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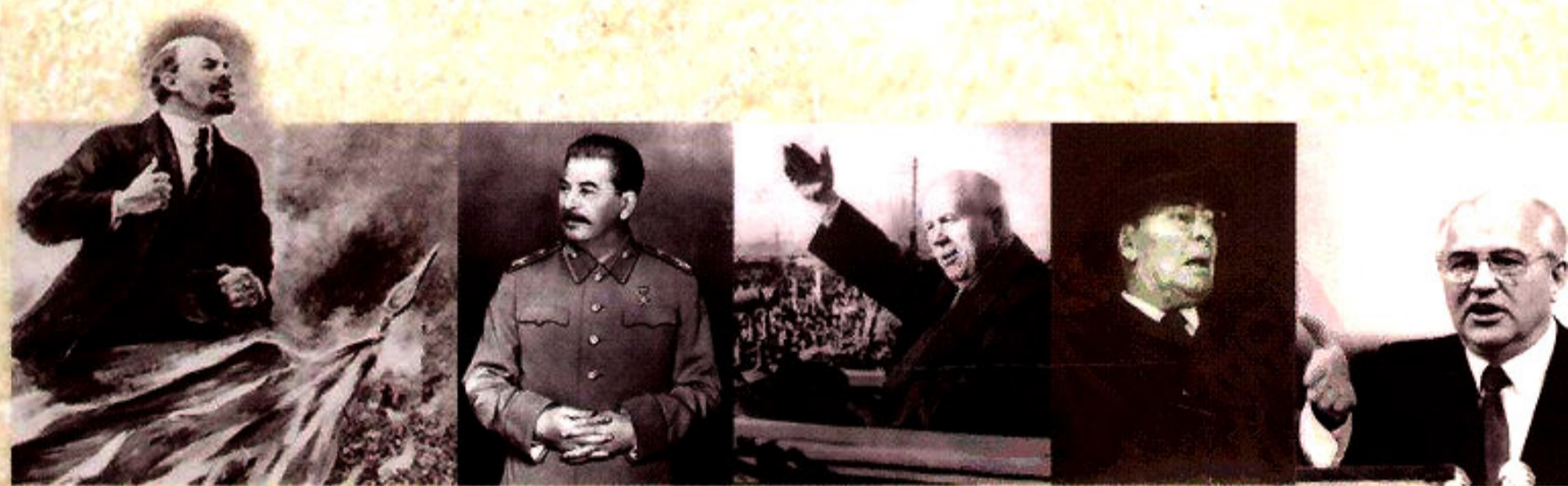
THE TRUTH ABOUT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101 IMPORTANT  
QUESTIONS

# 苏联真相

##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上

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主编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新华出版社



THE TRUTH ABOUT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101 IMPORTANT  
QUESTIONS

# 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上

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主编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等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011 - 9404 - 9

I. ①苏… II. ①陆… III. ①苏联—历史—研究 IV. 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145 号

---

##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主 编：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责任编辑：刘 飞

特约编辑：江建明

封面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08

字 数：15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404 - 9

定 价：246.00 元 (全三册)

---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mailto: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

# 序 一

阎明复

由于工作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一直十分关注苏联问题。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我国国内的学者撰写了不少论著，对苏联70年的历史、它的兴衰、中苏关系与最后解体原因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应该说，取得了不少进展。我对研究这些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特别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继续探索，研究苏联问题，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纵观全书内容，我认为，本书的重要意义首先是有利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与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发展道路来看，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正如书中提出的，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这已被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

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本书还用了较多的篇幅研究斯大林之后各个时期改革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最后失败的原因。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虽取得一些进展，理论上亦有所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行政指令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用地方的行政指令代替中央的行政指令。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头几年还坚持推行改革，后来就停滞不前，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一词也不准用了，只能用“完善”一词。所以，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一方面他看到对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紧迫性，着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后来又失去了控制，最后迷失了方向，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从本书对这三个时期的概括性分析可以看到，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确实像小平同志讲的只能是死路一条。但同时，改革又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要与时代发展的潮流、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本国的实际相适应。

本书的写作形式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把大量的人们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起来（其中不少问题是过去与现在、国内与国外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以问题解答的方式加以论述，这便于广大读者十分方便地找到自己关心的或长期迷惑不解的问题的答案。

特别要指出的是，参加本书撰稿的作者，绝大多数是长期乃至一辈子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十分熟悉苏联的情况，手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学风严谨，这保证了本书的学术水平。我深信，本书值得重视与阅读，读它可以引起我们对苏联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给人以启发，这对于推动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是大有益处的。有鉴于此，我也就欣然提笔，写些想法，作为本书之序，亦是权作向读者作一推荐。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会荣誉会长。）

## 序 二

李凤林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和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苏联之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苏联人的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大论战，在激烈的对抗情绪下都对对方有许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脱危机，叶利钦执政时期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共和国、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会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俄罗斯大选。这次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轮大选中他并没有

当选，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诺夫。按照事情的逻辑，既然叶利钦让人们生活更困难，人们应该让俄共重新掌权。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 304 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 74 年。在这 74 年中，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个民族共和国都有了自已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 30 年代大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在 20 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1921 年、1932—1933 年和 1946—1947 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人祸。1907—1913 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 45%，1963 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到 70 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 年代中期，每 3 吨粮食食品中就有 1 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了衰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为什么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却长期无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中苏关系、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突破苏联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

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 1991 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 20 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 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在此，我想利用为本书作序的机会，就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首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 1929 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信心。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一直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



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了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实际上稍懂点儿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有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sup>①</sup>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sup>②</sup>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

---

<sup>①</sup> 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第1版。

<sup>②</sup>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当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罪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还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本书作者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

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sup>①</sup> 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 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说了斯大林不少好

---

<sup>①</sup>（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 1939—1973》，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7 页。

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设的强国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与张学良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乘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那里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

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sup>①</sup> 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sup>②</sup> 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

① 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 558，ОП. 11，Д. 62，Л. 71—72.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253页。

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sup>①</sup> 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sup>②</sup>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sup>③</sup> 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sup>④</sup>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sup>⑤</sup> 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②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第260页。

③ 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5页。

⑤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332页。

####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带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 **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我认为，那种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 **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同志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值得讨论。

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



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 2000 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 74 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苏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

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sup>①</sup>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苏共自身也没有加强民主建设，仍保持着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党的各级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党群关系紧张。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干部按级别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

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且不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两个人而言，他们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失控与最后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

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

---

<sup>①</sup>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南风窗》2009年第24期，第33页。

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不是老话、套话，这里包含着对苏共执政教训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多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读者共同思考。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希望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 前 言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很重视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明确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①</sup>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束缚，从尊重群众的首创性出发，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自已的特色，正如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2008年12月18日，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与分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总结其提供的经验教训。

我们组织编写本书已酝酿很久。不仅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组织者，而且是参与本书撰写的作者和很多同行，都深切感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与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之际，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科学地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成为一个十分迫切与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下决心编写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书中涉及的101个问题分6编：

第一编、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这一部分首先是简要地考察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特征，接着，论述有关十月革命的问题与十月革命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重点研究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分析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十月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列宁是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

第二编、斯大林时期。这一部分用了较多篇幅评析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在苏联执政时期最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对苏联整个发展历史影响最大。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推行到东欧等其他国家。这部分重点分析的问题有：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与主要弊端；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与大清洗政策及其产生的后果；斯大林缘何抛弃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有关“阶级斗争尖锐化”、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所起的作用；怎样对苏联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它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什么关系。

第三编、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政策，绕不开的一步是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时期的重要标志。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档案材料表明，“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赫鲁晓夫是二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如何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如何正确认识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这一时期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与失败的原因，是这一部分要着重分析的问题。另外，在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发生了大论战，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出现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亦是这一部分要说清楚的问题。

第四编、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等于1964年10月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这一部分主要分析这18年对苏联的兴亡究竟起什么作用，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的历史地位。本书作者认为，如果对这一时期给予总体评价，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应视为停滞时期，是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形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这18年里改革停滞不前，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大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对外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从而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

第五编、戈尔巴乔夫时期。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病夫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我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政策与其本人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有人把苏联剧变归结为个别领导人的责任，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结果。简言之，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等。考虑上述情况，本书在这一部分，集中分析的问题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缘何提出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一再强调改革紧迫性，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及如何认识其对外政策新思维等。总的来说，本书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首先是改革者，其次是改革的失败者，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会忽略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导致笼统地否定改革的必要性。

第六编、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这个问题既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本书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苏联剧变的原因。应该说，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sup>①</sup>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其中某个因素的作用。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本书作者明确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sup>①</sup> 我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sup>②</sup> 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sup>③</sup>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②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同志指出：“20 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sup>①</sup>

我们认为，研究苏联问题，要有科学的态度，要以中国人的立场去分析问题，要独立思考，切勿以苏联、俄国某些学者与媒体，从他们本国利益乃至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看法为依据，不加分析地说什么俄国出现了“斯大林热”，现在重评斯大林了，“重评苏联历史”了。俄国人对其历史自有自己的看法，当权者也在让历史研究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为重振俄罗斯大国与强国地位服务。对苏联历史的“重评”也好，“重新解读”也罢，并不意味着向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回归。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对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都是否定的，他们的目标是使俄国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享受自由、平等和富裕。对于我国学者来说，应该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由于失去了昔日的大国地位，今后还会通过宣扬苏联和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来重塑大国形象，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切勿把他们的强国主义视为国际主义。学者要有良知，社会主义更应是讲究伦理道德的社会，不能用斯大林的功绩为其错误辩护。

我们要求本书所有撰稿人，力求做到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这是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对已有的有关著作要吸取其所长，对不同的观点本着“双百”方针，根据历史事实以平等的态度进行讨论。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我国苏联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有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利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文章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由于作者较多，涉及的问题有些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某些内容难免有交叉，引文有重复，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些差异。此外，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某些文章曾发表过，有些文章在原来基础上又作了修订和补充。

由于苏联问题十分复杂，本书涉及的领域很广泛，我们的水平又有限，书中肯定有不少缺点与错误，恳切地希望得到同行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主 编

---

<sup>①</sup> 《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 目 录

序一 .....	阎明复 (1)
序二 .....	李凤林 (3)
前言 .....	主 编 (1)

## 第一编 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

1. 1917 年革命前的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	(3)
2.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	(16)
3. 列宁为什么说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	(34)
4. 二月革命真相如何? .....	(46)
5.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夺得政权的? .....	(61)
6. 十月武装起义是怎样进行的? .....	(78)
7.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	(84)
8.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	(94)
9. 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 其后果如何? .....	(106)
10. 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	(120)
11. 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夭折了? .....	(139)
12. 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的? .....	(159)
13. 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	(170)
14. 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	(180)

## 第二编 斯大林时期

15. 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	(191)
16. 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 .....	(214)
17. 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	(242)
18. 如何认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 .....	(263)
19. 20 世纪 30 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	(280)
20.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联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	(286)
21. 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	(301)
22.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	(311)
23. “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	(329)
24.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	(336)
2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	(344)
26. 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	(354)
27. 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	(367)
28.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	(391)
29.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是什么? .....	(399)
30. 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	(408)
31. 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与协定? .....	(426)
32. 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东方战线”? .....	(444)
33. 如何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 .....	(458)
34. 为什么说了解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是认识赫鲁晓夫 “解冻”的钥匙? .....	(479)
35. 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	(493)
36. 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	(503)
37. 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	(519)
38. 冷战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	(539)
39.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	(555)
40. 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	(567)

41.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 (589)
42. 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 (606)
43. 俄罗斯在重新评价和肯定斯大林吗? ..... (620)

###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44.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 (645)
45. “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 ..... (669)
46.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 (687)
47. 能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忘恩负义”吗? ..... (717)
48.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 (734)
49.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问题? ..... (747)
50.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 (757)
51. 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 (777)
52.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 (799)
53.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 (813)
54. 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 (818)

### 第四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

55. 如何在苏联历史上给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定位? ..... (827)
56.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缘何停滞不前? ..... (847)
57. 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 (865)
58.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 (878)
59. 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搞军备竞赛? ..... (895)
60.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持不同政见者”? ..... (911)
61. 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 (926)
62. 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 (939)

###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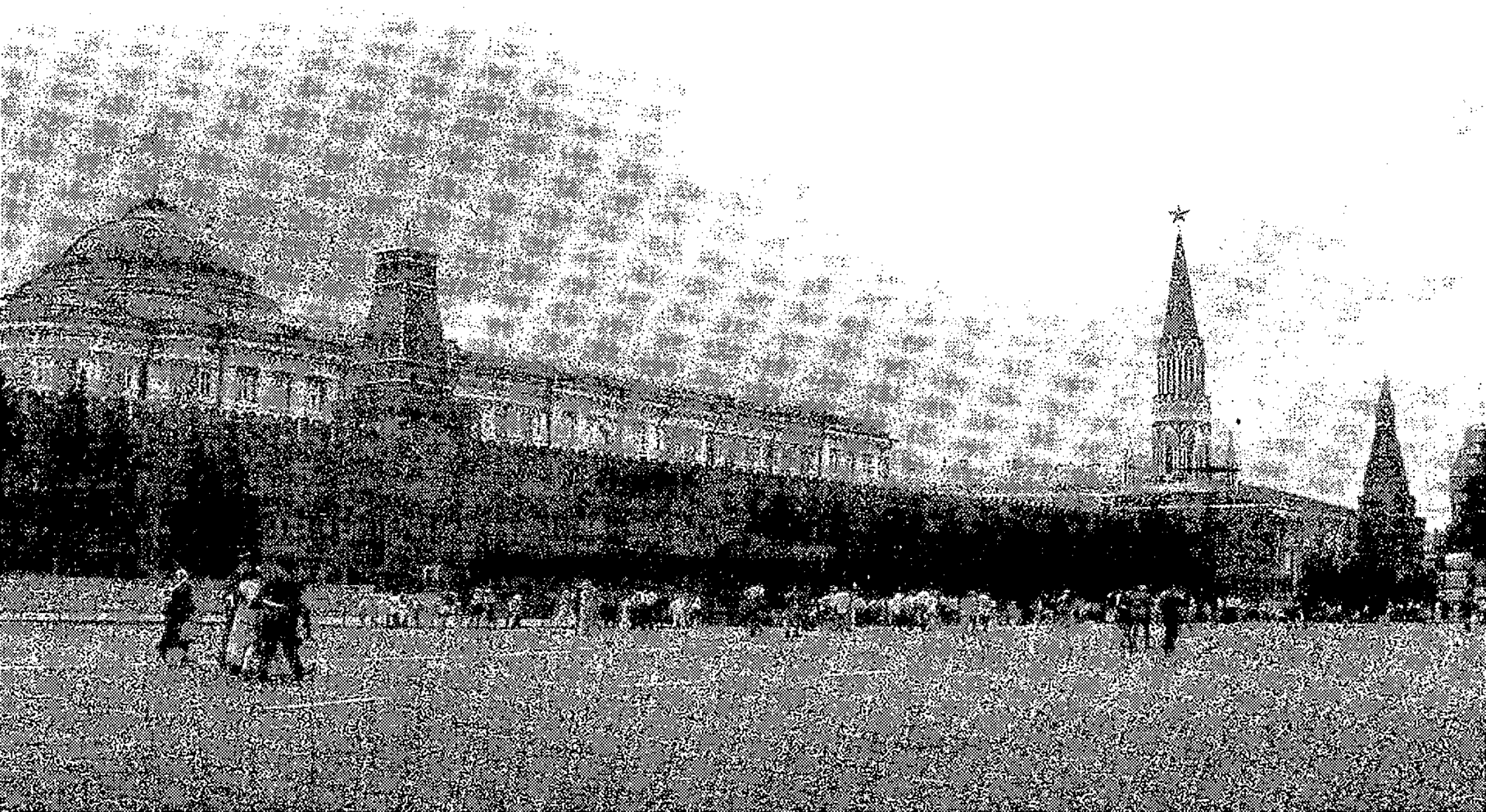
- 63. 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 (959)
- 64.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 (978)
- 65.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经济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 ..... (993)
- 66.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 (1005)
- 67. 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 (1022)
- 68. 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话的真相如何? ..... (1034)
- 69.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 (1042)
- 70. 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 (1057)
- 71. 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变化的? ..... (1070)
- 72. “8·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 (1081)
- 73.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 (1114)
- 74.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 (1134)
- 75. 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 (1144)
- 76. 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苏东剧变的? ..... (1165)

###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 77.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1179)
- 78. 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 (1187)
- 79. 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 (1204)
- 80. 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 (1216)
- 81. 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 (1227)
- 82. 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 (1246)
- 83. 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 (1263)
- 84. 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问题? ..... (1277)
- 85. 法制建设的缺失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 (1288)
- 86.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 (1299)

87. 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	(1314)
88. 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	(1337)
89. 苏联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	(1350)
90.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1376)
91.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	(1390)
92. 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	(1416)
93. 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	(1425)
94.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	(1435)
95. 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	(1446)
96.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	(1457)
97. 苏联领导人的收入是多少? .....	(1465)
98.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	(1474)
99. 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	(1483)
100. 《莫洛托夫访谈录》说明了什么问题? .....	(1522)
101. 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	(1559)
苏联大事记 .....	(1579)
本书作者简介 .....	(1658)

# 第一编 十月革命与 列宁时期





# 1. 1917 年革命前的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姚 海

## 历史文化传统

自 9 世纪古代国家形成以来，俄罗斯文化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交汇之地，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

9 世纪初，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来到东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平原，参与和影响了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他们开辟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建立和繁荣。9 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882 年，留里克的继承者奥列格征服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

9—10 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贸易和战争，使得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988 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 13 世纪初期被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 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



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1328年起，莫斯科公国的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沙皇政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来说意义重大的新因素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 赶超型现代化道路的矛盾性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国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目标、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

国的野蛮”<sup>①</sup>。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而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奴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农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

农民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社会结构的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迫使沙皇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沙皇政权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国民教育、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改革所达到的程度和产生的影响：一是1878年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并致其重伤，但有陪审团和律师的法庭宣判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47页。

其无罪并当庭释放；二是1881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前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这将是未来议会的雏形。

但政府实行的改革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 社会发展的困境

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快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对权力的支配地位与要求立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其次是19世纪末叶俄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

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sup>①</sup> 人口的增长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再次是19世纪末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造成了俄国农村的普遍饥饿。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绵延不绝。“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sup>②</sup>

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政治领域，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而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它对社会采取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立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革命派别结成了联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欢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sup>③</sup> 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

---

① Анфимов А. М.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1881—1904. М., 1980. С. 229.

② Белоусов Р.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 На рубеже двух столетий. М., 1999. С. 21, 49.

③ Леонтович В. 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ариж. 1980. С. 237.

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 19 世纪最后近 20 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

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 1905 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俄国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是，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 系统性危机加剧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 10 月 17 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 1917 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 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决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 1906 年 11 月 9 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

进步的。”<sup>①</sup>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不公正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快，农民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这一事件表明，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缓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还是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作用。“大约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依旧落后于欧洲大国，但农业改革扫除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经济进步打开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可以通过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维护自己利益。在大城市里面，廉价剧院、赌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209页。

平提高的结果。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新兵的识字比例从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走上了新路，尝试着新的形式。这些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sup>①</sup>

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后，政权的改革陷于停滞，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作出的反应。1911年开始，俄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趋于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罢工抗议浪潮，其中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质，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1909—1913年，俄国工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比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sup>②</sup> 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sup>③</sup> 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

① 参阅 Геллер М. 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1997. Том 3. С. 244.

②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 6. С. 6.

③ Owen T. G. 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 1855—1905. Cambridge, 1981, p. 200.

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在知识阶层中，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也在蔓延。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加剧了战前的政治危机。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对社会和政治运动加强了高压态势。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认为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立宪民主党左翼领袖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尖锐矛盾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 战争酝酿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在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局面，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



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机器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马和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而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同期的物价要比1914年增加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其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sup>①</sup>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

<sup>①</sup> Буржу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 Л., 1927. С. 1—2.

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sup>①</sup>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而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

---

<sup>①</sup>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42.

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sup>①</sup>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并达成某些妥协，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聚集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sup>②</sup>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在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科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杜马主席罗将科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

---

<sup>①</sup>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45.

<sup>②</sup> Палелог М.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 Пг. 1923. С. 154.

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sup>①</sup>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警察机关的报告指出：“立宪民主党最近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政治影响，其领袖成了真正的时势英雄。”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京。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借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

---

<sup>①</sup> ГАРФ. Ф. 523, ОП. 3, Д. 22.

## 2.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陆南泉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如果与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相比大约要晚 200 年。1861 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俄国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 20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总的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落后得多，并有其自身的一些明显的特点。

### 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

长期以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制约，要比欧美资本主义兴起的进程与发展程度有很大差距。因此，农奴制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农奴制是一种强迫劳动，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阻碍了技术进步，同时也阻碍了劳动市场的形成。这样，使俄国工业革命与农奴制发生严重冲突。另外，长期实行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日益加强，俄国农村中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争取人身解放，以及为争取获得作为小农经济生产者独立经营地位的必要的土地，农民频繁地进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在农奴制手工工场中，也爆发了农奴的反抗运动。

在上述情况下，俄国沙皇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来缓解矛盾，达到挽救封建王朝的目的：一是用加紧对外扩张、掠夺新的领土和市场的办法，来转移国内人民

的视线。19世纪上半叶，俄国先后通过侵略战争，夺取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高加索；在中国东北强行割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sup>①</sup>但侵略战争并没有达到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挽救农奴制。1854年3月，英法等国向俄国宣战，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迫使沙俄交出对黑海及沿海地区的控制权。沙俄的战败，清楚地表明：第一，由于沙俄向东北扩张的势头遭到严重挫折，从而失去了主导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也反映了沙俄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存在巨大差距；第二，战争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对此列宁指出：“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sup>②</sup>由于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生活更加恶化，因而，战争不仅没有缓解农奴制的危机，反而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据沙皇政府第三厅的记录，1858年发生了86次骚动，1859年为90次。在1861年到1863年，俄国就发生了两千多起农民骚动，其中1861年就达1176次。在第一种办法挽救不了农奴制的条件下，沙俄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改革的办法，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于1861年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宣布农奴的人身解放，规定了农民赎买土地的有关办法。法令的具体内容是：有关农奴的人身解放方面，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出卖农民或交换农奴和任意惩罚农民的权利；农民有自由处理自身财产的权利；农民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可以订立契约和拥有动产与不动产。有关处理封建社会核心问题的土地所有制方面，法令规定在交纳高额赎金的条件下，给农民以份地，归其长期使用。俄国农民用高价赎取的土地，在大部分地区是由村社共同占有，分给农民使用。这里要指出的是，农民在获得份地的同时，必须承担劳役租、代役租与履行为贵族地主服务的义务，这些都由地主制定的契约加以规定，并由地主加以监督执行。这次农民改革的法令，只涉及地主农奴。1863年和1866年此法令的一些基本原则又推行到100余万采邑农奴与950万国家农奴中去。之后，又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进行农民改革。

1861年的农民改革法令，虽然使2000多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并没有动摇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与支配权。就是说，作为确保封建社会地主统治与

---

<sup>①</sup> 在1864年和19世纪80年代，沙俄又侵占中国5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沙俄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74页。

剥削农民的基础——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61年的法令明文规定：“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说，在进行农民改革时，首先不仅保持了地主原来的土地，并以“割地”形式夺取了农民20%以上土地，有些地区，甚至高达40%，其次，在划归农民耕种时要确保地主首先占有足够数量的优质土地，并还可以随时收回农民的份地，就连农民赎买的份地，地主也同样有权赎回。

尽管1861年的不彻底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改革，远未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俄国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它毕竟标志着俄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开始，推动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进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演进，迫使农村地主经济逐步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过程在俄国是十分缓慢的。这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农民改革后，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地主并没有经营大农场所需的农具和经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验。另外，改革后，劳役制虽遭到了破坏，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大量的土地乃控制在地主手里，地主还享有各种特权。

第二，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改革前，俄国的农民主要由贵族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和宫廷农奴三部分构成。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与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数的20%、30%和50%，各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富裕农户占74%，而贫农只有9%。<sup>①</sup>但是，很多贫农由于无力耕种手中的土地，不得不出租给富农，而自己到城市去做雇工。富农除了自己的份地外，还购入和租入大量土地。这样，占农户20%的富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占全部农田的35%—50%，而占农户总数50%的贫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只有20%—30%。耕畜与农具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38%—62%的耕畜和70%—86%的改良农具属于富农，而贫农只有10%—31%的耕畜和1%—4%的改良农具。<sup>②</sup>在1896—1900年，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就从560万增加到660万（农户总数为1100万户）。

<sup>①</sup>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28页。

<sup>②</sup>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这意味着，2400万—3000万的农民生活极为困难。<sup>①</sup> 农民分化，使得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要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全俄农业工人已超过350万人，占农村中成年劳动力的20%。再加上农民改革时已使2000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提供自由劳动力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随着农民分化趋势的发展，开始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主，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还经营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这约有150万户。与此同时，开始形成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农、短工和其他工人。他们占农户总数一半以上，约650万户。<sup>②</sup>

第三，农民改革后，促进了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的发展。1876—1894年，农业机器增加2.5倍以上。1864—1905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近50%，粮食产量增加1.6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4.5倍。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提高，在改革后的40年间，每个劳动者的粮食平均产量增加27%左右，马铃薯增加2倍以上。<sup>③</sup>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商品流转量与国内贸易市场的扩大。农民改革初期，国内商品的流转主要依赖国内大多数农民从事生产的农产品。后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与交通的发展，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使更大部分的农产品变成了商品。同时，由于农民的税捐负担重与必须偿还土地赎金等因素，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出售自己的农产品。

俄国农业生产发展后，还形成了专业化的农牧区，在各地出现了一些商业性谷物地区和畜牧业地区。这对增加农畜产品的商品交换起了不少作用。这从谷物的铁路运输的增长就可以证明。1876—1880年至1891—1895年间，6种主要谷物运输量平均增长了1倍多，谷物运输量在1861—1895年间增加了4.5倍。<sup>④</sup>

俄国内市场的扩大，还与农民改革后俄国把土地变成商品有关。1863—186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为860万俄亩，1893—189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几乎增加了

---

① 参见（苏）B·T·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②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187页。

③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187页。

④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187页。



1 倍，而且 90 年代的地价比 60 年代增加了 2 倍。<sup>①</sup>

还应看到，农民改革后，俄国工业也得到发展，市场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得商品交换增加，市场扩大，从而大大冲击了自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但是，1861 年的农民改革，是使俄国进一步走上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从总体上讲，不论在经济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方面，都仍然是由贵族地主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因此，改革后社会经济矛盾并没有缓解，而是日益发展与深化。到 1905 年广大农民的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波及全国 1/3 的农村地区，全年农民起义达 3000 多起，仅 1905 年底前的 3 个月内，就有农民起义 1590 次。在沙俄军队中，这一年由穿军服的农民引发的士兵起义达百余次。<sup>②</sup> 在上述背景下，被 1905—1907 年工农革命运动吓坏了的沙皇专制政权，看到了单单靠残酷的镇压手段难以维持统治。为了保持政权，顺应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考虑对农民实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样在 1906—1910 年实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1906 年 11 月 9 日颁布法令，1910 年 6 月 14 日为国家杜马批准的关于农民退出公社的条件的法律，该法令的标题是“关于有关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某些规定的变更和补充”。该法令的基本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可以把份地变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具体办法是，把全部农民的土地分成两种：一种是村社自从分配土地以后，不实行土地的再分配，这种不再分配的村社，直接确认为份地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另一种是村社实行再分配的，其任何农户有权把重分土地时所有应划归他的土地都可以随时要求确定为他个人的财产。所有转为农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或抵押。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从 1906 年 11 月到 1916 年 1 月 1 日，在申请确定土地为私有财产的 270 万农户中，完全退出村社的农户有 200 万，退出村社最多的是 1908—1909 年，要占有所有各年退出去的总数一半以上。这次改革是继 1861 年改革之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第二次以地主方式

---

<sup>①</sup>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讲义》上册，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276 页。

<sup>②</sup>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 页。

清洗土地”。列宁把要根本破坏旧的、中世纪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斯托雷平改革称为“最后一个气门”。他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sup>①</sup>这一改革也并没有缓解农村中不可调和矛盾，农民运动并没有终止，富农——独立农庄主（斯托雷平式的地主）和农村贫农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更趋尖锐化。

从对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俄播种面积，在前帝俄 71 个省和区，从 1901—1905 年 5 年的平均 8830 万俄亩增加到 1911—1913 年时期的 9760 万俄亩，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 10.8%。同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更快，棉田扩大了 111.6%，向日葵——61%，甜菜——39.5%，烟草——18.5%。农业中使用机器的数量也增加了，从 1900 年到 1913 年使用机器的价值增加约 3 倍，但只是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大的富农经济中使用。农业中使用的化肥也有较大增加，1900 年进口 600 万普特（1 普特等于 16.38 公斤），1912 年进口了 3500 万普特，国内还生产了 324 万普特。谷物产量也有较大增长，1900—1904 年谷物年均产量为 39 亿普特。1909—1913 年增加到 46 亿普特，1913 年为丰收年，谷物产量达到 50 亿普特，按人均计算为 574.9 公斤。由于农业的发展，其商品率也有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主要依赖地主与富农经济的发展，以谷物为例，1913 年，地主与富农生产了全部粮食的一半（地主为 6000 万普特，富农为 1.9 亿普特），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 71.6%。与此同时，俄国农产品出口也随之增加，1911—1913 年比 1901—1905 年年均增加 60%。农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要指出的是，俄国农产品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沙皇政府实行“饥饿输出”改革的结果。当时沙皇的口号是“吃不饱，也得出口”。<sup>②</sup>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2 卷，第 20 页。

<sup>②</sup>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 200—201 页。

## 工业的发展

农民改革前，俄国工业主要表现两种形态：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城市小手工业。自17世纪后半期起，在俄国的手工业中已产生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作坊。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对工场手工业实行扶植与鼓励的政策。俄国工业在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过渡。与市场相联系的工场手工业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形态。到了18世纪末，俄国已有手工业工场1200个，其中冶金和金属加工业200个，轻工业（麻布业、呢绒业、丝绸业、棉织业和制革业）有近千家，共雇佣工人42万人。<sup>①</sup>到了19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对外军事扩张与西欧产业革命的影响，俄国的工场手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趋势，这标志着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1845年已有工场9994家，这个时期不少行业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1860年雇佣工人已达53万人，占工人总数的61.4%（其中加工工业的雇佣工人占87%）。棉纺织业在工业中发展最快，雇佣工人已占95%，并在19世纪初已开始使用蒸汽机。由于产业革命的兴起，带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860年的彼得堡成为机器制造业中心，已有15家机器制造厂。<sup>②</sup>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

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的是纺织工业，它也是俄国最先进的一个工业部门。1846年俄国已有70万纱锭。到1861年，机器纱锭已增加到200万个。1861年后，纺织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861—1881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机器织布工厂挤掉了手工织布业。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甜菜制糖业、造纸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1860年，使用蒸汽动力制糖厂生产的糖已占全国产量的84%，机器造纸占全部纸张生产的80%。

交通运输是俄国落后的一个部门，19世纪30年代俄国才修筑了第一条铁路（长1俄里），1851年建成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铁路，到1861年，在辽阔的俄国才约有1488俄里的铁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必须要有良好的交通道路。

<sup>①</sup>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310页。

<sup>②</sup>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第78页。

为此，沙俄在农民改革的头十年里，把 2/3 的资本投入铁路建筑。这使得从 1861—1881 年的 20 年间，建筑铁路 19500 俄里。铁路建筑的发展，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开始生产铁轨。在农民改革后的 40 年中（即从 1861—1900 年），生铁的产量与石油产量迅速地增长，几乎增加了 10 倍。乌克兰的煤产量在 1861—1881 年期间，增加了 14 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形成了。从 1861—1881 年，工人人数增加了 1 倍，到 1881 年已达到 66.8 万人，此时，俄国已有一半工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工厂。<sup>①</sup>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俄国工业进入了一个发展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工业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俄国内市场的发展，并且俄国已卷入世界市场。

第二，1861 年农民改革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工业仍受到农村半农奴制与自然经济残余的严重影响，但进入 90 年代农民的分化进程加速了，城市人口与工业、商业的人口大大增加。对形成资本主义市场起了促进作用，亦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正如前面指出的，19 世纪 60—80 年代俄国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为 90 年代后期工业高涨打下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 70—80 年代大规模修建铁路，对今后的工业高涨具有重大的意义。1885 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为 26024 公里，1890 年为 30596 公里，1900 年为 53234 公里，这样，1885 年至 1900 年的 15 年中，俄国铁路网扩大了 1 倍。这一时期，铁路平均每年增长 2000 公里以上。到 1901 年长达 7000 多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大体完工。<sup>②</sup> 这条铁路对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经济联系，统一市场，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第四，引进外资对工业的推动作用。在工业高涨时期，投到俄国工业的外资增加了 4 倍，到 1900 年已达到了 10 亿卢布（1890 年为 2 亿卢布）。从 1896 年到 1900 年，成立了 190 家股份制企业，其中 1/4 是外国企业。外资在全俄股份资本中的比重，在 1890—1900 年期间由 1/3 强增长到约占 1/2。外国资本在采矿、冶

---

<sup>①</sup> 参见（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 2 卷，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443、447 页。

<sup>②</sup> 参见（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 2 卷，第 524 页。

金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高达 74%。南方的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俄国从外国进口了大量技术设备。在工业和铁路的投资中，有 25% 以上是用于进口设备的。<sup>①</sup> 列宁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外国的资本、工程师与工人大批地移入并且继续移入南俄，而在目前的狂热时期（1898 年），许多工厂也从美国搬到这里来。”<sup>②</sup>

第五，沙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发展国有经济与增加国家订货等政策，对 90 年代工业高涨也起了促进作用。沙俄政府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土地与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掌握的全部军事工业和 92% 的铁路投资，使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也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

由于上述原因，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就其速度而言，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俄国工业发展情况还可从表 1 材料中得到体现。

表 1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发展概况

年份	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	生产总额（百万卢布）
1890	32254	1424.7	1502.7
1900	38141	2373.4	3005.9

资料来源：（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 337 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10 年内，企业数增加了 18.3%，工人人数增加了 66.5%，工业产值增加了 1 倍。在这一期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值增加了 1.5 倍以上。金属冶炼与能源部门增长速度更快，生铁产量从 1890 年到 1900 年增加了 2 倍（从 5660 万普特增加到 17910 万普特），钢产量增加近 5 倍，石油产量增加了 1 倍。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国石油开采量与美国相等，而到该世纪末甚至曾一度超过美国。机器制造业在迅猛发展的铁路建筑业带动下，也得到较大的发

① 参见（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 2 卷，第 529 页；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 191 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448 页。

展。19世纪末，俄国已有569家工厂制造工业劳动工具，181家企业生产农业机器，14家机车和车厢工厂。纺织工业也是快速发展的部门，从1890—1900年，纺织生产的产品增加了97.5%，织布生产的产品量增加了75.4%。这10年间，俄国棉纺织工业的设备，平均每年增加220000只纱锭和6400台织布机。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与当时俄国的下列因素有关：一是沙俄政府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二是俄国建立了自己的纺织业原料基地。

工业的发展，使得俄国国内外贸易也得到很快发展。从1890—1900年，俄国内商品流转额几乎增长了1倍。在对外贸易中，谷物、糖、亚麻、木材、石油等产品的出口量大有增加。在工业高涨的19世纪末，俄国还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银行信贷系统。到1899年底，作为俄国货币中央发行机关、最大的国内短期信贷银行的国家银行，在全国各地区已有9个办事处与104个分行。另外，贵族土地银行有26家分行，农民土地银行有39个分行。还有42家商业股份银行，10家抵押贷款股份银行，116家信贷互助公司，241家城市银行，十分众多的储蓄银行网。

到了20世纪初，在19世纪后期工业高涨之后，俄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卷进了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些特点在俄国都有反映，但危机的严重性与持续时间要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一是俄国在经济上对外国依赖程度高；二是俄国19世纪后期工业高涨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俄国这次经济危机始于金融领域，并迅速波及各个工业部门，重工业危机最为严重。在危机期间，生铁产量下降了15%，顿巴斯矿井开工率为59%，炼焦厂为42%。在1900—1903年，仅大中型企业就倒闭了3000多家。<sup>①</sup>从1930年底起，俄国工业危机开始缓慢地消退。1904年开始了俄日战争，接着1905—1907年俄国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主要任务是扫清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此，革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及改变沙皇的专制统治制度。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经历了较长的萧条时期，到1909年才开始新的高涨。这次工业的高涨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1909—1913年（1911年除外）农业丰收。在有利的国际行情下，农产品输出增加，这使俄国每年比19世纪90年代多收入8亿—9亿卢

---

<sup>①</sup>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202页。

布外汇，为工业积累了资本；其次，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剧了农民分化，它一方面扩大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地主出卖土地获得的资金大部分投入了工业；第三，沙俄政府为了加紧对外扩张而积极扩充军备，仅海军造舰费就从1908年的3600万卢布增加到1912年的1.1亿卢布，增加两倍多。1913年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开支的26.5%。十分明显，国家军事订货的增加，对工业发展起了刺激作用；第四，1905年的革命被镇压后，俄国内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势，这为外国资本重新大量进入俄国提供了条件。<sup>①</sup> 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俄国对英、法等国在财政经济上的依赖，决定了它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参战后，俄国经济逐步转入战时轨道，导致军事工业的增长，1916年军工生产比1913年增加1.3倍，军火与军事装备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7.4%。但是，战争对俄国整个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出现了普遍的衰落。从1913—1917年，生铁产量下降了36%，煤下降了21%，石油下降了26%，农业机器下降了90%。由于西部地区被占领，工业损失20%左右。战争对农业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使牲畜减少了30%。1917年的谷物播种面积比1914年减少约1000万俄亩，该年的谷物产量几乎比战前下降了25%。<sup>②</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势就已出现，而在1914—1917年战争期间，国家垄断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所著的《为了面包与和平》这一论文中指出：“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已是贴近社会主义的前阶段。”<sup>③</sup>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广大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与痛苦，从而反对战争与反对沙皇专制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与士兵的反战活动大规模地展开，街头出现了很多红旗，上面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打倒战争”等标语。1917年俄历1月9日，彼得堡等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罢工与示威，“要面包，不要战争！”“打倒沙皇政府”的示威发展为武装起义。此时，沙皇军队也纷纷

①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202页。

②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213—21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71页。

掉转枪口指向沙俄制度。1917年俄历2月俄国人民的武装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政策，对内实行一系列反人民的政策，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使国内已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二月革命后的7个月里，就关闭了799家工厂，导致16万多工人失业。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卢布贬值了9/10。1917年1月到10月，莫斯科每人每月只能领到8公斤口粮。1917年的工业产值比上年减少了36.4%，其中采矿业减少了44%，金属加工工业减少36%，纺织业减少了33%。到1917年底，俄国的军事开支约为500亿卢布，这个数目超过1917年以前100年发生的所有战争的费用。<sup>①</sup>这给俄国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上述情况下，工人罢工和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不断发生，1917年的8—10月，仅莫斯科就发生了十多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到10月革命前夕，农民运动已波及俄国91.2%的县份。这时列宁在和平夺取政权完全失去希望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准备武装起义，最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 基本特点

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在经济方面具有自身的一些重要特点。

### （一）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

长期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就是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一直受着浓厚的传统的封建关系的束缚。所以列宁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sup>②</sup>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还仍是一个大地主封建土地占有制国家。像列宁所说的：就是在“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的管理方法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sup>③</sup>俄国资本主义之

<sup>①</sup>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第423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44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5页。



所以被封建关系的密网紧紧地缠绕着，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不论是1861年的农民革命还是1906—1910年实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封建主义的土地关系，实际上都是以“地主方式清洗土地”，仍然存在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另外，还应看到，俄国的大地主与工业资本家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俄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还有约一半的大地主同时兼管资本主义企业。就是在俄国垄断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剥削的方法，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经济中还居优势。还有不少垄断组织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半封建性质，例如，糖业辛迪加就是由制糖工业资本家与种植甜菜的大地主共同组成的。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除了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外，还存在着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宗法式的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列宁指出，俄国经济的特点“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sup>①</sup>

第二，俄国资本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美欧国家不同。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通过对封建地主反复的斗争和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摧垮封建统治，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俄国，对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关系的改革，一直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不仅不触及贵族地主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他们的利益加以保护，这自然就难以根本消除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从而成为阻碍俄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从政治上来讲，沙皇长期实行的专制制度，它所依赖的是贵族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联合专政。列宁把沙皇专制制度视为俄国封建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是“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sup>②</sup> 这种政治制度下，俄国经济中的农奴制残余及其浓厚的封建性都不可能消除。

## （二）垄断与集中程度高

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晚于美欧国家，其经济亦比美欧国家落后，但它的垄断与集中程度要比美欧国家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出现了垄断联合组织。从20世纪开始，垄断组织成了俄国经济生活的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00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85页。

基础之一。到1909年初为止，俄国45个工业部门中计有140个垄断联合组织，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200个全俄或者省规模的卡特尔和辛迪加。银行资本也已高度集中，12家最大的银行集中了俄国所有50家股份银行80%的固定资产和债务，参与了90%以上的筹措资金和工业信贷的业务。俄国在垄断化的程度方面处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由‘煤炭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sup>①</sup>“五金公司”辛迪加（俄罗斯冶金工厂产品销售公司）联合了30家工厂，垄断了俄国冶金工业80%以上的产品；“铜业”辛迪加的各个工厂提供了国内90%的铜产量，在石油工业中，三家垄断联合组织控制了俄国石油开采总量的一半以上；独霸顿巴斯采煤工业的“煤炭公司”辛迪加控制了国内主要矿区采煤量的75%；等等。<sup>②</sup>俄国在1910年，拥有工人500人以上的企业，占了全部工人数的53.4%，同年美国则只占了将近33%。在俄国，拥有工人1000人以上的企业数目，从1901年到1910年增加约50%；1910年在这些企业中做工的有70万人。在棉纺织工业中，有1000人以上做工的工厂，1913年占了全部工人数的3/4。1900年，俄南部拥有工人3500人以上的工厂还只有3家，1914年，这样的工厂已有9家，这9家工厂占了南部冶金工业动力设备总量的4/5，生铁产量的3/4，工人总数的4/5。<sup>③</sup>

俄国经济垄断与集中程度高，除了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外，还与它工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其他国家晚有关，它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与资本方面的帮助，从而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发展进程，这使得用外国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快速发展。另一个因素是俄国国有经济发展快，到了20世纪后，国有经济成了俄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从控制大量国有土地、森林、矿山、铁路、军事工业和邮电等方面所获得的财政收入，1897年为4.84亿卢布，1913年增加到9.64亿卢布，增长了3倍，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62页。

② 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复旦大学经济系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页。

③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397—398页。

由 34% 上升到 60%。<sup>①</sup> 这也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依赖性很大。

### （三）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

在经济、财政上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是俄国经济的又一个特点。1900 年外国投资占俄国国内全部股份资本的 45%。1917 年前，全部外国投资的 54.7%（约 22 亿卢布）用于矿山和冶金工业。在南方和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的。在外国资本中一半属于法国和比利时。外资的大量引入，一方面促进了俄国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俄国沙皇政府与俄国资本依附于西欧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还使得俄国的燃料、冶金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受外国资本的控制。

俄国经济对外依附程度高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的外债不断增加。1900 年外债为 39.95 亿卢布，到 1913 年增加到 54.61 亿卢布，增长了 36.7%。<sup>②</sup>

### （四）经济的落后

尽管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如果和现代技术与文化水平下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那是慢的。列宁对此分析说：“它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sup>③</sup>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主要表现在：

第一，俄国工业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直到十月革命前的 1914 年，它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14 年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结构是：农业占有 53.7%，工业、交通、商业、事业总共占 46.3%；国民收入中农业占 53.6%，其余占 46.4%。<sup>④</sup> 1912 年城市人口占全俄人口的 14%，农村人口占 86%。从 1914 年 1 月 1 日俄国国民财富的构成来看，农业、林业和渔业占首位——34.8%，而工业

①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 207 页。

② 参见（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20 世纪初的俄国》，莫斯科 2002 年版，第 19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2 页。

④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本），第 112 页。

只占 8.8%。<sup>①</sup> 还应指出，俄国农业生产十分落后。1910 年俄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及德国的 1/9，美国的 1/20。<sup>②</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农业中完全没有拖拉机、电犁和其他新技术。保留了 300 万张木犁、790 万个木索哈，只有 81.1 万台收割机和 27 万台蒸汽机。俄国农业中机器和畜力之比为 24:100，当时英国为 152:100，美国为 420:100。化肥使用量方面俄国也明显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实际上自己不能生产矿物肥料。俄国人均生产粮食为 26 普特，而当时美国为 48 普特，加拿大为 73 普特。<sup>③</sup> 1909—1913 年俄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每一俄亩为 45 普特，只及法国的 1/2，德国的 1/3。农业的商品率也不高，就是在 1913 年也仅为 26%。至于俄国农村文化水平的情况更为糟糕，到了革命后的 1920 年文盲仍高达 70%。

第二，从工业发展情况来看，其增长速度虽曾一度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整个工业水平不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很低（详见表 2）。

表 2 俄、美、英、德、法的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

国家	1881—1885 年	1896—1900 年	1913 年
俄国	3.4	5.0	5.3
美国	28.6	30.1	35.8
英国	26.6	19.5	14.0
德国	13.9	16.6	15.7
法国	8.6	7.1	6.4

资料来源：（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20 世纪初的俄国》，第 172 页。

从上表材料可以看到，1913 年俄国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仅为 5.3%，比 1896—1900 年的 5.0% 并没有提高多少。至于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也很低，只及法国的 1/2.5，英国的 1/4.6，德国的 1/6，美国的 1/14。俄国的生铁产量几乎只

① 参见（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20 世纪初的俄国》，莫斯科 2002 年版，第 174 页。

②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 392 页。

③ 参见（苏）B·T·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第 98—99 页。

及美国的 1/8，煤产量只及美国的 1/10。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更低，1913 年俄国按人均计算的电力为 11 千瓦时，而美国同期为俄国的 20 倍以上，煤约为美国和英国的 1/33，生铁为美国的 1/12.5，英国的 1/8.3，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 1/13，等等。1900—1913 年期间，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 1/10。<sup>①</sup>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并没有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大部分机器依赖进口。在进口的工业产品中，机器设备要占进口总额的 30%—35%。俄国最为发达的纺织工业中有 70% 以上的机器设备从国外进口。俄国的机器制造在工业生产总额中只占 7%。工业的落后，在工业的部门结构中也得到明显的反映（详见表 3）。

表 3 俄国工业生产的部门结构  
(以产品价值计算，单位为万卢布；占当年的%)

年份	纺织	食品	畜产品加工	矿业	冶金加工	化工	建材	农产品加工
1887	453.8	451.0	64.0	185.8	114.4	54.8	29.0	48.1
	32.4	32.2	4.6	13.2	8.2	3.9	2.1	3.4
1900	805.2	767.4	118.8	671.6	357.8	131.2	80.7	153.3
	26.1	24.9	3.8	21.8	11.6	4.2	2.6	5.0
1913	1854.9	1443.7	240.4	1182.4	769.0	478.6	187.7	315.4
	28.6	22.3	3.7	18.3	11.9	7.4	2.9	4.9

资料来源：（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20 世纪初的俄国》，第 170 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1913 年，纺织、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工业，其产值占俄国工业总产值的 59.5%。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对革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俄国经济如何改造，必然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影响，亦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列宁指出：“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从资本主义向社

<sup>①</sup>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 396—397 页。

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sup>①</sup>“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sup>②</sup>列宁谈到俄国时写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sup>③</sup>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4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70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02—203页。

### 3. 列宁为什么说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郑异凡

国情决定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路线。俄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俄国的一些革命家都一致认为，俄国面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

19世纪末俄国有过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派认为，俄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借助于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则认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实际上那时候（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不久，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正因为还不太明显，所以才会发生争论，需要写文章，甚至大部头著作，如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事实很清楚，那就无需论证，更不会争论了。

1919年俄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关于党纲问题曾有过争论，列宁主张把资本主义写进党纲，而布哈林主张只写帝国主义。针对列宁所说的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布哈林承认，确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重心转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旧纲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俄国更是如此，它保存了大

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它们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分同时并存，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还在进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但是纲领谈的主要的不是这些落后的形式，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首位。

布哈林的议论也说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非常不发达的状态，保存着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这个判断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成为俄国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列宁像。(新华社稿)

###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正确判断

在民主革命期间，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是准确的，据此制定的革命策略也是符合俄国国情的。

1905年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sup>①</sup>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列宁非常鲜明地主张在俄国搞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他接着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sup>②</sup>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一直主张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56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56页。



革命。在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之后，他给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仍然是民主革命，并为此批评了主张立即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列宁认为俄国需要民主革命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917年1月9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谈到未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接着表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sup>①</sup>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动身回国，在告别瑞士工人的时候，列宁仍然认为，俄国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离他们这些革命者还非常遥远。1917年3月中旬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有可能“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够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sup>②</sup>

到这时为止，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对俄国革命的定位和采取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 策略的大转折——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转折发生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回国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转变。正因为突然，不仅其他党派不表赞同，而且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都跟不上。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只有柯伦泰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列宁不得不提出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本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准备都显得不够。此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的阶段论，主张俄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1917年在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33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0—91页。

完成的情况下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全党不清楚，列宁本人也不很清楚，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样子。这就难怪老布尔什维克们跟不上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都批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普列汉诺夫说，俄国还没有磨出可以烤制社会主义面包的面粉，俄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对这一批评，列宁当时没有实质性地反驳，直到5年之后，1923年初才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给以回答。不是否认“缺乏物质前提”的命题，而是提出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来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所谓物质经济前提，指的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不发达，人数没有达到国内的大多数。这两点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认的。

党内的反对、质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是基于列宁以前所坚持的理论的。稍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担心少数人举行起义会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临时政府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和平、土地、面包。这倒不是它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8个月，而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下，结束战争也并非易事（回想一下，列宁为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足足花了5个月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三大问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用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可以解决。

这时候的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不抱着书本，哪怕是他自己写的书本不放，而是根据形势的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战争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反政府情绪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既然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加以利用。

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例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

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sup>①</sup>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断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当时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离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前提还很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准，列宁也想出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而且应当提上日程。

他在1917年4月写就的《论策略书》中说：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sup>②</sup>

不过，这要看是什么革命了，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形态革命？政治革命的标志确实是国家政权的转换。而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虽然也需要解决政权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具体的物质前提问题。马克思说过，一种社会形态在竭尽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潜力显然没有竭尽，借助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仅仅一个政权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现实也说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倒退，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 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由国家直接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358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5页。

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国有化了。他们把国有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sup>①</sup>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在农村实行“粮食专政”，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仅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收走农民的几乎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口粮等。与此同时，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富农，打击中农。

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全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且这种免费供应的种类还逐步从食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用品，最后发展到住房、交通、观剧等等也都免费。那时布尔什维克发现用军事强制手段可以最迅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正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达到高潮。

布尔什维克把小生产看成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为消灭小生产，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大力组织公社和集体农业。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组织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因此列宁改变提法，说组织集体农庄不是当务之急，允许个体农民的存在。

以上措施后来被列宁叫做“军事共产主义”。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权，在贫穷落后甚至濒临破产的俄国，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当时的战争环境逼迫所致，而是执政党的主观认识和无视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追求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只要无

---

<sup>①</sup> 布哈林著，余大章、郑异凡译：《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4页。

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货币、市场，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道路，却被布尔什维克党搬到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试图用超越阶段的办法，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于改变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列宁后来承认，这是无视国情，犯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他多次就此作了检讨。他说：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sup>①</sup>

他还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sup>②</sup>

列宁又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76、18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2—183页。

要原因。<sup>①</sup>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适应军事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一些战时措施，如把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企业或军工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国家实施粮食垄断和食品配给制、粮食征收制，等等。俄国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也都实施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接手了这些现成的措施，贴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措施”，后来就叫做“军事共产主义”。这些措施同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实施国有化、粮食征收制的时候，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执行得更加坚决，更加严酷。其结果就是激发广大农民举行暴动来反抗“暴政”，导致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落后的俄国是不能超越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 对国情的再认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在危机的逼迫下，列宁对俄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承认俄国资本主义严重不足，需要向后退。20年代初列宁多次谈到，俄国与其说吃资本主义的苦，不如说是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这标志着列宁对俄国实际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俄国的落后性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sup>②</sup>这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切入俄国的国情，虽然还不是全面审视俄国的国情，但重提落后性表明，列宁对俄国的落后性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列宁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地强调俄国的落后性。这实际上是俄国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新经济政策的实际依据。

俄国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表现在各个方面。

经济技术落后。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承认并多次提及的。但起初列宁认为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4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4页。

虽然俄国经济技术落后，但迅速崛起的西方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会给予俄国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从而解决俄国的落后状态，拯救俄国革命。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始终强调革命的国际性，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乃至策动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但是列宁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20年代欧洲革命进入低潮，列宁更加感觉到经济落后对苏俄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从中抽取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sup>①</sup>

凭借这种认识，列宁号召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sup>②</sup>

大家知道，即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还多次表示反对“自由贸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列宁同意实行贸易自由，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声明苏维埃政权在重建资本主义，“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sup>③</sup>“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sup>④</sup>

列宁甚至认为，实际使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比关心“纯洁的”共产主义要好得多：“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更多得多。”<sup>⑤</sup>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1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19—221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0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4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0—221页。

俄国是个小农国家，小生产如汪洋大海。按照列宁的主张，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进行，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村的雇农和贫农一起进行，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是革命的对象。以中农为代表的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大敌。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小生产是消灭的对象。然而在当时的俄国，小生产是无法消灭的，消灭不了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开始改变对小生产的看法，不仅予以容忍，而且对其存在的需求予以满足，反而否定集体农业组织和农村公社，最后得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结论，认为简便易行的合作社本身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样，小生产就从“大敌”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之一，不是消灭小生产的农民，而是利用他，发挥他的积极性，以恰当的方式让他们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列宁的合作社不同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向小农让步，退回到自由贸易，从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付小生产，到允许小农存在和发展，经商做买卖，自我发展，组织合作社，这是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得出的结论。

1922年3月28日，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我们怕承认这一点，那就必然要灭亡”。<sup>①</sup>

由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且决心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由此也理所当然地开始利用一直被看成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货币、价值规律等。广泛利用市场关系，是把列宁1921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与1918年春天的计划区别开来的新东西。列宁总结道：“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sup>②</sup>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文化界出现一个左的激进流派——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主张抛弃以往的所有文化遗产，在空白地上创造崭新的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针对这种空想的高调，列宁声明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4—11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30页。



况也是很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sup>①</sup>

列宁多次公开承认俄国的文化落后，甚至缺乏资产阶级文化。他在去世前还认为，文盲是俄国的大敌之一。“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么说的轻一些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sup>②</sup>

从1917年开始，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等反对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没有回应他们的理论挑战，没有回答反对者的责难，恐怕也很难回答。那时俄国迫切需要的是革命行动，而不是理论论争。直到1923年1月，列宁躺在病榻上反思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明确承认了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经济前提，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的这一结论，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短文《论我国革命》上。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俄国就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列宁需要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所以他接着提出可以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论点，认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用政权的力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需的物质前提，赶上先进国家。

第二国际一些领袖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对此表示同意，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

列宁接着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此特殊性就是俄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文化的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sup>③</sup> 干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6—35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9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0—372页。

起来再说，这有点像我国改革开放时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列宁的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说法给予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许多国家效法俄国，跳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它们大多着眼于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致使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名无实。

世界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在局部地区，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有的超越阶段，有的停留不前，有的跳跃发展，有的复辟倒退，总之，各个地区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刀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不变的，这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缺乏生产力的支撑，单纯依靠暴力来改变社会发展阶段，最后一定失败。所以在某一特定阶段，改变发展顺序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及时设法补上所欠缺的东西，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行事。

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sup>①</sup>

列宁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他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从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回到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终于走上了新经济政策这条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不过列宁身后的领导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就恣意妄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可以无视历史规律，随心所欲，跳过发展阶段。斯大林中断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刚走出饥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声称2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如此等等，都是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他们不懂得，可以暂时改变历史发展顺序不等于可以随意跳过历史发展阶段，缺的东西需要补上，历史的欠账终究是要还的。无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5页。

## 4. 二月革命真相如何？

姚 海

### 风暴将临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这一被称为“二月革命”的事件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切是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进入1917年后，很多人都认为，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1月初，保安局的报告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在工厂内外举行集会，反对战争，抗议物价飞涨、供应不足；罢工风潮又起，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提供面包；一些工厂停工，因为工人宣称他们饿得干不动了，要去找吃的；各种各样的党派、协会散发鼓动性的宣言和小册子，人们举着红旗和标语横幅、唱着革命歌曲示威游行；工人手中出现了枪支和其他武器，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和部队的袭击频繁发生，抢劫商店特别是食品店、纵火、行凶这一类事件越来越多。

1916—1917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冷。2月的彼得格勒出现了少有的严寒，平均温度达到零下29摄氏度。天气冷到农民们没法去城里的市场，罕见的大雪封住了铁路，又缺少人手清除积雪。酷寒的天气使得运输问题更加尖锐，火车头经常要生上火几个小时才能产生蒸汽压力，装载粮食和燃料的车皮因为积雪而无法移动，由此造成的供应不足对北方城市特别是彼得格勒影响很大。

2月，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市内开始有流言传

播，说政府将对面包实行定额供应，出现了恐慌性的抢购。经常有人通宵排队，希望早上面包房开门时能买到面包。人们都很焦躁，经常发生争吵和斗殴，不安、恐惧和愤怒在不断加剧。2月下旬，由于没有燃料，首都很多面包房不得不停工。一些工厂也因缺乏燃料而停止了生产。数万工人失去工作，踉跄街头。

全国范围内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的古尔科将军提醒尼古拉二世：“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这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2月10日，杜马主席罗将科在面见沙皇时指出：“战争表明，国家的治理是不能没有人民参与的。”他坚持主张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强调政权如不作让步就会发生革命和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sup>①</sup>

在这个紧张和复杂的时刻，尼古拉二世仍然认为并不存在对政权的真正威胁。2月22日，他离开彼得格勒去了俄军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

## 自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进入2月下旬，彼得格勒的天气突然明显变暖了，22日的气温竟然升到了零上8摄氏度。人们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严寒而尽量少出门。现在，他们很乐意出来享受温暖的阳光。有人认为，出乎意料的天气变化对于2月日子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有着不小的影响。

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自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揭开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序幕。这一天，很多工厂都举行了集会，然后工人们唱着革命歌曲走上大街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是“给我们面包！面包！面包！”人们砸商店的玻璃，阻止有轨电车通行，强制其他工人加入游行队伍。直到傍晚6点左右，街上才平静下来。根据不同的说法，这一天罢工和示威游行人数在7.8万到12.8万之间。有人将这一天的事件称为“平常的饥饿暴动”。<sup>②</sup>

第二天，2月24日，彼得格勒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天，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进。“涅瓦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群携带妻子儿女的工人，示威游行就像节日的游园一样。”上街的工人队伍中有人拿着棍子或铁

<sup>①</sup> Родзянко М. В. Крушение империи. Харьков. Изд. Петербук. 1990. С. 213.

<sup>②</sup> Февраль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17 года. <http://www.kro.su/article/show/?id=661>

器，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不少商店被砸，一些食品店、面包铺被抢，不少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

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学生、教师、职员等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涅瓦大街和市中心很多广场都挤满了人。很多大街上都在举行游行集会。电车完全停驶了。有些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

23日开始的运动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骚动”，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发动了它。二月事件的参与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为伟大转折做好了准备”。各左翼政党对23日事态的反应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而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没有人认为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更没有人想过这将是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导火索，因为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这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把它当回事，而只是尽量利用运动于宣传目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成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在有人告诉他彼得格勒发生了革命时，他挥挥手说：“哪会有什么革命！只要给工人面包，运动就会平息。”<sup>①</sup>

彼得格勒从23日以来的3天动乱几乎没有受到政府方面认真对待。尼古拉二世离开彼得格勒后，首都事务实际上是由一些庸碌的官员在负责。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是靠贿赂拉斯普京获得这个职位的。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是一个迂腐的军事官僚。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的职业经验不超出办公室和军事学院的范围。他们起初都未看到局势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迫切问题，平息群众的不满。当局的犹豫不决加剧了街头游行示威的势头，使得参与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人们似乎感觉到政府害怕了，可能会作出某种决定。

25日晚上9点左右，在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制止首都的动乱。一个小时后，哈巴罗夫下令使用武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但是，2月26日早晨，工人们还是继续走上街头，涌向涅瓦大街。下午3点左右，涅瓦大街多处发

---

<sup>①</sup> Чурбанов В. IV Дум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созданная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возглавить. [http://www.russia-today.ru/2006/no\\_03/03\\_centenary.html](http://www.russia-today.ru/2006/no_03/03_centenary.html). 20080816

生部队和示威者的冲突。下午5点左右，一些反对政府使用武力镇压示威者的士兵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并与骑警交火。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这些士兵的造反行为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

至此，始于23日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26日晚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左翼政党领导人都认为，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了。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电话通知杜马主席罗将科，沙皇命令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

但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对局势下一步发展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他在26日晚上9点52分发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指出：“在彼得格勒开始的群众骚动具有自发的性质和危险的规模。骚动的原因是面包不足和面粉运输薄弱引起恐慌，但主要是人们完全不信任无力引导国家走出困境的政权。正因为如此，事态无疑将会扩大……饥饿的失业的人们正在走向自发的、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救救俄国吧，它正面临屈辱和羞耻的威胁……请立即征召一位得到全国信任的人士，授权他组织一个全体人民能够信赖的政府……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后果极为可怕的危急时刻，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也不可能再拖延了。”<sup>①</sup>

对于罗将科的电报，尼古拉二世的反应是不屑一顾。但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在主要政治活动家中，只有罗将科对局势发展的判断是正确的。

##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起义

2月27日，局势的发展再一次出人意料，事态发生根本转折。

27日清早，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哗变。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他们在步枪的刺刀上系上了红布带，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发的示威游行转变为士兵起义。起义士兵和工人一起，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夺取了军火库并得到了70000支步枪和左轮手枪，放出了关押的政治犯

---

<sup>①</sup> Телеграмм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I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М. В. Родзянко Императору Николаю II о начал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http://www.krugosvet.ru/articles/109/1010974/1010974a2.htm>

和普通的刑事犯，放火烧了各地段警察局、警察总局和保安局。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可见手持武器、挂着子弹袋的人，有的甚至一人带着几件武器。枪声连续不断，伤亡事件时有发生，抢劫商店十分普遍。俄国的首都成了起义者的大舞台。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 66700 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三分之一。而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都散掉了。彼得格勒事实上已在起义者手中。

28 日，起义士兵已逾 12 万。到 3 月 1 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俄国首都已经不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起义士兵同工人一起，占领兵工厂、海军部等重要据点，捣毁内务部和保安局，逮捕政府高级官员。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沙皇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则主要是由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组成的。在二月事件中，他们发动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派往前线。后来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起义士兵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将不被调往前线。这是对他们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

在革命最初几天，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政党表现了自己，没有一个革命政党成员在街头战斗中受伤甚至划破手脚。苏联学术界也早已承认：“否定二月群众发动的自发因素是不正确的。运动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布尔什维克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sup>①</sup>

## 尼古拉二世退位

在发生大规模士兵起义的情况下，首都的军事和行政组织陷于崩溃，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信心。27 日，军事部长别利亚耶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请求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迅速从前线调来可靠的部队”。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给

<sup>①</sup> История КПСС. М., 1966. Т. 2. С. 672.

沙皇发电报，请求任命一位有声誉的将军指挥彼得格勒的部队，请求解散大臣会议并授权一位得到公众信任的人士组织新政府。尼古拉二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通过直通线路与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联系，请他报告尼古拉二世，为了平息已有很大规模的运动，必须立即批准大臣会议集体辞职，并任命一位得到君主信任和各阶层普遍尊敬的人士担任大臣会议主席。惊慌失措的大臣们没有等到尼古拉二世答复，就纷纷离去。

前线军事将领也开始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27日下午和晚上，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和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给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平息人民的骚动，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局势恶化”的镇压手段。

28日凌晨1点多，21位国务会议成员联名给尼古拉二世发去请愿电报，称“祖国面临严重危机”，现政府继续掌权将意味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战争的失败和王朝的灭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按照人民代表制的原则立即召集立宪会议、现政府辞职并由沙皇指定一位受到人们信任的人士组织新政府。

尼古拉二世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担任过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一支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将军还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并被授权对平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

尼古拉二世在28日凌晨乘坐专列准备返回皇村。他以为自己回到首都以及忠于他的部队的抵达，将会扭转彼得格勒的局面。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再无机会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皇帝回到彼得格勒了。

28日，沙皇专列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国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此时，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为了安全，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3月1日晚上7点左右，沙皇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已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在鲁兹斯基与沙皇谈话过程中，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也发来了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强调全国范围内不断扩散的



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危险每一分钟都在加剧，军队在进一步瓦解，战争已不可能继续，要求沙皇立即签署宣言确认成立责任内阁并授权国家杜马主席组阁。

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最终作出让步，同意组织责任内阁。3月2日零时20分，沙皇给率领部队已经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但尼古拉二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清晨5点15分，尼古拉二世给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发去电报，表示可以公布关于组织责任内阁的宣言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俄国将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是，在彼得格勒，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群众。然而，彼得格勒的激进情绪在加强，群众集会游行如火如荼，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有人提出了沙皇退位的要求。

随着群众情绪的升级，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杜马临时委员会产生了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方案。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倾向于作出重大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尼古拉二世退位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也指出，不能坐待革命分子去摧毁君主制，而应争取主动。民族主义者舒尔金更明确地表示，尼古拉二世退位不可避免，但不能让皇帝同革命派直接见面，退位诏书应该交到君主派人士手中。而“一旦退位诏书落到我们手中，革命可能就会从此消失……革命将从法律上被取缔”。

杜马临时委员会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13岁的继承人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杜马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同时，杜马主席罗将科通过电话向鲁兹斯基将军通报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表示组织责任内阁的方案为时已晚，尼古拉二世必须退位。

鲁兹斯基与罗将科的谈话通过北方战线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请鲁兹斯基立即叫醒尼古拉二世，向他报告杜马主席的意见。3月2日上午，阿列克谢耶夫把鲁兹斯基与罗将科的谈话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各舰队的司令，要求他们就此问题立即表态。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包含了希望将军们支持尼古拉二世退位方案的暗示。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

令埃维尔特等主要将领很快给大本营回电表示，为了制止革命、结束无政府状态，拯救祖国和王朝，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作出牺牲。阿列克谢耶夫将收到的回电转发沙皇，并请求尼古拉二世“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拖延将意味着俄国的灭亡。”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在军队主要将领要求尼古拉二世为了祖国和王朝的利益而退位的时候，他事实上已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决定退位。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了彼得格勒的无政府状态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解决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他本已准备让位于儿子，但考虑到儿子的病情，决定同时以他自己和阿列克谢的名义宣布退位，由其兄弟米哈伊尔继承皇位。古契科夫表示：“您内心的父亲情感在说话，在这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对您的建议有任何反对。”

## 君主制的末日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于形势了。

3月2日，彼得格勒出现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给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销毁，把古契科夫干掉。

在杜马活动家和临时政府中，对米哈伊尔是否继位问题出现了分歧。克伦斯基和罗将科等人主张关于由立宪会议来解决未来国家制度的问题，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等人坚持要米哈伊尔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国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的妥协意见是让米哈伊尔自己来作出决定。

3月3日早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代表团来到米哈伊尔的住地。双方向米哈伊尔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占优势的显然是要求米哈伊尔拒绝皇位的意见。米哈伊尔与李沃夫、罗将科简短交谈之后，宣布在立宪会议就未来国家制度作出决定以前，他拒绝接受皇位。俄国的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

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一些工人、士兵的集会提出的反对君主制、实现共和国的要求，经常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再由执行委员会向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事态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倾向。这是在革命的日子里出现的一种循环。

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广大的地区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很多工人仍然愿意支持君主制度。而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3月1日中午，当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停靠旧鲁萨车站时，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在尼古拉二世决定让位于其兄弟米哈伊尔后，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革命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索尔仁尼琴曾问道：“谁能够想象，谁能够预测，俄罗斯帝国会以这样不可思议的速度崩溃？……3月1日还没有谁会相信尼古拉二世会退位，3月3日退位的就已经不仅是尼古拉二世，而是整个王朝了。”<sup>①</sup> 俄国君主制垮台的突然和迅速，不仅在当时令人震惊，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入探索和思考的广阔空间。

### 苏维埃与一号命令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

---

<sup>①</sup>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http://vff-s.narod.ru/gov/pr/opr33a.html>

进程施加影响。

27日这天，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孟什维克K·A·格沃兹杰夫、П·O·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里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动权。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各企业和部队按照每一千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里达宫集中。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孟什维克齐赫泽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劳动团成员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在选举产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这两个政党并不准备充分利用苏维埃的权威来领导革命，而认为苏维埃只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

但苏维埃成立后还是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布了关于军队民主化的“一号命令”。发布一号命令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预先准备后采取的行动，而是事态的发展推动了拟定一个详尽的文件以满足士兵群众要求的过程。3月1日清早，卫戍部队各单位的士兵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映军官试图解除士兵的武装。正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决定讨论“士兵们的需要”，并同意士兵们选出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有起义部队代表参加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决定把有关组织部队和保证士兵权利的措施综合起来并以命令形式发布，为此成立一个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Н·Д·索科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命令。

3月1日凌晨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了一号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在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所有连及以上军事单位立即选举由下级军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每个连派一个代表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各部队的政治活动应服从苏维埃和自己〔部队〕的委员会；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若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定矛盾，不得执行；所有武器应该由连、营的委员会掌握；士兵在非执勤状态和不在作战队列时，在政治生活、一般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享有全体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取消非执勤时士兵对军官必须立正、敬礼的规定；取消对军官的尊称，禁止粗暴对待士兵，禁止使用“你”称呼士兵；士兵应及时报

告破坏以上规定的情况。<sup>①</sup>

一号命令使得彼得格勒的部队事实上脱离了指挥机关。而且，尽管一号命令形式上只是针对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而发的，但它立即就传达到整个俄国军队，由此开始了“军队民主化”进程，在军队中普遍建立了各级委员会。

一号命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时、俄国有大约 1100 万人手中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发布的，它取消了军队的纪律，使其瓦解和失去能力，从根本上破坏了俄国旧军队的基础。当代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斯坎德洛夫认为，“军队始终是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正是军队的瓦解成为决定俄国君主制崩溃的基本原因”。

###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活动

27 日上午开始，一些杜马代表积极活动，如动员和组织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到国家杜马一边、实行革命暴力、逮捕沙皇制度支持者等，使杜马事实上介入了事态发展。下午，杜马部分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一致同意由杜马各党团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杜马代表将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委员会。由罗将科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为“在彼得格勒维持秩序并与机构和个人进行联系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它发生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之前几个小时。

27 日夜间 11 点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在事实上接受政府权力。28 日（3 月 13 日）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

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就作为革命的中心领导起义。傍晚，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2 月 27 日一天中，起义

---

<sup>①</sup> Приказ №1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о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арм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861—1917. М., 1970. С. 528—529.

士兵人数从早上的 1.02 万人增加到傍晚的 6.67 万人，与军事委员会同犹豫不决的部队进行谈判、促使其转向革命的努力直接有关。军事委员会在起义士兵的基础上组建了最初的一批革命部队，并使用这些部队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的任务。

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掌握政权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获得广泛支持的权力机关，得到了自由派和民主派高层的支持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效忠，以及主要盟国英、法的承认。

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向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派遣政治委员，使主要中央管理机关在自己的控制下恢复了活动。政治委员一般都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关政府机关，开始发号施令。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往政府部门派遣任何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以及控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措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

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还直接领导了革命暴力并组织了对革命的保卫，使自己成为二月期间革命司法的中心。杜马领袖很快就开始利用逮捕作为同旧政权斗争的手段。罗将科曾以逮捕“大臣会议全体成员”相威胁，要求其立即离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 27 日夜里宣布掌握权力后，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广泛地使用逮捕手段，以便直接控制中央机关。它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授予他们对旧官员、军队指挥员实行撤职和逮捕的权力。逮捕的范围后来扩大到宪兵、警察、情报官员。在二月革命反对者眼中，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转变为全俄范围的暴行，即对于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在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

## 政权问题的解决

当沙皇专列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此时，苏维埃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的。早在 1905 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

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on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与孟什维克一致，他们在二月革命中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的谈判通过了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了八点纲领：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通常认为，二月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理解为可以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苏维埃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达成的协议确定，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管理国家的机构，它无权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能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因为那都是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的。临时政府的这种暂时性政权的特点还不是它履行政治职能的最大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它的牵制、施加的压力以及它不能单独调动军队和警察执行自己的命令。

二月革命对政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2月到10月间政治乱局的根源。原有的权力结构彻底破坏，新的权力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将由未来的立宪会议决定，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召集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

之前只有一个权力和地位受到诸多限制和掣肘的临时政府来应付局面。

应该说，临时政府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临时政府对二月后的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最基本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最终被群众抛弃。

### 彼得格勒以外的“电报革命”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和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彼得格勒的事变。

彼得格勒以外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临时委员会派往交通部的政治委员布勃利科夫通过铁路电报系统发出的一份电报。

在2月27—28日的那个夜里，布勃利科夫一到交通部就立即控制了对全俄铁路的管理权，但他最初采取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利用铁路电报网络向全国铁路车站站长发出电报，宣告政权已转到国家杜马手中：“铁路员工们！造成国家生活各个领域崩溃的旧政权已经完结。国家杜马委员会已着手组建新政权，并以祖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拯救祖国现在取决于你们……”<sup>①</sup>

这份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科和布勃利科夫共同署名的电报震动了整个国家，在加快革命的发展和使政权转到杜马临时委员会手中起了重要作用。电报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事态发展的速度，因为当时沙皇政权还存在着。但是电报表现出的那种权威的、居高临下的、威严的口吻，无可争议地令人相信它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正是从布勃利科夫的电报中，全俄罗斯听说了革命，并知道是杜马制造了它。在这之后沙皇退位就显得是次要的形式了。但是……在布勃利科

---

<sup>①</sup> 转引自 Спиридович А. И. Великая Войн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4 —1917. Нью - Йорк. Всеславян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62. [http://www.xxl3.ru/belie/spiridovich \\_ ai/03.html](http://www.xxl3.ru/belie/spiridovich_ai/03.html) 20080518



夫勇敢地庄严地向全俄罗斯宣告新政权建立时，事实上它还根本不存在。”<sup>①</sup>

在二月革命的消息向彼得格勒以外传播以及革命本身向各地辐射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一份电报，还有其他一些电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被视为“电报革命”的组成部分。例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的政治委员格隆斯基和萨拉兹金发往各省报纸的电报新闻稿，也是“电报革命”的实际推动因素。电讯稿在地方上的出现和传播，意味着二月革命最初几天外省的信息闭塞状态被打破，并且有力地促进了地方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迅速胜利。又如，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政府各部门的政治委员到任后立即向地方发号施令，这些命令同样以电报方式传达到各地相应的下属部门，而地方部门也纷纷回电承认政治委员权力。此外，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一系列决定，也都是通过电报传达到地方并得到实现的。

“电报革命”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十分微弱的事实，也表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局势发展的自然结果。

---

<sup>①</sup> Почетный гражданин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а А. Бубликов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http://museum1723.narod.ru/library/Bublikov.html>.

## 5.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夺得政权的？

姚 海

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中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地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活动、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是比较弱的，总共只有23000名党员，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人左右，许多地方组织尚未恢复。党的主要活动家都不在首都，他们一部分侨居国外，一部分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内部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依据建党初期就已明确的革命理论，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对待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有条件支持的立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将支持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向演变，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

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 列宁的新思想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俄国会发生革命。当关于彼得格勒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甚至是不太相信的。但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sup>①</sup>

在准备回国的20多天里，列宁明确地形成并提出了下述思想：俄国发生的革命不会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将很快转向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条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贫农，以及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sup>②</sup>这是一个新观点，因为至今为止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将会有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将逐渐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但现在列宁看到了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巨大革命热情，向他们提出了简单易懂的口号，确定了具体实在的目标。

列宁非常关注当时俄国实际上政权缺位、空前的无政府主义、全面的社会混乱等现实情况。他清楚地知道，历史为他实现以革命方式让俄国翻天覆地、给予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毁灭性打击的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国内布尔什维克的状态显然不能承担这样的历史性使命。他自己必须尽快回国，领导革命。

列宁在一番犹豫之后，不顾政治和道德风险，决定借道德国——俄国的敌国——返回俄国。在瑞士社会党人格里姆和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一些持国际主义反战立场的俄国侨民就通过德国回国的条件同德国当局达成协议，据此，侨民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能上下客，尽量不停靠车站，免审验护照等。这就是后来所谓“铅封的车厢”的来历。3月27日，列宁等俄国侨民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德国、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

离开瑞士前，列宁写了《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信中说，俄国无产阶级开

---

①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М., “Наука”. 1995. С. 54.

② 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64—565页；第29卷，第8页。

始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一系列革命，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不是特殊的素质，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列宁强调，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前提下，在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sup>①</sup>

## 四月提纲

4月3日晚上，列宁乘坐的火车到达彼得格勒。他在车站向士兵、水兵和工人发表讲话时说：“人民把武器对准剥削者——资产者的时刻到来了。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sup>②</sup>

4月4日，列宁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闻名。

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布尔什维克应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为把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在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它应该实际地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这将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立即实现和平，等等。

应该说，这些措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其他民主派政党也不反对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列宁要求立即实现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90—91页。

<sup>②</sup>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 6—7.

这些任务，其目的是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临时政府陷入危机。由于当时苏维埃是支持临时政府的，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列宁建议走一条迂回的道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哪怕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苏维埃。在苏维埃掌握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再去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苏维埃，就能以和平的政治斗争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突变，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sup>①</sup>

列宁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的不理解和抵制。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地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直到4月下旬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对列宁的纲领进行表决时，118票中仍有47票反对或弃权。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 布尔什维克党与“七月事件”

二月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在面对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

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新的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参加运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事态失去控制，发展为大规模动乱。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动乱。

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七月事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它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在“七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借助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力夺取政权，只是因其力量不够而未能成事，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而在事件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形势和自己力量的估计上存在着分歧，并因此而引起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明显的。7月3日开始的运动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不同看法，一天里对运动的态度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出面领导，再到取消支持。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非常矛盾。“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布尔什维

克在游行队伍中的带头和鼓动，组织喀琅施塔得水兵到彼得格勒参加运动等。<sup>①</sup>

列宁的态度尤其令人关注。“七月事件”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人向在芬兰的列宁报告了彼得格勒的情况。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火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时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上万名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的坚持下还是同喀琅施塔得水兵见了面，对他们表示欢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水兵们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列宁对当前运动的态度是不明朗的。他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认为同时也要准备好撤退。<sup>②</sup>

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分队保卫临时政府，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点，原先保持中立的卫戍部队几个团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里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运动。5日凌晨2—3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协力平息了动乱，意味着双重权力现象的终结。“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二月革命以来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导致了俄国国内政局的根本性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

<sup>①</sup> 伊萨克·多伊彻著，王国龙译：《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sup>②</sup>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89. С. 38.

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列宁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他指出：“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sup>①</sup> 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 布尔什维克党修改口号

在“七月事件”后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不事声张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崛起作了准备。

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比较空洞的，如“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不进行谈判的立场。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但是，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sup>②</sup>

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8月以前，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而主张对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底明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sup>③</sup>

“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81—482、510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0页。



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sup>①</sup>

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考虑联邦制问题。列宁在6月提出了让俄国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sup>②</sup>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脉搏，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

### 右翼失势与布尔什维克党重新崛起

“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被称为“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86—487、510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0页。

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sup>①</sup>

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在单独与克伦斯基见面后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俄军总司令，同时宣告俄国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

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

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

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

---

<sup>①</sup>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197.

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sup>①</sup> 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接近了政权。

## 十月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建立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

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也对武装起义表示了怀疑。

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

---

<sup>①</sup> 转引自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忙去接近它们。”<sup>①</sup> 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sup>②</sup>

布尔什维克开始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这个过程是公开进行的。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积极活动，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对起义的支持。

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但克伦斯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24日晚上，列宁从藏匿地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25日上午，列宁写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而这时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还有14个小时。

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

---

<sup>①</sup>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 1989. С. 225.

<sup>②</sup>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 конеч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2. С. 42.

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sup>①</sup>

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闹声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轻蔑地宣称：“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破产了，你们的戏演完了，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那是你们从今以后该待的地方。”<sup>②</sup>托洛茨基冷酷而尖刻的言辞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发生在1917年10月26日1点左右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表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群众大多数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的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 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

---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кн. 1. М., 1967. С. 321—328.

② 参见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III (книга 5, 6, 7). М., 1992. С. 336—337.

“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制定的方针已经明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代表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局面。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中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目的未能达到。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sup>①</sup>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sup>②</sup>

11—12月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如逮捕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规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并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11月28日（原定立宪会议召开日期）动用武力驱散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驱散了进入塔夫里达宫会场的部分立

①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93. С. 153—154.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9页。

宪会议代表；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宣布由苏维埃政权派驻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其一切事务，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乌里茨基那里登记并取得临时证件，等等。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的1月3日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sup>①</sup>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在立宪会议会场塔夫里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

<sup>①</sup>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1. С. 323, 324; Протасов Л. 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 С. 288, 307.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sup>①</sup>实际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它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不是为了再把它交出去。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sup>②</sup>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作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其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曾在一些代表的反对声中宣布，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在十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但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sup>③</sup>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在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他还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

---

①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

③ 参见普利马克：《另一个列宁》，《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页。



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sup>①</sup>但是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仅仅过了短短几个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马上就把立宪会议视为完全过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扫地出门。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质，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社会主义终究是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sup>②</sup>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到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sup>③</sup>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3版，第29卷，第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77、691—692、698页。

③ Бурганов А. Х. Была 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зда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5.

生。

相比之下，工农和士兵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下层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一事实。在十月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由于处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泛滥，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在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下层群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摆脱困境的一个选择。

## 6. 十月武装起义是怎样进行的？

郑异凡

1917年9月（本文均用俄历），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当选苏维埃主席，接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当选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其他一些地方的苏维埃也开始“布尔什维克化”。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9月12—14日，他向党中央建议立即举行起义，“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sup>①</sup>接着，列宁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政论家札记》、《危机成熟了》等文章，敦促党中央采取行动。由于中央对建议置之不理，9月底列宁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及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起义的自由。

这时候列宁对举行起义已经有了明确的构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指出，“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sup>②</sup>他在《危机成熟了》中对在彼得格勒举行起义作了更为具体的设想：我们在彼得格勒有数千名武装工人和士兵，他们能够一举占领冬宫、总参谋部、电话局以及各大印刷厂。“如果我们立刻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突然进行攻击，那么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获得胜利”。<sup>③</sup>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32、23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3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77页。

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起草的会议决议写道：“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方针处理一切实际问题。

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月21日，选出5人组成的常务局，其中3人是布尔什维克——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萨多夫斯基，2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和萨哈尔科夫。这个机关后来就成为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的机关。

10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会议决议号召各级组织、工人和士兵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此后，布尔什维克党进入了起义的最后准备阶段。

10月24日一早中央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央委员之间作了分工。托洛茨基提议，派中央委员布勃洛夫同铁道保持联系，派捷尔任斯基负责安排同电信局的联系，责成米柳亭负责组织粮食事务，由斯维尔德洛夫负责监视临时政府，并保持同彼得保罗要塞的联系。同时派加米涅夫等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同他们进行政治合作。立即同莫斯科联系，向其通报彼得格勒的事态进程。

会上决定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加米涅夫建议，一旦斯莫尔尼宫被摧毁，就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建立据点，托洛茨基提出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指挥部。要塞储备有大量军火，是战略要地。这时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已经完全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了。

由于当天凌晨当局派遣士官生查封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会议决定立即派卫队保卫印厂和报社。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赤卫队和革命士兵赶走了士官生，印厂恢复工作。

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具体部署起义的会议，它意味着起义的实际开始。

24日晚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的时候，起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列宁敦促立即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当时对立双方的两个中心是：起义的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临时政府占据冬宫。

到10月25日白天，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格勒各要害机构和部门以及市内

战略要地，开始准备夺取临时政府的最后据点冬宫，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往冬宫方向集结，实施对冬宫的包围。

25日下午2点，从喀琅施塔得驶来一支由巡洋舰“奥列格号”率领的5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停泊在涅瓦河。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它们传达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它们参加包围冬宫。“阿芙乐尔号”因等待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而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晚6点，冬宫已经完全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军队包围。军事革命委员会战地司令部成员波德沃伊斯基、丘德诺夫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布勃洛夫、叶列梅耶夫、布拉贡拉沃夫，在彼得保罗要塞开会，确定攻打冬宫的详细计划，决定缩小对冬宫的包围圈，如果对方不投降，不晚于9时发起进攻。

7点钟左右，安东诺夫和布拉贡拉沃夫签发给临时政府的最后通牒，内称：“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要求临时政府及其所辖军队投降。将逮捕临时政府、总司令部官员和高级军官；解除士官生、士兵和服务人员的武装，这些人在查验身份后将予以释放。”给予20分钟的期限。

在期限到达的5分钟前，守卫冬宫的部分士官生宣布投降，但临时政府还在坚持。军事革命委员会派丘德诺夫斯基作为军使进入冬宫，敦促政府投降，丘德诺夫斯基被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下令逮捕。一些士官生表示反对，要求予以释放，丘德诺夫斯基得以走出冬宫，这一部分士官生也随同出走。

8点，丘德诺夫斯基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派再次进入冬宫，号召士官生和突击队员缴械投降。守卫的士兵中间出现混乱，部分士兵动摇缴械，并打算撤出冬宫，但被扣留。不过军官们感到扣留有危险，就放他们走了。冬宫的守备力量就这样逐步瓦解了。

整个城市是平静的。这边武装起义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那边在彼得格勒区民众馆里还在上演著名歌唱家谢里亚宾主演的《鲍里斯·戈东诺夫》，一支起义部队路过并暂停在民众馆旁，一些士兵们还悄悄地进去听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向冬宫进发。

冬宫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和它连接在一起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有大量无价之宝，攻打这样的建筑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否则就会玉石俱焚。攻打冬宫的军事领导由波德沃伊斯基、丘德诺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三人负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彼得保罗要塞政委布拉贡拉沃夫约定，一旦完成对冬宫的合

围，就在要塞的旗杆上升起红灯，“阿芙乐尔号”看到信号后发射空炮以威慑一下，迫使临时政府投降。如果被包围者继续顽抗，就用轻炮向冬宫实弹射击。如果冬宫还不投降，“阿芙乐尔号”再用6英寸口径的大炮实弹射击。安排这个顺序的目的是，尽量减少牺牲和城市的损失。

然而，执行时却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困难。

首先在彼得保罗要塞找不到红灯，找到红灯后把它挂到旗杆上并让各方都能看到也很不容易。

其次要塞只有一座用于中午报时的午炮，是从炮口装火药的，要实施炮击的话，需要把野战炮抬到要塞的城头上去。到中午时分这段计划得到了实施，6门大炮对准了冬宫。但炮手却不好找，驻扎在这里的炮兵连在“七月事变”中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不太可靠，临到行动的时候，准尉却报告说：大炮生锈，压缩机缺油，无法开炮。

安东诺夫获悉后发疯般乘快艇赶来，他和布拉贡拉沃夫一起找到炮位，炮手们还是说生锈之类的话。安东诺夫只好命令从海军射击场调几个炮手来，再由午炮发射信号。

“阿芙乐尔号”在等待彼得保罗要塞的信号。“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后来写道：从冬宫方向传来机关枪和步枪声。一艘小艇驶到“阿芙乐尔号”，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联络员送来命令说，临时政府应在9点投降，如果拒绝，彼得保罗要塞将发出红色信号。这是“阿芙乐尔号”发射空炮的信号。我上到前甲板，那里有水兵守候在6英寸口径的大炮旁边。岸边传来射击声，但彼得保罗要塞却没有声音，已经9点35分，还没有看到红色信号。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求派了几名海军炮手来到彼得保罗要塞。他们虽然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布尔什维克，准备用生锈缺油的炮来开火。这时候炮声显然比瞄准更为重要。安东诺夫下令开炮，号炮发出一道暗红色火光。

看到要塞发出的信号炮，9点40分，“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发出开火的命令。于是炮弹发出一道闪光，隆隆炮声响彻涅瓦河和冬宫广场的上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弗列罗夫斯基写道：“要塞的信号炮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怒吼起来了。空炮的轰鸣和火焰亮光比实弹还厉害。”别雷舍夫命令给大炮装上实弹，以防不测。

炮响之后，冬宫的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不知从哪儿拿来一块弹片给部长们看，海军上将维尔捷列夫斯基一看就承认弹片是自己海军的，是从“阿芙乐尔号”发射的。不过后来多方面证实，“阿芙乐尔号”发出的确实是空炮，并且只开过一炮，目的是威慑一下，也不是总攻的信号。

由于冬宫还在顽抗，彼得保罗要塞那边接着开炮了，这次是实弹，但不密集，击中的更少。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共发射了35发炮弹，结果只有两发击中，仅损坏了墙面，其余的炮弹飞过屋顶，没有给城市造成任何损失。彼得保罗要塞同冬宫只隔一条涅瓦河，射中冬宫这样的庞大目标并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没有命中显然不是技术问题。

深夜，起义士兵和赤卫队队员从冬宫广场和涅瓦河岸两边的大门进入冬宫，士气低落的卫兵还以为来者是杜马代表。一时宫殿挤满了人，双方都武装到牙齿，但没有开枪，也没有扔手榴弹，因为敌我胶着在一起，分不开。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忆说：我们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进攻者进入冬宫内部。我们进入的时候士官生已经不反抗了，我们自由地进入宫殿各处寻找临时政府成员。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遇到了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他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各党派已经达成协议，以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市杜马代表正往冬宫走来，以结束对冬宫的包围？我们问他：临时政府在哪儿？他指了指某个方向。这时候传来喊声：“这里，这里……”我们穿过一个房间，看到有几个士官生在站岗，我和丘德诺夫斯基走向士官生，要他们投降，他们略为犹豫，交出了步枪。又遇到帕尔钦斯基，他想向我们提什么警告，但丘德诺夫斯基抓住他的袖子，把他推向进攻的人群，高声喊道：“我逮捕了彼得格勒的总督！”士官生放下武器。在一个房间，我们发现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他们坐在桌子旁边。我宣布：“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这时已经是26日凌晨2点10分。被捕的部长共16人，只有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早在25日上午11点逃出了彼得格勒。顺便说一句，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起义军在冬宫内的进攻路线并不是《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条路线，那是为了使情景好看而拍摄的。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进攻路线。

25日夜10点45分第2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26日凌晨3时许，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攻占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临时政

府已经被推翻，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就此写道：大炮在远方不断地轰鸣，苏维埃的代表们不断地争论……新俄国就是这样在大炮声里，在黑暗、憎恨、极端恐惧、忠勇的气氛里诞生的。



## 7.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黄宗良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极其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中巩固政权？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就是这个党能够在俄国社会“毫无出路”、广大工农大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

### 站在时代的潮头，满足民众的需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俄国广大工农大众要求的是什么是“四大件”：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即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获得政治民主自由，改善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使俄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但是其他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谁能够带领工农大众实现这些愿望，谁就能赢得工农大众的拥护，就有可能取得政权。

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保皇的十月党，还是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都公开声称要把帝国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直言：“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

有战争，一切会很快垮台。”<sup>①</sup> 他们把本阶级的利益同进行战争捆在一起了。对于解决关系到工农兵的面包问题的农民土地问题，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行动上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反对农民的夺地运动，斥之为“越轨行为”。这样的政治势力，自然不可能取得民心，而只能被人民抛弃。

列宁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甘愿退居合法反对党的地位。因此，他们尽管向帝国主义政府发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呼吁，但支持临时政府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就是支持进行战争。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召开立宪会议上。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则在一战期间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著名策略口号，并以鲜明的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坚持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根据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经过列宁的不懈工作和顽强斗争，列宁的理论和方针逐渐取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成为党的方针。

二月革命以前，比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并不大，在正确的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激烈和瞬息万变的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也迅速地改变着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布尔什维克只有 2.14 万人，召开四月会议时就发展到 8 万党员，到了党的六大（1917 年 7 月底）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党已拥有 24 万党员。党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地扩大着。这明显地反映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力量对比上。在 1917 年 6 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 105 名，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 700—800 名。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大多数民众根据切身的体会，确信布尔什维克在和平、土地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上代表了他们的主张，起而罢免了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出

---

<sup>①</sup> 转引自（俄）德·阿宁编，丁祖永等译：《克伦斯基等目睹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63 页。

现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政治潮流。8月底9月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京都先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之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明斯克、塔什干、乌拉尔、顿巴斯等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苏维埃都相继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说，“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中央执委会消息报》也指出，布尔什维克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sup>①</sup>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在649名代表中占有390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分别是193名和80名。<sup>②</sup>

同广大工农兵血肉相连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的渴望。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相应通过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列宁曾经为之作序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对大会通过这些法令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当大会一致通过《和平法令》时，代表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战士感动得像小孩一样地呜咽着”。在一战中，俄国400万士兵缺吃少穿，有的冬天里光着脚在地里偷几个萝卜充饥。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就不难理解大会的情景，也就不难理解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深得民心。当大会表决通过（只有一票反对）《土地法令》时，“农民的代表们欣喜若狂”。作者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不移的行动纲领，而其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空谈了八个月之久”<sup>③</sup>。

历史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有十分宽厚和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的。工农民众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这个党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苏维埃的许多活动，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是比较准确地标示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列宁

<sup>①</sup>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sup>②</sup> 参见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sup>③</sup> （美）约翰·里德著，郭圣铭译：《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152页。

语)。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于是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列宁回答说：“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在列宁看来，是按布尔什维克、还是按社会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sup>①</sup>。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讲话，是因为它在民主与民生、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原汁原味”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读来发人深省。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关注民生必须实行民主，党的领导正确，根本保证在于充分地信任和尊重广大人民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

### 依靠民众的支持战胜强敌

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更应该这样。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布尔什维克巩固政权的“秘诀”是什么？是以广大工农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渡过难关。第一次大危机是三年国内战争，3/4的国土曾经陷入敌手。布尔什维克党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便是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于1919年3月决定同中农实行巩固联盟的政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解决前线士兵、城市工人和居民的吃饭问题，苏维埃政权实行了粮食征收制。这项政策对夺取国内战争胜利是必要的，但在没有工业品交换农产品的条件下，农民的粮食换来的是一些“白条”。农民在战争条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21页。

件下容忍了这种损失。国内战争一结束，农民再也不能接受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了。“全国到处是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事件集中反映了全国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sup>①</sup> 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生死考验。布尔什维克党毅然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从当时未经实践充分检验的社会主义观念看，叫做“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于“给”农民发展经济、谋求生计的应有的自由自主权利。当然，这里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而且是全国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的经济很快从崩溃边缘恢复过来，布尔什维克执掌的苏维埃政权也因其政策合乎国情民意而得到巩固。试想想，假如继续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俄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局面呢？



1919年5月25日，列宁在莫斯科红场向接受军训的部队讲话。（新华社稿）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4页。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来看，列宁此时的思想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这便是：搞社会主义不能仅靠“高举红旗”、“政治热情”；应该靠人民大众从私人利益上来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说，应该把民众的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同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必须改变“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办法，“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sup>①</sup> 我们以前研究新经济政策，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点看来阐发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政权、巩固政权，靠的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也是靠党自身的集中统一和铁的纪律。列宁总结说：“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sup>②</sup> 但是党的正确和统一又是靠什么来取得和维持的呢？靠的是同人民民主紧密相连的党内民主。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不断召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停留在纸上、口头上的，而是实际上做了的，其目的在于防止和减少高度的集中统一情况下容易出现的一言堂、个人专断和决策错误。这里着重提出的是党的十大决定要实行的“工人民主制”。这个被用以代替“极端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排除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sup>③</sup> 决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要定期、公开召开，并使之成为制度，“有关的党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sup>④</sup> 主要内容之二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sup>⑤</sup> 为此，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90—191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35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57页。

④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54—57页。

⑤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54—57页。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对党内民主问题的探索确有许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具价值的建树，有的甚至在今天读起来也会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由于俄国的国情和建立政权初期、特别是内战条件下的严酷斗争环境，权力体制总体上说是向集中的方向发展：由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管理制（直接民主制）向着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的转变；从多党合作掌权向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转变；从强调实行民主选举制向普遍采取任命制的转变；从“工会国家化”到工会等社会团体成为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纽带；党中央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从事实上有条件地容许党内派别集团的存在转向无条件地严禁党内派别存在。<sup>①</sup>

实际上，高度的集中统一，必须有充分的民主相对应，才能保证集中的正确，保证民主集中制不致成为“官僚集中制”，不致成为个人独裁制。党内民主状况如何，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思想和工作作风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在这方面，列宁堪称模范。列宁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靠什么？靠的是他的纲领、政策主张在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中被承认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在党内无数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央全会就曾两度否决了他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后来经过激烈的辩论才获通过。《四月提纲》也是经过一番争论才得到党的会议代表的拥护的。列宁不是靠自己的地位、不是靠权势、不是靠压服，也不是靠小权术、拉帮结伙搞小动作，而是平等待人，以理服人，去争取多数。他反对对自己搞个人崇拜，拒绝为自己歌功颂德，批评有人把他等同于“中央”的错误。他胸怀坦荡，不抱个人成见、不记仇，为了共同的事业，他善于与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共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斯大林等都在不同时期，在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上同他有过分歧、争论，甚至激烈地反对过他、攻击谩骂过他；列宁也曾不客气地回击、怒斥过他们，但这没有影响列宁在他们改正错误、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合作共事。列宁这种胸怀和气度，是凝聚布尔什维克党的才智、力量，共同奋斗，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

<sup>①</sup> 详见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6页。

## 列宁留下的难题

由于列宁领导执政毕竟只有五六年时间，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上，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制度、体制的建设上，都还不够完备和周密，一些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即使是在理论上也是“悬而未决”的。例如，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如何使“代表”不致成为“代替”，这就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规章来确保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使党能真正地代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如果“代表”不称职，有什么制度保障人民有权撤换这个“代表”？列宁曾正确地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不能制定法律的，但他又认为，作为执政的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sup>①</sup>。这么说来，党权谁授？

政党制度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常设权力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权力机构。而且，在1917年11月底和12月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其中的代表数还曾经多于布尔什维克（113:92；112:97），到1918年1月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两党代表数之比为111:182），布尔什维克党才占了一定优势。<sup>②</sup>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也曾有7名成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后来两党在内外政策上发生分歧，从合作走向公开分裂和武力冲突。苏维埃政府平息了冲突。到1922年底，除布尔什维克党之外，其他政党就从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列宁并没有作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共产党一党独存的政治结论。列宁在俄共（布）十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sup>③</sup>1922年初，列宁又在一篇文章的写作提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sup>②</sup> 参见（苏）阿·拉兹贡：《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1977年版，第38—43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5页。



纲中提出政党制度问题，“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流派……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和统一战线……无情的斗争……和……联盟！”“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孟什维克的合法化”。<sup>①</sup> 列宁拟就提纲的文章并没写完，其他政党的“合法化”问题没有得到阐释。但从提纲看来，列宁显然一直在思考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见，列宁没有否定布尔什维克执政条件下出现多党制的可能性。当然，在列宁的思想中，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不反对实行苏维埃制度。

党内民主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党内派别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对此尚无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结论。十大以前，甚至在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党内派别存在的。列宁在党的九大上说：“党内各派，只要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sup>②</sup> 1921年，列宁又谈道：“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sup>③</sup>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全国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同时发生了“党内危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党内形成了有不同政纲的派别集团，影响了党团结统一地展开中心工作。于是，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党的十大，一方面决定用“工人民主制”来代替“极端集中制”，同时通过另一个决议，即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它对后来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sup>④</sup>。列宁在大会上说，“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sup>⑤</sup> 他再三强调的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至于以后，列宁没有涉及。

为了更好地探寻列宁的思路，我们再联系这个决议的第7条。这一条规定，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33—53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30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41—242页。

④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67页。

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sup>①</sup>。但是，大会对此谨慎地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 2/3 的多数票方得通过。列宁在大会上一再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提议不公布这一条，“希望不用这一条”，“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sup>②</sup> 此时，列宁还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sup>③</sup> 列宁在这里触及的是一个党内民主建设的世纪性课题。可惜列宁当年强调的“不容许的”、“不希望”发生的“例外”，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区别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与派别活动？如何防止和惩处借反派别活动而破坏党章、党纪和党内民主的行为？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3—64 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28、36 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97 页。

## 8.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郑异凡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的阶段大致如下：

### 执政前的探索

俄国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因此 1917 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准备民主革命。列宁对民主革命有一套具体的设想和相当详尽的措施，而对社会主义革命只提出一般的设想。

1917 年初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列宁回国后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近期目标。这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许多领袖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主要的根据是当时的形势有利，先夺取政权再说。至于夺得政权后如何行事，只有粗线条的设想。

列宁从两个方面探索执政后需要采取的措施。

(1)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学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主张取得政权后消灭市场经济，消灭资本、货币，实行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早在 1906 年，列宁就写道：“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

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国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sup>①</sup>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sup>②</sup> 1916年末列宁同布哈林就国家问题展开讨论，促使他深入查阅马恩的有关著作，研究马恩关于国家的学说，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及其所采取的措施。1917年8、9月间列宁写成《国家与革命》，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廉价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和罢免制，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废除常备军，实行民兵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公社（苏维埃），而不是清谈馆的议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等，把这一切当做无产阶级掌权后效法的榜样。

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了坚决贯彻，而《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和措施，如廉价政府，公务员的薪金，厨娘管理国家，选举制和罢免制，民主自由等几乎没有一条得到落实。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时措施，如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面包配给制，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计算和监督，国家集中控制全国的生产和消费，普遍劳动义务制。这些措施被某些人看成是“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列宁也从中得到启示，1917年把这些措施看成是拯救国家的主要办法，1918年实施了这些措施，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甚至借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办法。这些措施也就成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sup>③</sup>

## 革命初期的措施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

列宁在1917年11月起草的经济措施纲要等文件中列出了需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银行国有化、强迫辛迪加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用强迫参加消费合作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2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111页。

③ 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著作，载《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社的办法使消费集中，等等。这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现在得到了落实。

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对计算和监督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和工人的计算和监督能力估计很高。1918年初列宁写道：实行计算和监督，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他认为，“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sup>①</sup> 所以当时实行的是集体管理制，即委员会制。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检验，发现管理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经济殊非易事，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普通的工人、农民不具备这种条件，在委员制下往往出现众口难调、无人负责的状态。组织和管理是一门学问，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胜任组织家工作的。后来不得不改行一长制。

1918年5月底，以捷克军团叛乱为标志的国内战争爆发，打断了原来设想的建设计划，1918年9月2日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全国进入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军事共产主义涵盖生产、交换、分配、领导方法等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是：

#### (1) 实行粮食征收制（余粮收集制）

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国家垄断粮食买卖和实行固定价格。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国内战争尚未爆发。这就说明，粮食政策的变化并非由内战引起。1919年1月，“粮食专政”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粮食征收制”规定征收农民的“余粮”，但实际上无偿征收的粮食，不仅是余粮，还有口粮、种子粮等。与此同时，颁布法令，组建公社，加速实现农业的公社化。

#### (2) 银行和工业国有化

1917年11月中旬，苏维埃政权接管了国家银行，然后实行了私人银行国有化。11月14日（27日），通过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工业、商业、农业、运输和合作社企业中施行工人监督。11月底开始大工业国有化，接着运输业、商业

---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78—379页。

和外贸也陆续实行了国有化。1918年5月决定，实行全行业的国有化，1918年6月对基本工业部门的企业实行国有化。1918年底宣布“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但国有化并没有就此止步，1920年11月29日进一步规定，凡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数目超过5人，不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数目超过10人的一切工业企业都实行国有化。至此，国内大、中、小工业企业统统实现了国有化。

### (3) 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

在“粮食专政”的条件下，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禁止商品交易。名义上是用工业品同粮食进行实物交换，实际上由于工业品严重短缺，没有可能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多数场合，国家只能用贬值的纸币去同农民交换农产品，这种纸币是政府开给农民的“白条”。

由于禁止任何贸易，国内出现经济的自然化、实物化。从主观上说，这是俄共消灭商品经济，从而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的重要措施。早在1917年11月初列宁就指出：“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与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sup>①</sup>

由于经济的自然化，取缔了市场，苏维埃政权就向取消货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鉴于共产主义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还没有能够立即建立起来，因此不可能立即取消货币，但俄共纲领仍决定扩大非现金结算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用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同农民交换。用发行天文数字的货币来消灭货币，即把货币变成废纸。

### (4) 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在城市对粮食实行按阶级原则分配的定量配给制。由于粮食短缺，这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生、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四类的供应仅及第一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7页。

类的三分之一。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办法反而达到顶点。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这就说明，军事共产主义并不全是战争环境迫使的。

少数特别需要的专家享受高薪。

#### (5) 高度集中的军事命令制

用军事化方法领导一切，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甚至在党内也实行“战斗命令制”，贯彻各项措施的主要方法是军事强制和暴力。由于国家统一管理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需要庞大的机构来实施，这就造成官僚机构充斥和官僚主义的盛行。

当时乌克兰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名义上都是独立的国家，从程序上说，俄联邦无权直接对其发号施令。不过共产党是统一的，各独立共和国的共产党作为俄共的一部分都服从俄共的领导，因此把各共和国统一起来的唯一力量是俄共。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的实施实际上是由俄共来实施的，是党专政。苏俄和以后苏联长期党政不分，党政合一，一党专政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把社会主义推进到农村，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6月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由其掌握农村的政权，对富农实行剥夺，俄国的富农基本上被消灭。贫委于1918年底被撤销。

从以上列举的措施可以看出，其大部分并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而是搬用各国政府，包括俄国临时政府所实施的战时措施。

列宁后来承认，当时至少曾经“设想过”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1921年10月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

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sup>①</sup>

## 新经济政策——引进市场机制

军事共产主义把国内有限的粮食以及其他资源用于战争的需要，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长期剥夺农民的产品以及暴力的盛行造成了农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的严重不满，在内战的后期他们纷纷举行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震撼了全国，造成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在不改革就是灭亡的压力下，俄共终于对农民作出让步，中止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端。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史上的重大转折。

### （1）改变对农民的估计

实行粮食税政策是对农民的重大让步，被看成是“农民的布列斯特”，农民在缴纳粮食税之后，可以自主处理自己的粮食了。由于实行了粮食税，农民暴动明显减少，国内出现安定的局面。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威胁是有认识的，1917年9月，他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针对临时政府和当时的形势写道：“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危机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sup>②</sup>在苏维埃政权建立3年之际，出现遍地农民起义，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实行粮食税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不过，这时候列宁对小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根源的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他曾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甚至禁止农民把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力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限制在实物交换的范围之内，直到1922年，列宁仍然认为“最后的斗争”是同小农的斗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列宁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他把合作社看成是国家资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1—184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72页。



本主义的一种，指望用国家资本主义去对付千百万分散的小农生产。

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根本改变了对农民和合作社的看法，在这里，列宁把合作社等同于社会主义，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认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可以引导农民过渡到新制度去，这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在此期间，列宁同布哈林、弗拉基米罗夫的谈话中都一再说明，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了。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sup>①</sup>

列宁曾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以“临别赠言”：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sup>②</sup>

## (2) 引入市场、商品、货币

军事共产主义下是明令禁止市场、商品交易，并且准备取消货币的。实行粮食税后，农民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就有个出路问题。由于对“自由贸易”的恐惧，起初列宁竭力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的实物交换，起初连“商业”一词也不用。但是农民的实践很快就突破了限制，几个月后，列宁承认实物交换失败了。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7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

---

<sup>①</sup> 《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sup>②</sup> *Волег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 186.*

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开始号召共产党人“学会做生意”。所以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承认商品买卖的时候开始的。

承认商品、货币、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和跃进。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引注）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sup>①</sup>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种类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另一面，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sup>②</sup>

### （3）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向上级和下级报告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党内有广泛的讨论和争论、进行充分自由的批评的权利，等等。<sup>③</sup>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9—63页。

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列宁要求解决党政不分现象。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一切服从党的指挥，党政完全一体化，在和平时期党政不分现象有增无减。1922年3月，列宁给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写信，提出中央给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要严格划分党政职能，他写道：“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确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sup>①</sup> 列宁的建议写进了十一大的决议。

1922年底，列宁在给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明确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鉴于党政机关官僚主义盛行、各级组织缺乏有效监督，某些人身上集中的权力过大，列宁提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集体领导，防止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党的分裂；改组工农检察院，把工农检察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加强监督机关的威望，加强对国家机关、党的组织的监督，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并且具体建议解除作风粗暴的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指出“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sup>②</sup>

#### （4）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

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对列宁的这一论断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加进论者本人的许多东西，但往往忽略了列宁本人的解释。其实，他接着解释得非常清楚：“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sup>③</sup>

人们通常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同革命、暴力、夺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4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专政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作的重心转移了，应当转向经济文化建设了。在列宁的思想中，只要有可能就应当转移工作重心，早在1920年底，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之后，他就提出要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说“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sup>①</sup>两年之后，列宁把自己的这一想法上升为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变了，应当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应当说，这是列宁晚期思想的核心之所在。遗憾的是，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理解列宁看法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列宁逝世后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加强对农民以及其他阶层的强制，频频使用暴力，搞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不肯把重心转到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

#### (5) 寄希望于东方

列宁是世界革命论者，始终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只是在后期放弃了武装输出革命的做法。进入20世纪20年代，列宁还多次强调，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重申：“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么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即爆发革命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的灭亡。”<sup>②</sup>到1922年春，列宁进一步把这种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虽然是个“痛苦的真理”。他说：“我们历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sup>③</sup>

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革命逐步进入低潮，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东方各国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从而给苏俄以援手。因此他在最后的文章中满怀希望地写道：“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54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0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50页。

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sup>①</sup>

#### (6) 让实践来检验、修正

列宁是现实主义者，是实践论者，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是只要有机会就抓住机会不放，先投入战斗，然后再摸索前进。十月革命是先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政权拿到手再说，以后怎么办，有的是预先设想过的，有的是根据现实需要采取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实践验证，正确的继续，错误的放弃，并不固守死板的原则。

夺取政权前夕，列宁写道：“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sup>②</sup>

夺取政权后不久列宁继续这个思路写道：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为正确了……”<sup>③</sup>

1923年初列宁在《论我国革命》对俄国走过的路作了总结，他写道：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sup>④</sup>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五年间，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有巨大的成绩，也有过错误，但列宁敢于承认错误，能够不断修正错误，开辟前人没有想过，更没有走过的道路，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在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模式的转换，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转换为新经济政策模式，在社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81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会主义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另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改变，把经济文化建设提到第一位。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高度评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①</sup>

可惜的是，列宁的许多新思路没有被其继任者所理解，所掌握，甚至相反，最终被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没有能够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走了回头路，回到了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上去了！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93年版，第139页。

## 9. 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其后果如何？

郑异凡

苏俄在1918—1921年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称呼。“军事共产主义”一词虽然在苏俄施行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例如亚·波格丹诺夫），但被接受并流行开来是后来布尔什维克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以实施粮食征收制<sup>①</sup>为主要标志的政治经济体系。

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上的和把全国资源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国家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其措施包括实施粮食专政，粮食征收制，城乡间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实行按照阶级原则统一分配产品的配给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原则；俄共一党专政，在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

之所以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有几个原因：当时普遍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苏维埃政权可以借助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等待西方革命的爆发。其次，俄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一整套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才能保证军队、工厂的粮食和农产品需要。最后，布尔什维克党把这套措施看成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试图通过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消费，实现共产主义原则，进入共产主义。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过，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意识中却是相当明显的。

---

<sup>①</sup> 亦有译作“余粮收集制”，不太确切，本文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

## 从“粮食专政”到“粮食征收制”

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主要是在国内战争中施行的，但其某些措施在此之前已经实行，例如1917年底1918年初实施了大工业、银行和交通企业的国有化。不久又对中型企业实施国有化，1920年11月更进而没收小企业，以彻底消灭私有制。

如果把1918年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当做俄国内战的起点，那么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志性措施“粮食专政”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和固定价格。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揭发隐匿粮食者可获得粮价一半的奖励，另一半奖给村社。与“粮食专政”配套，1918年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

5月13日，通过粮食垄断的法令，商业实际上被禁止。1919年1月11日，为整顿城乡交换，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规定农民有义务按照固定的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以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禁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私人贸易。所谓余粮实际上由国家及军队的需要确定，国家先确定所需要的粮食数量，然后分配给各省、县和村。这样“粮食专政”就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粮食征收制”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不过俄文 *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 一词本身并无“余粮”的意思，而是直接指征收（摊派）粮食，并且在实践中征收的也不仅仅是农民手中的余粮，所以准确的译法应是“粮食征收制”。列宁后来承认：“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



都是纸币。”<sup>①</sup>实际上这种“借用”是有借无还的！

摊派越来越普遍。1919年摊派只用于粮食、饲用粮和肉类，1920年油脂、其他农产品和农业原料也采用了摊派的方法。

成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派往各地农村征收粮食。1918年至1920年全国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达82000人。<sup>②</sup>由于征粮队采用暴力夺粮，频频引发农民的反抗，队员死伤颇多。

粮食专政的第一年（至1919年6月），国家获得446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至1920年6月）获得11390普特。军队消耗了60%的肉和鱼，40%的粮食，几乎100%的烟草。但是由于管理混乱，征收来的粮食，特别是土豆，相当一部分腐烂了。

1919年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之后大力宣传成立公社和协作社。许多地方当局通过决定，规定在1919年春过渡到集体耕种土地。但农民对此并不欢迎，强制集体耕种使农民疏离苏维埃政权，因此俄共八大决定改变方针，同中农结盟。

###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党专政”

军事共产主义的第三项措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施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起初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执政，但不久由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苏维埃政府，并发动反苏维埃的叛乱。从此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执政，同时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如孟什维克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在俄国处于极少数，由于国内战争不少无产者在战争中牺牲，还有一部分为逃避兵役和饥荒而移居农村，其人数就更少了。列宁承认，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实施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是由为数不多的党的领袖来代表的。所以在苏俄实际上是党专政。这种党专政在国内战争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这个时期，像乌克兰等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的，原沙俄帝国疆域内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军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8—209页。

<sup>②</sup>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78页。

事上的统一是靠俄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维系的，乌克兰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等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相当于区域委员会一级的组织机构，是服从俄共中央的领导的，俄共通过它们去领导各共和国。所以这里不是俄联邦人民委员会，而是俄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共和国。列宁承认，苏俄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sup>①</sup>

1920年底全国约有党员70万名，其中半数在前线。党内生活中采用军事命令方法的机关的作用增长了。普遍实行任命制，集体领导被一长制所取代。共产党人在各级组织中占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合并，形成军事命令专政。党政机关比较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能够迅速作出决定，并予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机关苏维埃服从执行机关，并被执行机关所取代。

实行大中小企业的国有化，迫使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去管理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从事经营和分配的工作。当时非常缺乏管理人才，这就出现大量的外行的官僚领导，官僚主义盛行。

在俄国无产阶级是少数，共产党人更是少数。少数人的专政必须借助于强制和暴力。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公开宣布实行革命的恐怖，这种革命恐怖从1917年底已经开始。起初是针对反革命政党的，后来扩大到作为反对党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红色恐怖也针对所有的寄生虫、资产者、贵族、僧侣、怠工者等。从1918年9月起，恐怖具有大规模的性质。9月3日彼得格勒枪毙了500多名人质和可疑分子。在1918年秋契卡机关的惩罚措施几乎不受任何监督，这迫使苏维埃六大决定把恐怖限制在“革命法制”的范围之内。

革命恐怖的另一种形式是集中营。1918年8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用来关押奸细、反革命军官、怠工者、寄生虫和投机贩子。集中营分两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关押被革命法庭判刑的犯人，由契卡管理的集中营则关押潜在的阶级敌人，是按行政程序被捕的。据官方统计，到1921年初，内务部集中营关押了51000人，契卡集中营关押了25000人。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25—126页。

## 全国成为“统一的军营”

第四项措施是1918年夏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社会生活军事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强制和暴力。

“统一的军营”由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而这些机构又受命于俄共中央及其政治局。苏维埃的权力被各种行政机构所取代。

红军由30万人增加到550万人。内战结束时，特派员（чрезвычайные комиссары）将近750人，他们享有特权，有权利用任何机关，调动或逮捕公职人员，改组机构和使之改变从属关系，以军需的名义征用仓库和居民的商品。所有为国防服务的工厂均归其支配，特别是粮食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工厂。

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为解决军事作战任务，在居民中实施劳动动员，16—50岁居民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从事采集木柴、挖战壕、运输等劳动。1919年底，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工人纪律法庭的决定，对违反纪律的惩罚包括遣送集中营。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成立劳动军。1920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第一劳动军的决定，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实施劳动义务的程序的决定，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劈柴、修路、兽力运输，等等）。广泛实行劳动动员以及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为监督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由从劳动战线动员来的人员组成劳动军，击败白军后，部分战斗部队改组为劳动军，派往所有处于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如交通运输、收集木柴、原料等。为管理劳动军，成立劳动管理总局（Главкомтруд），统计、动员和分配劳动力。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取消其粮食配给证。

## 经济自然化（实物化）

俄共的目标是取消市场、货币关系，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建立无市场的经济体制。当局力图实现城乡实物交换，但缺乏交换所需的工业品，所以根本做不到。当时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贬值，银行发行天文数字的纸币，用来

“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这种货币只是发给农民的借条而已。当局也有意识地把发行这种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当做消灭货币的手段。

1918年底，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网络供应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各总管理局向粮食部提供相应的工业品。生产的全部产品、没收和征收的产品，均无偿堆放在仓库之中，无偿发放。这种状态往往造成贪污和专权。

实施平均主义的阶级分配原则。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孕妇和喂奶妇女按一类供应，3岁前的婴儿增加牛奶供应卡，12岁以前的儿童按2类供应。

采取多种措施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但这种免费供应远非共产主义的天堂。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人员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4类的供应仅及第1类的1/3。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粮食专政或者粮食垄断并没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只是造成高价非法流买卖。在内战期间，出现大量“背口袋的人”，即向城市倒卖粮食的商贩。市民通过配给制只能获得不到40%的食品，60%得通过非法商业获得。

## 军事共产主义的源头

军事共产主义往往被看成是国内战争迫使的政策措施，内战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并不仅仅如此。

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所采取的战时措施借鉴来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

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量。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做“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列宁在1917年写的一些著作中，也把各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的解决政治经济难题的措施。

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写道：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为很普遍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够大家吃。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sup>①</sup>

1917年9月14（27）日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sup>②</sup>

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中明确写道：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每一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5—307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63页。

是工作者的证明。”<sup>①</sup>

由此可见“粮食垄断”、“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劳动手册”等军事共产主义的典型措施，并不是临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权之前就设想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布尔什维克的施政纲领中的内容。这些措施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给这些措施披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正因为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夺取政权后要实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措施，引起了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关注，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他就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去搞“军事共产主义”。他在写于1920年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指布尔什维克。——引注）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的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说法的。”<sup>②</sup>

波格丹诺夫的话证实，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逼迫下才采取的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苏俄的国内战争。

早在1917年6月，波格丹诺夫在《国家—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2—303页。

<sup>②</sup> 转引自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2. С. 123.

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sup>①</sup>

他还认为，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年至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sup>②</sup>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只能转入新经济政策。<sup>③</sup>

波格丹诺夫的预见在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之后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免费供应的物资和服务大量增加，并且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

① 见 Богданов А. А. Вопрос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М., 1990. С. 335—344.

②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 9.

③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 9.

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

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措施中看到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确定下来和予以绝对化并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倾向。他看到，这样做的根源是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处于少数和缺乏民主传统。执政党无法以文明的形式在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只好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措施，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由此劳动群众的依附性增长了，转向了政府专政，这同时也是社会上层的寡头。

波格丹诺夫对苏俄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被围困城市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要消除极权，它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同。前者着眼生产，后者则着眼于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体——生产的合作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是特殊形式的公共消费，用极权调节的群众寄生组织。“苏维埃政权……是围城状态下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消费的共产主义（瓜分剩余物），其次，取决于它、也适用于它的是生产生活中剩余物的定量分配。”

1921年4月，他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中说：

“围城状态下的，或者灾变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的，它是和下列状况相适应的，即生产瓦解，或者仅仅削减，但不能弥补消费，而任务在于使用现有的储备作补充，使整体能够坚持到正常条件的恢复。这是在大海中失去缆索的船只被迫实行的共产主义，被包围的城市的共产主义，脱离世界交往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同这种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失去它是无法生存的。首先它是消费的共产主义：一切必须的产品都被征收并尽可能地有计划地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社会经济的有计划组织’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这是极大的错误。”<sup>①</sup>

布尔什维克党所实施的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措施，看做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同一般的个人占有形式的尖锐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

---

<sup>①</sup> 见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 2. С. 125.



义的模糊雏形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实现。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波格丹诺夫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直接卷入现实的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研究人员。俗语说，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布尔什维克要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能看清，才觉悟的东西，经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1917、1918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波格丹诺夫在狱中敢说，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

### 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

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但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更不能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局的迫切任务是拿到粮食，分配现有的物质资源，维持红军、城市工人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存，所以采取的各项政策不是促进生产的政策，当时也没有可能去抓生产。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1919年由于缺乏棉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只能提供战前产量的4.7%，亚麻工业的产量为战前的29%。重工业方面，1919年全部高炉熄火，不能生产钢铁，只能靠存货维持。1920年有15座高炉投产，产量为沙俄时期的3%。燃料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不仅缺原料，而且缺人手，内战结束时，由于大量工人参军上了前线，还有一部分为逃荒而移居农村，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不到1913年的一半，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城市居民中非无产阶级出生的阶层以及从农村动员来的农民。国家财政完全靠发行不断贬值的天文数字的纸币维持。1919年卢布贬值3136个百分点。统一的货币系统瓦解，许多地区自行印刷纸币，仅中部地区货币即达21种之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实物工资制。

劳动生产率下降。1920年一名工人的工作量只及战前水平的1/3。许多企业缺勤达工作日的一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劳动军事化。起初在军工企业实施，1919年底推广到所有的工业和铁道部门。

粮食征收制几乎拿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农民有了土地，但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情绪，到国内战争

末期，这种不满就演变成遍地农民暴动，最著名的有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起义、西西伯利亚起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小型起义。单在1921年国内就发生50起以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出现“盗匪活动”（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起义或暴动的说法）的。这一现象被叫做“小国内战争”。其顶点就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震撼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农民和士兵暴动的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

## 列宁的反思

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和列宁并没有把所实行的政策方针叫做“军事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语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强调，这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到年底，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承认当时有直接过渡的“设想”、“计划”、“构想”。

在1921年4月21日所写的《论粮食税》中，列宁第一次使用了“军事共产主义”一语，他说：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sup>①</sup>他指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拯救了苏维埃俄国，因此是一种功劳。但他随即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sup>②</sup>

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是客观形势的迫使，而没有触及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问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中“军事共产主义”均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本文统一译作“军事共产主义”。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8—209页。

题。直到1921年10月14日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文章中才开始触及主观动机并承认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sup>①</sup>

同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列宁解释说，“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1—184页。

他宣告：“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我们用‘强攻’办法即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sup>①</sup>

过了一年，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谈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把1921年春所遇到的政治经济危机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sup>②</sup>

这样，列宁就从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及其严重的后果等几个方面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目的——一是纠正错误，二是让全党引以为训，避免以后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模式，它被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所取代，这是苏联实行的第二种模式，也是较好的模式。可惜的是，20年代末斯大林摒弃了新经济政策模式，开始实行他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5—226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5—226页。

## 10. 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郑异凡

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主导了苏联近半个世纪。

### 农民起义推动改革

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sup>①</sup>，推行军事共产主义。

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粮食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

---

<sup>①</sup>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通常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盟是不牢靠的。

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不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明确纲领的农民起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有25%—30%的农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

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是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相呼应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历来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这一次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矛头直指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的标准是，这个政权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这给苏维埃政权一个严重的教训，即一个政权不能长期无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凭借暴力进行“领导”。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支援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取消粮食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例如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3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的征收量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接受。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以11票对4票被否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曾实行过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份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征粮工作在9月1日开始，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sup>①</sup>

那时候最高决策层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列宁的态度也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

---

<sup>①</sup> ЦПАИМЛ, Ф. 2, ОП. 1, Д. 15337, Л. 3, 引自 Журавлев В. В. (ред.) 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55.

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sup>①</sup>

直到1921年初，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才开始考虑改变方针。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 “1. 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2. 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3. 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4. 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sup>②</sup>

然而，提纲草稿没有及时变成决定公布。

####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炮火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大会开幕后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列宁惊叹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sup>③</sup>

3月15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

①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38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9页。



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sup>①</sup> 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得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于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sup>②</sup>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sup>③</sup>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0—65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5—107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23、299页。

##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 ——社会主义观念的大突破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一系列措施：

- (1) 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 (2) 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 (3) 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 (4) 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 (5) 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 and 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 (6) 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 (7) 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
- (8) 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整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引注）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sup>①</sup>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质。”<sup>①</sup>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年11月30日列宁致谢·叶·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义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sup>②</sup>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问题。实施粮食税之后，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成是“反革命”的口号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合法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sup>③</sup>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成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它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蜉蝣”，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小步。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

①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35—36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68页。

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另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sup>①</sup>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sup>②</sup>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sup>③</sup>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允许农民纳税以后拥有剩余农产品，他们就应当拥有自行处理这些产品的权利，有出售和用它交换所需产品的权利，要想人为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的交换之内，是不现实的。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sup>④</sup>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sup>⑤</sup>

但是即使如此，列宁还是把目标定位在恢复“正常的产品交换”上。他在总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5—356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63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8页。另见第506页。

⑤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8—229页。

结发言中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sup>①</sup>

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 党内高层中的分歧

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成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37页。

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sup>①</sup>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sup>②</sup>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 退却和进攻

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成是一种暂时退却，对造反的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和落实，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者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sup>①</sup>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sup>②</sup>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5年12月，在联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sup>③</sup> 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sup>④</sup> 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

①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 в). Бюллетень. С. 5, 7.

②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页。

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sup>①</sup>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sup>②</sup>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sup>③</sup>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成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看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sup>①</sup>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sup>②</sup>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sup>③</sup>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2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5、366页。

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sup>①</sup>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sup>②</sup>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在1928年七月全会上所作的《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sup>③</sup> 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指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sup>④</sup>

早在俄共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意思是说，要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坚决贯彻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还有人提出“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拉林概括说，这就是从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就为私商存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1—363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④ 见（苏）沃尔科戈诺夫著，岑鼎山等译：《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他指出，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农民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

### 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废除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绝不是一项经济改革所能完成的，它要求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是新经济政策的致命所在。

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党内高层要求转入“进攻”的呼声不断，在列宁卧病去世之后，激进的“左”的代表人物上台执政，主导政策，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列宁逝世前后，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sup>①</sup> 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

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集中营。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

---

<sup>①</sup> ПАНО, Ф.1, ОП.2, Д.266, Л.31.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 208.

社的决定，其中规定：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要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专门决定。

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游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国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国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sup>①</sup>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揠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党内掌权的领导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骨子里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斯大林批判剥夺农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sup>②</sup>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8页。黑体是原有的。

<sup>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3—306页。

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

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成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扬言：“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sup>①</sup> 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sup>②</sup>

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是，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论述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

①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08.

② 转引自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晨曦等译：《苏共野史》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3页。

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

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拉大距离的社会。

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好相反，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作为一种补偿。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的运动，把他们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趁列宁生病之际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形成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sup>①</sup>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俄文原文为：“Мы её отбросим к чорту”，全集的译文为“我们就把它抛开”，直译应是“我们让它见鬼去”。

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sup>①</sup>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行政命令、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1929 年底，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去”了。

---

<sup>①</sup>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63 页。

## 11. 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夭折了？

马龙闪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试图正确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探索。在苏联 74 年的历史上，它是与采取军事共产主义统制体制发展经济的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列宁在实践中通过新经济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因此，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国家建设挥洒最成功的一笔，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灵活运用于俄国实际，创造性运用商品市场关系——实际上是利用资本主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伟大创举。

但是列宁逝世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中途取消了。这中间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研究，但学界观点各异，争论不休，似乎每一观点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近年，俄罗斯学术界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挖掘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切入点，将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笔者认为，阻碍新经济政策顺利实施的主要是主观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 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措施，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和在一定范围内放开商品流通，成效显著，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产生了明显作用。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成就所鼓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沿着市场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若干步子。为了刺激生产和小商业的发展，降低了某些



税率，放宽了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条件，也更多地允许人们迁出农庄。但是，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已经显不出实质性的效果。相反，从1926年起，一些矛盾和困难在苏联社会已经开始显现和发展起来，其根源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布尔什维克有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目前俄罗斯学者将此称为“意识形态治国论”思想。鉴于此，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凸显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从其建党开始，在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上，虽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但其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在其整个历史中凸显出来的、与新经济政策相违忤的最重要的特征，恰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最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表征。这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烈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二是“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思想；三是把暴力绝对化的普遍暴力论思想；四是坚持“阶级战争”，即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五是革命浪漫主义思想飞扬，其突出特点是充满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甚至被一些革命诗人称为“星际革命”。

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是纯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特征都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思想色彩，特别是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来自民粹主义，这是十分明显的；凡是对民粹主义稍有一点深入研究的，对此无须多加说明，都能了解这一问题。但对商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属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而民粹主义和俄罗斯纯本土传统的反商品意识，却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含有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暴力冲动和普遍暴力倾向，是俄国社会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是这种社会群众意识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传播和渗透。至于“阶级战争”的思想，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条件地绝对化了，显然是有所曲解造成的。而且，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和绝对化的后果，是为日后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了的。

20年代，苏联社会具有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即“军事共产主义”思

想意识的，存在这样几种社会成分的人：相当部分的党政干部；“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希望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如果说，当“战时共产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和其他革命阶层尚能比较一致地接受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地转入了商品市场的轨道，那么，当危机稍一过去，商品经济打破了过去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带来了有违“革命”常规的“纷乱”，出现一些贫富分化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常有的现象时，党内和革命者当中便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各种怀疑和不满。

这种怀疑和不满，突出表现之一，是“具有极左思想情绪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sup>①</sup>。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一部分诗人的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看！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sup>②</sup>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诗人，实际上是指“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诗人，在该派诗人中有一批“锻冶场”诗人，他们许多人的诗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思想情绪。其中一个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诗人在《车床》一诗中写道，他在革命时期曾用他诗歌的切削器，削掉了整个勃朗山的山峰，但是

……他的神经颤抖起来，  
在一九二一年，  
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sup>③</sup>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sup>④</sup> 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

---

①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 1996. С. 222.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6页。

③ 原载弗·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1917—1932）》，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④ 柯根：《新兴文学论》，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版，第139—140页。

而“愚蠢”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重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sup>①</sup> 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但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把它责难为“对富农的让步”。他攻击的目标，是针对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他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对他们的不满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并不是维护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一旦取得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斯大林又转而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支撑工业化，实际上是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而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俄国社会上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突袭，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所以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所以说，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实际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或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

---

<sup>①</sup> 柯根：《新兴文学论》，第141—142页。

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

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正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战时统制、高度集权的、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经济政策轨道以后，虽然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为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采取了少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体制并未改变。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则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某些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否则，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事实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组。把中央 50 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 16 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 30 万缩减到了 9.1 万。<sup>①</sup> 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尽管如此，由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所以没多久，机关职员人数急剧增加了两倍多，达到 350 万人，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sup>②</sup>

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

---

<sup>①</sup>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 1996. С. 218.

<sup>②</sup>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253. Верт Н. ,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 фр. 2 - е изд. М. , 1996. С. 183.

皮拖拉外，所擅长的就是进行行政干预。列宁1922年在第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推动，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令呢？”<sup>①</sup>

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sup>②</sup>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得到发展。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实行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要上缴，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sup>③</sup>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2) 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首先，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

②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 1996. С. 224.

③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 1996. С. 253.

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倒是不断受到国营垄断企业的欺侮、打压和排挤。

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面临被划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就成了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把大把地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 (3) 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外。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但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又同时使它在社会上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伊·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这部自传性回忆录中，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种情况曾写道：“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sup>①</sup> 这位作家接着说道：“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的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

<sup>①</sup> 伊·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上卷，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

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sup>①</sup> 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是很明白的。由于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sup>②</sup> 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 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sup>③</sup>

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揭示了这一史实。俄国农村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村社。<sup>④</sup>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这首先表现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耕地的马匹，同战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有资料表明，1926—1927年，木犁还占耕地器具的40%；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和基本的生产工具。<sup>⑤</sup> 恢复古风旧习还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极端闭塞，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机制停滞了起来。由于农民村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能适应苏维埃

① 伊·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上卷，第384页。

② 伊·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上卷，第387页。

③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4. С. 152.

④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 фр. 2 - е изд. М., 1996. С. 178.

⑤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 фр. 2 - е изд. М., 1996. С. 178.

社会的现实。加上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村社的复兴。所以，20年代又成了农民村社繁荣的时期。村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担负管理农村集体生活事务，但已不像从前那样，照料村社成员的鸡毛蒜皮的行政琐事，而是把这些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当地的党支部。村社所以具有相当的牢固性，是同小农户经营这一农业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稳固性相联系的；村社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又可特别受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等等。村社具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使它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村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它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村里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对他们的这些社会开支，被看做像雇佣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村社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不要被滥用。

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生怕在村社的影响下，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B·莫洛托夫就曾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A·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A·基谢廖夫，把当时的农村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sup>①</sup> 由于村社财政独立，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sup>②</sup> 也由于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分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村社使一些当权者感到很恼火。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求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村社当时保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存在着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就成了农民村社存在和自发发展的条件。

---

<sup>①</sup>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т. /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Шагина. М., 1999. Т. 1. С. 408.

<sup>②</sup> 村社组织内不存在有组织的贫农团体；而被剥夺的人却可以参加选举，还有通过决定的表决权，但铁匠、放牧人和失去土地的人却没有这些权利。



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让村社服从村苏维埃，企图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勒令召开生产会议；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还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实施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归根到底虽然说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是非标准）可以判明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存在着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如果采取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处理得当，不是急攻近取，那是未必不可以将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①</sup> 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出了问题。

从20年代中后期党的中上层干部结构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入党的，所以受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加上列宁逝世后，在“列宁召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吸收党员的运动，从工人中集体发展党员达24万多人；接着，1925—1927年，党又在农民中广泛吸收党员。这样，在1926年党员人数超过了

---

<sup>①</sup> Россия Непокаянная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4. С. 153.

100万。从1924年起，党的队伍在两年间就增加了1倍多。<sup>①</sup>到1928年1月1日，联共（布）党员总数已达130万人。<sup>②</sup>这期间，新党员占了党员总人数的近60%，而老一辈的地下党员还不到1%，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迅速地、大量地吸收工人、农民党员，党内的文化状况受到了很大影响。有数字显示，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sup>③</sup>

党员队伍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苏联党政军干部的素质和结构。20年代后半期新增大量工业项目，干部又面临新老交替，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和列宁逝世期间入党的党员，大批走上中层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这样，干部的中层和基层都是一大批新人，他们或者多是被国内战争时期的“阶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者是由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的工人组成，加上受到2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造成所谓工人阶级“农民化”现象的影响，从整体来说，干部队伍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都相当低。

在这样的干部队伍面前，面临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整合新旧价值观这样难度巨大的复杂问题，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力所难及的；加上20年代党内连续不断的争论和斗争剑拔弩张，缺乏应有的同志式的协商气氛，这样，就失去了有效正确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条件。

由于缺乏整合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难以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采取急攻近取的直线进攻，就势不可免。因此，苏联党和国家最终选择了“全线进攻”的办法，从1930年7月30日起，由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宣布，彻底取消了土地村社，将它的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

---

①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4. С. 421—422.

②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339—340页。

③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т./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Шагина. М., 1999. Т. 1. С. 422.

## 工业化方针引发危机，直接导致新经济政策被“抛弃”

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严重危机，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之际，全党几乎没有疑义，转入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但实施这一政策不久，国家便遇到各种困难，使“工农联盟”受到威胁，这样在党内便很快引起了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由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所代表的“左”派，他们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他们的路线；另一个是以布哈林为主要理论家的“右”派，其思想的执行者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坚持建立“工业专政”。所谓“工业专政”，就是要优先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则要靠从农民身上来榨取。榨取的方法，后来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了阐述，就是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意识地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社会主义获得“原始积累”。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国际包围和国家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只有从私有部门（主要是农业）“抽取”到社会主义国有部门中来。而这种资金的“抽取”和“转移”，只有靠加重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税收和不平等交换来进行。

实行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引起广大小生产者群众的不满，因而招致了布哈林的强烈批评。他认为，这是“杀鸡取卵”的政策，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并使群众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在布哈林看来，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需求，说服他们生产更多供给市场的产品，来发展市场经济。对此，布哈林在1925年4月的一个著名讲话中集中作了论述，他号召农民们“发财吧，不要害怕什么镇压”。布哈林认为，要消除技术落后，农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分配合作社，但这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靠这些合作社，农民经济可以逐渐达到国家所要求的水平并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样就能以“缓慢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位理论家看来，这个过程要慢一些，会持续数十年光景，但这比搞坏同农民的关系危险要少一些；而依靠农村实现高速工业化，必不可免地要破坏“工农联盟”。

其他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起初在这一国家经济

发展道路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政治战略，其目的是争夺领导权。1924年以前，这“三驾马车”结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支持斯大林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年，他们又转向“左倾”反对派，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斯大林左右起手，最初在托、季之间充当不偏不倚的法官，以期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并取得权力。随后，托、季联合，把矛头转向斯大林之后，他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向托、季“联合反对派”展开了批判。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攻击布哈林“右倾”，向富农“投降”时，斯大林原是站在布哈林一边的。

当党的权力上层纵横捭阖，围绕着反对和拥护新经济政策展开一波波政治斗争时，苏维埃国家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是由摇摇摆摆，忽左忽右的措施所加剧的；这些不连贯的摇摆性措施，反映了领导层的思想波动，也表现出他们的政治路线并不明确。一般公认，实际上到1926年为止，新经济政策措施就已踏步不前了，而到1927—1928年之交的秋冬，就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在1928—1929年，农业各项指标便成灾难性的了。尽管这期间采取了非常措施，只要富裕农民和中农拒绝按收购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就对他们采取直到逮捕和关押的镇压措施，在1928—1929年冬天，国家收购的粮食仍比上一年减少许多。这是不顾农业实际状况，从1925—1926年以来实行快速工业化方针所导致的直接后果。1925年中央一月全会批准大大增加对冶金工业的投资，还提出不只恢复，还要新建工厂、扩大重工业规模。在实现中央全会决议的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5年4月提出了建设一系列冶金工厂的任务，拟定从1926年起在南方，从1927年起在乌拉尔新建一批大型矿山和工厂。实际上，从1925年起已经开始设计和建设了111座矿山和新的工厂。<sup>①</sup>接着，越到后来，这类工厂的建设越来越多。

这些计划和基本建设投资，原是以未来取得粮食丰收为前提的；指望出口大批粮食，为工业换取机器设备，而且还要有多余的粮食供给城市和军队。可是，计划机关却没料到，此后发生歉收之后，农民却把粮食储存了起来，因而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非常措施使农村形势极端紧张，报刊报道了近千起针对“官方人士”的“暴力事件”，牲畜头数也大为减少。1929年2月，城市又开始实行粮卡

<sup>①</sup>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 А. и др.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 2002. С. 377.

供应制度，食品缺乏成了普遍现象。政府关闭了多数私人商铺和被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手工业工场。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导致物价普遍飞涨，这直接影响到了上班族居民的购买能力。这种情况在大多数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看来，农业应对经济困难承担责任，因为工业领域的增长还是让人感到满意的。不过，只要仔细研究一下统计资料就会发现，所有质量方面的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成本和产品质量，都全面下降了。这种让人警觉的现象证明，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的是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度消耗。这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劳动力空前不足，也造成预算开支的不平衡。

由于工业而愈加凸显的农业落后局面，使斯大林宣布农业部门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斯大林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特别大讲特讲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农业必须全面组织起来，以达到工业的增长速度。这样，对农业所进行的改造，必须是比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所批准的五年计划指标更高、更为急进。这样，就全面调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

1928—1929年，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中，三番五次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崩盘的农村危机形势，是由富农和其他敌对势力捣乱引起的，因为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苏维埃制度”。在斯大林看来，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农村资本家，或者是集体农庄”。实际上，斯大林把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走向资本主义，而只有建立集体农庄，实行“全盘集体化”，才是走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1929年中央四月全会取得对所谓布哈林“右派集团”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对刚刚通过的计划又作了大幅度修正，特别是在集体化速度方面，指标大大提高。起初，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集体化达到500万农户。到今年6月，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宣布，在1930年一年内集体化必须达到800万户，到1933年必须实现全体农业居民的半数加入集体农庄。到8月，米高扬又把数字提高到1000万户。到9月，提出的目标又升至1930年一年达到1300万户。到12月，这个数字又被提升到3000万户。<sup>①</sup>

集体化计划进度的大大提速，吹响了集体化的号角。1929年6月，报刊宣

---

<sup>①</sup> Верг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 фр. 2 - е изд. М., 1996. С. 207.

布，一个新的“大规模集体化”阶段开始了。政府给所有党组织都提出了双重任务，既要开展粮食收购运动，又要加速集体化。工会和共青团也被动员了起来。成千上万工人和大学生同党的积极分子和国家保卫局干部混编，组成小分队，被派往农村。粮食收购运动所带有的暴力性质比以前更加明显，采购甚至变成强迫征收。1929年秋，市场经济机制已彻底扫荡净尽。收购运动告一段落后，又在农村集中将近15万人搞起了集体化运动。从6月到10月，集体化触及了100万农户。10月31日，《真理报》发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一礼拜后，在纪念十月革命12周年之际，斯大林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宣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坚决进攻”。同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大会上，在提出“消灭富农”口号<sup>①</sup>的同时，郑重宣布，当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sup>②</sup>这样，列宁创造性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在斯大林的这一宣布中偃旗息鼓了。

## 斯大林集团与布哈林集团的斗争及其结局

在取消、终止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所催生的混合经济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奠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以及高速工业化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造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内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集中表现出来的。

在2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从1926—1927年开始，因工业品匮乏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对等交换而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对待这一危机，斯大林诉诸的是“非常措施”，即采取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征粮的办法，用强迫和暴力向农民收购粮食，对拒绝售粮的农民滥施逮捕、关押、没收粮食等办法。对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斯大林一味用“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尖锐化”来解释，所以认为出现了“粮食战线”，在禁止粮食买卖，关闭市场的同时，一方面用类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斗的方式”，组织征粮队来收粮，另一方面计划建立大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

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来发展粮食生产。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利用 1927 年苏英关系紧张、1929 年苏中“中长铁路事件”，大造“外部危险”和“战争临近”的舆论，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大上重工业项目；为此所需的资金，又进一步通过征收“贡税”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布哈林为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反对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非常措施”，因为禁止粮食贸易，关闭市场，是直接同新经济政策相抵触的。布哈林不是从“富农捣乱”和“阶级、阶级斗争”来寻找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而是从经济方面，即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不对等交换等等来寻找根源。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应是国家“严肃而长期”采用的政策，其“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sup>①</sup> 他十分强调市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在 1929 年 4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国还将存在许许多多。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将长期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是决定性的！”<sup>②</sup>

针对斯大林在 1928 年中央七月全会上第一次宣布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sup>③</sup>，布哈林将其称为是“奇怪的‘理论’”，他尖刻地揭露了这一“理论”的荒谬性：“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纲，岂不是说阶级越是迅速地走向死亡，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看来，正是在不再有任何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将会燃起最炽烈的火焰！”布哈林还谈到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我们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口，看来我们要么打内战，要么饿死，剩

---

① 原载《真理报》1928 年 8 月 17 日和 1928 年 9 月 30 日；转引自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卷，第 10 页。

②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卷，第 10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49 页。

下一堆白骨。”<sup>①</sup> 布哈林的预言真是不幸而言中，日后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引导下，难道不是多有发生对农民的或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内战”，也造成了夺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吗？

布哈林既然主张通过把包括个体的、集体的、社会的和国家的混合经济形式巧妙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自然主张革除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所以，他从“沙赫特事件”中看到是党、干部、工会和群众脱节，是体制集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他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少搞一些委派制”，加强无产阶级民主。他也反对工业化的“速度崇拜”，反对用斯大林所说的“贡税”，即通过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办法来发展工业；他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过分“挖取”农民，使农业失去发展的必要的资源，不可能增加粮食生产，这样也不可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基础和资源。布哈林作为经济学家，是从经济规律本身，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提出政策主张的；同时，他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主张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路线，也是站在同新经济政策相违背的种种政策措施反对者的立场发言的。

从上述布哈林的这些政治主张看，他处处是从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益出发的。布哈林一向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忠实捍卫者。他在20年代中前期为捍卫新经济政策，最早是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接着又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合反对派进行斗争；在他同这些“左”的反对派进行斗争时，斯大林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暂时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策略性地支持了他，但斯大林早在骨子里就对新经济政策抱有异议，只是在内心里隐藏了这一点。而当1927年12月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彻底战胜这些“左”的反对派，斯大林清算新经济政策的底牌便一下子显露了出来。所以，当1927—1928年之交粮食收购危机一出现，他便开始放手以断送新经济政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了。对斯大林的这些政策措施，特别是接着采取的“非常措施”，布哈林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非同一般的警觉和疑义。

---

<sup>①</sup>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4卷，第10页。



在十五大刚一结束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和随后马上采取的第一批指令中，斯大林就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为有效收购粮食，“需要对富农（实际上不只是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并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对领导不力者随时撤换。<sup>①</sup>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第一个以全新方式“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取镇压手段的纲领”<sup>②</sup>。接着于1928年1月14日，斯大林又发出指令，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包括要“打击收购者和富农”，“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并直接把“投机者和富农”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以震慑中农。<sup>③</sup>斯大林从1月15日至2月6日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巡视当中，亲自指挥了那里的粮食收购运动，下令变本加厉地采取了上述的镇压和惩办行动。这实际上是在实实在在地断送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虽然最初暂时地支持了“非常措施”，但没想到对这一措施执行得如此离谱，造成如此严重的事态。他们严厉斥责了这种“过火行动”，要求制止并纠正这些“非常措施”。在布哈林等的要求下，经过曲折交涉、讨论，斯大林暂时作了让步，时断时续地收敛了一些紧急措施。但双方的争论和论战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上仍在激烈进行。这个时期，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集团在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尚未显出分晓，由于加里宁和伏洛希罗夫等尚在倾向于布哈林的动摇之中，起初甚至布哈林集团一时显出了某种优势，但利用夏秋到外地休养的机会，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纵横捭阖，夺取了布哈林集团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一个个阵地，到1928年11月，斯大林集团已经显现了某种优势；在十一月全会上，双方围绕“非常措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辩论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全会发言的倾向虽然整个

---

①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6页。

②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6页。

③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第7页。

来说是有利于斯大林的靠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但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对“右派”打击的绝对优势和有利条件，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只是表面上缓和了同“右倾分子”的矛盾，采取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非常措施”还在程度不同地持续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在不断恶化。南方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按压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粮食采购再次失败。由于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发生中断，人们不得不连夜排队购物，这造成不满情绪爆发，罢工不断出现。有资料显示，在1928年前9个月中发生了96次达1.7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同时期也有1万冶金和矿井工人的罢工。<sup>①</sup>为控制事态发展，地方政府自发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经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实行了配给制。

形势的恶化，使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中出现了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言论。1929年初，据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报告，他所到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支部里都认为，右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记者还报道了工人的言论，说李可夫和加里宁“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不让他们讲话而抱不平。<sup>②</sup>

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保证布哈林集团的胜利。正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一张传单，揭载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在1928年7月11日的“秘密会面”和谈话。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情况，将它视为“右派”的非组织活动——秘密组织反对派，借此而向他们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在1929年1月30日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大肆宣扬并公布了这次会面和谈话的细节，把布哈林集团置于政治上极被动地位。斯大林利用这一有利局面，乘胜追击，进一步取得组织上的优势，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彻底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

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解除了束缚斯大林集团的手脚，他们在1929年4月

---

① 转引自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22页。

② 转引自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4卷，第3页。

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实现超高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 1.8 倍，而第一部类增加 2.3 倍。<sup>①</sup> 接着几个月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大大提高了一系列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同时，在农村又变本加厉地恢复并加剧了非常措施。把收购粮食的计划任务从上到下直接下达到了村，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对没有完成交售义务的富农“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sup>②</sup> 如果拒绝完成任务，则“处以 5 倍罚款”。“第一次”这样处罚；“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sup>③</sup>。

从上面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非常措施发展到这种地步，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到 1929 年 5—6 月间，对农民实行暴力已经成了基本的政策方针。加倍惩罚变成了法律和行动准则，由没收粮食发展到没收生产工具，行动越来越过火。实际上，随着布哈林集团在 1929 年十一月全会彻底失败，到 1929 年秋冬，非常措施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而正式宣布要把新经济政策“抛开”，<sup>④</sup> 让它“见鬼去”的，是斯大林 1929 年 12 月 27 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报告，这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最后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总之，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问题，造成了这一政策最终被取消的命运。

①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 5 卷，第 2 页。

②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1927—1939 年文件和资料）》5 卷本，第 1 卷（1927 年 5 月—1929 年 11 月），莫斯科 1999 年版，第 612—614 页；转引自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 5 卷，第 2 页。

③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1927—1939 年文件和资料）》5 卷本，第 1 卷（1927 年 5 月—1929 年 11 月），莫斯科 1999 年版，第 659—660 页；转引自 B·П·丹尼洛夫、O·B·赫列夫纽克、A·Ю·瓦特林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 5 卷，第 2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1 页。

## 12. 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的？

郑异凡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政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格纪律的组织。在建党的原则上，列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但列宁的这一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夺取政权时期，列宁强调集中制，在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更强调实行民主制。令人遗憾的是，苏共并没有注意发扬列宁的民主制思想，而更多地继承了夺取政权时期的集中制思想。

###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由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写道：在未来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需要自由和民主是应有之义。在苏共存在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有关党内民主的争论，但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党内状况，争论每一次都是以集中制或高度集权的方针占上风告终。

有一个说法，认为民主集中制源自马克思、恩格斯。这是苏联时期理论界制造出来的概念。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文第1版）名目索引中单列了一条“民主集中制”，但没有标出具体的卷次页码，而是“见无产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4页。

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按图索骥，找到无产阶级政党条内的“组织原则”，按其中所指各卷页码查阅，始终没有发现“民主集中制”一词，看到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章程的一些论述。但那里说的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例如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中写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照这样的民主制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月8日最后通过。”<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倒可以看到对“集中制”的否定。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草案中规定实行集中制，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批评说：“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sup>②</sup>

“民主集中制”一语源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过最初出现的名词是“集中制”。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针对党内的分散的小组习气，针对党内有人要求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实行由铁的纪律来维护的集中制。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一直强调要建立严格集中制的党组织，强调秘密工作和职业革命家的作用。这里的集中是针对分散而言的。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有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1899年，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sup>③</sup> 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火星报》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之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sup>④</sup> 他在《怎么办？》一文中反对在党内实行“广泛民主原则”，他认为“广泛民主原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51—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558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7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236页。

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sup>①</sup>而这两点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压制下是做不到的。

然而当时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都不同意列宁的“集中制”方针，他们担心，这种集中制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少数人的独裁。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企图建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德把这种集中制叫做“官僚的集中制”、“机械的集中制”。<sup>②</sup>

对集中制提出系统的批评意见的是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一文。她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制”，指出这种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而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sup>③</sup>这是“布朗基式的密谋主义的集中制”。

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党的核心和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卢森堡担心，这样的集中制有可能变成把工人阶级降低为委员会执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sup>④</sup>

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一文中也强调，必须防止集中制变成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下，工厂实行的是兵营体制，然而“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或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页。

② 阿克雪里罗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见亚·阿谢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53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17页。

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因为，当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sup>①</sup> 托洛茨基相当有预见地指出：“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办法将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展开公开的竞争，工人阶级不会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sup>②</sup>

那时有人提出，如果中央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列宁承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认为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开始时可由各个分组作出决议，随后由它们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直到最后（在最坏的情况下）推翻完全无能的当权者。”<sup>③</sup> 由于那时还没有真正碰到这种问题，列宁显然把问题想得简单了，后来的历史证明，对于这种因高度集中制而大权在握，又滥用权力的人“同志式的影响”是无济于事的。

反对者的主张，简而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实行民主制，发扬民主，发挥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他们在关注未来的危险时，却忽视了俄国当时的环境与迫切任务，这就是在反动的俄国夺取政权的任务。

列宁主张集中制，他认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针对反对者的指责，列宁指出，他所主张的集中制不是“官僚的”集中制，而是“民主的”集中制。这里，“民主的”是相对于“官僚的”而言的，其基本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

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革命的压力下，沙皇发布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公民享有全部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这就开始改变了革命者活动的社会环境。由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肯定了“民主集中制”。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等人也都认为，

---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36、40、80页。

② 丹尼尔斯基著，高德平译：《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9页。

只有一个严格集中的组织才能成功地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所以反而是孟什维克在1905年11月首先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以区别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

1905年12月召开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其第1条写道：

“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决议还认为，二级选举制是“不符合完备的民主制的做法”，只有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容许。<sup>①</sup>

这里确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选举制、选出的机构可以更换、公开性、报告工作制以及选出的机构的领导权。就实质而言，这与民主制并无多大差别。

1906年4月召开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参加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中有一项为“党组织的基础”，其中写道，“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在目前条件下虽然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可以实行的，因此建议：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予以贯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由选举机构遴选等等。<sup>②</sup>

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大会后列宁就大会决议写道：“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sup>③</sup>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就是说，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两大派已经达成一致。

这时候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开始谈论民主、选举、公开性，是因为经过1905

<sup>①</sup>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9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139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62页。



年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争得了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用列宁的话说，“赢得了一半的自由”。“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也确实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尝试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1907年由列宁本人编辑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收入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删去了近一半的过时内容。<sup>②</sup> 1907年9月列宁重申，“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sup>③</sup> 可以看出，组织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环境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过由于1905年革命的失败，沙皇反动镇压的加强，昙花一现的“民主”随即烟消云散。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国内不存在公开活动的可能性。1907年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再也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大派别，而在不同时期每一个派别内部又存在若干个小派别，党内根本不存在统一的纪律，各派自行其是，既无民主，也无集中可言。不过作为党内一派的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始终实行高度的集中制。也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保证了它所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 国内战争中的“战斗命令制”

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走出地下，成为执政党，按理说可以实现广泛的党内民主了。事实不然，不久苏俄爆发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全国为“军营”，而作为这一军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党组织的“军事化”，在其内部实行“战斗命令制”，即“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按照这种战斗命令制，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战斗命令，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78页。

② 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和中央机构人选斗争的部分，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97页。

代，公开性根本谈不上，定期报告工作制无法实施，等等。这一切是战争环境使然，是保证胜利的需要，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稍后，布哈林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制度有几个特点：极端的集中制，冻结党组织的一切集体机构，取消各种争论，等等。在国内战争期间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军事集中制，工作方法是战斗命令制”。<sup>①</sup>一切服从于军事需要。这是“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的最极端的表现。

不过即使这样，在列宁领导下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运用民主机制，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例如在战争岁月按期每年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都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最后是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拍板的。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1919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各项迫切的问题之外还列入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迫切的党纲问题，在会上就党纲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种做法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战斗命令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国内战争时期，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命令制变成了压制的形式，必要的战时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内的精神生活，等等。用列宁的话说，集中制变成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以，一俟战争基本结束，实行党内民主问题马上提上了日程。

## “工人民主制”及其命运

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家开始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这时候一些党内人士和派别提出需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废除“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具体讲就是“工人民主制”。

党内出现一个“民主集中派”，强烈要求改“集中制”为“民主集中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加强党内民主。“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人物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曾长期主张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每一次都

---

<sup>①</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226—227页。

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民主集中派”的另一位领袖奥新斯基撰文指出：我们早就主张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他解释“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说：这种各民主要求：（1）把尽可能多的问题的讨论、决定和贯彻执行，集中在广泛的开放的委员会，而不是集中在狭小的封闭的委员会内，或者甚至集中在个别人手中。（2）如把执行权同立法权分开的话，那么执行机关应切实对广泛开放的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3）一切经选举产生的机构都要经常改选、向选民报告工作、吸引群众参加这些机构的实际工作等等。（4）政权机关要接受工农舆论的监督，为此，这些机关的会议应公开进行，工人和农民应当有可能在报刊上或在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还提出，要使党内派别合法化，“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他的根据是，国内没有反对党，作为替代，党内应当有派，它们应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任何迫害。“只有这种合法化能够保证实行执行机关报告工作制度和负责制，才能保证我们实行共同的监督，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民主。”<sup>①</sup>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工人民主”的呼唤颇有代表性。他们关于反对派合法化的要求现在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然而就在提出这个要求后不久，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就合法地出现许多派别，甚至列宁也参加了一个叫做“十人纲领派”的派别。

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下举行的。会前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反对粮食征收制的农民暴动，有工人群众对军事共产主义不满的罢工风潮。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作为革命堡垒的喀琅施塔得爆发了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要求之一就是实施“工人民主制”，实行选举制。而在此前党内又爆发了把高层领导人统统卷入的工会问题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在农村废除粮食征收制，一个是在党内抛弃军事命令制。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十大不得不匆忙宣布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

大会讨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通过了一个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

---

<sup>①</sup>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101等页。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代表中央作报告的是布哈林。他说：现在我们在党内应当实行工人民主制，它可以表现在选举制、广泛的争论，等等。这符合党的自我教育任务。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局势要求解决的任务，是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必须建立工人民主制来解决这一任务。谈到关于党的建设的提纲时，布哈林说：“在制定提纲时我们的出发点是，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都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从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不能认为某种组织形式或者相应的工作方法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是最优秀的，最合适的，最可以接受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些组织形式也好，工作方法也好，都取决于党工作所处的那时刻的条件，党在该时刻所面临的任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sup>①</sup>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议的导言写道：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

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决议认为，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工人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决议对党内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从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要把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作为一种制度，普通党员可以出席这种会议。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sup>②</sup>

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的

<sup>①</sup>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231、218页。

<sup>②</sup>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9—63页。

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应当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好的一个决议。贯彻这一决议无疑能够防止个人专权，可以做到集思广益，广泛调动全体党员积极地创造性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然而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是针对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党内派别林立的情况作出的决定。决议规定禁止一切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织成的集团。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决议的第7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sup>①</sup>这个并不长的决议，对以后苏共的命运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它成了某些人手中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的上方宝剑。

列宁和大会代表意识到此决议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担心会被滥用，所以对涉及中央委员的第7条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三分之二票的多数通过。同时还规定，决议第7条不公布。列宁在1921年3月16日的一个短短的发言中，三番两次地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不希望动用。他解释说：“我们提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列宁严肃指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sup>②</sup>然而，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中央全会开除中央委员几乎成了惯例，成了家常便饭。

这涉及中央委员会同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自然无权开除自己的委员。

由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十大代表的选举是按不同纲领进行的。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梁赞诺夫曾建议对草案作如下补充：“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这又涉及代表大会的权力了。列宁不同意这种提法，他反驳说，“这次代表大会对下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如果出现像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63—6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7页。

样的意见分歧，那又得按不同纲领进行选举了。这是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sup>①</sup> 列宁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程序和准则的。

俄共十大本意是要根据已经出现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扩大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走上正常的道路。这是同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同步的措施。只有党内生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国内生活民主化则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然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大大冲淡了民主的气氛。在以后的宣传中只提禁止派别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而根本不提“党的建设的决议”，以致很长时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十大还有一个主张实行“工人民主”的决议。“禁止派别”变成了压制批评，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借口。

结果，俄共没有能够为经济上的改革准备好一个较为民主自由的环境，没有能够使俄共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来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口授的“政治遗嘱”即最后书信和文章中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建议。<sup>②</sup> 然而这时候列宁已经重病不起，他的建议始终停留在文本上，而没能付诸实施。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0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页。

## 13. 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尹彦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922年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查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强调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地监视病中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

### 列宁口授遗嘱受到的监视与阻挠

1921年底列宁病情出现最初症状，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sup>①</sup> 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7页。

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sup>①</sup>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全会曾专门作出决定：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sup>②</sup>

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医疗制度的监督人。

但是，这时候列宁的思维仍然清晰，继续思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

“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sup>③</sup>

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还严禁列宁打电话。”<sup>④</sup>

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

防止列宁受刺激是必要的，但为什么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甚至连“家属”也不能向伟大的政治家谈政治？1922年12月21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这下惹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她严厉训斥，使她“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sup>⑤</sup>

当时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他批评“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sup>⑥</sup>斯大林被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56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96页。

④ 《托洛茨基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20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75、229页。

⑥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29页。



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于斯大林的行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sup>①</sup>“最有害的就是急躁”。这些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还有更重要的。列宁认定斯大林“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而是表明列宁对“斯大林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sup>②</sup>从1902年起列宁就已十分赏识才华出众的托洛茨基，虽然后来产生分歧，但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基本保持一致的。而列宁不时要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斯大林只是后来才完全站到列宁一边。到了要交班的时候，是交给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呢？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说，列宁亲口告诉他，希望他能接班，但被他坚拒。后面还将有专文谈这件事。

### 在扩大中央委员会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列宁看到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存在问题，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其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

从俄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为19—27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著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新的中央委员从哪里来呢？列宁主张从工人阶级中选出50—100个中央委员。<sup>③</sup>他说：“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sup>④</sup>列宁所指的工人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并且特别强调，“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sup>⑤</sup>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629、630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275—277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2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2页。

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认为这样做的目的：第一，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及书记处的机构。第二，提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以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第三，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造成党的分裂，党的稳定性将因之得到增强。总之，列宁的目的在于让工农群众的代表监督党的最上层领袖人物，以制约过分集中的权力。还有一点重要的，又不便明言的，卢森堡等人对于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为“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让大量优秀工农分子进入中央，也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名实相副。列宁的这个建议，口授于1922年12月23日，“当天即送达斯大林。”<sup>①</sup> 可谓正中斯大林之下怀。因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必然出自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组织局的提名、选拔，这一来自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山头，多一些受自己控制的“人马”。所以，1923年1月29日，书记处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应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增加到50人，美其名为以“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

托洛茨基经过研究，于1923年2月22日向中央全会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显然这是他在了解了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的回应之后的一个较为系统的补充与反建议，他说他是始终捍卫列宁信中的基本思想的，但认为扩大中央委员会意味着效率降低，不仅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反而应当减少。他说：

“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会使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工作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建议：“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sup>②</sup>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58页。

<sup>②</sup>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79页。

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同的。

列宁是从增强工农分子对中央最高层的监督出发，并且试图为中央最高层设置监督机构，因而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为此，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使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与扩大了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终走上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以改变政治局内事实上已形成的无监督、无汇报，权力过分集中于斯大林的现象，从而将加强对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监督。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思路并不同意，他从保证中央高层决策效率出发，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更多地考虑到拉帮结派、壮大自己山头的利益，同意扩大中央委员会。

列宁的主张，其愿望固然美好，但实践证明是空想。中央委员会虽然增加一些淳朴的工农分子，但由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不了解真相，缺乏判断的经验与足够信息、智力、能力，他们能起监督的作用吗？如果他们也参与决策，岂不会影响“准确性、正确性、及时性”？托洛茨基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所缩小，但由谁来监督这缩小的领袖集团呢？谁来监督权力中心：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呢？看来胜利者是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中委、中监委，扩大党代表大会，一步步把他们变成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人物，或者干脆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如果说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种决策与监督机构的联合体，它还能起到监督制约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作用，甚至还可以制约列宁、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那么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它既不能监督政治局、组织局，更不能监督书记处，不仅不能防止冲突与分裂，反而加速了冲突与分裂。

### 围绕把斯大林调开的明争暗斗

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sup>①</sup>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6位领导人的优缺点，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优缺点。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8—339页。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sup>①</sup>

当时不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托洛茨基也身居要职，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是陆海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托洛茨基当时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托付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加之托的功勋远在其他领袖之上，其名望仅次于列宁，因此，有大批拥戴者。所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党与国家的稳定与不稳定，团结与分裂。列宁的话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

所谓“分裂”，当时可能的“分裂”形式有三：一是党与工人阶级式的分裂。1922年2月26日，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告状的《22人声明》中，就谈到这种形式的“分裂”，即党反对工人阶级中“敢于坚持自己见解人”的“分裂”，党脱离自己代表的阶级的“分裂”。二是列宁此时所谓的“分裂”，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列宁信上还提到第三种分裂形式，即工农两个阶级的“分裂”，但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所以这种分裂在当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而列宁当时所设想的斯、托的分裂，还仅仅类似他和马尔托夫的“分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不久的事实果然证明了列宁关于“分裂”的预见，并且发生得很快。只不过它不是列宁与马尔托夫的那种“分裂”，而是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暗杀，以及列宁的近卫军全部被枪毙、坐牢这种“分裂”，这种分裂看来是列宁做梦也没想到的。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即所谓遗嘱，是分六次口授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3、24、25、26、29日与1923年1月4日）。如果说，开始时，列宁还没有下定撤去斯大林的决心，那么之后的十天，即1923年1月4日，终于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位上调离：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sup>①</sup>

如果说列宁前面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评价，是一种毁誉参半保持平衡的评论，那么，这里的建议，使天平一下子倾向托洛茨基了。加之列宁写的几篇最后书信和文章，四篇含有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内容，而最厉害的是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工农检查院在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期间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可想而知，斯大林是何等惶惶不可终日了。

到了列宁发现斯大林粗暴辱骂其妻子的事后，立即叫来速记员，口授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sup>②</sup>

这里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问题就不只是“调开”的问题，而且已经进而要“公开进攻”，“投掷炸弹”了（列宁秘书福季耶娃转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03页；第52卷，第554—555页。

述列宁的话<sup>①</sup>)。

从1922年12月21日以来，列宁曾多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全会为外贸垄断等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在给斯大林信的这一天，又口授了另一封信，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sup>②</sup>

这样看来，让“现在最有才能的人”、公认的天才，当时仅次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托洛茨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推荐，但列宁没有推荐，也不想作这样的推荐。列宁与托洛茨基齐名，国内当时悬挂领袖像，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个别场合还有季诺维也夫）。国外更是把列宁与托洛茨基相提并论，因此不必多此一举。二是虽然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决策人，但“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语）。而在国内战争中，托洛茨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功勋盖过其他人，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离之后，再否定托洛茨基的继任几乎是不可能的。谁料，却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12月23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却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规定。

<sup>①</sup> 《托洛茨基自传》，第420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554页。

然而不久，政治局多数人就已经知道列宁调离斯大林的建议了<sup>①</sup>，从而使斯大林等人早有准备。同时，列宁又规定对信、文件进行密封，除了他本人可以启封外，在他死后则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启封。1923年3月5日，列宁病情急转直下，随后丧失言语功能，已完全不能令人转交即将在4月份召开的十二大，不过，毕竟政治局是知道列宁给代表大会写了信的，所以1923年2月22日，托洛茨基说明，他“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sup>②</sup> 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的信，这样一来，只能延迟到十三大。因此十二大前后的中央全会、党代表大会并不知道有这封信。

在处理列宁遗嘱的手法上，严重违背党章，即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采取政治局少数人取代中央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方式。“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巴扎诺夫，曾亲身经历了十三大，他对列宁《信》的命运的描述，比托洛茨基准确、权威。他是这样说的：“1924年5月21日，即十三大举行的前几天，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操纵全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全会还决定不在代表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由他们向各代表团传达。会议这一决议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从而使代表团团长可以简单地向代表们说一下要点，而不必逐字逐句传达，‘列宁遗嘱’就这样悄悄地解决了。”<sup>③</sup>

本来应该“印发”给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的信，却变成“对中央全会特别会议”的“传达”，同时还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记录”，此其一；其二，本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却简化为举手表决；其三，本来该原原本本地传达，却变成简要地说一些要点；其四，传达中还加解释：斯大林同志愿意检讨与改正等等。这里可以看出，少数人是如何取代政治局与中央全会的，而中央全会又是如何取代党代表大会的。而托洛茨基推辞不在十三大作政治报告，不同意撤换斯大林，又帮了斯大林一把。斯大林的宝座就是这样保住的。有了不受监督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好办了。1925年1月，托洛茨基的军权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313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32、478、537、538页。

③ 鲍里斯·巴扎诺夫著，张斌译：《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87页。

被解除，1925年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被流放……直至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伊里奇（列宁。——引注）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政治局的其他领袖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一个个被排除出中央。到了联共（布）十七大，许多代表面对集体化的恶果，想起了列宁的遗嘱，竟有300人不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差额选举的话，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当不上。在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下，隐瞒了真相，这才又保住斯大林的宝座。当时斯大林还不宜于发作，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开始报复，70%的中央委员，过半的十七大代表，成了枪下鬼、牢中囚。凡是早先谈论、当时谈论列宁遗嘱的人，都有坐牢、枪毙的可能。这场血腥镇压，殃及全国数十万人。从此人们噤若寒蝉，不知列宁遗嘱为何物。只是到了二十大，列宁的信才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出版了单行本，人们才又知道了《遗嘱》的存在。<sup>①</sup>

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看，列宁是接受教训了，他更慎重于领袖的个人品质了，但是教训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置若罔闻，他取自杀式的宽宏大量。他不听列宁不要跟斯大林等人搞“糟糕的妥协”的警告，而是反对撤换总书记，“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撤换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只是告诫斯大林，“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的合作。”<sup>②</sup>斯大林保住了权力之后，哪有什么忠诚合作可言？托洛茨基为自己铸定了失败的结局，成就了斯大林的“伟业”，并进一步孕育了苏联的败亡。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59、340、473页。

② 《托洛茨基自传》，第424页。



## 14. 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郑异凡

从苏联末期直至今天，列宁遗体的去留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不过谈论的大多是是否继续保存列宁遗体，如何保存列宁遗体问题，很少谈及这一难题的源头，即始作俑者为谁？

### 列宁遗体保存之谜

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对身后的遗体如何处理本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马克思逝世后和普通人一样下葬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从来没有出现过遗体如何处置的问题，人们随时可以去墓地向这位伟人表示敬意。恩格斯逝世后遵照遗嘱火化，然后把骨灰盒沉入伊斯特博恩海边离岸5英里的海底，任人凭吊。这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做法。怎么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遗体成为纷纷扬扬的争论不休的问题了呢？

关于遗体如何处理，未见列宁留下的遗嘱。现在俄国有人说，列宁曾嘱咐把他同母亲一起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沃墓地的说法，未见有文件支持。列宁的侄女奥尔加说：“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同乌里扬诺夫一家的成员一起度过的……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存在什么列宁有关安葬的遗嘱。”保存遗体，修造专门的陵墓安放供人们瞻仰，这可能是列宁本人从来没有想到的。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反对保存遗体的。据曾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克鲁普斯卡娅在同他私下谈话中表示反对把列宁木乃伊化。列宁逝世后不久，她在一封信中请求不要把列宁当做圣像膜拜。她本人很少

去看望列宁的遗体。第一次去是在1924年5月26日。最后一次是在1938年她逝世前几个月，面对列宁遗体，她对陪伴的人说：“瞧，他仍然没变样，而我却老了……”

官方是怎样准备列宁后事的，同样没有留下专门文件，似乎列宁病危期间没有对出现万一情况事先作出过正式安排。

不过，任何社会都会留下一些传说或叫“小道消息”，弥补官方消息之空缺。小道消息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证实，但不一定就不可靠。关于如何处理列宁的遗体问题，一个名叫尼·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的人就记载了一个当年在莫斯科流传的“小道消息”。瓦连廷诺夫时任《工商报》副主编，因为是搞新闻的，能接近上层人士，能听到流传莫斯科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小道消息，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上世纪50年代他写了一本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回忆录《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一书，记录了他在20年代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列宁卧病和逝世的一些情况，给我们留下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料。瓦连廷诺夫记载的说法加上近年来公布的解密档案，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保存列宁遗体始作俑的概况。

## 列宁去世前高层的非正式讨论

1921年下半年起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起初是无法坚持工作，这一年6月、7月、8月、12月不得不去休养。1922年更是如此。医生怀疑是1918年遇刺遗留在体内的子弹所致，所以在1922年4月23日住院动手术，成功取出子弹。但病情并未得到根本改善。1922年5月25日第一次中风，右手和右腿活动不灵便，说话有点不清。大概此后不久，列宁曾找斯大林索取毒药，以备瘫痪失语，无法工作时使用。此后，列宁在哥尔克处于半休养半工作状态。10月初返回莫斯科，开始工作。针对列宁的健康状况，12月2日医生告诉列宁，每两个月必须1次甚至2次外出休息几天。周二不允许主持会议，周四可以，但时间不能长，周四之后必须外出休息几天。12月7日晚，列宁再次赴哥尔克休养。12月12日返回莫斯科，这一天是列宁在自己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12月13日列宁发病，医生嘱咐离城全休，但列宁没有走，继续处理各项事务。12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病情突然恶化。这是第二次中风。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进一步

恶化，右臂右腿瘫痪。此后，列宁开始口授他的“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同时，指示自己的秘书班子调查斯大林等人打击压制格鲁吉亚领导人事件的真相。1923年3月初，列宁口授了3封短信：一封是给托洛茨基的信，请他出面在中央全会上代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第二封是给斯大林的信，要求他为粗暴谩骂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否则就与他断绝关系；最后一封是给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的信，对斯大林等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粗暴和纵容行为表示愤慨，对格鲁吉亚领导人表示支持。7日凌晨列宁健康急剧恶化，到10日已经不能说话，身体右侧瘫痪加重。3月14日《消息报》就列宁病情发布“政府公报”。这标志着列宁彻底退出政治舞台。5月15日列宁转移到哥尔克疗养。此后，健康状况有所好转。10月18—19日，列宁曾返回莫斯科，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没有找到需要的文件，极为不快，19日晚回哥尔克。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刺激颇大，病情加重。1924年1月俄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围攻托洛茨基。列宁对此极为关注，情绪激动。1月21日，列宁因病情急剧恶化逝世。

列宁的健康状况自然引起高层人士的关切。斯大林是特别关注列宁健康状况的一个，一是因为他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二是因为这时候他正因主张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按照“自治化”方案建立苏联、对不同意其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粗暴施加压力等做法，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直接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列宁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据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弗拉基米罗夫说：斯大林早就观察伊里奇并且认为列宁病得很重。第一次中风之后，斯大林就此病询问医生，索取有关医学图书查阅，还两次专门去哥尔克观察列宁病情。这样，早在1922年斯大林已经宣布，列宁的病是无法治疗的，第一次中风之后接着还会发作，列宁“完蛋了”。安娜·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姐姐）听到“列宁完蛋”的说法，非常气愤。斯大林的话给列宁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不开心的印象。列宁愤慨地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

就在列宁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后不久，大约在1923年10月底，6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加里宁、斯大林和李可夫曾非正式聚会。斯大林通知说，据他得到的消息，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有死亡的危险。一些情况表明，斯大林指的正是10月19日列宁从哥尔克赴莫斯科之后健康状况急

剧恶化。

加里宁接着斯大林的话说，列宁的临近死亡给党提出了他的安葬这一极端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对这一可怕的事件我们不要搞得措手不及。如果要安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葬仪之盛大应当是世上空前的。”

斯大林完全支持加里宁。他说：“的确需要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到，以免在极其悲痛的时刻出现任何张皇失措。据我所知，这一问题也使我们的某些外省同志极为焦虑不安。他们说，列宁是俄罗斯人，应当以与之相应的方式安葬。例如他们坚决反对火葬，把列宁遗体火化。照他们的看法，焚化遗体不符合俄罗斯人对先人的敬爱之情。这种做法甚至会是对他的纪念的一种侮辱。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焚化、消灭和抛洒骨灰，总是被看做是对被处死者的最后最高裁判。某些同志认为，现代科学有可能借助于防腐剂长期保存先人的遗体，至少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使得我们的意识能适应列宁毕竟不在我们中间了这一思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斯大林是首先提出保存遗体这种想法的领导人。

斯大林的发言引起托洛茨基极端愤怒的反应，他针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讲完话以后，我这才明白，说列宁是俄罗斯人，应当按俄罗斯方式安葬这起初令人不解的议论和指示要引向何方。照俄罗斯方式，照俄罗斯东正教教规，圣徒是要制成干尸的。看来是要建议我们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种方式行事——保存列宁的遗体。过去有过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和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干尸，现在想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干尸去取代它们。我倒很想知道，这些外省同志都是些谁，据斯大林说，他们建议借助现代科学给列宁遗体涂上防腐剂，把它制成干尸。我想对他们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完全赞同托洛茨基，同样表示愤慨。照他的看法，把列宁的遗体变成涂上防腐剂的木乃伊，这是对他的纪念的严重侮辱，同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极端矛盾而不相容，这种做法提都不应该提。他说：

“我觉得在党内什么地方从空隙里冒出一股奇怪的气味。想以牺牲思想的崇高去尊崇身体的遗骸。例如有人说，要把马克思的遗骨从英国迁到莫斯科来。甚至听说，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旁的这马克思遗骨似乎会使这整个地方，使安葬在烈士公墓的人增添‘神圣性’和意义。这真是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加米涅夫也以同样的精神反驳斯大林。他提出，有人建议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特别支持这一建议。这种显示列宁在十月革命历史上的巨

大作用的做法，加上出版几千万册他的著作，这是对列宁的真正尊敬和纪念。至于保存列宁的遗体，他加米涅夫认为是列宁在其哲学著作中曾予以痛斥的那种“僧侣主义”的特殊的和奇怪的余音。

不过，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抗议没有对斯大林和加里宁起什么作用，斯大林拒绝说出建议把列宁遗体做防腐处理的“外省同志”的姓名，而加里宁则继续顽强坚持，列宁不能像一般死者那样埋葬。看来，所谓“外省同志”云云无非是一种托辞而已。

李可夫采取奇怪，但倾向于斯大林和加里宁的立场。他认为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建造陵墓，把几百具似乎是十月革命捍卫者的遗骨迁往红场，埋葬在烈士墓上，是极不得当的想法，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捍卫者，而不是偶然被杀者，甚至是革命的敌人。1919年在此地安葬斯维尔德洛夫时就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李可夫也认为，列宁应当按特殊方式安葬，至少要葬在烈士墓以外的地方。<sup>①</sup>

这不是正式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没有出席，会议既没有正式记录，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仅仅是交换看法。不过，可以看出，某些领导人已经在谋划保存列宁遗体了。

主张保存遗体的两人的身份值得注意。加里宁是农民出身，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在推荐他担任此职时说：“他本人就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同农民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并且经常在改善和加强这种联系。”加里宁的出身表明他身上具有农民意识，而俄国的农民普遍信仰东正教，由他提出盛大葬礼的建议是符合他的出身的。斯大林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接受过神学教育，保存圣人的遗体使之不朽，是东正教的一个传统，由他嘴里说出保存遗体的要求一点也不奇怪，后来他在列宁追悼大会上的像神父般的宣誓，更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由于存在分歧，议论归议论，未见有人具体准备后事。

---

<sup>①</sup> *Воленг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 90—92.*

## 列宁遗体保存经过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次日，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决定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追悼大会，星期六为下葬日，列宁遗体由200人（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领导人）运往莫斯科。安葬地点为红场，遗体告别地点为工会大厦。同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其成员为捷尔任斯基（主席）、穆拉洛夫、拉舍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捷连斯基和叶努基泽。后来安葬日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政治局决定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但这时候还没有长期保存遗体的迹象，仅仅由阿布里科索夫做一般的保存6—7天的常规防腐处理，以保证遗体告别活动的正常进行。

不过24日政治局已经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把列宁遗体保存在红墙旁边的临时墓穴。但即使临时保存遗体暂不入土的方案也受到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姐妹兄弟的反对。政治局曾委托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说服她不要坚持过一个月还会重新提出讨论的建议。

1月2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政治局的指示作出决定：

“为满足无数代表团和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信上所表述的愿望；为使在安葬日赶不到莫斯科的人们有可能同敬爱的领袖告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

- (1) 把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遗体的灵柩陈放在陵墓内以供瞻仰。
- (2) 陵墓建在克里姆林宫宫墙旁十月革命战士公墓中间。”<sup>①</sup>

此决定于1月26日在《真理报》第4版左角不起眼的地方公布。后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李可夫的建议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谜，其语义相当含糊。一方面说，保存列宁遗体具有临时的性质，为的是让外省来的代表团得以同敬爱的领袖“告别”；另一方面，兴建的“陵墓”并不是临时性的，而是供长期瞻仰的永久性建筑。决定之所以采用语义含糊的表述，显然是因为政治局内存在不同意见，斯大林和加里宁等人不顾其他政治局委员如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反对而执意要求保存列宁遗体，所

<sup>①</sup> 《真理报》1924年1月26日。

以只好以含糊其词作缓兵之计。其结果就是使得某些地位相当高的人士也莫名其妙。例如，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还说：“亲爱的列宁！你的已死亡的躯体，我们把它埋入地下，而你的事业，你的思想，仍然同我们在一起。”<sup>①</sup>

即使最高层人士也有人认为列宁将被埋葬入土。1月26日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追悼大会。会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都意味着列宁遗体将被埋葬。季诺维也夫说：明天我们将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埋入坟墓”。加米涅夫说：“现在我们拜倒在领袖墓前。”1月27日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写道：“真好，决定把伊里奇埋入坟墓！真好，我们及时领悟到这样做！所以，把伊里奇的遗体掩埋入土已经不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这是当时掌权的“三驾马车”中的两人的想法！

托洛茨基当时在赴苏呼米休养途中，没有来得及赶回来参加葬礼，但他的立场是清楚的。他后来在《我的生平》中写道：“本应当把列宁看做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做宗教领袖看待。不顾我的抗议，在红场建造了不成体统的和有辱于革命意识的陵墓。”<sup>②</sup>

斯大林在追悼会上发表了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宣誓词，连“遗嘱”一词用的也不是法律用语“завещание”，而是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заповедь”（戒条，圣训）。他开始把列宁神化！<sup>③</sup>

列宁葬礼后不久，1月30日，克鲁普斯卡娅针对“为伊里奇树立纪念碑”而建立基金库一事，在报上发表短信说：“我对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请求，不要把自己的悲痛变成对他个人的表面崇敬。不要为他树立纪念碑，不要建造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不要举办豪华的隆重纪念仪式，等等，这一切他在生前认为没有什么意义，感到是一种累赘……”

值得一提的是，匆忙修建的陵墓在列宁遗体移入后立即关闭了。官方的理由是陵墓内部装修未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列宁的遗体开始腐烂了，需要用新办法重新处理。

① 《真理报》1924年1月26日。

② 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8页。

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6页。

政治局和捷尔任斯基、克拉辛开始寻求保存遗体的办法。1924年3月13日政治局听取莫洛托夫和克拉辛的报告后通过决定：“鉴于缺乏其他保存弗·伊·列宁遗体的方法，责成委员会用低温的方法保存遗体。”此后不久，党的领导赞同哈尔科夫市的沃罗比约夫的保存方案。经过4个月的防腐处理，得出可以长期保存的结论。

1925年1月，悬赏列宁墓的设计：一等奖1000卢布，二等奖600卢布，三等奖500卢布。1929年7月政治局经过多次审查，听取叶努基泽的报告后通过决定：着手修建列宁陵墓。

当局禁止对此提出任何异议。1929年7月《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沙茨金的文章《论党内的庸俗作风》，对建造陵墓的思想提出批评。政治局认为此文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

1929年，用木头仓促建筑的陵墓改建成大理石建筑。从此，列宁陵墓成为红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重大集会、庆祝游行的观礼台。

此后，苏联领导人的殡葬逐渐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是列宁、斯大林，进入专门的陵墓；其次是一些在职去世的领导人如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埋在红墙旁边的墓地，斯大林后来也进入了这个行列；下一个等级的领导人和名人，骨灰盒安放在红墙上，即在墙上取出一块砖，放进骨灰盒，外面镶上刻有名字和生卒年的大理石，《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里德的骨灰盒就安放在红墙上。如果苏联存在下去，这种做法延续下去，有一天红场很可能会变成一片墓地！一些“下台干部”是没有资格进红场的，曾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曾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等都只能去新圣母公墓安眠。还有一些领导人，如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曾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布哈林，则至今不明葬身何处！

列宁遗体的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了一个先例，此后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的遗体也做了防腐处理，长期保存，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日成，中国的毛泽东。

列宁逝世后，为纪念领袖采取了3项措施，一个是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一个是决定出版《列宁全集》，第三个是保存遗体以供瞻仰。现在，“列宁格勒”又改名为“圣彼得堡”，恢复了历史名称。保存遗体一事时不时地在俄国国内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有造成社会分裂的危险，而其最后命运尚难



预料。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论，保存遗体是要花费大量资金的，一旦资金短缺，就难以为继。真正能够永久纪念列宁的是出版他的著作，让他的思想流传下来。《列宁全集》在苏联出版了5个版次。在中国出了两版，我国出的60卷第二版《列宁全集》（还有一卷补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列宁著作集，为研究列宁思想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资料，这是我国对纪念列宁作出的贡献。

# 第二编 斯大林时期



## 15. 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郑异凡

### 担任总书记以前的斯大林

斯大林 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 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不是像后来所说的在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的）。他于 1913 年 2 月被捕，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此后直到 1917 年 3 月足足沉寂了 4 年之久，《斯大林全集》中没有这一时期的任何文章。

1917 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开始活跃的革命活动。这时候，斯大林并不是列宁方针的积极拥护者。由他和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在基本方针上动摇不定，如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加米涅夫发表文章，号召士兵“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也就是说号召继续进行战争。而斯大林在《论战争》中认为，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sup>①</sup> 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一个暗淡的、没有光泽的斑点。”

1917 年 4 月 4 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第一次宣读《四月提纲》，会上发言支持列宁的只有柯伦泰。由此可见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

---

<sup>①</sup> 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这个错误，见《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289 页。

的态度。列宁在9月建议举行武装起义，中央委员会置之不理，为此列宁甚至提出辞职表示抗议。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在武装起义之前，斯大林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真理报》和某些组织工作，由于不善于鼓动讲演，他很少在群众集会上露面。

在整个准备和举行武装起义过程中，斯大林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十月革命的目击者、著名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所著《震撼世界的十天》，没有关于斯大林在此期间活动的记载。

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中，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按照列宁1921年3月给越飞信中的说法，三年半来斯大林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sup>①</sup>

胜利之初，由于中央委员们都忙于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很难召集全体开会议事，所以设立了一个中央常务局，处理各种紧急事务。其成员为斯大林、斯维尔德罗夫、列宁和托洛茨基四人，但同时规定，在决定问题时必须吸收在斯莫尔尼宫的所有中央委员参加，因此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设置。

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经常受命去各战线，是“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他的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发生冲突，抗拒托洛茨基的指挥，为此列宁不得不多次出面调停。

总的说来，从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再到经济建设初期，斯大林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就知名度而言，当时的排名大体上依次是：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以后才轮得上斯大林。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非凡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69页。

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sup>①</sup>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 俄共中央机关和书记处情况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 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秘书，文书，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 Секретарь 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到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



斯大林。（新华社稿）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72—72、212页。

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sup>①</sup>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以及执行其他组织职能。<sup>②</sup>俄共八大之前实际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政治局的设立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17年10月10（23）日为政治上领导武装起义而成立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成立这样的组织，是事后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写上去的，就是说，是1924年“组建”的！<sup>③</sup>把反对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入“政治局”，是斯大林对他俩卖力反托洛茨基的奖赏。

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通过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由此可以看出，1917年建立的由4人组成的处理紧急事务的中央常务局已被政治局取代。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三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通过的党章。

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

① Протоколы ЦК РСДРП (6.). М., 1958. С. 13.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7. С. 69.

③ 见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十大后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者，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sup>①</sup>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sup>②</sup>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 斯大林是怎样选上总书记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

---

<sup>①</sup>（英）伦·夏皮罗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sup>②</sup>（英）伊恩·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得也并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sup>①</sup> 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工于心计，很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察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sup>②</sup>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领导组织干部工作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被派去的就是斯大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500页。

林，他迅速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作准备了。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斯大林的心腹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卡岗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此外，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利斯也得到主人的精心培养和安排。布哈林被打倒后，此人代替布哈林掌管了《真理报》，并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局长，一时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总书记以有力支持。另外，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都是涉及登记分配工作的，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票。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之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弧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所以4月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定下的决定而已。

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 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斯大林时期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

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sup>①</sup>

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sup>②</sup>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出另一个推荐人，他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在我们党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是，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列·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sup>③</sup>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

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sup>④</sup>据记载，1922年3月6日列宁去莫斯科省特洛伊茨科耶—雷科沃村附近的科尔津基诺休假，3月25日才返回莫斯科。所以列宁没有参加2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这就是说，列宁没有参加决定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位的中央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sup>⑤</sup>

巴让诺夫的说法解决了托洛茨基与麦德维杰夫两人之间说法的矛盾。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

①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М., 1953. С. 88. 另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5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86页；《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0页，等等。

② 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页。

③ Медведев Р. А.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New York. 1974. С. 49.

④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页。《列宁全集》第43卷，第62页。

⑤ （苏）波·巴让诺夫著：《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不久之后，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他们三人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的因由。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sup>①</sup>

由于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四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然而十一大速记记录中未见加米涅夫的这一声明。中央全会只好把此解释记录备案。<sup>②</sup>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时也是斯大林本人的。

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和决定设置总书记一职，最终确定设置这一职务的是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记录写道：

“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sup>③</sup>

在十一大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身兼数职曾提出意见，他说：“我们举斯大林同志为例，他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能够设想吗，一个人能够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要担负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中央几十个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工作？”<sup>④</sup>

列宁在会上为斯大林身兼数职辩护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能

---

①（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另一种说法是，“总书记”字样是直接印在中央委员的选票上的，见瓦·萨哈罗夫：“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职位”，载《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页。

② ЦПА ИМЛ, Ф. 17. ОП. 2, Д. 78, Л. 1—2. 引自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③（苏）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137页。

④ 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 (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1961. С. 84—85.

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察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sup>①</sup>

从列宁的辩护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护，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3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所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sup>②</sup>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sup>③</sup>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太看重“总书记”这一职务，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位。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9页。

② 福法诺娃著；《回忆录》，引自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著：《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3页。

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sup>①</sup> 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sup>②</sup>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sup>③</sup>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9页。

③ “职务名册”制和“在册权贵”俄文均为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本义是名录、名册,在苏共组织中作两解:一指党中央设定的高级干部的职务名册,我们译作“职务名册”。其二,为根据此职务名册由上级任命的高级干部,译作“在册权贵”,现在俄国报刊图书中常见的均为后一义。

## 领袖们的“地盘”

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

托洛茨基一直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作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这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被叫做“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暂时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

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

## 被歪曲的列宁的建议

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sup>①</sup>

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sup>②</sup>

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年4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他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2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7页。



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40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sup>①</sup>

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增加人数，这是他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取来的，但是他的方案与列宁的思路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人中，斯大林<sup>②</sup>和托洛茨基年龄最大，生于187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而布哈林生于1888年，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他们的年龄在32至43岁之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组合。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讲了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sup>③</sup>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斯大林老化之说完全是个借口。

斯大林说，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

---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② 另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此说属实，斯大林就是除列宁外这个班子里年龄最大的了。

③ Фоти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 285—286.

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此前，斯大林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2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名来自省或中央的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3人接近季诺维也夫，2人为中央工作人员，其余12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sup>①</sup>

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为50人，加10名候补委员，大致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相同。

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十二大致敬的代表团，最后都高呼“万岁”：通常都喊“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除列宁外，喊托洛茨基万岁共12次，喊季诺维也夫6次，喊加米涅夫3次，而喊斯大林的仅1次！就代表大会鼓掌的次数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这种状况是斯大林所不甘心的。

### 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运动

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在首都莫斯科，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胜。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们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

---

<sup>①</sup> 阿夫托尔汉诺夫著：《苏共野史》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призыв 是征收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 призыв 这个词。所以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 一词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轰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 25 万名党员。

到 1924 年 5 月底，俄共原有党员 472000 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 25 万名，一下子变成 72 万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做“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指出，“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sup>①</sup>

1924 年 5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斯大林作结论说：“所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扩大中央委员会会有很大的好处，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sup>③</sup>《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

① 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第 448 页。

② 《俄共第 13 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193 页。

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sup>①</sup>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约·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sup>②</sup>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工厂的工人倒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名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名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sup>③</sup>

<sup>①</sup>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8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7—18页。

<sup>③</sup>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3页。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sup>①</sup>

### 通过党内斗争打倒对手

从1921年底1922年初起，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这时候开始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于年中结成“三驾马车”，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他们采取的一些决策频频出现错误，如中止外贸垄断，在成立苏联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压制打击反对自治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等等。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列宁的批评，病中的列宁为此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维护他（列宁）的立场。

“三驾马车”本来就把托洛茨基看成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倚重，更加剧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敌视。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那时根本不把“平庸”的斯大林看在眼里，以为只要打倒托洛茨基，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列宁成为最高领导人。在1923年秋“新方针”的争论中，1924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争论中，他们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给他戴上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并从组织上解除托洛茨基的军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们明显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就在他们联合的“蜜月”期间，斯大林就不断地展示其独立专权的霸道作风。1923年夏多数政治局委员到南方基斯洛沃茨克休假，只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留守莫斯

<sup>①</sup>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387页。

科。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单独决定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征求在南方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不满，他写道：“各种各样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末等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sup>①</sup>

显然是为了抑制斯大林的独断专行，7—8月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政治局委员们拟定了一个改革领导机关的方案，撤销组织局和改组中央书记处。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作，让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书记处。7月29日季诺维也夫等把方案通知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于8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认为这无非是要或者马上撤换书记，或者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他表示自己“并不看重地位”，同意撤换书记，但反对实行政委制。

1923年8月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不撤销组织局，而在该局的成员中加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923年9月25日，中央全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组织局委员，选举布哈林和科罗特科夫为组织局候补委员。<sup>②</sup>

后来斯大林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回过头来清算了基斯洛沃茨克这笔账。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认为，新反对派（未提布哈林）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斯大林回顾了问题的历史：“1923年，在第12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sup>③</sup>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

---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4. С. 197—198.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③ 速记记录上是“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由于其他人以后被陆续打倒，所以《斯大林全集》中只留下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两人了。

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绝不声张，也不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争论，也不要保障少数的权利。”<sup>①</sup>

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含糊地提到列宁的“遗嘱”，说“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斯大林于8月7日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说“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就不怕什么信吗？”<sup>②</sup>

季诺维也夫在8月10日回答斯大林说：“是的，是有弗·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第12次代表大会）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对您提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您对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分歧的认识本来就太主观片面，所以我们不想使您神经紧张。”<sup>③</sup>

这是拿列宁的遗嘱警告斯大林了。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设法整“三驾马车”中的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了。1924年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公开批判加米涅夫的“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口号，还不指名地批判“党专政”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在提出口号以前缺乏思考的习惯”。<sup>④</sup>前者斯大林利用了速记员的笔误——把“耐普”写成“耐普曼”。至于“党专政”的提法并非出于“疏忽”，而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来主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而只可能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实施。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党专政无非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斯大林不经政治局同意，1924年6月2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报告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加、季两人的声誉。

不过大敌当前，在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和斯大林联合一起来对付托洛茨基，通过“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问题的争论，击败了托洛茨基。1925年的一月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3—324页。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4. С. 203.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4. С. 205.

④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4—225页。

从而扫除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

矛盾无法掩盖。在一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等要求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扮演和事老的姿态，表示反对割除、流血的办法，声称“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sup>①</sup>

斯大林把处理托洛茨基问题上的分歧看成是处理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分歧的开始。击败托洛茨基之后，对斯大林来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就是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时任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国际和国内都有相当的名望。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等组成“新反对派”，向斯大林发出挑战。加米涅夫在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反对制造‘领袖’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够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重复一遍：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sup>②</sup>

加米涅夫最后说：“我们反对一人专权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我的发言以这些话开始，现在也以这些话结束。”<sup>③</sup>

“新反对派”遭到了失败。加米涅夫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不久，季诺维也夫失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托洛茨基，结成声势浩大的“托季联盟”。但这时候，这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军队、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而已经不能形成对斯大林的实际威胁。

斯大林则同布哈林结成联盟以对付“托季联盟”。斯大林不是理论家，因此真正的理论争论还得靠布哈林这支笔，由布哈林写文章来批判左倾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面对“新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联共十四大上竭力为布哈林辩护，为他的“发财吧”的口号辩护，轻描淡写地说：“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

---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7页。

② 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 в). Бюллетень. №5. С. 56—57.

③ 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 в). Бюллетень. №5. С. 57.



不值得注意的”，反对要布哈林的血，声称“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sup>①</sup>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声明“‘发财吧’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为以后批判布哈林留下伏笔。

同布哈林的结盟同样是权宜性的。1927年底，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之后，同布哈林“右派”的矛盾开始突显。以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斯大林开展了反对“右倾”的斗争。所谓右倾的代表人物正是为反对托洛茨基作出贡献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由于在初始阶段斯大林并不拥有多数，他的一些主张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例如在1928年七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包含很多布哈林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斗争起初以采取不声不响的党内上层的内部斗争的形式展开，斯大林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多数。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这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斯大林通过长期的努力，把自己人陆续安排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在联席全会上就能够容易形成自己的多数，以多数票通过自己所需要的决议。一旦有把握形成多数，斯大林就召开联席全会。1929年的四月联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得以通过全会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按照惯例，在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同时，斯大林就安插进自己的人，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分。到1929年底，整个政治局已经是斯大林的政治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候补委员为：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瑟尔佐夫和丘巴尔。反对派成员只留下一个李可夫，但他的时间不会太长，同年12月他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可以说清一色的斯大林中央从此确立，斯大林本人登上了苏联权力的巅峰。从此以后，总书记也就成为党内最高职务。

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9—321页。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10. С. 24.

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的处于二三流地位，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这些人在1929年12月斯大林50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就是一篇严重歪曲国内战争历史，竭力吹捧斯大林的典型之作。斯大林拥有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往农村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有了自己的骨干队伍和群众，斯大林剩下的工作就是在30年代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消灭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消灭人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记忆，消灭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

## 16. 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

陆南泉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如果与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相比大约要晚二百年。1861年俄国进行农民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俄国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总的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落后得多，并有其自身的一些明显的特点。因此，十月革命后，苏联由于受到俄国工业严重落后与当时所处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自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

如何全面地认识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是研究苏联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今对中国推行工业化仍有启示意义。

### “大跃进”式的工业化

俄国从彼得一世起，在认识到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便提出要搞工业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备，为对外扩张与战争服务。这一发展经济与搞工业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列宁提出并开始实施一些经济革命改造的设想与政策，后来因国外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被迫停顿下来，转入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战争结束后，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教训基础上，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1928年）。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到20年代中期，苏联基本上完成经济的恢复工作，1925年农业基本上达到了战前水平，但并没有改变经济严重落后的状况，仍然是俄国遗留下来的技术经济结构。首先表现在苏联还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的农业国。192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82.1%，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6%，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其次，1925年工业总产值已达到战前的73%，但要看到，代表工业主体的机器制造业、冶金、燃料、航空、电力和建筑材料等部门很不发达。实际上，到1925年苏联还没有汽车、拖拉机和航空工业这些最重要的部门。第三，工业的设备基本上是旧式的，而且多半是磨损很大的机器与机床。现代化的设备国内又不能生产，因此，很多机器设备要靠进口解决。1927年机器设备进口额比1924年增加1.3倍，其中金属加工设备增加3.9倍，动力设备增加5倍。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独立性。第四，由于运输业的严重破坏，它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恢复，斯大林认为，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业化问题上来。1926年4月13日他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报告，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思想的变化。他在报告中，把新经济政策分成两个时期：1921—1925年底为第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在扩大商品流转的条件下，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建立国民经济基础；而从1926年开始为第二个时期，“……最重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经转移到工业方面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张了”。<sup>①</sup>后来，斯大林认为，必须结束新经济政策，否则就难以实行工业化政策，到了1929年他就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弃。”<sup>②</sup>

在上述背景下，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工业的方针。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说：“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sup>③</sup>在他报告的结论中明确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的基础。”<sup>①</sup> 1925年提出工业化方针，但并不是说，工业化时期就此开始了。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十四大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没有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政策、纲领和规定明确的任务。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

至于工业化时期何时结束的问题，斯大林本人就有各种说法。<sup>②</sup> 看来，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或时期来讲，斯大林1946年的说法可能更贴近实际，即苏联工业化用了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完成的。但要指出的是，随着斯大林在1926年的经济建设思想由农业转向工业，因此1926年与1927年，已经对发展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苏联有近千个新建企业投产，其固定资产为8500亿卢布。大量发电站交付使用，还开始兴建包括第聂伯列宁水电站在内的11座巨型电站。冶金工业是重点发展的部门，为此扩建与改建了刻赤冶金厂等企业。还开始着手建设一些大型的拖拉机厂、重型机器厂、车辆厂、钢铁厂、化工厂等。在扩大煤炭、石油与泥炭开采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为了具体了解苏联工业化的进程，下面我们对苏联战前实行工业化的三个五年计划作一概述。

### （一）“一五”计划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28年10月1日开始执行到1932年结束。按苏联的说法，实际上是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任务。

对“一五”计划要实现的广泛经济与政治任务，如果作一简单的归纳，其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具有头等意义的重工业，在此基础上着手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sup>②</sup> 按斯大林第一种说法，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时期结束了。他在1933年1月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4页）。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之事时，称这是“一个飞跃”。在他看来，“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以便巩固苏联的国防与经济的独立性；

第二，着手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大型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主要途径是发展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

第三，在经济中不断排挤资本主义成分，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

但要指出，“一五”计划的中心环节是经济建设。这是由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指的是：国家需要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必须从速彻底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建立起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的结构；需要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提高工业的比重，改变轻重工业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改变生产力的布局；广泛开展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规定的任务。

关于“一五”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1929年4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作了具体的规定。

“一五”计划经济增长方面应达到的水平：

(1) 5年期间，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为646亿卢布；

(2) 由于进行了这些投资，国家固定基金总额在5年期间要增加82%；

(3) 工业总产值到“一五”计划结束时要比战前增加两倍多，农业产值增加50%以上；

(4) 根据国家工业化、加强苏联国防力量与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总方针，工业基建投资主要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它要占全部工业投资的78%。因此，这些工业部门的产值增长快得多：在计划工业总产值增长1.8倍的情况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增加2.3倍。

“一五”计划还规定一系列重大的建设项目：

(1) 在电站建设方面，计划规定建设42个区中心发电站。从而使五年计划末发电量由50亿度增加到220亿度；

(2) 在黑色冶金业方面，计划规定建设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大型冶金工厂，这样，到1932—1933年度生铁的产量应当由35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sup>①</sup>

(3) 在煤炭工业方面，计划在顿巴斯、乌拉库兹巴斯和莫斯科煤矿区建设大矿井，使煤产量从1927—1928年度的3500万吨增加到1932—1933年度的7500

---

<sup>①</sup> 后来斯大林把生铁产量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钢产量规定为1040万吨。

万吨；

(4) 在机器制造业方面，由于改建原有的工厂和建设新工厂，可使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增加 2.5 倍，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增加 3 倍；

(5) 在化学工业方面，计划建设化学联合工厂，使化肥产量在 1932—1933 年度达到 800 多万吨，而 1927—1928 年度是 17.5 万吨。

1933 年 1 月，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一五”计划执行结果的基本特点是：首先，从总体上来讲，发展速度是很高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 23.5%。但就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未达到计划规定的目标。如工业总产值原计划规定 1932 年要比 1928 年增加 1.8 倍，而实际只增长 1.33 倍，重工业计划规定要增加 2.3 倍，而实际 1.93 倍。其次，特别强调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23.5% 的情况下，第一部类为 31%。

由于“一五”计划期间第一部类发展速度大大快于第二部类，这使第一部类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28 年的 39.5% 上升到 1932 年的 53.4%，而第二部类的比重则由 60.5% 下降为 46.6%。第一部类的快速增长，也使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28 年的 48% 上升到 1932 年的 70%。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展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既要许多陈旧设备加以更新，又要新建大量的大型工业企业（“一五”计划期间新建了 1500 个工厂），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新技术设备，但国内又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而这一期间，又恰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 1929—1933 年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即西方国家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竞相向苏联出售工业设备与钢铁、机械等重要产品。这样，在“一五”计划期间，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提高到 90% 以上，其中机器设备占一半以上。到“一五”计划结束时，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一半，居世界第一位。<sup>①</sup> 苏联在购入技术设备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技术的引进，1929 年 5 月，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建设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外国咨询局，以领导外国技术力量的引进与利用业务。1932 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技术人

<sup>①</sup> 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8 页。

员分别为 1910 人与 10655 人，比 1928 年分别增加了 4 倍多和 20 多倍。与此同时，还选派了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国外进修和进行合作研究。在 1929—1931 年期间，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派出了 2000 多人。

大量购进设备与引进技术，对“一五”计划期间建立大型工厂与技术进步都起着重要作用。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扎波罗钢铁厂，均是在美国与德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也都是在利用西方技术与设备的条件下建成的。

## （二）“二五”计划

在“一五”计划结束前夕，苏联已着手制订“二五”计划。1934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0 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 年）》决议。决议规定“二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6.5%。

“二五”计划与“一五”计划相比，主要特点有：一是降低增长速度。二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力图进行调整，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为了增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食品工业的发展，“二五”计划规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 97.2%，而消费品的生产则要求增加 1.34 倍。对农业的投资增加 50%，产值要求增加 1 倍。对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的投资也有明显的增加，投资额规定为 161 亿卢布，这比“一五”计划期间的 35 亿卢布增加了 3.6 倍。而对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投资增长幅度为 1.5 倍。三是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放在中心地位。

根据苏联官方宣布，“二五”计划于 1937 年 4 月 1 日完成，与“一五”计划一样，只用了 4 年 3 个月完成了 5 年的任务。

“二五”计划最后一年的 1937 年，工业产值比 1932 年增加 1.2 倍，年均增长率为 17.1%，计划为 16.5%，生产资料的产值增加 1.39 倍，消费资料的产值增加 99%，农业产值增加 50%，国民收入增加 1 倍。“一五”计划时期甲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乙类工业 75%，而“二五”计划时期仅超过 20%，甲、乙两类的增长速度出现接近的趋向。“二五”计划执行结果表明，机器制造业的增长大大超过原计划规定的速度。1937 年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工业产值比 1932 年增加 1.9 倍，而计划规定为 1.1 倍。在整个工业产值增加 1.2 倍的情况下，钢与钢材产量增加 2 倍，化学工业产值增加 2 倍，发电量增加 1.7 倍，但发电量只完成计



划规定的96%。“二五”计划的后几年，苏联把一部分原计划用于发展轻工业的资金调拨给了国防工业部门，使国防工业产值增长1.8倍，由于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为更新生产设备创造了条件。“二五”计划期间更新了50%—60%的生产设备，如考虑到“一五”计划期间进行的设备更新，那么，从1928—1937年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生产部门的设备已全部得到更新。“二五”计划期间，对运输业的投资为170亿卢布，比上个五年多1.5倍。铺设了3000公里长的新铁路线和5700公里长的复线，对克服交通运输业的落后状况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也有大的提高。职工实际工资增加了1倍。由于农业发展情况远不如工业，如粮食产量“一五”计划期间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而“二五”计划期间下降为7290万吨，<sup>①</sup>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实物收入与现金收入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还是增长了。

根据“二五”计划期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sup>②</sup>

### （三）“三五”计划

1939年3月20日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五”计划的决议。

“三五”计划的主要特点：一是考虑到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计划的出发点是要迅速提高苏联的军事经济潜力，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规定加速发展国防工业，建立雄厚的国家储备，首先是燃料、电力及某些其他具有国防意义的产品储备；二是新的工业主要拟建在苏联的东部地区，特别像钢铁、石油、化工、机器制造业更着重建在东部地区；三是改变“一五”与“二五”计划期间建设大型工业企业的方针，而改为重点发展中型企业的方针，目的是缩短工厂的施工与投产期；四是新建企业不要集中在某些地区，而要分散到各个不同地区；五是强调应确立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的新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中的甲类与乙类、工业与农业等关系。1938年2月由人民委员会批准的苏联国家计委的条例中

<sup>①</sup>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页。

<sup>②</sup>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最主要任务是，保证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各部门发展的正确对比关系，以必要的措施防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由于希特勒德国发动战争，“三五”计划不得不中断。从1938—1940年的三年情况看，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计划规定为14%），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5.3%（计划规定为15.7%）。但机器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0.6%，大大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

“三五”计划的头三年，整个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而国防工业为39%。国防工业在三年中增加了1.8倍。与此相关，到1940年，生产资料生产在全部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1.2%，消费品生产的比重为38.8%。

1940年是苏联“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完成工业化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了解苏联工业化的水平，下面以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对1940年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列表展示。

表1 1940年苏联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产品	1913年	1940年
电力（亿度）	20.39	486
石油（包括凝析油，万吨）	1028.1	3112.1
天然气（亿立方米）	-	32.19
煤炭（万吨）	2915.3	16592.3
生铁（万吨）	421.6	1490.2
钢（万吨）	430.7	1831.7
钢材（万吨）	359.4	1311.3
化肥（按100%有效成分计算，万吨）	1.7	75.6
化学纤维（万吨）	-	1.1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0.18	5.84
汽车（万辆）	-	14.54
水泥（万吨）	177.7	577.3
拖拉机（万台）	-	3.16
谷物联合收割机（万台）	-	1.28
木材运出量（实积亿立方米）	0.67	2.47

产品	1913 年	1940 年
纺织品 (亿平方米)	4.60	33.20
纸张 (万吨)	4.0	83.8
皮鞋 (万双)	680	21200
砂糖 (万吨)	136.3	216.5
肉 (屠宰量, 万吨)	500	470
粮食产量 (万吨)	8600	9564
籽棉产量 (万吨)	74	224
牲畜存栏头数 (万头)	5840	4780

资料来源：根据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与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等有关部分资料编制。

## 独特的工业化政策与理论

苏联工业化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思想进行的，其基本政策或者说主要特点是：重工业化、超高速与主要通过剥夺农民的办法用高积累来保证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在斯大林实行的三大工业化政策中，其核心是重工业化。由于工业化的基本政策，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因此，苏共党内工业化理论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有过激烈的斗争。

### （一）重工业化的实质是集中一切力量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

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工业化决议，并没有强调要侧重发展重工业。但到了1926年4月，斯大林开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明确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sup>①</sup>后来，斯大林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我们应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3页。

“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sup>①</sup>

为了实现斯大林重工业化的政策，在战前三个五年计划的13年期间，苏联对工业的投资为1550亿卢布，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42%。而用于工业的投资中，重工业占84%，轻工业占16%。重工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一般要占30%，有时高达40%，而轻工业的投资只占7%，有时仅占4%。而对农业的投资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一五”期间为15.5%，“二五”期间为11.8%，“三五”期间为10.7%。<sup>②</sup>根据官方的材料，从1926年到1940年，苏联重工业增长18.4倍，年均增长率为21.2%，轻工业增长6.2倍，年均增长率为14.1%，农业仅增长26%，年均增长率仅为1.5%。

有关工业化从何开始的争论，在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在党内失去领导地位之后，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斯大林在坚持重工业化政策的同时，指责布哈林等人“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布哈林等人也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决定性意义，但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他认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sup>③</sup>

## （二）超高速的工业化

斯大林一再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当时布哈林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坚决地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并且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最近的几年中”。<sup>④</sup>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sup>⑤</sup>但斯大林不顾有人反对，还是竭力追求高速度。在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上，当有人表示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等口号时，斯大林说：“那些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页。

② 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406—407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93页。

⑤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09页。

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此后，还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呢？

### （三）斯大林主要通过剥夺农民的办法用高积累来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为了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苏联在“一五”、“二五”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要达到26%—29%的水平，个别年份要占到国民收入的1/3。在工业化初期的1928—1931年，积累率的增长速度很快，积累基金增长近2倍，而消费基金仅增长0.5倍。<sup>①</sup>

斯大林为了重工业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必然要提高积累。而提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办法是靠剥夺农民，即靠农民的“贡税”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党中央四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专门谈到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即社会主义积累问题。他提出，苏联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不能像英国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资本，也不能像德国靠在普法战争后索取赔偿来加速工业化，更不能走俄国靠接受奴役性的条件下获得外国贷款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靠苏联国内积累解决资金问题。到了1928年工业化时期开始之际，大量的资金来源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了。内部积累究竟靠什么，斯大林在1928年7月9日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回答说：这种内部积累的源泉是农民，明确提出了“贡税”论。他说：“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付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这种税。”<sup>②</sup>斯大林通过“贡税”这种强制的办法，使农民一半的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一五”计划时期，从农业那里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

斯大林的“贡税”论来自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工业专政”的理论。

---

<sup>①</sup>（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王逸琳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2—124页。

<sup>②</sup>《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9—140页。

托洛茨基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像战胜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农民，为此，国家必须实行“超工业化”，即通过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并同时提高向农民供应的工业品价格，靠这种剥夺农民与挤压农业的手法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他还认为，要对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实行“工业专政”，即使一切经济部门都必须严格服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全力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度。

布哈林针对托洛茨基的上述理论与斯大林的“贡税”论指出，这些理论实际上是把农村当做殖民地，剥夺农民的政策实际上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从长远看，其结果必然是“需求缩减，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缓慢，工业凋敝等等”，最后“完全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sup>①</sup>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应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去解决，这样做在开始时工业化发展得慢一点，但之后随着农民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与资本周转的加快，最后会获得一个较高甚至最高的积累速度。

## 苏联工业化的成绩巨大

首先应该肯定苏联工业化的成绩。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关于这一点，苏联各届领导人也是一再强调的。积极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期正是由于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并“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使苏联“变成为强大的工业——集体农业的强国”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堡垒。”<sup>②</sup>勃列日涅夫在评价实行工业化的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岁月离开得越远，这段困难的然而而是光荣的时间在我们面前也就显得越加宏伟”，“我们头几个五年计划是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sup>③</sup>提倡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②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9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8—20页。

③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183页。

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 1933 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用他们在 20—30 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sup>①</sup> 长期以来，多数苏联学者对工业化的评价与官方是一致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工业实力大大提高

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在“二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值从欧洲的第四位跃升为欧洲的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苏联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从 1917 年的 3% 提高到 10%。按斯大林的说法，“三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

### (2) 基本上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独立性大大增强

由于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这为工业的其他部门发展提供装备有了可能，从而使苏联在工业化的较短时间内，使很多重要的工业部门得以建立和迅速发展，如建立了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机床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联合收割机、大型涡轮机和发动机制造业，多种化学工业，优质钢材的生产等。木材、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在工业化时期，由于集中力量加速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工业中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部门发展尤为迅速。

由于在工业化期间机器制造业处于特殊的优先发展地位，仅“三五”计划的头三年，机器制造业总产量增长 0.76 倍。1940 年机床总数为 71 万台。这样使苏联工业独立性大大提高。在二战前苏联能依靠国产机器和设备满足国内大部分的需要，特别是能保证军用生产部门的需要。

### (3) 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工业的发展

斯大林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必须有大量资源作保证。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这就要求加速东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1940 年该地区的生铁产量为 425 万吨，占全苏产量的 28.5%，钢 678.1 万吨，占全苏产量的 37%，生产轧材 479.2 万吨，占

---

<sup>①</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 页。

全苏产量的36.8%，铁矿砂857.5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8.7%，炼焦516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4.5%。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苏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高于全苏的工业增长速度。在1940年全苏整个工业的总产量比1913年增长11倍的情况下，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增长13倍和28倍。经济落后的哈萨克共和国增长19倍，格鲁吉亚共和国25倍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52倍，塔吉克斯坦272倍。<sup>①</sup>

#### (4) 军事实力加强，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创造了物质条件

大力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所以可以说，苏联工业化过程，也是大力加强国防实力的过程。在工业化期间，苏联军事工业的核心由一些“骨干”的军工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在1928年为46家，到1938年增加到200家。100%的航空工业、80%的造船工业、5%—10%的机器制造业、仪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础部门属于“骨干”军工厂。<sup>②</sup>

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发展十分迅速，工业化时期军工产品大幅度增长（详见表2）。

表2 1930—1938年苏联军工产品增长情况

项目	1930—1931年	1938年
大炮	1911门	12687门
步枪	174000支	1174000支
机枪	40980支	74657支
飞机	860架	5469架
坦克	740辆	2271辆

资料来源：（苏）A·H·拉戈夫斯基：《列宁论对国防的经济支援》，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158—159页。

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共生产了2700架新型飞机，4300辆

<sup>①</sup> 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周邦新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9页。

<sup>②</sup> 参见左凤荣著：《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坦克，其中 50% 是新型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发展的军事工业，是战胜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要指出的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由于德国发动突然袭击，斯大林又没有防御的准备，因此，苏联大量领土很快被德军占领。这样，使苏联遭受到重大损失。以下事实可说明这一点：1940 年苏联钢的产量为 1830 万吨，其中南部地区钢产量占 1/2 以上。战争初期南部冶金工业地区和部分中部冶金工业地区被德军占领，这意味着在战争中苏联不是以 1830 万吨钢同德国作战，而是以 800 万吨钢抗击德军进攻。在头三个星期里，红军损失约 85 万人，3500 架飞机，一半坦克，整个 1941 年下半年红军损失 500 万人，是战前红军总数的 9/10 以上。<sup>①</sup>

### 苏联工业化的问题严重

随着对苏联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方与学术界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持简单的完全肯定的观点已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绩也明确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战前斯大林工业化过程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包藏着深刻的矛盾与积累着大量尖锐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其下台后发表的论著中，改变了过去对斯大林工业化的看法，他说，过去苏联往往用“增强国家的必要性为苏联采用的方法辩护。（指斯大林工业化方法——笔者注）”。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这样，我们就会挨打。但是有谁说过，采用别的办法，就不可能使国家发展起来呢？”<sup>②</sup> 苏联学者卡普斯京指出：“从历史上看，不惜任何代价的超工业化策略是否站得住脚呢？是否还有别的、非斯大林的实现工业化选择？选择是有的，存在过！”接着他说，这种选择就是列宁提出的使国民相互配合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而这一政策被 1929 年秋天斯大林突然提出的“大转变”而停止了，转向“迅速向工业化

<sup>①</sup> 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5 页。

<sup>②</sup>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 页。

和全盘集体化”。<sup>①</sup> 在改革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的大前提下，在解放思想、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不断深化的条件下，“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运动。通过10多年的艰辛努力，我国学者就斯大林时期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与过去相比，科研水平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讲都有了极大提高，如果说人们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也是毫不过分的。”<sup>②</sup> 不少学者对斯大林工业化的评价与以前相比，要贴近实际得多与深刻得多。如有些学者指出：“把斯大林进行的国家工业化放到历史的长河考察，只能恰如其分地给予肯定，如实承认这不过是一个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的阶段。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成就，既包含着违反客观规律的理论错误，也包含着严重的实践错误，如果把一时取得的成就夸大为多么正确的理论，多么伟大的功绩，那就极为片面了。至于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吹嘘他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sup>③</sup>

苏联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唯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sup>④</sup> 应该说，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值得我们思考。

斯大林工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贡税”榨取农民的政策，导致农业破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斯大林工业化时期，一方面坚持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积累；另一方面坚持

---

① 参见（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4、5期。

② 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457页。

③ 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第156页。

④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82页。

高速度。实行这两项政策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而当时主要通过“贡税”的途径，从农民那里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人所共知，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在此情况下，农业很难承担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斯大林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认为出路是快速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农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

应该说，斯大林在1928年工业化开始前，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强调要“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sup>①</sup>但从1928年开始工业化后，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与采取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起因是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在1928年以前，国家粮食收购量已有多次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如1924年收购量为524万吨，这比1923年的652万吨减少128万吨。截至1927年1月，国家收购的粮食为4.28亿普特，这与1926年同期6.3亿普特相比减少了2.02亿普特。但到了1928年1月，粮食收购的情况进一步急剧下降，减少到了3亿普特，使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在党内领导层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的想法是，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实行的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所致，是人为地扩大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的结果，因此，主张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手中夺取粮食。

1928年6月初，布哈林就粮食问题给斯大林写信说：“苏联的国内形势很严峻，而党没有整体计划，只是凭经验办事！国内粮食普遍欠缺，而问题根本不在富农的‘猖獗’。我们不能一下子向集体农庄提供足够的资本和机器，因此不能不考虑必须发展个体经济的问题。不能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得紧张。”<sup>②</sup>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指出：成功地推行工业化政策的关键在于靠农村来进行内部积累。他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促使工业的高涨。

很明显，斯大林1929年决定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控制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② 转引自《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4期。

在工业化时期，斯大林为了榨取农民，一方面是对农庄不断增加农畜产品的征购量，另一方面是不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如果说，1932年集体农庄交给国家的粮食占其收获量的1/4多一些，那么1933—1934年是1/3之强，1935年几乎达到40%，<sup>①</sup>集体农庄通过义务交售和上交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还分别占其粮食收获量的31%与34%。之后，再留下种子与庄员的口粮，农庄与农民能拿到市场上进行贸易的粮食就只占其收获量的4%—5%。斯大林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粮食，这样，悲剧就一幕一幕地出现了。因未完成交粮任务的农庄领导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枪毙。在庫班地区，甚至将16个未完成交粮任务的村镇迁徙到极北地带。由于高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上交了。农村严重缺粮，造成了大量农民死亡。据有关材料，1931—1933年，饿死的农民达300万—500万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独特的原始积累方式。当我们说到它在推进苏联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换中的作用时，应当补充说一句，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从农畜产品价格制度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为实现斯大林的“贡税”政策服务的。在工业化时期，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所需资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价格不仅形成了，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变。只要举出下面的材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为了能买一辆“吉斯—5”型汽车，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99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124吨小麦，而到了1949年就要卖出238吨小麦。

由于实行榨取农民的政策，不顾客观条件过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对农业造成了极大破坏。以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如以1928年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为1913年的65%。1933—1940年粮食年均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到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

---

<sup>①</sup> 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63页。

## (2)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

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我们在前面已提到，到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尚未达到1913年沙皇俄国的水平。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是“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sup>①</sup>“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sup>②</sup>当时不少苏联学者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sup>③</sup>这迫使赫鲁晓夫一上台首先抓农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头几年农业有所好转，但在1960—1963年这4年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到1964年畜产品严重缺乏，1963年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不得不亲自首先抓农业，并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但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sup>④</sup>后来，苏联连年需要进口粮食3000万吨。农业落后状态难以扭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没有改变，如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不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没有解决。

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制约了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发展。在苏联，食品工业80%以上、轻工业2/3以上的原料来自农业，拿轻工业中的纺织业来说，苏联甲类工业为它提供的化纤只能满足它们需要的1/4，其他3/4要靠农业原料。轻工业、食品工业的严重落后，使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花大量外汇进口食品与食品原料，这项费用要占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成了苏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

斯大林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为代价

---

① (苏)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著，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584页。

② (俄) 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③ (苏) 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④ (苏) 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的。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扩充军备发生矛盾时，在苏联最终总是“大炮”战胜“黄油”。据有关材料，如1928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00，1932—1933年为53，1936年为60。1928—1938年间，农民人均收入降低约20%。<sup>①</sup>居民的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1928年降至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而居民住房建设计划常常完不成。“一五”计划规定建造住房6250万平方米，而实际建造2350万平方米，“二五”计划规定建造7250万平方米，结果只建造了2680万平方米。

由于苏联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长队、抢购，一直是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 (3) 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斯大林保证重工业高速发展主要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这种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资源浪费大而经济效益低。在1929—194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4%，国民收入为14.6%，而基建投资为17.9%，后者比前两者分别高出4.5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即分别高33.6%和22.6%。<sup>②</sup>1918—1940年苏联国民经济投资额为617亿卢布，投入工业部门的为215亿卢布，占34.9%，农业为70亿卢布，占11.3%。对工业大量投资，又必然提高积累率。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在26%—29%之间，1931年高达国民收入的1/3。<sup>③</sup>从就业人数来看，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职工增加最快，从1922年的19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1308万人，增加了5.9倍，而同期，整个国民经济中职工增加了4.4倍。<sup>④</sup>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虽然使工业高速发展，但经济效益一直低下。工业化时期虽有大量企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从1928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后，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成为赢利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到战后的1950年不到美国的30%，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指标为55%。至于农业劳动生产

① 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第145页。

② 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第150页。

③ 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第83页。

④ 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433页。

力长期停留在20%—25%这个水平上。苏联在物质生产部门手工劳动占的比重很大，直到80年代中期，从事手工劳动的还有5000万人，在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为3/4。<sup>①</sup>

(4) 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结果是使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 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

苏联工业化模式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毛泽东较早发现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和产生了严重问题，<sup>②</sup>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间的相互关系的见解。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斯大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而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提出批评。1956年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方针性问题时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总之，中国应实行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sup>③</sup>的工业化政策。

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中国今后在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方针，这需要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苏联工业化模式

<sup>①</sup> 参见《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页。

<sup>③</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 （一）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其最突出的问题牺牲农业去高速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濒临破产状态。

苏联时期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都与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有关，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通过行政手段及至强制与暴力的办法搞农业集体化，以便达到牢牢控制农业的目的；二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掠夺的办法，把农业创造的收入纳入国家预算。1935—1937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50%—60%来自农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未能解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它要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这项投资占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35%，而国家通过再分配把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80%集中到国家财政。这说明农业仍是提供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上述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有积极性，“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造成现在的困境。”<sup>①</sup>但是，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跳出斯大林工业化的框框。他为了加速工业发展，就搞群众运动的“大炼钢铁”，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结果是农民大量饿坏、饿死。“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sup>②</sup>

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对“三农”问题的严重错误，中国今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以下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强了，如实行农业税减免，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疑，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sup>②</sup> 转引自张素华著：《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日—2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针。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村人口近 8 亿，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 年农村人口仍有 6 亿左右，“三农”问题仍是个大问题。再说，全国农村有近 2000 万人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近 6000 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影响工业化的进程，也将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工业化才能更快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sup>①</sup>

第二，目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个弱势的产业，农业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又面临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是国家应该给予大量补贴的部门，让农业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的进展中分享到好处，绝不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使乡镇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这既可以使它与整个工业化融合为一体，并且还可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第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去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要由广大农民创造。要牢记马克思的话：“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②</sup>

## （二）农轻重必须平衡协调发展

斯大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再强调的是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这不仅牺牲农业，同时，也放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他还断言，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的。实际上，从欧美五个最早的资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7 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来看，共同特点是都以纺织工业、冶金业为先导，其他重工业各部门紧随其后，轻重工业相互依存，互相补充，互相推进。<sup>①</sup> 由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严重落后，缺乏竞争力，在苏联解体后实行开放政策后，这两部门一下子被冲垮，需要重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食品与食品原料50%左右要靠进口，就是到20世纪末，食品进口仍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1/4。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制约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sup>②</sup>

苏联长期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理论根据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苏联对此存在片面化与绝对的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作为扩大再生产原理提出的，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出发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任何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与再生产的其他因素相互协调与平衡。列宁指出：“社会产品的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sup>③</sup>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sup>④</sup> 这些说明，那种不为扩大消费资料生产而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就会失去社会经济意义。

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时指出：“真想建设

---

① 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第123页。

② 《北京晨报》，2002年3月17日。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sup>①</sup>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分析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sup>②</sup>

温家宝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强调：“我们要努力实现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在中国今后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应从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讲，应该明确，工业化也好，发展整个经济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搞工业化、现代化要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造成市场紧张，人民的消费得不到满足，乃至像苏联后期那样，出现严重的消费品供应危机。其次，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将大大扩大，对生活消费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发展，应提高科技含量，多生产附加值高、质量高和安全程度高的产品，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国际市场不被打败的必要条件。

### （三）绝不能搬用斯大林实行的赶超战略

斯大林执政后，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sup>①</sup>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页。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经济高速增长要为在军事上赶超美国提供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过“加速战略”。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力图尽快在经济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亦应该通过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争取早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而苏联实行这一战略的问题在于：一是脱离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目标，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二是苏联的赶超战略重点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不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三是赶超战略的重要目标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外扩张与争霸服务。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当然要追求的目标，特别像苏联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实行赶超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扩张与霸权相联系的超级大国，那是另一回事。

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深刻教训的。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现在有可能用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sup>①</sup>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又将15年变为10年，后来毛泽东又改为7年，再后来降到2年至3年。<sup>②</sup>

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时期，应从苏联长期实行的赶超战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防止盲目性和唯意志

<sup>①</sup>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70页。

<sup>②</sup> 张素华著：《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第145页。

论。第二，绝不能像苏联那样，赶超主要是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争霸扩张服务。中国在天下还不太平，加上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情况下，适当地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国防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能参加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中国参与军备竞赛亦必将把经济拖垮，所以，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 （四）工业化要走集约化的道路

斯大林用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实现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但问题是，苏联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以粗放方式进行的。

苏联自上个世纪 30 年代消灭失业后到 80 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 200 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 30% 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 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 1961—1987 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5.4%，而基建投资为 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 90%，耗电量多 20%，耗石油量多 100%，水泥用量多 80%，投资多 50%。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已感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率与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已大大下降，原材料、燃料供需之间开始出现不平衡。在上述情况下，20 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提出向集约化方针过渡。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集约化方针未能得以实现。苏联一直到 1991 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型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 1970 年的 55 戈比下降到 1990 年的 28 戈比。80 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 1—1.5 倍。工业生产日益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76—1980 年年均增长率为 4.4%，1981—1985 年为 3.6%，1986—1990 年已降为 2.5%。到 1991 年已为负增长 2.8%，而这一年 GDP 负增长 13%。十分明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导致苏联最后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苏联上述教训，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改变落后的粗放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和难循环。这些问题必

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目前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 1/30，日本的 1/18，法国的 1/16，德国的 1/12 和韩国的 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 1/10，日本的 1/20，德国的 1/6。

十分明显，不改变工业发展的粗放方式，不仅关系到我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在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方面，要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 2004 年 2 月 21 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今后“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落实，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推动工业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 17. 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徐天新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项震惊世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部分，特别受人关注，褒贬不一。

### 斯大林对农民认识的偏差

关于农民问题，斯大林并不熟悉。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定危机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对私有农民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强调小农经济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类型的经济”，<sup>①</sup>说基本农民群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sup>②</sup>“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sup>③</sup>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宣布小农所从事的个体经济已毫无生命力，说“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sup>④</sup>“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sup>⑤</sup>总之，斯大林此时已全面否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把农民特别是那些仍想保留小生产者地位、不愿无条件服从苏维埃决定的农民和他们的经济，都划到社会主义对立面——资本主义一边，把它们定性为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阶级和

---

①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5页。

②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01页。

③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41页。

④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3页。

⑤ 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页。

经济，把它们视为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障碍，最大的潜在敌人，最危险的复辟根源，应该立即予以消灭的阶级和经济。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改造个体农民、防止分化实现平等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他的计划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它是消灭小私有农民的计划，同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人人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列宁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sup>①</sup>而斯大林却要用行政命令甚至惩罚镇压的方法强迫农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私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交公，同时进入集体农庄。斯大林创建了暴力剥夺农民的理论，并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 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台

1928年的非常措施表面上似乎获得积极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收购到更多的粮食；实际上它使本已存在的农业问题更加严重。个体农民经济受到打击排斥，许多富裕农民缩减耕地，屠宰牲畜，甚至弃地出逃，自我消灭经济，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另一方面，行政命令和惩罚镇压盛行，使国家难以通过正常的城乡贸易往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更无法靠它调整好工农关系。面对农业危机的加深，斯大林决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进攻，向小私有农民进攻，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

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宣布，农业已发生“根本转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农民“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要“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sup>②</sup>即要求立即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几天后，党中央召开全会，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

---

①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687页。

②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06页。



始了”，<sup>①</sup>提出要加快集体化速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并没有出现集体化运动高潮。到1929年10月初，全国只建立了67400个集体经济组织，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的7.5%，而中农户仅占全国中农户的3.3%。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中农对参加集体农庄仍持观望态度。

在人为的推动下，集体化运动在1929年底有了新的巨大进展。不过，情况十分混乱，冒进发展与等待观望并存，有形无形的阻力普遍存在，问题成堆。为了尽快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5日成立“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经过讨论，委员会认为在5年内可以基本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22日，委员会将决议草案提交党中央政治局审查。12月25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认为“这份草案不太合适”，<sup>②</sup>并亲笔把委员会建议的期限缩短了一半。<sup>③</sup>

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在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仅能按照五年计划的规定完成20%的播种面积的集体化，而且能完成绝大多数农户集体化的任务。像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在1931年春季就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1年秋季或至迟在1932年春季基本上完成”。<sup>④</sup>

### 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迅猛开展

1月5日的党中央决议是一项脱离实际、无法正常完成的决定。但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却从其中领会到中央的急迫心情，纷纷不顾实际情况提高任

---

① 《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0页。

②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9年12月25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③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④ 《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113页。

务指标，决定“在1930年春季播种运动期间”完成集体化。

在上级的强大压力下，基层干部大多采取行政命令和威胁惩罚的办法，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对拒绝者，或威胁剥夺其选举权、不提供工业品；或干脆宣布其为“准富农分子”、“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报告说，中央黑土地带乌斯曼专区安年斯克区从1929年12月24日到1930年1月5日，共逮捕了144人，其中80%是贫农和中农。用这种恐怖手段，该区的集体化比例在几天内就由26%猛升为82.4%。<sup>①</sup>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兴起了。1930年1月，有300万农户加入；2月又有700万农户加入。据集体农庄中心的统计资料，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共有194.3万户，占全体农户的7.5%；1930年1月20日，共有439.3万户，占21.6%；1930年2月20日，共有1367.5万户，占52.7%；1930年3月20日，共有1393.7万户，占53.5%。<sup>②</sup>

在组建集体经济组织时，各地纷纷越过被中央决议称为“过渡形式”的劳动组合，建立起农业公社。在西伯利亚，1930年3月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公社占43%，劳动组合占39%，共耕社占18%。<sup>③</sup>

关于牲畜家禽是否公有化问题曾经有过犹豫。1930年2月6日，公布了经斯大林同意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没有对牲畜家禽等是否应该公有化的问题表态。但《真理报》于当天呼吁将母牛集体化作为反对富农的手段。次日又强调劳动组合应向农业公社过渡，并赞扬公社的思想。2月20日，报刊指责对农民的牲畜工具给以偿付是阻碍贫农加入集体农庄。这些说法使地方干部和群众觉得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公社将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统统收归公有，许多劳动组合也仿效实行。有的地方甚至将家用的炉子、茶壶、水桶也收归集体所有。1930年1月20日，耕畜公有化的程度为17%，2月1日达到52%，2月10日达77%，3月1日更达81%。<sup>④</sup> 农民采取消极对抗策略，在

---

①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Под ред. Данилова В. П. и др. М., РОССПЭН. 1999—2002. Т. 2. С. 100.

②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Т. 2. С. 365.

③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Под ред. Зеленина И. Е. М., Наука, 1986. Т. 2. С. 158.

④ Известия, 1930. 9 марта.

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大量屠宰牲畜。仅1930年2—3月间，全苏就有1400万头大牲口被杀，猪的存栏头数减少了三分之一，羊减少了四分之一。

全盘集体化的强制推行，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仅在秋冬两个季节，就有9万封信写给斯大林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控诉农村发生的种种荒唐事情。有的农民公开抗议，甚至举行武装暴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绝密报告说，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群众性骚动7576起，暗杀恐怖活动3263起，散发传单事件2009起。<sup>①</sup>

但斯大林并不认为政策出了什么问题，继续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他指示《真理报》于1930年2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说最近做出的关于1930/1931年度集体化水平达到75%的规划，并不是最高指标。

农村局势的持续动荡最终引起上层的不安。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完全肯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党的相关政策，说“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文章谴责了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强调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和采取劳动组合的组织形式，同时把出现“偏差”的责任推到地方干部身上，说“一些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sup>②</sup>3月14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制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实行集体化。

斯大林的文章和中央的决议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不检讨自己对农村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集体化速度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把错误全推给下面，许多地方干部还为此受到惩治。1930年夏，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指责集体化的做法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说不能把中央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地方机构身上去，但遭到卡冈诺维奇的严厉斥责。<sup>③</sup>6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工人马马耶夫的信。他在信中勇敢地提出，“究竟是谁的头脑被冲昏了？”并说“决议和实际是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

①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Т. 2., С. 788.

②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8、239、243页。

③（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马马耶夫被当做右倾分子开除出党。

1930年夏，那些纸面上的和强行建立的集体农庄瓦解了。到9月1日，有1000多万户农民退出了农庄，入农庄的农户总数回落到年初的水平，或者说，几个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高潮的成果实际是空中楼阁。

## 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制定

富农被认为是剥削者、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早在1918年，富农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依靠贫农委员会剥夺了富农的5000万俄亩的土地，没收了价值200万卢布的农具和役畜。同时，向富农摊派和征收了100亿卢布的赋税，征缴了6300万卢布的罚款。富农的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富农的处境有所改善，富农的数量有所增长，但具体数字很难确定，因为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各不相同的标准，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各种标准只重视体力劳动，没有把生产组织工作视为劳动内容，有的甚至把阶级划分的社会标准简单归为财产多少。这样就无法把勤劳致富的中农同富农严格区分开来。一些善于经营的中农，即“富裕农民”、“殷实农民”往往被等同于富农。由于标准不一，所以富农的数量也就说法不一。拉林在1927年提出，农村中长期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户为45万，占农户总数的2%。而弗鲁姆金特别委员会的估计是7.9%。“托季联盟”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富农人数已占到农村居民的15%—20%，而莫洛托夫认为富农仅占农户总数的3.7%。1928—1929年即消灭富农前夕，斯大林断言富农占农户总数的5%。苏联学者达尼洛夫认为，1927年的全苏人口调查数字比较可靠，即全国有富农89.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后，富农户数减少，到1929年秋只剩下60万—7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3%。<sup>①</sup>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未经党中央和政治局讨论就在学术性的专家会议上宣布根本改变对富农的政策，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

<sup>①</sup> Данилов В. П. Советская доколхозная деревня. М., 1979. С. 316.

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sup>①</sup>

几天后即 1930 年 1 月 5 日，党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的办法》的决议，追认了斯大林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1 月 26 日，以莫洛托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 月 3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决议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规定了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的措施。决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其余富农活跃分子则“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第二部分确定了强制迁移首批富农户的具体步骤。要求“在最近 4 个月内（2—5 月）对第一类和第二类富农采取镇压措施”，“遣送 6 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 15 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决议详细规定了各州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和去向。被驱逐者在移居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进行管理。

富农的财产予以没收，“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须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 500 卢布）”。

第三部分制定了没收富农户财产的原则以及对被没收财产的处理办法。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sup>②</sup>

第四部分对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发布指令，为加强镇压，要求扩大国家

①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228、231 页。

② 《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 年 1 月 30 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0—607 页。

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编制，增加其开支预算，等等。

联共（布）中央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决议出台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了具体实施中央决议的重要机关。1930年2月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戈达下发了《第4421号命令》（秘密文件），<sup>①</sup>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部门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命令规定对积极活动的第一类富农分子进行打击，并事先规定了各地区这类富农的数字，例如乌克兰为15000人，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为6000—8000人，等等。对这些被捕者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处组建的三人小组快速审判。大部分关进集中营，对最凶恶的富农分子则判刑直至处死。命令对各地区迁徙富农及其家庭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同时确定了接纳富农移民的地区及接纳人数，规定了开始迁移行动的预定日期。

为了完成上述行动任务，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自成系统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级代表处，并建立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共（布）委员会和检察机关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应快速审理第一类富农案件，不必按司法程序进行。三人小组直接领导迁移第二类富农的行动。组建“军事后备力量”，“以应付有可能发生麻烦的情况”，在非常情况下，在发生暴动时，准许动用军队。<sup>②</sup>

至此，党和政府完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总体部署。

## 富农阶级的被消灭和特殊移民的安置

各地接到中央关于消灭富农的指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虽然有剥夺富农的规章，但大都形同虚设，地方政权和农民群众受物质利益驱使，不仅剥夺的范围远远超过规定，而且手段粗暴野蛮，有些地方的行动完全变成了对农民的抢劫。一些明令列在剥夺范围之外的红军战士、工人家属、红色游击队员也遭到了剥夺。一些农村干部将没收的物品或据为己有或共同瓜分，他们提出了“拿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口号。一些地方任意增加剥夺指标，使被剥夺的富农户远远超过了3%—5%的比率，有的地方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农户总数的37%。还有一些政府工

<sup>①</sup> Козлов В. А. Неиз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 20 века. М., 1992. С. 245—249.

<sup>②</sup>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Т. 2, С. 163—167.

作人员和农村干部把剥夺行动作为威胁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打击报复结怨者的手段，他们甚至秘密追捕或杀害拒不从命的农民，被人称为“红色匪徒”。

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报道，“为了剥夺富农，卡德尼科沃（在沃洛格达州）招来了一批由100人组成的准军事化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设置了岗哨并封堵了所有的道路。剥夺行动在晚上进行，就像强盗袭掠一样；被剥夺来的财产没有进行任何登记，一抢而空。幼小的牲畜当场被杀掉并送到合作社卖掉。

“被列入富农名单的有中学教师、中农、拥有25年工龄的苏宏斯克工厂工人。被剥夺的还有红军家属甚至执行刑事侦查的代理人。在拉邦格斯克村，苏维埃和区执委会全权代表拿波尔内逮捕贫农和中农，并开枪进行威胁。宣传员罗曼申抢夺了鸡蛋、蜂蜜和其他产品并在几个‘头儿们’中间进行了瓜分。”<sup>①</sup>

在一份给斯大林的关于西伯利亚消灭富农工作情况通报中说，“我们……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他们所拥有的”。<sup>②</sup> 据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从富农那里剥夺到的财产达4亿卢布，占农庄固定资金的15%。<sup>③</sup>

富农被剥夺后，立即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他们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整个迁移工作由于缺乏准备，混乱不堪。大量迁移富农被滞留在各中转站等候发落，有不少病弱人员在迁移路上死亡。

特殊移民被押解到目的地后，安置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多数移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劣；衣物不够，难以御寒；医疗保健工作严重滞后，各种传染病开始蔓延，儿童死亡率不断增高。出现逃跑现象，骚乱暴动也时有发生。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以后，各地政权组织普遍开展了“纠偏”工作，开始放慢迁徙速度并注意移民的安置工作。但到1931年春，又开始新一

---

①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4. С. 48.

②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 3. С. 43.

③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и колхоз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Под ред.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Н СССР. М., 1963. С. 276.

轮消灭富农运动。3月20日，党中央通过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富农》的决议，决定继续强制迁徙富农215000户。党中央还决定，特殊移民安置地尽量集中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管理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负责，特殊移民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广泛用于林木采伐、矿产开发和农业种植等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苏范围内到1930年底，共有约40万户富农被剥夺。另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sup>①</sup>他们变卖家产，逃往城市或各工业中心。<sup>②</sup>1931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剥夺20万户富农，这样在1930—1931年共剥夺的富农户约60万左右（更为精确的数字为56.93万富农户<sup>③</sup>），共计1158986人<sup>④</sup>，加上“自我消灭”的富农户就达到了80万户。在这期间被执行强制迁移的富农有381086户。<sup>⑤</sup>

1931年后继续迁徙富农，但由于政府加强了新闻管制，不再公布特殊移民情况，具体数字很难确定。有的学者认为，1931年下半年到1933年约迁徙了80万户富农。<sup>⑥</sup>除去前期未能按计划迁徙的20万滞留户，大概又迁徙了60万户。这样，在全盘农业集体化时期，总共大约迁徙了100万户富农。

1933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富农阶级已被粉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被根除”，“‘谁战胜谁’这一基本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社会主义战胜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sup>⑦</sup>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到底消灭了多少富农，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1929—1933年间，被逮捕关进集中营

---

①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 3. С. 44.

② Ивницкий Н. А.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деревни и ликвидация кулачества как класса. М., 1972., С. 245.

③ Славко Т. И. Кулацкая ссылка на Урале 1930—1936. Мосгорархив. 1995. С. 251.

④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 3. С. 44.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0. No. 11.

⑥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4. С. 60.

⑦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3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1页。



的第一类富农共有 519600 人。<sup>①</sup> 被迁徙的第二类富农约 100 万户。至于第三类富农，大都被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管理轨道。据估计，到 1930 年夏，分布在各州和各区的第三类富农只有 26 万户。<sup>②</sup> 另外，还有 20 万—25 万户富农“自我消灭”。总之，在 1929 年底到 1933 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大约有 140 万—150 万户富农被消灭，如果按每一农户 5—6 人计算，共有 700 万—900 万人。

消灭富农的斗争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消灭农村“剥削阶级”就谈不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值得提出的是，它是促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推进集体化运动的最有力的杠杆。没收富农财产并流放其全家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民参加因占有富农的农具财产而比一般农户富裕的集体农庄，并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愿望和提供向富人报复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可以威胁那些不愿参加农庄的农民，警告他们不要因抵制运动而落入同富农一样的悲惨命运。这种一打一拉政策对完成全盘集体化运动起到了某种关键性作用。

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始后一个月就不顾客观条件不成熟和各级干部思想准备不足，毅然决定立即消灭富农，并且采取最严厉的行政暴力手段实施。进而，借助消灭富农的声势全面消灭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消灭私有农民。

### 全盘集体化的实现和个体私有农民的被改造被消灭

1930 年秋，党中央决定再次推进集体化运动。9 月 24 日，给各区委、州委和共和国中央发出一封《论集体化》的信件，谴责众多党组织对集体化事业的消极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民中积极开展工作，“以使集体农庄运动达到新的强有力的高涨”。<sup>③</sup>

在中央的督促下，各级党政机关要求那些退出农庄的农民重返集体组织。1930 年 12 月 17—21 日，党中央全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重新审定了各地实行全

① Кенгавр. 1990. No. 3—4. С. 59.

② Кенгавр. 1990. No. 3—4. С. 60.

③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64—1980. Т. 4. кн. 2. С. 158.

盘集体化的日期，规定“在1931年使乌克兰（草原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东岸）等地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不少于80%”，这就是说将年初规定的第一类地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日期推迟一年。中央全会的决议还规定，在1931年“在其他产粮区——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带）、哈萨克斯坦（产粮区）——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集体化。在产粮消费区，保证使20%—25%的农户集体化。在产棉区和甜菜区，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保证1931年在全苏各农业部门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实行集体化”。<sup>①</sup>

1931年1月，苏联第十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决议提出，在1931年可以对一半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而在基本产粮区可以对90%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sup>②</sup>

集体化的实际进程比党和政府预计的还要快。在3、4、5月份，每月都有150多万农户加入农庄。到6月初，共组建了21.1万个集体农庄，包含有1303万农户。全苏集体化程度达到52.7%，<sup>③</sup>超过了规定。

1931年10月—1932年2月，集体化运动再次陷入低潮，有16万户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但在上级督促下，夏天又重新掀起高潮。到1932年底，全苏共建立21.11万个集体农庄，有1490万农户参加，占农户总数的61.5%。<sup>④</sup>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sup>⑤</sup>这以后，政府又用几年的时间把剩下的个体农户吸收进集体农庄。1933年7月1日，集体化的比率为65.6%，1934年7月1日为71.4%，1935年7月1日为83.2%，1936年7月1日为90.5%。到1937年，全苏共建立集体农庄24.37万个，有1850万农户加

---

① 《关于193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202—203页。

②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ажнейши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1927—1935. М. 1957. С. 351.

③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Под ред. Зеленина, И. Е. Т. 2. С. 188.

④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⑤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3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325页。

人，占农户总数的93%，其播种面积占全苏的99.1%。<sup>①</sup> 尚未加入农庄的只是山区或边远地区的一些零散农户。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作为阶级，在富农之后也被消灭了。

### 集体农庄制度——控制农民的再版村社

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时，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对组织进集体农庄的农民并不放心，不肯把土地、农机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给农庄。政府向集体农庄下达上百项计划指标，对生产的品种、播种的面积和时间、每项农活的技术指标、收割的时间、上交国家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指标和规定都是指令性的，是必须执行的，违者要受法律制裁。

为了确保国家指令的执行，除了通过党政机关进行直接领导指挥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二是实行义务交售制。

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联共中央于1930年初曾决定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但到年底改变了主意，决定把现代农业机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1932年，全苏共有2446个机器拖拉机站；1937年增为5818个。<sup>②</sup> 斯大林需要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控制农庄。1933年1月，联共中央和政府决定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立政治部，它的任务是用开展农村阶级斗争的方法监督农庄的活动，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同集体农庄中对抗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sup>③</sup> 简单地说，政治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国家能按计划收购到粮食和肉类。随着地方党政机关的巩固，政治部于1934年11月并入党的区委员会。这以后，对集体农庄的政治领导和监督工作主要由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但机器拖拉机站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集体农庄。拖拉机站

① 《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第17页。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Под ред. Зеленина И. Е. Т. 2. С. 297, 336.

③ 《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的目的及其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341—342页。

要求事前审查农庄的生产活动是否符合国家计划安排，要求农庄为其服务提供实物报酬，以此保证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收取一定数量的农畜产品。设置机器拖拉机站的结果是，通过使集体农庄同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脱离的办法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把农庄的全部活动纳入国家的行政命令体制之中。

国家的另一项控制措施是，实行农庄义务交售农畜产品制度。1928年爆发粮食收购危机后，斯大林认为从集体农庄收取粮食比个体农户更容易，决定加快集体化步伐。由于工业化的需要，政府不断扩大粮食收购量。1928—1929年，国家收购商品粮1080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7332万吨的14.7%。1929—1930年，收购量增加为1600万吨，1930—1931年又增为2220万吨。<sup>①</sup>1932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把征购商品粮的幅度提高到总收获量的40%—50%。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1931年粮食减产，每公顷耕地的平均收获量比上一年减少9.5%，而每公顷的交售额却增加了4.2%。在乌克兰，许多农庄为完成国家收购计划要交出粮食收获量的80%，甚至全部。<sup>②</sup>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到1932年6月25日，农民只向国家交售了当月应交售的23.6%；到10月25日，也只完成交售计划的25.8%。<sup>③</sup>

1932年冬，党中央派人到地方督促粮食征购工作。对未完成任务的地区采取高压政策：从关闭地方商业贸易、停止信贷到清洗党政干部。

政府在高压的同时也被迫做了一些让步，于1932年先后通过3个决议，降低农庄的粮食和畜产品的采购量，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 and 交售的积极性，但实际效果几乎没有。因为交售任务虽然减少了，但对多数农庄仍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受灾地区的农庄根本无法完成国家的采购指标。其次，法令规定农庄在完成任后可以把谷物拿到市场上出售。可是只有一个或若干个农庄完成任务而全部农庄尚未完成时，仍不允许前者出售剩余粮食。这些农庄要想享有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的权利，就必须首先补足其他农庄未完成的交售额。这是一种连环保。

这种措施受到农庄的抵制。1932年的法令允许农村进行粮食买卖，承认市

---

①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第135、241页。

② 拉德钦斯基著：《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67、69页。

③ Правда, 1932. 27 июля, 29 октября.

场价格的合法性。农庄把粮食卖到市场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因此竭力少交售粮食。这就使得 1932 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 1931 年“更大的困难”（斯大林语）。全年粮食收购量比上一年减少 430 万吨。

斯大林认为，当前的问题是一些人把集体农庄偶像化，看不到农庄也会反对国家的收购计划。其次是看不到阶级敌人改变了反苏维埃的斗争策略，他们在通过集体农庄破坏国家的计划。1933 年，斯大林宣称，这是“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无声的’战争”。<sup>①</sup> 斯大林决定采取最有效最无情的手段来克服危机。除了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政治部，从外面监督农庄的交售工作外，还决定大力限制城乡市场贸易，实行集体农庄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

1933 年 1 月，决定“废除现有的谷物采购的合同（预购合同）制度，并为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户规定具有纳税效力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谷物的固定义务”。这一义务“是每一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首要的义务，故应以第一批打下的粮食完成之”。对“未于本决定规定期限内履行向国家交售粮食义务的集体农庄”，要“处以罚金，并令该集体农庄提前履行全年交粮义务”；对未按规定期限履行交售义务的个体农户则要负刑事责任。决议还规定：“集体农庄的粮食买卖行为，只有在全共和国，全边区，全省整个完成本决议所定的采购粮食计划，以及完成种子储备以后，始得进行”。<sup>②</sup>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很高。农庄交售给国家的数量和支付给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两项合计，在丰收的 1937 年占谷物收获量的 26%，在歉收的 1939 年占 34%。在畜产品中，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比重更大。1935—1937 年间，上缴的肉类和动物油占总产量的 68%，牛奶占 45%，羊毛占 53%。<sup>③</sup>

国家得到如此多的义务交售的农畜产品，但付给农庄的却极少。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只等于成本的 13.2%，土豆价格等于 7.5%，牛肉价格等于 5%。义务交售的价格比市场价格更是相差悬殊。1933—1934 年粮食产区的小麦交售价格是每公斤 3.2 到 9.4 戈比，而每公斤的面粉（小麦的出粉率是 85%）的零售价格，凭购粮卡的是 35 到 60 戈比，无须购

① Правда, 1963. 10 марта.

② 《苏联粮食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文献》，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51、253、254 页。

③ 拉德钦斯基著：《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 112 页。

粮卡的是4—5卢布，即价格相差100倍以上。<sup>①</sup>

义务交售制使国家的征粮计划得到保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虽然粮食的年均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产量少70万吨，但是国家每年平均征到的粮食却比“一五”期间多930万吨。这就使得斯大林在饥荒年代仍然能够增加粮食的出口。

斯大林创建的集体农庄同传统的合作社迥然不同，既不是生产者的自愿联合体，也不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独立组织。它实际是沙俄村社的再版，仍然是国家牢牢监管控制的基层农民组织，是把农民束缚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依附关系狭小天地里的工具。不同的是，国家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比当年对村社的控制更直接更严厉。1932年12月27日，苏联实行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不给农民发证，庄员要到城市去工作或居住，需经领导批准，得到证明才能离去。庄员的自由迁徙权实际被剥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剥夺农庄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利、限制市场贸易、发展农庄与国家间的实物交换关系的办法，使农庄失去经济独立性。总之，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基层单位，除了庄员可以经营规定的副业和得不到国家的最低收入保证（工资）外，几乎同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集体农庄和庄员既无权也无力自主决定生产、分配、人事等事务，一切重大问题都直接听命于政府。集体农庄同村社相比，自治权利更小，对国家的依附性则更强。集体农庄更像是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的村社。30年代到过苏联农村的西方人士曾报道说，农民常用ВКП（“联共”的俄文缩写）来暗指“第二次农奴制”（其俄文缩写也是ВКП）。<sup>②</sup>

集体农庄制度不适应现代化要求。首先，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脱离主要生产资料，失去独立自主性，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因而极大损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集体农庄体制虽包含有物质刺激因素（如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允许副业生产等），也注意到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些只占次要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农庄的各项工作基本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这对农业发展特别

---

<sup>①</sup> Зеленин И. Е. Колхозы и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33—1935 г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4. No. 5. С. 19—20.

<sup>②</sup> 塔克：《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不适合。因为农业不同于工业，各处进行生产的气候地理等客观条件极不一致，不可能具有工业中的标准环境。因此统一指令即使是专家起草的指令，也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和要求，而那些随意违背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的瞎指挥更使生产遭受破坏。第三，集体农庄制度造成机构臃肿。据苏联农业部抽查 26 个州 132 个集体农庄的结果：三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 20%—30%；八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 30% 以上。这样庞大的行政队伍只会促使官僚主义泛滥，阻碍生产发展。第四，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保守落后。由于生活不富裕，大多数庄员一心关注自己的副业生产，把它视为最可信赖的依靠和保障。对集体和国家大事不关心也不了解。另外，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庄员只得服从听命，也安于服从听命。他们缺乏主动创新精神，习惯于一切都依赖集体、依赖国家。因此集体农庄成了维护狭隘自私、听命依赖、因循守旧传统的温床。集体农庄制度从总体看，是缺乏生命力的。

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是他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部分。它消灭了农村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农民，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大生产，使集体农庄制度与城市的国有企业体制相配合，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它把几千万难于监督的农户置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为建立行政命令和惩罚体制奠定基础。它把农业变成绝对为工业化服务的部门，用牺牲农业剥夺庄员的办法，使集体农庄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提供资金、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从而确保了工业化的实施。总之，集体农庄制度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单一的计划经济，就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斯大林模式。

### 集体化和 30 年代大饥荒

农业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农牧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其次，在大农业的基础上，农业走上了机械化道路。第三，农业机器和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减少了农业劳动力。

苏联农业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总的讲仍十分落后，远未实现农业现代化。1940 年，农业人口占全苏人口的 67%，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54%。农业仍是粗放经营，在相当程度上是人力畜力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业基本是靠天

吃饭。

更为严重的是，农牧业生产力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遭到巨大破坏。相当一批有较高技能、有文化知识、善于经营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被当做富农消灭掉。进入农庄的农民因失去自主权，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依赖性占据了上风。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效益低下。庄员的消极怠工，再加上农庄建立初期组织工作的混乱，使30年代的苏联农村陷于衰退状况，生产下降，社会动荡。

1932年的谷物产量为6987万吨，只达到计划规定10580万吨的66%。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谷物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降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至于畜牧业，它在集体化运动中损失更大。1933年，牛、马、羊、猪的存栏头数只及集体化前1929年的一半左右。

集体化的强制推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牧业产量下降。许多地区在1931年就出现了饥荒现象。1932—1933年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生旱灾，使问题更加严重。全苏粮食产量由1928年的7330万吨降为1932年的6990万吨。但中央领导无视这一事实，继续高额征收粮食。1932年1月1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1931—1932年粮食收购》的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执行委员会完成规定给它们的粮食收购年度计划，继续超额收购”。<sup>①</sup>各地都依据这一决定，努力超额完成收购任务。普通农庄庄员和农庄主席则大量写信到中央，说国家收购任务超过了收获量。结果不仅庄员分不到粮食，农庄也没有种子储备。中央黑土地带丹科夫区“新力量”集体农庄主席写信给中央说，他那里荞麦每公顷的收获平均为26普特，而国家对荞麦的收购计划为每公顷132普特；豌豆平均每公顷收获175普特，而每公顷要向国家交纳480普特。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农庄只剩下740普特粮食。<sup>②</sup>1932年6月17日，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邱巴尔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要求对受灾严重的地区给予粮食援助。6月21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签署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乌克兰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

---

<sup>①</sup> ГАРФ, Ф. 5446, ОП. 1, Д. 463. Л. 11. 转引自: Зима В. Ф.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трудящихся Росс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48

<sup>②</sup> ГАРФ, Ф. 1235, ОП. 66, Д. 80. Л. 166. 转引自: Зима В. Ф.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трудящихся Росс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48—49



的电报，指出“任何不想完成为你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所规定的谷物交售计划及国营农场送交谷物的计划的行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交售期限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允许”。<sup>①</sup> 6月23日，政治局就柯秀尔求援电报通过决议，“仅以中央通过的决议为限，不向乌克兰额外运粮食”。

政府一方面无视饥荒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支援工业化的旗号下，加强对集体农庄的征购，留给农村的粮食不断减少。1932年夏，出现饥荒。许多庄员吃完储备粮陷于挨饿的困境。挨饿的农民或逃亡外地谋生，或留在村里充当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间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充饥。政府不去积极援救这些灾民，反而无情镇压庄员的“越轨行为”。1932年8月7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草案，作出了“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决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一切财产充公；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还规定不得对这种案件进行赦免。农民把这项法令称为“五束麦穗”法令，即偷拿或偷剪五束麦穗就要受到惩罚。结果许多普通农民甚至妇孺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党中央报告说，到1933年1月，即不到5个月的时间，根据此法令共对54645人进行了定罪判决，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sup>②</sup> 1933年1月22日，政府又发出指令，禁止农民离开饥荒地区。对未完成交售义务的地区和农庄则停止商品供应，关闭国营和合作社商店，撤换地方干部并交付法庭审判，甚至把整村居民迁至北方边远地区。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对未完成征购任务地区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各级领导，轻的撤职、开除党籍，重则逮捕、枪毙，一般庄员则被驱逐出农庄。这种迫害活动愈演愈烈。<sup>③</sup>

作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盟友的集体农庄庄员，实际是处于被国家全面控制、无情剥夺、随意宰割的无权境地。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讨论电影片的会议

---

① 引自《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1932年6月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第183页。

②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од ред. Данилова В. П. и Ивнического Н. А. М., 1989. С. 41.

③ *Данилов В. П.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М., 1963. С. 199.

上承认过去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但此话未公开发表。<sup>①</sup>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基辅省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在1932年的一次谈话：“新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上面装满了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路收集尸体。我想，最好有人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斯大林”。<sup>②</sup> 肖洛霍夫在1933年写信给斯大林，说北高加索的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sup>③</sup>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更报告说，一些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拉尔代表向雅戈达报告说，“瓦尔年区‘十月的道路’集体农庄有人吃尸体”。<sup>④</sup>

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在乌克兰饿死350—400万农民。<sup>⑤</sup> 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饥荒人口减少了179.8万人，其中包括20万逃亡国外（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而未能回归者。<sup>⑥</sup> 俄罗斯著名人口学家乌拉尼斯认为，苏联居民从1932年的16570万降为1933年4月的15800万，减少的770万人主要是农民。<sup>⑦</sup> 另一个统计资料表明，1932年全苏人口增加105万人，而1933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0万人。死亡人数由1932年的478万人猛增为1145万人。<sup>⑧</sup> 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提出，在集体化运动中，一些人遭迫

---

① РГАСПИ. Ф. 71, ОП. 10, Д. 127, Л. 39 引自 Данилов В. П., Зеленин И. 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 – 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No. 5. С. 108.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③ 《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63页。

④ 《图奇科夫关于农业工作的进展情况呈雅戈达的报告》（1933年5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7页。

⑤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и сообщений VII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емографии. Ч. 1. М., 1991. С. 521.

⑥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емография: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методы, источники. М., 1992. С. 76—78.

⑦ Урланис Б. Ц. Проблемы динамики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М., 1974. С. 319.

⑧ Смирнов, В.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 крах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СССР.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No. 6. С. 97.

害，一些人迁往城镇，苏联农村总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sup>①</sup> 据人口统计，苏联农业居民在1926年有12070万，1937年为11040万，减少了1030万，占农业人口的9%。而饥荒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多，如在哈萨克斯坦减少了30.9%，在伏尔加——23%，在乌克兰——20.5%，在北高加索——20.4%。<sup>②</sup>

1942年，丘吉尔在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用这个手势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sup>③</sup> 或是说牺牲的人很多很多。

总之，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的命运，既保证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的强大，也造成经济政治的相对落后，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

① 普利马克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Круглый сто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30 - е годы.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88. No. 12. С. 5.

②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М., 1991. С. 43, 51—59, 61.

③ Новый мир. 1988. No. 9. С. 30.

## 18. 如何认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 “大清洗”运动？

马龙闪

“大清洗”运动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以 1934 年 12 月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案作动员，在 1937 年 2—3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其斗争对象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持续时间达 4—5 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因“大清洗”设定的打击对象较为复杂，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显现出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政治动因和历史脉络的。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历史过程当中才能深刻地加以理解、透彻地加以把握。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然发生在 30 年代中后期，但只有把它放在 20 年代后期直到 30 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

（一）“大转变”和“大跃进”的政治后果，引起国内危机加深，党内斗争加剧，这使党内力量重组、稳健派抬头，斯大林领导地位发生动摇

斯大林把反“右倾”斗争（1928—1929）及其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

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为“大转变”。“大转变”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一套方针路线，代替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向着对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的一次大转折。“大转变”实际上进一步加速、强化了“大跃进”，使“大跃进”遭到了更大的失败。

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大跃进”起源于苏联。苏联当年的“大跃进”，发生在1928年至1933年间。只要翻阅一下这期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那个时代进行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化“大跃进”。实际上，苏维埃俄国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进行过“大跃进”的尝试，但那是战争年代不得已的措施。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大跃进”），频频出现在党的报刊上，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1958年发生“大跃进”，中文里“大跃进”一词，是原原本本把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借用过来的。“大跃进”就是用超常的高速度，像跳跃猛进一样，进行经济建设，实施“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和一些俄国人只知道揶揄嘲笑中国人的“大跃进”，对他们自己曾发生过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却讳莫如深。由于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忌称他们这段历史为“大跃进”，所以了解苏联“大跃进”的中国人很少。笔者了解苏联有“大跃进”，也只是在查阅那个年代的苏联报纸时才知晓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出版的历史著作已不再回避当年的“大跃进”。比如，近些年一部在俄罗斯很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即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史》，就专门设有“‘大跃进’的重负”一节。<sup>①</sup>最近，一本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应届毕业生编写的《俄罗斯历史》读本，也专辟“大跃进（1928—1933）”一节，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这段历史。<sup>②</sup>实际上，苏联当年进行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大跃进”；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称得上是“大跃进”，由原定用1—2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集体化，提前到了1—2年完成。结果，工农业“大跃进”双双遭到惨重挫折，基本以失败告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像中国一样发生了“困难时期”；但苏联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两年”，发生在1932—1933年，

---

①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 1996. С. 334—352.

② <http://history.clow.ru/1-17.html>.

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达数百万人之众，上述一书提供的数字是1000万至1500万人之间，较准确数字至今仍在研究当中。

在苏联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大跃进”有某种群众基础，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sup>①</sup>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连1930年3月中央下达地方的指令中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

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紧张、危机，城乡群众的不满，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sup>②</sup>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现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sup>③</sup>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党内力量的变化和重组，加强了党内稳健派的力量。

“大转变”和“大跃进”加剧了国内经济生活的紧张，甚至引起危机，其直接后果，是党内原先站在主流派一边的一些人对斯大林的路线发生了怀疑，党的上层出现了以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柳京为代表的新反对派。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以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是联共（布）中央

---

① 《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见《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

② Ю·Г·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

③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е годы. М., 1996. С. 1.

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斗争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和“大跃进”的后果所震惊，开始转而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有给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sup>①</sup>

出现这个新反对派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稳健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稳健派的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稳健方针深得人心的证据表现在，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所得的选票超过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他的地位在这期间逐渐得到恢复，甚至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在1936年新宪法的起草中曾担负了仅次于斯大林的工作。

这一切，显然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但也没有逃过这位领导人的锐利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近300票遭到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境况，使他对领袖地位的不稳暗怀着不小的担忧。

在这种形势下，向党内稳健派及其代表人物开刀，打击反对派，扭转党和国家发展的航向，显然成了斯大林所预定的政治目标。

## （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的“大转变”和“大跃进”，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群众要求实现工业化，迅速

---

<sup>①</sup>（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唯意志的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短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基础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一是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二是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运转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三是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基础的落后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去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着眼于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峰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蔓延滋长，加上官职等级名册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和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sup>①</sup>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不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也不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他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sup>②</sup>当时，他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只是间谍和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sup>③</sup>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但他无限扩大了事态，并作出了过火反应，而且也把这种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②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03页。

③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41—142页。



无限扩大的事态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面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找出路。

### （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6—1939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至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及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在党内党外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与此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

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 1926 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 80 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sup>①</sup>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便于 1936 年 9 月 25 日与同在索契休养の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方面改变对西班牙的政策，引起战云密布；一方面任命新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加速“大清洗”的步伐，——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成是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sup>②</sup>

对于“第五纵队”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 1937 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sup>③</sup>可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意图之一，就是在莫洛托夫心中扎根很深的“第五纵队”。但这“第五纵队”纯属一种主观上的担忧，经历史学家查证和几十年的历史验证，所谓“第五纵队”云云，纯系主观想象的子虚乌有的妄谈。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8—50 页。

②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293—294.

③ (俄)菲·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1 页。

## “大清洗”的直接导因

“大清洗”有各种具体的、直接的导因，而1934年12月发生的基洛夫被杀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线。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只把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看做“大清洗”运动的内涵；其实，这三次大审判只是“大清洗”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就它们在“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后期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在全面“大清洗”的真正高潮期间，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4—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sup>①</sup>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利用，作为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的路线不满者，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sup>②</sup>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小时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为“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查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死刑罪犯的申诉；死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sup>③</sup>这项法律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武断地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

①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 1996. С. 373.

②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 - е годы. М. , 1996. С. 142.

③ РЦХИДН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Ф. 17, Оп. 162, Д. 17, Л. 87.

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sup>①</sup> 1934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sup>②</sup> 一星期后，即1月16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牵连。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凶杀。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的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sup>③</sup> 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

---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4. С. 39.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 – 50 – х годов /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И. Яковлева. М., 1991. С. 123—147.

③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379.

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却以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由抵制贯彻中央方针造成的。于是，又进一步向各地方党组织开刀。

根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逮捕的有15218人，还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sup>①</sup>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sup>②</sup>通过这次运动，安全机关便在手裡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持有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与此同时，刑事律条也越来越森严。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人员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 “大清洗”的始末

1936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的“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

---

①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Ф.17，Оп.120，Д.177，Л.22.

②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е годы. М., 1996. С.148.

着，在1936年8月19—24日，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在这次对取名“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在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不仅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相联系属牵强附会，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sup>①</sup> 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sup>②</sup>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的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分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

---

<sup>①</sup>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 – 50 – х годов /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И. Яковлева. М., 1991. С. 33.

<sup>②</sup> РЦХИДН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 Ф. 17, Оп. 63, Д. 1123, Л. 146—147.

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sup>①</sup>接着在10月间，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力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上述人等，立即或稍晚一些都被处决。

此次审判的主题，是灌输反对怠工的思想，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经济管理层。似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当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打破生产纪录，天天在宣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经常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行为。“怠工”几乎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种指控。制造出技术专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煽起对他们的恶感，成了这次审判所要达到的预定战术目标。这样，莫斯科第二次审判就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員和党的干部清洗的序幕。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但他最后以身殉难，<sup>②</sup>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

奥尔忠尼启泽在1937年2月18日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2月25日至3月5日），便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

叶若夫在全会上的发言和斯大林最后的总结报告，是把“大清洗”推向高潮

---

① 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伦敦、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9页。

② 奥尔忠尼启泽在其自杀前40多天内（从1937年1月1日至2月18日晨自杀），就找斯大林22次，谈话达70小时以上（见Хлевнюк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е годы. М., 1996. С. 291.）。

的临阵动员。叶若夫用各地各部门破获的案例推动“大清洗”，斯大林则在报告中把打击对象对准了“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的“外国代理人”及其“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他说：“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而“一些领导同志”竟“麻痹大意”，不仅不善于分辨这些敌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sup>①</sup>他在全会上这样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1938年3月）的整整一年间，是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党政军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拔上来的新人取而代之的一年。“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支持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的稳健派倾向，甚至凡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而加以审查和逮捕。这次清洗触及了各个级别的干部，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层干部。在这前后被镇压的政治局委员，有丘巴尔、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在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而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部，损失最为惨重。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业部门——飞机和船舶制造以及冶金工业等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以至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党的同志，等等。

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sup>②</sup>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尔、乌鲍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位最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第136页。

<sup>②</sup> XXII съезд КПСС, М., 1980. С. 585—586.



著名的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sup>①</sup> 在随后的两年间，从军内消失的共有 11 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 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共 80 名委员），8 位海军上将，尚存 4 位当中的两位元帅（叶戈罗夫和勃留赫尔），16 位当中的 14 位军级将领，以及 90% 的集团军将领和总计 8 万名当中的 3.5 万名军官。<sup>②</sup>

“大清洗”运动除对各部门领导人和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镇压行动推广到了社会广大阶层中。针对社会阶层的镇压，主要进行了以下专门行动：

(1) 针对农业集体化中流放“富农”和刑事罪犯施行专门打击的行动

按照政治局批准文件，这部分人系指，“大部分从前一度从各个省区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后经流放期满又返回本地区的富农和刑事罪犯”。这次行动中，又把他们定为“反苏和破坏罪行的主要罪魁祸首”。指示将这种人分为两类：一类“立即逮捕”，“通过三人小组按行政办案规定予以枪决”；一类对其“登记造册，流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定地区”，“勒令在 5 天内向中央报送被枪毙的人数和流放的数字”。<sup>③</sup>

后又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上报“反苏分子”数字，制定的《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进一步把被镇压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应予立即逮捕并予以枪毙的，第二类应在集中营或监狱监禁 8 至 10 年。各地方后来又进一步增补追加镇压人数。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遭到了监禁或流放。

(2) 打击所谓“反革命民族分子”的专门行动

这次专门行动，逮捕了所有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德意志族人，并将部分流放国外；还消灭了“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对“由所谓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构”也采取了行动。

1937 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区的 17 万多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

① 苏联和国外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个反间计对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没起决定作用，只是被用来对动员其他军人指控被告起了一定作用。（见涅克里奇：《1941 年 6 月 22 日》，莫斯科 1965 年俄文版，第 85—88 页。）

②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385.

③ Труд, 4 июня 1992.

兹别克境内。<sup>①</sup>

此外，被采取各种形式镇压的“反革命民族分子”，还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等。

在“大清洗”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内务部部队护卫下，曾定期到各地巡视，对各共和国和省的党组织进行清洗。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叶若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曾分别到各地视察过。

### (3) 针对有各种历史问题者实行打击的专门行动

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大清洗”运动是在苏维埃国家处境复杂、斯大林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有误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当然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应该说打击面扩大得太大了，以致把大量党内意见分歧和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处理，冤杀、冤捕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大量无辜的人民群众，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军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的人。究竟1936—1938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以前发表的各种数字无疑是大大扩大了。据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

<sup>①</sup>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 5. С. 144.

会提供的数字，这期间受到迫害的共有 1344923 人，其中有 681692 人被枪毙。<sup>①</sup>这个数字只是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并不包括各地方档案馆的数据。各地方的情况正在研究当中。被公认是一位严肃研究大清洗的著名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没有接受苏联官方公布的 1937—1938 年被逮捕的人数，他说：“在我研究的文献中得出的结果是，在 1937—1938 年遭到逮捕的是 3141444 人。”<sup>②</sup>他经过仔细筛除，认为其中近 250 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sup>③</sup>

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苏联的人口基数较小，当时全苏只有 1.5 亿人口，这个数目在其全人口中，特别是成年人口中，比例是相当大的。但目前也有一种企图大大缩小“大清洗”受迫害人数的倾向，据报道，俄最近有一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主张，应该只计算被判死刑和被枪决的人数<sup>④</sup>。不过，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俄现行法律相悖的质疑。

## 大清洗的影响

应该看到，苏联大清洗中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这涉及成千上万家及其亲属，使人们由此形成的积怨和不满，长期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酵，最后积淀、酝酿成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形成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研究苏联的历史也必须研究具体人的活动。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动下行动的。因此我们考察苏联历史，就离不开考察各种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离不开考察受这些思潮推动而行动的人。

我们观察从 20 世纪 30—80 年代的苏联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 30 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严重消极后果的作用，苏联形成了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社会政治思潮。

① 伊·弗·巴甫洛瓦：《当代西方历史学家论 30 年代斯大林的俄国——“重评派研究方法”的批判》//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5.

② ГА РФ（俄联邦国家档案馆），Ф. 9401，Оп. 1，Д. 4157，Л. 203—205，Ф. 9492，Оп. 6，Д. 14，Л. 14. 转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 1. С. 203.

③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 1. С. 203.

④ 《环球时报》，2008 年 8 月 26 日。

社会政治思潮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但苏联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其形成和发展起了催化、加速的作用。苏联 30 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一方面，造成了苏联凝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由此铸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这种思潮又以官职等级名册制度形成的特权阶层为载体，二者互相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在这个派别的阻挠下，从战后初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滞、贻误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战后初期的局部改革，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以后的改革，等等。

另一方面，由 30—40 年代清洗、镇压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由此不满情绪发酵而形成改革诉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和战后形势的催化，形成并加强了这一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义的打击迫害，造成阻滞梗塞，回旋激荡，又蓄积了更大的势能。在赫鲁晓夫时期终于有可能爆发而奔泻、喷发出来，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经受压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政见思潮。这种思潮经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民主化”的释放，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航船，受到党内和社会上以上两股强大社会政治思潮的双重夹击，因而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葬身海底。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改革的进程发生了保守主义思潮、势力同极端民主派思潮和势力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合作社法”和“租赁法”的出台，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一部分人利用经济改革的漏洞，经过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有财产；随着财产的增多，私欲的膨胀，企图把非法财产转化为合法的私人所有，于是，由起初维护体制、反改革的保守派，一跃而转为主张推翻体制的极端民主派。这样，极端民主势力大增，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一派无所倚恃而导致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的结局。

## 19. 20 世纪 30 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顾志红

乌克兰独立以后，许多历史事件脱去面纱，显现“庐山真面目”。1932 年 8 月—1933 年 10 月<sup>①</sup>间发生在乌克兰的，被乌克兰史学界称做“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就是其中一例。1988 年，乌克兰《历史》杂志刊登了第一篇关于 1932—1933 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饥荒的文章以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逐渐被外界知晓。乌克兰独立以后，官方予以确认，并在乌克兰历史博物馆辟出专馆介绍这一事件，馆内以黑白两色布置，庄严肃穆，展示着大量震撼人心的照片和实物，以悼念在这次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饥荒中惨死的无辜民众。这次大饥荒造成乌克兰 394.1 万人<sup>②</sup>非正常死亡，其中 91.2% 为乌克兰人。大饥荒期间，吞噬同类的现象普遍发生，枪杀和自杀事件直线上升，乌克兰人民经历了巨大的道德悲剧，饥荒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创伤终生难愈。

乌克兰地处欧洲中部，自然条件优越，境内多黑土地。苏联时期，乌克兰是全苏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经济一直是乌克兰国民经济中的强项。乌克兰生产的小麦、大麦、玉米、甜菜和向日葵供应全苏需要，而乌克兰的土地面积仅占全苏的 3%。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呢？

---

① 国际调查委员会在 1992 年公布的有关材料中确认的饥荒时间。乌克兰政府认为饥荒时间应该从 1931 年 12 月算起。

② 2009 年初，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领导下，乌克兰法院再次启动大饥荒案调查后确定的死亡人数。

## 逐年加码的高征购指标，让乌克兰不堪重负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扭转这一局面，列宁在1921年3月15日第十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以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农民获得了支配自己土地的自主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步掌握了党政大权，此后，他并没有按照列宁的与农民一道前进的方针建设苏联经济，于1928年出台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加速实现城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要实现上述目标，苏联需要出口大量粮食换汇，进口工业化设备。当时，苏联仍是一个只能输出农产品，输入机器装备的落后农业国家，农业是苏联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为了增加出口量，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实行掠夺性的粮食征收制。

2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稳步发展。但是，国内商品匮乏的局面还没有转变，许多农民不愿意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遇到了困难，苏联政府则需要尽可能多的粮食出口创汇。在解决粮食的供需矛盾时，苏联领导人没有采用经济手段，轻率地沿用驾轻就熟的行政手段。苏联政府要求各级政府成立征粮队。为确保收购到足够多的粮食，征粮队强行向农民收购粮食。1927年12月15日，米高扬又向乌共中央发出关于乌克兰必须加强向国库交粮的指示，12月30日，苏共中央书记瓦·莫洛托夫到乌克兰哈尔科夫督粮。这一年苏共中央给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是2.65亿普特。1928年，乌克兰向苏联政府交粮2.72亿普特，占这一年度全苏粮食征集数量的42%。在粮食征集过程中，征粮队除了征收小麦和玉米以外，还征收其他农副产品。进入30年代以后，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连年减少，而中央下达的征粮指标却不调整。1930年，乌克兰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为2290万吨，上交国库780万吨，顺利完成征粮指标。1931年，乌克兰农业收成大幅度减少，粮食总产量只有1760万吨，苏联政府并没有因此降低征粮指标，乌克兰政府被迫动用农民的储备粮，向苏联政府上交700万吨粮食。1932年，集体化后的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仅1280万吨，而苏联政府向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仍然是770万吨。虽然后来征粮指标减少为660万吨，仍然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除了交粮，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税，苏联当时实行三种农业税：直接税；义务交售农产品（国家常常过高规定交售

额，许多农庄无法完成交售任务)；向农机站交纳实物报酬，负担过重。苏共中央没有想办法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强化征粮力度。1932年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给乌克兰的征粮硬性指标是：集体农庄上交475万吨粮食；个体农户上交108万吨粮食。为完成中央下达的征粮任务，乌共中央11月18日通过关于强化粮食征集措施的决议。这些措施是：(1)实行武力征粮；(2)关闭所有的国营、集体办的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3)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交易；(4)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5)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斯大林派出亲信瓦·莫洛托夫和拉·卡冈诺维奇督察粮食征集活动。上述措施在乌克兰当时358个区中的88个区实行，给乌克兰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征粮队在具体执行上述措施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农户缺粮少种子的现实视而不见，用武力从农民手中抢走160万吨粮食，占农户总储备粮的76.2%，他们搜尽了农户手中的最后一点粮食。这一年，苏联政府从乌克兰运走粮食700万吨。政府从农民手中运走大批粮食，付给农民的粮款极少，只相当于市场粮食价格的4%—5%。

粮食的高征购政策严重破坏了以农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统计资料显示，1932年冬季至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只存有80公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粮食。农民们只好宰杀牲畜，用树叶、树皮来补充粮食的不足。由于食品严重缺乏，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在长达22个月的饥荒中，农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包，农村经历了罕见的贫困，变为一个个废墟。可以说，强制实行粮食征集制是引发史无前例大饥荒的直接因素。

### 强制推行集体化，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1927年底，苏联爆发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量仅是1927年初的75%，粮食收购量的减少对苏联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斯大林没有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上找原因，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定是小农经济束缚了农业的发展。1928年，苏联政府决定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乌克兰农业经济的一贯传统是土地私人所有，农民大多不愿意实行集体化。苏联政府认为，只有在乌克兰推行集体化才能彻底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的问题。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乌克兰农业中集体经济应当达到

30%的份额。一开始，苏联政府尚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到1929年秋，乌克兰集体经济仅占其农业经济的5.6%，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仅占可耕种面积的3.7%，只有2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集体化的速度离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1929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快农村集体化的进程。1930年1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的方针。1930年2月，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的现实情况，强行全盘实行集体化。党的基层干部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反对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牲畜，加入集体农庄。伴随全盘集体化而来的是农村暴力事件增多，由于强迫集体化，农民殴打、杀害村干部和党员干部的事件屡屡发生，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普通农民运用最多的反抗形式是滥杀牲畜，他们认为吃肉，或者卖了比交给国家好。1928—1932年间，乌克兰家庭饲养的牲畜减少了1/2多。当时摆在农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加入集体农庄，要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 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

斯大林对农民的偏见几乎可以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之一。斯大林一贯认为，农民的保守性顽固不化，严重妨碍革命变革。消灭富农运动集中体现了斯大林的上述思想。

在乌克兰，富农是具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阶层。他们保留着乌克兰的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他们对政府提出的集体化运动和粮食征集采取抵制态度，不愿把粮食低价出售给国家，而是希望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富农成为粮食征集制和集体化运动的绊脚石，自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于对于富农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意志，制定了一个“规定”富农标准的文件：“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结果，乌克兰的富农占了农民人数的15%（实际上为3%—5%），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在所难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农村党政干部握有农户的生杀大权，这些人往往



依据个人的主观好恶判断是非曲直，制造出一幕幕人整人的悲剧。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铺开。苏联政府向农村派出大批城市工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1929年秋，向乌克兰农村派出大约1.5万人，1930年1月达到4.7万人。不久，又从俄罗斯抽调大量工人到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富农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北方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约有85万人强迫迁到北方，许多人惨死途中，很多青壮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场运动中，富农阶层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盲目屠宰牲口，烧毁农业设施，破坏农业生产工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乌克兰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消灭富农运动总计在乌克兰消灭了30万—50万富农。

### 苏联政府拒绝施救，听任饥荒的发生和发展

早在1931年1月，乌克兰就有271个区向乌共中央报告了实施粮食征集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32年2月10日，乌克兰农民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乌克兰农村缺少粮食的情况。同时，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在1932年全乌共产党第三次全会上正式宣布乌克兰食品严重不足，并向斯大林通报了乌克兰农业情况很糟的现实，但这一切均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1932年7月，乌克兰的粮食储备情况已引起乌克兰领导人的不安。1932年11月，苏共中央向乌克兰下达命令，集体农庄在没有完成上交国家粮食定额之前，不得向农民发放粮食。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罗曼·捷列霍夫在1933年1月中央全会上亲自向斯大林汇报了乌克兰发生饥荒的情况，基辅军区司令员也亲自出马要求中央给予援助。但是，苏联政府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食品帮助，更没有采取措施消除饥荒，或减轻饥荒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继续大量出口粮食。当饥荒在乌克兰蔓延时，苏联政府不仅不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时拒绝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

另外，苏联政府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封锁消息，动用武装力量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颁布一系列命令，禁止饥民逃离饥荒区，外出谋生。如1932年8月7日发布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禁止居民收集仓库附近和火车站附近的丢弃食品的命令；1933年3月17日和9月1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农民擅自离开集体农庄，外出找工作的命令；1932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国内护照制和饥荒受害人

不得擅自迁移的命令。上述做法进一步加深了饥荒局势，造成了更多的人员死亡。1933年春，仅在基辅州的16个区内就发生了123起人吃人和吃死尸的事件，俄罗斯档案馆的材料里记录了上千件吞吃亲生子女的事件，许多农庄变为废墟。

苏联政府为遮盖事实真相，从俄罗斯等地向无人村移民。1933年春天，苏政府开始从俄罗斯向乌克兰大规模移民。1933年11—12月，从白俄罗斯向乌克兰移民40车厢，从苏联西部地区向乌克兰移民51车厢，从伊万诺夫斯克移民24车厢，从中央黑土地带移民43车厢。移民分别被安置在敖德萨、哈尔科夫、顿涅斯克、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截止到1933年12月23日，苏联政府共向乌克兰移民11.7149万人，很多移民在目睹了饥荒造成的惨状以后，又离开了乌克兰。

这次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扎皮林于1989年发表的档案材料，1926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2890万人，1937年的登记人口仅2840万人。10年间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据苏联官方的人口统计，1935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319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2470万人，与1937年相比，人口减少350万。1933年，全乌克兰出生人数为40.7万人，死亡人数为185.3万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3倍多。这种状况从1933年6月开始，持续了1年半之久。而在以后的10年内，乌克兰一直没有摆脱人口负增长的危机。1927—1931年，乌克兰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260万人，如果不发生饥荒，1932—1933年的死亡人数应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但实际上，1932—1933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为400万人。1933年，乌克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其中290万人死于饥饿。<sup>①</sup>

1932—1933年间发生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乌克兰1932年的收成虽不如1931年，但粮食产量仅比1926—1930年平均产量低12%，居民的食品供应毫无问题。但是，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粮食，这是一场人为的悲剧，震撼人心。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

---

<sup>①</sup> 本文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乌克兰国家科学图书馆有关大饥荒的档案资料。

## 20.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联 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马龙闪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对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 1925 年俄共（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过去，我国思想理论界对这一斗争的研究和关注不够，今天重温这一理论争论，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并正确认识当前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首先要问，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联缘何要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呢？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这一斗争的？

在涉及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 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所谓庸俗社会学，按照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 M·利弗希茨所做的概括，它“主要是在史学、艺术批评、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所做的一种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更广义些说，庸俗社会学就是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的真正侵害，并导致错误政治结论的一种对马克思主

义的抽象理解。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漫画化。”<sup>①</sup>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庸俗社会学就是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形态，只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作为经济和技术作用于一定阶级利益的直接后果，进行简单化的、直观的解释。或者按照《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庸俗社会学观点就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因而把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往往做出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sup>②</sup> 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理解，往往把社会阶级看成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疑应该对社会现象坚持阶级分析，但应该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不是戴上“有色的阶级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涂上阶级性色彩，或者像庸俗社会学派的文艺学家那样，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而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这些伟大艺术家所做的评价那样。甚至像苏联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

在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里，代替真理位子的是集体的经验或阶级的意识，实际上他们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个性主体转变到了阶级主

① Лифшиц Мих.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3.

②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体。庸俗社会学像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潮一样，渗透着极端的能动论。历史主体的非理性的自我表述，在庸俗社会学体系里，就变成了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言而喻，这种主观主义往往掩饰在党性的词句之下，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党性的一种歪曲。

一般的庸俗社会学也大讲并突显阶级斗争，但它的阶级斗争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更接近于尼采笔下的强者与弱者的厮杀争斗，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学者所描写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某种类乎兽性的搏杀。庸俗社会学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势力为争夺一块面包，为争夺一块土地而进行的种族厮杀，这本身就不是对待各个时代基本阶级矛盾的态度。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M·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sup>①</sup>

把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就是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冒充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各种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被看做直接地、直观地、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地决定于经济，每一个作家都一劳永逸地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好像要永远被牢牢固定在自己阶级的属性上，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定是只能描写自己，只能表现自己本阶级和社会集团。20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Φ·彼列维尔泽夫，就是用这种理论解释作家及其艺术创作的。

庸俗社会学注意的焦点，不是分析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所体现的客观艺术价值。它的主要兴趣是集中于受体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在庸俗社会学看来，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预设的象形符号，其意义是以接受者为转移的一个可变量；每个时代、每种社会、每个阶级，都会把自己独特的意涵灌注进受体阅读的字里行间。一切艺术作品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其存在状况无非有两种：或者是，它们都有其本身客观的核心内容，而受体在千变万化的感受和理解中仍然

---

<sup>①</sup> Лифшиц Мих.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8.

保持其核心内容不变（因为它们以客观的现实形象为基础），或者是，社会科学丧失了衡量真理的任何标准，无法区分比如艺术真实和其他假象，就连对一些写手们制作的赝品，低俗的读物或者文牍主义的连篇空话，也无法对它们的真伪加以区分。在庸俗社会学活跃的社会环境中，艺术作品和精神文化现象只能处于后一种生存状态。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成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向农民无限制地征购粮食，农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抵制反抗，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甚至镇压、迫害的有力工具，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庸俗化现象。

庸俗社会学把阶级规定性的原则用来解释社会意识，往往将其扩大化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被做了绝对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应用到社会上，唯成分论成了谈人论事的唯一标准，其恶性发展，就导致到反动的“血统论”。庸俗社会学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载体，因而对他们采取排挤、打击的政策。把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

## 庸俗社会学在十月革命后相当流行， 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庸俗社会学作为一种扭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庸俗化的思潮和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几乎贯穿始终的一条又粗又长的思想线索。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成“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

在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把“唯物主义”一词变成了一个套语，当成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以为万事大吉。恩格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sup>②</sup>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曾表示他与马克思也应对这种情况承担部分责任。他在《致约·布洛赫》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则，而且还并不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sup>①</sup> 恩格斯在晚年一系列书信中表明，当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庸俗化的情况，在他看来已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sup>②</sup>

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传播到了俄国。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激进主义批判，他是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的，他在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此外，特卡乔夫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也把经济唯物主义与边沁<sup>③</sup>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都有相当影响。

庸俗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实证主义观点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有时也受到新康德主义成分的侵蚀。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就连常常同庸俗化保持距离的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也能窥见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的蛛丝马迹。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往往将文化史了解为由社会决定的带有必然性的一系列心理精神状态，而这种必然性就像苹果树要结苹果，梨树要结梨子一样，往往被说成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

普列汉诺夫的片面性，表现在把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任务仅仅限定为从发生学、起源学方面去研究艺术现象，而不允许在文学中用通常标准的方法进行艺术批评。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普列汉诺夫力图“千方百计强调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客观主义，因此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即主观意志的创造性方面注意不够”。<sup>④</sup>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同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B·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第479页。

② 这些书信包括《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

③ 伊列米亚·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④ 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32.



彼列维尔泽夫有着共同之处。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庸俗社会学思潮主要由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 M. 波克罗夫斯基、B. 弗里奇和 B. 舒利亚季科夫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起过较大作用，但并不总是属于正面的、积极的。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获得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在苏联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得到的迅速广泛传播，以及部分旧知识分子对它无奈的适应和服从，进一步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使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给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严重危险的现象。在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推动下，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在文化建设方面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达到了特别有害的地步。庸俗社会学采取荒唐可笑的形式，造成了巨大破坏性后果。它鼓吹打倒所有剥削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摈弃所有文化遗产，取消过去的学校，把过去官方的历史学公式完全颠倒过来。这样一来，伪皇德米特里成了当年那个时代革命力量的代表，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彼得的改革，反而遭到了粗暴的否定；十二月党人非但不是捍卫人民利益的英雄，反倒成了地主兼粮食贸易商的代言人。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遗产都丧失了艺术价值，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后者无非是与高等贵族沆瀣一气的中等贵族的代表；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是没有什么人类共同的珍贵艺术价值可言的。后来，“拉普”<sup>①</sup>又接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某些极左观点，进一步以变化了词句宣扬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庸俗社会学为摒弃文化遗产，为各种极“左”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环境。这种极“左”的思想形态，把所有的一切都涂抹上了阶级色彩，从宣传消灭过去时代的音乐，到把艺术融入生产和生活的理论（“列夫”<sup>②</sup>的主张），各种论调往往五花八门，离奇古怪。

从上面不难看出，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片面性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造成其追随者进一步将其发挥、放大了他的失误，

---

① 即俄文“РАПП”，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

② 即俄文“Лев”，是“左翼文学战线”的简称。马雅可夫斯基为其首领。

而出现庸俗社会学倾向；一是由波格丹诺夫受到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sup>①</sup>社会学的影响，而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应该说后一方面为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倾向。

莫斯科大学教授B·M·弗里奇和B·Φ·彼列维尔泽夫可以说汇合并承袭了这两股源流。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有一系列颇有名气的文学史专家，比如П·Н·萨库林和П·С·柯根等学者，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以B·M·弗里奇和B·Φ·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个庸俗社会学派，培养出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有才华的学者，这使他们的理论在苏联理论界和文艺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使1928—1930年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并未能铲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数十年间在苏联思想理论界一直存续了下来，而在苏联学校教育传统中保持得最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sup>②</sup>

庸俗社会学思潮在上世纪20年代最盛行时，实际上几乎成了苏联文艺学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当时，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从彼列维尔泽夫学派到“列夫”，从史学到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都具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口号，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其他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则与“无产阶级文化”无缘，只配受到排挤和打击。“列夫”则鼓吹“生产艺术”，认为唯有这样的艺术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拉普”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融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拉普”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sup>③</sup>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其一派的领导权。“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磨砺阶级斗争的“利刃”，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

---

① 约瑟夫·彼得楚尔特，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门徒，他们师徒都受到列宁的批判。

② Голубков М. М.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XX века (1920—1990 — е годы). М., 2008. С. 168.

③ Правда, 1 февраля. 1925.

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sup>①</sup>这段话，对“拉普”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拉普”宣称，俄共（布）党还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他们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党员作家组织的纲领，应该成为党的文艺纲领，他们的政策应该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代表党的文艺政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的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被列宁委任主办《红色处女地》的负责人）沃隆斯基，为了捍卫党的文艺政策，对“拉普”进行了反击。这一下捅了这个“左派”的马蜂窝。“拉普”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一下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于是，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

在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领导人布哈林和负责国家文化教育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主持下，为俄共（布）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草案，草案于1925年6月1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为反对以“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思潮在文艺阶级性问题上的简单化观点，为贯彻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方针政策，《决议》特别载入了针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一段话：“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sup>②</sup>

我们知道，无论“无产阶级文化派”，还是“左翼文艺阵线”和“拉普”，其极左的文化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庸俗社会学。这样，在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极左错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庸俗社会学派的抵制和干扰。

事实正是这样。大约在1926年或者是1927年，在一次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当讨论到有关中学文学教学特点问题时，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列维尔

<sup>①</sup>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1917—1932), М., 1966. С. 395.

<sup>②</sup>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泽夫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了“直接冲突”。接着，在1928年1月（不是像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说的那样，是在1929年1月<sup>①</sup>）召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当时，以B·M·弗里奇和B·Φ·彼列维尔泽夫为首的庸俗社会学派是掌握相当权力的。从1922年建立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学部时起，B·M·弗里奇和B·Φ·彼列维尔泽夫就是该学部的正副领导人，1925年改组后，他们两人又分别担任学部主席和学部秘书。他们作为老党员学者，在革命前就发表多部著作，向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他们有一批弟子追随左右，形成了这个日后被称谓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当彼列维尔泽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发生激烈争论后，他和弟子们为维护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在1928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们共同发行了第一个《文艺学》文集，在发行文集的同时，还在同舆论界的多次见面会中发表了他们的理论纲领。而此前不久，在高校教师的一个莫斯科会议上，彼列维尔泽夫还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总结性地全面阐述了他们的思想。此外，他还在另一场合向听众讲解，艺术形象的阶级制约性是通过什么机理，怎样具体发生的。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彼列维尔泽夫是一个活跃、固执并带有进攻性特点的学者，他利用当时在舆论界的名气和权威地位，在其坚持的观点上是丝毫不肯退让的。

这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派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斗争。

### 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始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维护1925年《决议》的重大原则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8年4月30日至5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拉普”代表大会上，针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派的错误，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状况和任务》的报告，<sup>②</sup>拉开了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序幕。

卢那察尔斯基从分析苏联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全面阐述了马克

---

①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9. М., 1935. С. 502//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27.

②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М., 1967. С. 7—18.

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地位、使命、特点和具体任务。他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学精神”。<sup>①</sup>他特别使用“科学社会学”一语，就针锋相对地同“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

接着，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进行怎样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的、最带规律性的经济关系，首先是劳动的形态。在广泛考察某个时代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努力给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sup>②</sup>

但是，他又概述、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当问题涉及某一个别作家或作品的情况时，倒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考察根本的经济条件，因为这里特别突显出来了一个恒常起作用的原则……这就是艺术作品只是在非常微不足道的程度上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们依存于生产方式是经过其他中介环节而发生作用的，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和在阶级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心理。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该作家作为表现者的那个阶级的心理，或者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其他各阶级对作家影响而生发出来的某些复杂成分；这也是必须予以关注并进行分析的。”<sup>③</sup>

显而易见，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针对的是庸俗社会学观点，并一一进行驳斥的：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卢那察尔斯基则提出了“中间环节”论；庸俗社会学把一切文学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阶级制约性”，卢那察尔斯基则一一作了具体的辩证分析。他没有把作家及其作品钉死在该作家出身的阶级机体上，而是看到了艺术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正是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决议》中所指出的重要原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sup>④</sup>

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庸俗社会学派分析一切文学现象，都从经济形态和“社会

①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С. 8.

②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С. 8—9.

③ Плеханов Г. 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10, С. 295—296. //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М., 1967. С. 9.

④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阶级制约性”出发的庸俗机械论观点，提出分析作家及其作品要从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并据此提出了评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标准问题。他反对艺术风格的“阶级制约性”观点，认为“绝不能否认研究文学形式的独立任务”：“事实上，作品的形式不仅是由该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是由若干其他因素决定的”。<sup>①</sup>在这里，他当然是指文学形式（包括风格）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所固有的一种方法论十分不满，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仅仅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表现在何处，又是什么意义的恶，其表现何在？”<sup>②</sup>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报告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庸俗社会学派的整个理论纲领。这个报告在“拉普”大会上发表后，接着立即于同年6月在其机关刊物《文学岗位》和《新世界》两家大型刊物上刊载，这样，这位教育人民委员，正像他本人所说的，便在“并非听命于任何人的”<sup>③</sup>的情况下，倡导并发起了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这场理论斗争。

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在1929—1930年全面展开的。在1929年初举行的

---

①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М., 1967. С. 10.

② 原载《劳动学校的国语和文学》1928年第1期，第70页；转引自 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28.

③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82. С. 76// 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26.

一次苏联语文专家会议上，苏联文化界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波梁斯基，也加入了同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论争。接着，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相继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举行的专门讨论会上，也发生了同这一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争论。第一阶段批判的高潮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整个1930年。

其间，经过大体一年左右的间歇，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再次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36年。如果按阶段划分，这是继1928—1930年第一阶段论争之后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批判。正是在这个阶段，先前方向基本正确的学术批判被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开始着眼于上纲上线，政治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本身的厘清和划分，因而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虽持续数年之久，但理论是非并未彻底弄清，所以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不仅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就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时期都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

以上就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大体情况和过程。

### 关于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当代认知

苏联所进行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那么，当代应当对它如何认知并作出正确评价来呢？

这场批判在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无数次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中，应该说是罕有的、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辩论和理论斗争之一。

这一理论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对庸俗社会学最集中、最有成效的一次打击，它对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灭了庸俗社会学派的气焰，阻止了庸俗社会学的蔓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由于这一斗争主要是在苏联文艺学领域进行的，所以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然而，这次理论批判的进程也经历了曲折。在争论的第一阶段（1928—1930年），进展是顺利的。卢那察尔斯基把论争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允许论敌答辩，

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发表文章和著作的权利。这一正确的方针使斗争避免了扩大化，把重点放在了分清理论是非上，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批判的第二阶段（1932—1936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理论斗争为苏联最高领导所利用，被用来打击政敌、改写党史、树立个人崇拜的目的，这样就把原本的学术论争扩大化，扭曲成了政治批判，因而走上了忽视厘清理论是非的错误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清算，造成理论是非厘清得很不彻底（特别是在文艺学以外的领域），为日后留下了隐患。

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清算的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语言学领域。在30年代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人类交际工具——语言，宣布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大肆宣扬语言的阶级性，这使庸俗社会学在语言学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没有稍显收敛的迹象。此外，苏联这个时期不只正确地宣传中小学人文课程的阶级性，还把阶级性特征扩大到化学、物理等自然知识课程领域，赋予自然科学以阶级性。语言学的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而学校教育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则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苏联在学校教育中存在这种倾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以米丁、尤金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一直宣扬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直到40年代末还把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苏联批判庸俗社会学的不彻底性，不仅长期侵害到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和教育界，也严重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上世纪50—7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仅在文学理论界对庸俗社会学有所批判，有所触及，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在庸俗社会学问题上拨乱反正，因此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和社会上还时有抬头，不时沉渣泛起，或余音回响。近年一股否定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噪音，就是这种状况（庸俗社会学抬头）的反映。因此，在学术理论界以至全社会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补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

庸俗社会学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加之因其长期存在而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错误理论及其倾向的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同它进行斗争。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伟大工程的建设中，需要注意纠正两方面的理论倾向，一是纠正从右的方



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歪曲和修正，二是纠正从左的方面，即庸俗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扭曲和侵害。离开了同这两种理论倾向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云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 21. 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马龙闪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淹没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而对意识形态极为严密的管控，又使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长期受制于僵化理论教条的束缚而得不到创新发展，使苏联在现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在新科技革命中败下阵来。因此，要深刻了解、认识苏联，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就是要了解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学术界很少敢于触及，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公布了大量材料，才使这个问题得以为外界所了解。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呢？

苏联从斯大林当政开始就通过管控意识形态的载体来控制意识形态。大家知道，当时意识形态的载体从物的方面来说，主要就是书刊和报纸；从人方面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从人的活动方面来说，就是新闻出版、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各种表演和演出等等。掌控意识形态，就是掌控书报、新闻出版和各种演出活动，掌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那么，怎样掌控这些人和物，以及文化人的活动呢？

### 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

斯大林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建立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二是不断展开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三是制定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和规范。

先看看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

俄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的传统。沙俄时代，有名的第三厅就是行使书报检查职能的。革命者深受书报检查之苦，所以，从赫尔岑到列宁都不得不流亡到国外，去办不受检查的革命报刊，从事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十月革命之初，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但当时就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声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sup>①</sup>

但是这一诺言并未兑现。随着革命后政治形势的逐渐稳定，非但没有放松对出版物的行政管制，反而越来越拧紧了行政管制的螺丝钉。

苏联党内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物，也曾同书报检查中的专横粗暴做法作斗争，企图通过制定出版法对此加以规范和限制。但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是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作为书报检查的依据，由它们实际构成了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创办期刊和出版社的批准许可制度；事前检查和各类演出的检查制度；编制查禁流通作品和书籍的清单；对印刷工业采取监督措施；各部门对各自领域的出版事业实施监督；实行国家对经典作家、教学参考书和已故俄国作家初版档案的初版垄断权；实施对报刊犯罪的惩罚措施；对所有以图书馆藏为目的的出版物实施登记、检查，等等。<sup>②</sup>

这一书报监督检查体制，在1922年至30年代初是由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集中实施的。出版总局经由两条途径贯彻俄共（布）中央的书报检查政策：一是“采取行政手段和书报检查追究手段”；二是“采取意识形态压力”。前一措施，包括查禁报刊和出版社，压缩印数和实施罚款，以及对责任人进行法律制裁和审判；后一手段包括同编辑部谈判，给它输送合适的人选，裁除不可用的人员，等等。

根据中央政治局1923年的实施细则，对出版物要按其一定倾向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出版物的检查都提出特别的要求。文艺类的作品，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建

①（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②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2001. С. 254.

设或者有低级趣味的，一律禁止；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类作品，凡是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又面向广大读者的，一律加以查禁；严禁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类书籍，但有学术和实用价值者，限量发行；宗教类书籍只有属于祈祷性质的才许可出版；对青少年读物限制很严，只有能促进“共产主义教育”的才允许出版。

书报检查实施细则除上述外，还包括“不准出版不应公开的资料（国家机密）和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带有明显敌视性质的文章”，不准许出版“在主要问题上——包括社会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和艺术等等方面，具有敌对性思想”的作品，不准出版低级趣味的报刊、诲淫作品和不良广告等；对文章中“有损害党和苏维埃政权威望的最敏感的文字（事实、数字、评价）”，要加以删除；暂停个别出版物或缩减印数，关闭有犯罪活动的出版社，并对其负责人交法庭或转交地方政治保安局处理。仅从文字上看，这些规定似乎在当时并没有错，但后来被斯大林用来针对党内反对派，就变了味，发生了严重的歪曲和扩大化。

在有关书报检查文件中，还规定了出版总局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切关系。这主要包括：（1）上述各安全部门的政治机构，“要在监视报刊发行、交付印刷、书籍贸易和进出口国境的出版物上，提供技术帮助”。——这里所说的“技术帮助”，主要是指提供警力；（2）在任命出版总局三头目时，对其中一位的任命，必须同国家政治保安局协商确定；（3）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监察部门对已由出版总局实施事前检查予以放行的出版物，再行实施事后检查，并对违法者提起诉讼和没收有关出版物。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逐渐走向宽松，而是越来越趋严厉，书报检查所包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加广泛。这集中体现在出版总局权力的逐步扩大及其职能的与日俱增上。而随着出版总局权力和职能的扩大，它自身的机构也日益膨胀。

1923年，在出版总局下成立了演出和剧目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种演出和各艺术类别目录的监督。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出现，出版总局也承担了对其各项事务的监督。随后，对音乐录音制品的监督，对广告的监督等，也都归入了它的职权范围。

从查禁出版物的数量看，1925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查禁了221部书。1926年禁行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

了975部作品。<sup>①</sup>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出12588条不能公布的属经济和军事秘密的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sup>②</sup>

出版总局也负责对进出口印刷品的监督，以及对图书馆藏和市场流通图书的检查和管理。出版总局下设国外部，专司对进出境出版物的检查。查禁的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出版物：“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甚至“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sup>③</sup>有权取得有上述内容国外出版物的，只是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所属工作人员，以及特大型学术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只有得到出版总局和政治保安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出版物，但后来这一规定也被取消了。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产阶级”报纸通常还是放行的。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起来。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受歧视，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sup>④</sup>

与此同时，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市场流通的图书也进行了大规模严格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以人文类图书为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

①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2001. С. 274.

②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38.

③ СЦАЛИ (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 Ф. 31, Оп. 2, Д. 8, Л. 9.

④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125.

达 5000 种以上，报纸近 5000 种。<sup>①</sup>

随着各类检查力度的加大、监督范围的放宽，先后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检查机构协同出版总局履行职能。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政治监督司、海关书报检查处、邮政检查局、艺术委员会、艺术事务管理局，等等。与此同时，出版总局本身的机构也越来越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到 1938 年，它就发展到 15 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 525 个检察官之多。到 1940 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 5000 人。<sup>②</sup>

尽管出版总局从组建之日起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但仍然不能令联共（布）最高层领导满意，于是，在 30 年代初又对书报检查机构来了一次大的改组：把书报检查体制由国家机构行使职权，转变到由党的机关实施全面的书报检查。这种转变是同书报检查对象由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相联系的。对于这种从检查对象到检查体制的转变，出版总局第一任局长、前“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在 1931 年一个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如果说先前我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队伍之外的敌对分子，那么现在，当着实行社会主义全面进攻的时期，我们就不得不将非常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队伍内部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己进行书报检查，所以，监督就将具有两重性。”<sup>③</sup>

这种转变最早发生在 1929 年 1 月 18 日中央组织局《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该决议取消了出版总局对新办重要杂志的审批职权，改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批准；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则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sup>④</sup> 扩大党的机关实施书报检查职权的重要步骤，是在中央政治局 1930 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作出的。该决议着令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改组出版总局。约一个月后，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

---

①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127.

②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33.

③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26—27.

④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290.

文件作出相应决议，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出版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sup>①</sup>

不仅在报纸，后来在杂志中也设立了政治编辑。政治编辑的职责和任务，由中央政治局 1931 年 4 月在其决议中作了规定，其中强调指出，政治编辑对报刊的思想政治审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党的检查机关负责”。

在这次改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建制之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 在大批判运动中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公式管控意识形态

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连续不断的大批判运动，推倒过去的思想理论权威，树立斯大林这个新的唯一的思想理论权威；也通过这种大批判，清除过去的思想理论原则，确立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原则，即由斯大林解释和认可的、实际上是被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管控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当政时期，确切地说，从 2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 1941—1943 年外，几乎不曾间断

<sup>①</sup>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2001. С. 290.

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三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或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就《哈萨克斯坦史》发难，展开了对哈萨克斯坦一批史学家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线，就是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主要是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当然，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不是一句空话，这要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所以，通过这一连串大批判，最终是要确立斯大林提出或认可的思想理论公式。

批判布哈林，是要为取消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扫清道路，要对所谓“新的实践”所产生的“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有一系列“新的看法”和“新的提法”。<sup>①</sup>透底地说，这就是要改变过去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贯彻斯大林“大转变”后所推行的“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批判德波林及其学派，其目的是使哲学问题变成了为当前政治，为当前现实服务的工具。这就是斯大林通过米丁等人为治罪德波林而提出的论据：德波林的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罪过”在于违背哲学的“政治化”、“现实化”和“党性”要求，而不顾反布哈林“右倾”的现实斗争，钻进了纯哲学的学术问题中去。通过批判德波林，确立了斯大林的哲学理论范式，即把哲学纳入“政治化”和“现实化”的轨道，而将一切理论倾向都归结为政治倾向。这样，就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但批判、解散“拉普”，并不是为了纠正“拉普”的路线，而是为了打掉同“右倾调和主义”划不清界限、政治上可疑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而建立以原“拉普”骨干和其他文艺“左派”为核心的新的全苏集中统一的文艺团体，推行没有“拉普”的、为斯大林赏识的“拉普”路线。这就为日后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为批判“拉普”所提供的理论公式，是建立全苏大一统的文化艺术领导体制，为确立单调划一的文艺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提供理论根据。

史学界进行的一系列批判，是直接为树立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上与列宁并列的地位，为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准备。由斯大林为其提供党史“分期标准”和编写大纲的《简明教程》，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他的整个思想理论提供了标准教本和理想范式，因此，出版后被推崇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全苏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这为宣传、贯彻、推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为进一步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 **建立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严密控制意识形态**

除上述措施外，苏共还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来控制意识形态。

革命初年，党内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那时，是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来直接负责对意识形态机构的总领导和总监督的。在地方上，则由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以及由它们建立的各种名称的宣传鼓动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只是到1920年8月，党中央才建立宣传鼓动部，专门负责“把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局、中央出版物供应

社、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全部抓起来和统一起来”,<sup>①</sup> 主要集中对精神文化各领域实行总的领导。在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负责对各地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则由党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负责。党中央下设一个委员会,由它给宣传鼓动部、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青年团下达方针性指示。宣传鼓动部则协调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除这些常设机构外,为完成特定临时任务,还不断设立各种中央临时专门委员会,来集中领导某项工作。革命后建立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框架体系,打下了此后数十年苏联意识形态集中统一的基础。后来各种具体管理机构或有增设和扩大,它们的名称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其由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书记为总管,由中央宣传鼓动部统一集中领导的总体框架体制,一直保留了下来。

对联共(布)来说,斯大林时期控制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更加高度集权,对思想文化管控的手段更加严厉。这种手段主要体现于,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各部门,不断制造各种题目,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地开展大批判运动。这种高压、恐吓机制,有效地震慑了文化知识界,使各种知识文化人诚惶诚恐地循着在大批判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公式,亦步亦趋地沿着斯大林规定的思维路径前进。

这种不间断的大批判运动又是通过高度集权的管控机制推行的。这种管控机制对斯大林来说,包括三条控制线索:一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组织分配部,按照登记造册的官职等级名录,集中掌控党、政和社会团体系统文化意识形态干部的委任调配大权;二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文化宣传部,掌控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报刊宣传、科学研究和党校教学等部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领导大权;三是通过解散“拉普”和20年代存在的几乎一切文化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团体,建立大一统的中央协会统管机制,掌控一切群众社会文化团体。而这三条掌控线索在中央最高层,在30年代前半期都集中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之手;从30年代中期起,一直到1948年则一直掌控在斯大林与日丹诺夫之手。

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决策和指示,一般都是通过以下机制和程序贯彻执行的:卡冈诺维奇(30年代中期前)或日丹诺夫(30年代中期后)在有关场合亲聆斯大林的有关决策和指示,先由这两人之一召开部门领导人会议直接传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页。

达，并作部署，然后由其提名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贯彻。如果需要根据斯大林的决策和指示形成中央决议，在30年代中期以后，日丹诺夫往往亲自捉笔或令专门委员会起草，再由他修改定稿，然后呈报经斯大林批准、政治局通过，再颁布执行。日丹诺夫档案中保存着不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或正式文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形成的。比如1935年5月13日《关于建立小学、中学和高校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草案<sup>①</sup>，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工作和对高校领导事宜的决议草案》<sup>②</sup>，联共（布）中央1935年2—3月“关于改组中央文化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sup>③</sup>等，都是如此。

30年代党内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不仅表现在取消了20年代讨论各种文化问题的代表会议，只有由最高领导层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运筹帷幄，决定文化问题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现在党除了对方针政策的指导，还直接具体地涉足了各个文化职能和业务部门。在这10年里，党的各级机构不断扩大，不断增设文化职能、业务部门，出现了一个文化职能业务部门领导权力向党内转移和集中的过程。

斯大林这种严密管控意识形态的机制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上半期。只是1953年以后的“解冻”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才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的这一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使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才稍稍有所变化，但上述这一基本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并未有所改变。

---

① ЦПА ИМЛ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Ф. 77, Оп. 1, Д. 458, Л. 1.

② ЦПА ИМЛ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Ф. 77, Оп. 1, Д. 497, Л. 1.

③ ЦПА ИМЛ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Ф. 77, Оп. 1, Д. 824, Л. 1.

## 22.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陆南泉

斯大林逝世后一直到苏联剧变前，虽然经历数次改革，但苏联基本上仍保持着斯大林模式。对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历史地、客观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对斯大林模式本质的认识。

###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它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是：

(1) 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组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源于斯大林主义。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2) 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

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个人集权主义，“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sup>①</sup>

(3) 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 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 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联邦制“就实质来说是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的模式”。<sup>②</sup> 苏联“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在苏联整个历史中，这理论只是一种幻想。”<sup>③</sup>

(6) 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斯大林的扩张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为有效、最稳妥的手段。

(7) 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

<sup>①</sup> 高放：《苏联制度宏观研究论纲》，见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1998年版，第80页。

<sup>②</sup> （苏）《真理报》1990年7月15日。

<sup>③</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上面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互为条件。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这里仅介绍一下苏联国内有关人士的看法。布坚科认为：“根据现在的全部情况，是否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由于30年代末我国历史性建设新社会的特点，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sup>①</sup>有些学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些。但实质依然故我”。“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sup>②</sup>

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的学者从列宁晚期著作中描绘出来的轮廓，把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

根据劳动的质和量付给报酬的原则；

允许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存在；

承认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

在防止官僚机构为所欲为的条件下保持“坚强有力而灵活的”国家机关，人民对它的监督；

考虑劳动者利益的多样性；

---

<sup>①</sup> 转引自（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页。

<sup>②</sup>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

实行生产者同公民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不一定非通过国家不可，允许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民团体；

劳动者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坚持不懈地扩大民主；

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公正地解决民族问题。<sup>①</sup>

学者对有关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的看法较为一致，或者说大同小异。《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明显的收缩，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sup>②</sup>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B·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

<sup>①</sup> 参见（苏）《真理报》1989年7月18日。

<sup>②</sup> 参见（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第724—725页。

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

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sup>①</sup>

我们仅从上面的材料就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是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

###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原因

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在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

<sup>①</sup> 参见（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第492页。



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绝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sup>①</sup>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绝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发生的三次大论战：关于列宁主义的大争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和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权力斗争方面看，这场大论战都可以被看成是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随着斯大林在理论、政治与组织三条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这为他抛弃新经济政策，建立斯大林模式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因此可以说，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接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是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开始建立的阶段。苏联工业化运动与30年代的大清洗，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是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时期。普遍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与政治大清洗三大社会运动，是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也是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因素。

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并且围绕三大运动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都对形成斯大林模式有着重大影响。为此，我们下面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分析。

---

<sup>①</sup> 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为《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一书撰写的“导论”（该书由陆南泉等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 （一）1924—1929 年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党内斗争

这期间苏联党内展开的大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而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争论的结果是：

第一，虽然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总结，但应看到，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这也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被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初步确立，因为这时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最后被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

第三，1929 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也可以说全方位的“大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 1924—1929 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和这个“大转变”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政策，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

第四，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明朗，并在整个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停止过，尽管表现的形式与斗争激烈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苏联各个阶段状况的变化一般都与两种模式斗争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长期占主导地位。

第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可以认为，1924—1929

年是斯大林主义奠定前提的时期。<sup>①</sup>这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比较简单的、有点庸俗的、没有被理解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革命人民中明显地有两派：一派虽然有些左的情调，但仍可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派、革命民主派；另一派是左倾革命派、兵营共产主义派。早期斯大林主义更多依靠的是后一派革命群众。”“兵营共产主义派则是那些被抛弃在最低层、比较封闭的劳动群众，他们憎恨现存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涅恰也夫分子就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无处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们想借助‘火和剑’，借助强大的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当时有一个革命领袖说过：‘如果太阳只照亮资产阶级，那就把它弄灭！’”“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否定的价值和冒险主义方针固定下来了，并且提升为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sup>②</sup>

### （二）工业化运动对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到战前的1941年，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而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sup>③</sup>第二，在工业化运动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大大加强了，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第三，1929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快速推行，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第四，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不仅一个一个地打败了他的政敌，并且接着30年代搞大清洗，最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领导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

###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对农民的政

---

<sup>①</sup> 斯大林于1922年4月担任总书记，但独立领导全党工作是在1924年1月列宁逝世之后。

<sup>②</sup> 转引自《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4期。

<sup>③</sup>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8页。

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在欧俄几个资本主义绿洲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广大腹地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间斗争的焦点。在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sup>①</sup>

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sup>②</sup>

在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最后形成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体制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有：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sup>②</sup>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1) 反映生产关系一个重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十分突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斯大林整个经济体制形成过程来看，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形成的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农业集体化显得最为突出。

(2) 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行政命令、强制与暴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把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范围压挤到最低限度。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sup>①</sup>

实际上，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发展农业的模式，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极大地败坏和践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

#### (四) 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反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这样保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简要地论述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大清洗”。

我们通过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借助强制和暴力，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党群关系紧张，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仅1930年1—3月全苏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sup>②</sup> 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已把一个一个的党内反对派打下去。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的情况下，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这就构成了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

<sup>①</sup>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35—36页。

<sup>②</sup> 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4年时间里，“大清洗”运动高潮迭起。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斯大林的镇压并没有到1938年结束。大量材料证明，在斯大林逝世之前，镇压一直未停止过。<sup>①</sup>第二，斯大林的镇压并不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在此前已经出现。现在大家都用“30年代大清洗”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特别是其中的1937—1938年，镇压运动规模之大使苏联所有的人震惊。这简直是突然降临在苏共党的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可怕的悲剧。

至于现在来争论“大清洗”运动被镇压与迫害的人数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这不具有重要意义。就算是几百万人，难道还少吗？难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为党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至于有人说，被斯大林镇压的人中有真正的反革命，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的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sup>②</sup>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不要把它说得太复杂了。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内心充满着渴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想要获得的是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绝对的服从。同时他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造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正是这个原因，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首先冲向中央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出现的种种措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斯大林与党的基本骨干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大的变化。党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到了1934年（虽然晚了一点）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是不需要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

---

<sup>①</sup> 如1949—1951年发生的所谓“列宁格勒事件”和1952年11月发生的“医生谋杀案”等。

<sup>②</sup> 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第959页。

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伊·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sup>①</sup>而对于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斯大林来说，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清洗”运动。而爱记仇、疑心重的斯大林，在这个运动中就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为自己破坏法制与践踏民主大开闸门，消灭反对他的政治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与此同时，在全国造成一种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种局势把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在这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是挽救局势的“救星”。

斯大林搞“大清洗”，用“人民的敌人”等种种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30年代的“替罪羊”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造成国内困境的原因推给“人民的敌人”的头人，说成是由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消灭，对斯大林搞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以上简单的分析表明，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一个中心目标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他手里。

这次“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凡是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都将被抛弃，凡是他不喜欢的人都将被撤职或消灭。应该看到，30年代的“大清洗”把苏联发展到了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是实践，都已遭到严重的扭曲。麦德维杰夫远在1974年就谈到，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他指出，“那是一场沉痾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

---

<sup>①</sup> 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第251页。

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sup>①</sup>不幸言中了，由于“大清洗”使得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形成和巩固，并导致最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又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最后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主导性原因。换言之，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

#### （五）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个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sup>②</sup>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因此，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时，必须考虑到影响很深的历史传统因素。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以后还指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sup>③</sup>，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sup>④</sup>。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在世界革命名义下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模式，依靠它把政治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①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第74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页。



## （六）斯大林个人品性对产生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不可能不起作用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忽视或否定了特别是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就会忽视斯大林个人的品性特点对在苏联形成的体制模式的特点所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的。

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嫉能和孤僻，则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

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把他们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们，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并且在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而且加以粗暴的污辱、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sup>①</sup>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

---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

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sup>①</sup>的气味。”<sup>②</sup>看来，斯大林在科学领导中需要的也是一种以奴隶主义对待理论的工作者。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导致产生一系列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愈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这一切，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sup>③</sup>对“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而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把强制与暴力当成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sup>④</sup>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嫉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但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有许多不足之

---

① 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3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61页。

④ 参阅《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辑。

处。正是这一点，产生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的，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的人。<sup>①</sup>

在苏联国内再版 300 多次，译成 31 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 4.7 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反映出斯大林的个人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是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反映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

#### （七）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有关

这里，对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原因，分析一下斯大林是如何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他们都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种产品经济。但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也有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讲，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和承认价值规律、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牢牢地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也就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商品货币设想时，就指出，这种设想，带有一般的、大概的、草图的性质。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后，果断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在货币、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列宁一开始就从允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做起，而对大资本

---

<sup>①</sup> 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第 532—533 页。

的生产资料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要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性质的经济核算制。但后来很快被实践证明，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必须后退，从而“……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sup>①</sup> 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与发展商业，主要出发点是当时存在大量小生产者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建立国营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联系方式，那么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后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与商业等问题，列宁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列宁毕竟否定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进步。这也为党内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正确理解与对待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布哈林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sup>②</sup> “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重要标准”。<sup>③</sup>

但斯大林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他说：“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sup>④</sup> 很清楚，斯大林这里说的取消“中介人”就是指取消商业，商业没有了，就不存在商品流通了，那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了。这种思想是他对商品经济的错误看法的必然反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sup>⑤</sup> 也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也急于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尽快消灭在他看来迫使苏维埃从事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小生产者。就这样，斯大林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坚持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可简单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

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在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往往对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6页。

马克思主义还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尤·波利亚科夫在列宁诞辰 120 周年前夕举行的讨论会上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剪裁，以便首先能够证明他的学说的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事要略而不计，有些事巧而掩饰，有些事要秘而不宣，有些事则干脆一笔勾销。”斯大林在推行他的政策或提出理论时，“最不光彩的就是，这一切都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做的。”<sup>①</sup>

---

<sup>①</sup>（苏）《党的生活》1990 年第 7 期。

## 23. “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马龙闪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走过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超苏联模式”，打倒“四人帮”后，才最终在新时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几乎经历了30年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是经历了对苏联模式的基本实践之后才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国特色”首先是对过去传统的“苏联模式”而言的；同样，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和突破，也首先是对过去传统的“苏联模式”来说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和突破，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概括起来，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光辉的思想创造，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对苏联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和因循教条，坚持不断创新，把我国融入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去，这是对封闭禁锢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际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对苏联忽视民生，半个多世纪一成不变地实行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

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破苏联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是对苏联集权政治、行政命令体制的突破。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是领导全党从体制模式层次上进行改革的，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这些突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正令全世界震惊不已。这些事实向世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有别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和突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近年已经赢得了世人的承认，受到国际学术界和一切有识之士的热议和赞赏。当此之际，却有人以捍卫改革方向为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不许触动“苏联模式”，说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就是“可疑”的，还宣称，所谓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一个“假命题”，还说什么提出这种说法是“制造混乱”、“别有用心”、“包藏祸心”、“借刀杀人”。罪名可真不小！若在30年前，这个“罪名”可以吓得人倒抽一口冷气，可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说法就成了一幅漫画，活脱脱勾勒出了说此话者承袭的文化大革命那种“打棍子”、“扣帽子”，惯于置人死地而后快的手法和习性。

甚至有一位学者，连对苏联史上最起码、最基本的史实、脉络和线索还没搞清楚，竟大胆地谈起苏联史上的分期来了，并且用这个分期法来证明不存在一个“苏联模式”。这位学者说，“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苏联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从赫鲁晓夫始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败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照这位学者的说法，持续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模式了，而且，按他的逻辑，赫鲁晓夫已完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而建立了另外一种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模式。还有，请问：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他们遵循的又是什么模式……

凭着上述这个论据和逻辑，难道就能推翻“苏联模式”这一学术命题？要想推翻这一学术命题，就首先需要弄清楚，究竟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种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如果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那这个概念和术语，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合理的、不可质疑的；如果它纯系子虚乌有，属于人们凭空杜撰、编造的东西，那这个概念和术语的存在就应当受到质疑。苏联存在69年，斯大林当权30年构建的这个体制模式，赫鲁晓夫10年基本继承的这个模式，勃列日涅夫18年又力图恢复、坚持的这个模式，——它叫什么？世界上成百上千的学者，甚至成千上万人都在谈论它，把它叫做“苏联模式”，把它作为一个铁的事实来讨论，在研究，而且已经写出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别说在苏联解体以后，就是早在苏联解体以前多少年，苏联学术界、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就已提出“苏联模式”这一概念来了。而且，如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史稍微有一点点儿常识的话，就会知道，邓小平恰恰不仅是从当时中国的体制，也是从苏联的体制模式着眼，来思考、设计中国的整个改革蓝图的。

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的改革。他深刻论述了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发展和兴衰的决定性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sup>①</sup> 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sup>②</sup>

他在1985年8月接见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③</sup>

从上面邓小平同志这段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从一开始就把苏联模式看成“僵化了”、“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来着眼改革的，要改掉这些“僵化了”、“落后的东西”。这样提出“苏联模式”有什么“可疑”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邓小平同志不仅谈到突破，在领导改革的实践中，也确实确实突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关键性的问题。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黑体为引者所加）。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sup>①</sup>

很显然，我们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吗？这种“突破”为什么就是“假命题”呢？难道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捆绑在一块，将二者混同起来，混淆为一种体制模式，才是“真命题”吗？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混同起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

有一种说法，很直白地表述了这种“混同”论的观点，就是认为苏联模式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把两种不同理论体系下的形式相同的两种思想观念等同并混淆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两种模式框架下，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多只是字面概念相同，而内容、内涵却是大相径庭的，绝不能把字面概念相同、而内涵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也绝不能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苏联模式中的基本制度相混淆。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

<sup>①</sup>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过去苏联模式的公式是：社会主义 = 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还是这样的吗？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①</sup> 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苏联模式的上述公式来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计划经济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像斯大林式的“专政”一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杀绝，进行“人身消灭”的“专政”，同样不是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尽行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求法制的专政；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民主”和“专政”二者的关系，对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多、更重要的应该是“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把“专政”、“暴力”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所有制问题，我们今天也不是实行单一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混合所有制。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样看来，难道还能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完全混同吗？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混淆不得、也混同不了的。

宣扬这种“混同”论的人，还指责什么，讲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为何“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怎么，在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难道不允许继续深入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吗？对于20世纪苏联崩溃这样一件世纪性的重大事件，难道到现在就已经把问题讲深讲透，穷尽了真理，不许人们再讲了吗？中国的改革开放，“革”的“对象”是什么？难道不是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是什么？由于中国过去基本“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我们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是对苏联模式而言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拿苏联说事”？

这种“混同”论的宣扬者，还指责什么，“突破”论“命题”，“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这种论调不打自招，暴露出在该论者心目中，苏联模式就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它捆绑在一起，死拉在一起，非要把中国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不可；同时，也暴露出他们“非黑即白”、“非驴即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好像一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非“突破”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不可，仿佛世界上除了苏联模式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余地了；仿佛除了这两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就不允许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存在的权利，非要把它贴附在某种其他模式上，成为其他模式的附属品不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决定这种论者的思想是僵化的，因而他们不顾苏联模式曾有过的诸多弊端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心死守苏联模式，不许人们对它触动一下。

这位“混同论”者在文章标题中以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为名，宣称要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但是在文章中却对《共产党宣言》一字未提，更未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任何论述，却集中在维护苏联模式上大做文章，这给人们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苏联模式就是他心目中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要“共命运”的并不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他一点不许人们触碰的、千般维护万般呵护的苏联模式。

我们主张“突破”论，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这方面与“混同”论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们认为，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斯大林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宣扬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也越尖锐；他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化，只讲专政，不讲民主，更把专政暴力绝对化。所以苏联发生把列宁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混同”论者把苏联模式看成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现，所以不允许人们去触碰这种体制模式，他们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共命运”。我们奉告“混同”论者先生们这种“命运”是“共”不得的，因为苏联模式的“命运”并不妙，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就是明证。你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共命运”，是要把中国改革拉到何处去，不是很明白吗？

我国学术界主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是邓小平理

论，其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包括苏联体制模式在内的过去的旧体制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体制模式层次着眼，是对苏联模式这种“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体制模式，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曾发生相当影响，它没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并赋予鲜明时代特色，所以，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苏联的体制模式不仅在苏联曾造成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遭受惨重损失的当今时代，必须突破苏联模式而探索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产物。它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才能焕发出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能在这样短短的30年间把中国从一个濒临危机边缘的贫穷的中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繁荣强大的现代化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是“僵化了”的、“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东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同”苏联体制模式的做法，就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去，这只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开倒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共命运”，葬送中国的前途。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死抱住苏联模式不放，要与之“共命运”，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路一条。

## 24.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姜长斌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没有很好总结、甚至错误总结苏联的教训，犯了许多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曲折的实践让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前发展，必须抛弃斯大林模式。但是，我国理论界总有一些人，对斯大林模式念念不忘，竭力为之辩护，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对斯大林模式有清醒的认识。

### 这样提出问题合适吗？

有人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sup>①</sup>的文章，且不说该文内容与标题相去甚远，这里只就有关斯大林模式问题与该文作者商榷。

该文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是“被一些人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并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混乱而又包藏祸心的提法。”还说，“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可以

---

<sup>①</sup>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6月5日）。该报发表该文时加了编者按语说：“向读者推介这篇文章。此文把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讲清楚了。”真不知道该文讲清了什么重大理论问题。

任由发挥的空间。执此说法者摆出一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原创性的架势……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真实意图的同时，使自己披上了‘改革捍卫者’的唬人外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所力图抹煞的”，这些人“别有用心”、“借刀杀人”，因此这个“假命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作者还警告说：“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还要继续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仅仅）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政治分析。”

我不明白这里的“政治分析”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毕竟，棍子乱打、帽子横飞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当年斯大林打击、镇压党内同他意见不同者，用的方法就是把意见分歧上升为“政治问题”，给对方扣上“反党”、“暗藏敌人”之类的政治帽子，直至肉体消灭。难道现在还企图诉诸这种办法吗？

### 谁是我国批判分析“苏联模式”的发轫者？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国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研究分析、批评和批判，起源于什么时候、起源于谁。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谈论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否也是假命题？

1956年中共八大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之前最成功的一届代表大会。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八大前《论十大关系》<sup>①</sup>的主调是实事求是，以苏联的体制模式为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农、轻、重”、“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国际关系”等机制问题不要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同年，即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44页。

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楚的。”<sup>①</sup>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更是认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sup>②</sup> 邓小平对筹备八大是有特殊贡献的，他后来回忆说：“1956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五十二岁。”<sup>③</sup> 但是，八大时期出现的这些先进而又宝贵的探索，很快被接连不断的“左”的浪潮淹没了。

不过，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并未被“左”的思潮压服。1957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批判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sup>④</sup>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坦率地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sup>⑤</sup> 此后不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关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发言权。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对立面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再次开始发表一系列批判“苏联模式”、“斯大林模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4—235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0页。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大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2页。

式”的言论。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按，指科学教育领域）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sup>①</sup>1978年3月10日他在国务院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sup>②</sup>同年9月15日邓小平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sup>③</sup>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再次说到苏联政治体制问题上，“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sup>④</sup>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继续就改革开放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外国（按，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sup>⑤</sup>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再次谈到八大修改党章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民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

---

① 《邓小平年谱》（上），第210、211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上），第277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上），第378—379页；在1998年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里紧接“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还有一句：“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见该书第77页。

④ 《邓小平年谱》（上），第394页。

⑤ 《邓小平年谱》（上），第398—399页。



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sup>①</sup> 1981年12月12日，邓小平有针对性地说：“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sup>②</sup> 当时中国改革遇到的尖锐问题是如何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讨论“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sup>③</sup>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提法，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结和规划，更是对照搬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否定。<sup>④</sup> 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总结我国发展经历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是照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sup>⑤</sup> 1985年8月28日，他更明确地指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关键是僵化：“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⑥</sup> 邓小平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训是：“建国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照搬别人的经验吃了亏，有时是自己太性急了，还搞了‘文化大革命’。”<sup>⑦</sup>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再次重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sup>⑧</sup>

① 《邓小平年谱》（下），第713—714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下），第791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第832页。

④ 《邓小平年谱》（下），第843页；也有资料说，早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查良镛（金庸）时就已经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

⑤ 《邓小平年谱》（下），第1049页。

⑥ 《邓小平年谱》（下），第1070页。

⑦ 《邓小平年谱》（下），第1121页。

⑧ 《邓小平年谱》（下），第1152页。

1987年2月6日他对筹备十三大的重大理论问题论述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sup>①</sup> 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指出：“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sup>②</sup> 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我国“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否定，更是针对苏联一向标榜的“向共产主义前进”、“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言。1988年5月18日，他阐述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于1988年5月18日再次强调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sup>③</sup> 1988年10月17日，他在会见东欧领导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自己认为成功的东西，就应该坚持，不要因为别人改变了，自己也跟着改变，用不着这样。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我们都吃了这个亏。”“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

① 《邓小平年谱》（下），第1168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下），第1203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第1231—1232页。

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sup>①</sup>

尽管邓小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者多次强调必须时刻注意批判分析“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然有一些人固守、留恋斯大林—苏联那一套陈腐的东西，这种思想再次回潮。在这一关键时刻，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 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标准

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成败标准时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也正是这时，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成败的“标准”，给予了科学而又全面的表述。<sup>②</sup> 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赞同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up>③</sup>的提法，从而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以上三大标准反思“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难道不正是在于违反了这些科学规律吗？！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自从我党提出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以来，有些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看成是对立的、互不

① 《邓小平年谱》（下），第1254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下），第1342—1343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第1347页。

包容的关系。症结在于他们把苏联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错就错在不能理解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目标，是一项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避免社会两极分化，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社会的总战略。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sup>①</sup>他还多次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更要不断改善，不断走在历史进程的前沿。

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精髓、苏联模式的扩张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模式与列宁主义、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我们过去学习《共产党宣言》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重点放在“消灭私有制”和“暴力革命”上。其实，《宣言》有两大落脚点：第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宣言》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发展和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或者说精神发展）都说到了。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们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依据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甚至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与姜长斌教授很早就商量组织力量编写这本书，十分痛心的是他突然离我们而去。本文是他生前最后撰写的文章。这次收集到本书中，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本书主编）

---

① 《邓小平年谱》（下），第8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3、294页。

## 2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郑异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是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过重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可以说，斯大林模式首先是通过这部著作集中传入中国的。

《简明教程》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由斯大林本人亲自审定的教科书，有材料说是斯大林本人的著作，原来准备把它当成斯大林著作直接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4卷，后因全集停止出版而作罢。《斯大林传略》写道：“1938年出版了由斯大林同志撰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认可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sup>①</sup>在2004年重印的《简明教程》后附有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的评述，其中认定斯大林就是本书的主要作者。至于用“中央特设委员会”的名义，是为了在书中便于直接吹捧斯大林本人——如果标明作者是斯大林本人，那么有些过誉之词就不便写了。

1938年9月9日起，此书在《真理报》连载。同年10月出书，第一次的印数是600万册。据统计，从1938年到1953年，《简明教程》共印刷了301次，印数达4280万，被翻译成67种语言。此书一出，唯我独尊，其他所有关于联共党史的著作统统被封存或烧毁，关于联共历史上的各种事件、人物的写法、评价统统按照《简明教程》改写，斯大林成了党史中的主角。

---

<sup>①</sup>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163.

此书出版后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百科全书”，被叫做“共产主义的圣经”。沧海桑田，到了90年代初，又被叫做“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但都有一定的道理。

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百科全书”，并不全错。但此“马列”，非彼马列，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简明教程》出版以后，苏联高等院校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叫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其基本教材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是列宁的著作，而是《简明教程》，这门课程直到苏共20大以后才被取消。联共中央有一个专门决议，规定要根据联共的历史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的开设，最清楚不过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含义了。如果马列主义是按照教程所传授的内容来理解，那么完全可以把《简明教程》看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

把此书叫做“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也有部分道理。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教程的中心人物自然是斯大林本人。为了大树特树斯大林，一部联共党的历史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大家记得，在苏联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动辄指责西方史学家伪造苏联历史。实际上，只要稍微认真读一下《简明教程》，不难得出结论：《简明教程》乃伪造历史之大成。试举一例。

十月革命无疑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但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中到底做了些什么，至今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最能说明斯大林在起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证据”，是斯大林的名字被列入了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和“党总部”的名单。

这两个组织中，“政治局”当时根本就没有成立，是1924年斯大林在1917年10月10日的中央决议上添写进去的：“为政治上领导起义成立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洛夫组成的局”。<sup>①</sup>

这个名单本身就非常离奇。在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反对武装起义，会后又发表了反对起义的《论时局》的给有关组织的信。三番两次坚决反对起义的人怎么可能“从政治上领导起义”呢？这是难以想象的。

查当时秘书记录的原件上是这样记载的：

---

<sup>①</sup> 见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捷尔任斯基同志建议为对近期进行政治领导成立由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编辑部+2人+布勃洛夫）”。这段话写在记录纸的背面并被涂去。<sup>①</sup>

这就是说，有过提议，但事实上并没有正式成立这样的政治局。是斯大林在7年之后，新组建了这一个“政治局”，由于那时迫切需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支持，才硬把这两个反对起义的人也拉进了“政治局”！

还有“党总部”的问题。《简明教程》说：10月16日，党中央会议选出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它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

此事同样存在疑问。中央会议记录上只有名单，并没有指明谁为首。其次，“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一语得不到任何资料的证实。实施起义的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斯大林本人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也承认的。而直接领导起义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10月24日（11月6日）上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起义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列宁当时在地下，没有可能出席。但斯大林也没有出席，他这一天到底在哪儿，做了些什么，《简明教程》没有交代。如果斯大林有重大作为的话，肯定会大书特书的。

诸如此类的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斯大林抬高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上去。斯大林需要神化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简明教程》是制造“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当年为批判斯大林创造出来的一种说法，也许是不得已的说法。他要否定斯大林，但他既不能触及苏维埃制度，也没有认识到问题不在个人，而在于体制，只好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推给“个人崇拜”。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图腾崇拜的时期。对图腾的崇拜其过错显然不在图腾，而在于崇拜者自己的无知无能。人类在可怕的自然现象面前束手无策，只好向图腾顶礼膜拜，请求保护免灾。

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他在国内的大镇压，他的对外扩张，能用平民百姓对他的“个人崇拜”来解释吗？“个人崇拜”的说法等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平民百姓——谁叫你们顶礼膜拜的！斯大林个人没有责任，体制也没有责任了。这样的逻辑推下去，今天的改革也就没有多大的必要

---

<sup>①</sup>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86页。

了。苏联学者卡普斯京认为，问题不在个人，也不在崇拜，而在于必须改变已经形成的僵化的极权主义和官僚体制。<sup>①</sup> 在这种意义上，把《简明教程》说成是“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是不恰当的，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编辑出版《简明教程》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广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做法当成供全世界效法的样板。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苏联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斯大林就给此书规定了向世界传授俄国革命的经验的任务。在编写《简明教程》时，树立斯大林的伟大领袖形象，传授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经验以便向全世界推广，更是其最中心的任务了。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作出过有关学习《简明教程》的专门决议。

就所传授的内容而论，应当说，《简明教程》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

中国的革命，特别是建设，同这本书有不解之缘。

1938年9月《简明教程》还在《真理报》上连载，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立即把此书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瑞典文、芬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马来文、“印度文”、保加利亚文和“南斯拉夫文”。翻译成这些文字的最后期限为1938年11月15日，即总共只给1个半月的时间。

这样，中国人很早就读到了这本“共产主义的圣经”。在延安时代，《简明教程》就被列入“干部必读”书。好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并没有按照《简明教程》的路子去搞，但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人们不难看到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明教程》中有三章加上“结束语”被指定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这三章是：第10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第11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年）和第12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我们且看看这几章所传授的具体内容。

第10章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看了这个标题千万不要以为苏联在1926—1929年实现了工业

---

<sup>①</sup> 见《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化。1925 年底举行的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叫做“工业化的代表大会”，会上似乎有一个“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实际上，斯大林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连“工业化”一句都没有提到。苏联的工业化建设是 30 年代的事。《简明教程》教给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就是超高速度地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把农民当做剥削对象，从农民身上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即斯大林所说的“贡税”。在 20 年代斯大林曾严厉批判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理论，即超高速度发展工业的主张。然而 1930 年 6 月斯大林在联共十六大的中央政治报告中却说，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目前工业的产值每年增长 18% 是改造时期计划加快发展的最高限度，应当作为理想来追求。然而苏联近三年产值的实际增长速度是：1927—1928 年度为 26.3%，1928—1929 年度为 24.3%，1929—1930 年度为 32%，1930—1931 年度的控制数字为 47%。因此斯大林反而把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张叫做“投降主义哲学”。<sup>①</sup> 原来，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比托洛茨基还要“左”的计划！在这里，国民经济的平衡，农轻重各部门的平衡发展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其后果之一就是，苏联的农业一直停滞不前，直到 50 年代才恢复到沙俄的 1913 年水平。至于轻工业品的短缺，则是贯穿苏联全部历史的不争的事实。苏联的工业化完成没有？俄国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没有完成，因为工业化应当包括轻工业，农业以至生活的各个部门，而苏联的工业化仅限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就很难说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农业的集体化，这要从党的代表大会说起。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被称做“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实际上，在这次大会的决议中连“集体农庄”这个词都很少见，更没有规定什么集体化的任务。《简明教程》在论述集体化的必要性时引用了列宁的 4 段语录，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一句也没有引用列宁的《论合作社》中的论点。这是颇有特色的斯大林文风——只取所需，为我所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不是一回事，所以从列宁的《论合作社》中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也就无法引用了。

集体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即强迫农民参加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列宁的合作社打算用做买卖的利益吸引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参加合作社并不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他们依然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305 页。

是独立的生产者，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多种服务，农民的利益始终得到有效的保证。而集体农庄完全是另一种组织。在集体农庄里农民同土地、生产资料脱离，同劳动产品脱离。在苏联，集体农庄首先是一个保证国家能从农庄取得所需农产品的“连环保”组织，国家通过农庄取得工业、城市和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集体农庄也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组织。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员长期没有身份证，是无权自由迁移的。这种农业组织生产效率非常低，是苏联的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之所在。

斯大林的理论设想也在起作用。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阶级甚至没有阶级的社会，这就需要消灭富农，富裕农民以至全体农民，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简明教程》教给人们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抓阶级斗争。这里以最明确的语言表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是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教程把这叫做“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然而，这种原理在列宁的著作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按照这种原理，党内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问题上的分歧被上纲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起初用行政压制手段来解决，后来就上升为监禁、流放以至肉体消灭。按照此原理，凡是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统统被当成“富农”，扫地出门，流放他乡。按照此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以至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领域，统统难以幸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遭到严重的摧残。可以说，各行各业都进行了大清洗、大镇压，而这一切大多是在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情况下进行的。

斯大林需要树立自己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为此目的，斯大林在 30 年代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开展了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从肉体上消灭像布哈林这样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以后，《简明教程》开始抛出斯大林本人的哲学著作。《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按照历史顺序本应介绍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内容，斯大林在这里加进了不属于历史问题的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独一节，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对这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著作，《斯大林传略》吹捧为“继续发展了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真正顶峰”。<sup>①</sup> 这样斯大林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后最伟大的哲学家。

《简明教程》只写到30年代末，就时间段而言，还不足以覆盖斯大林模式的全部，所以作为《简明教程》的补充，在苏联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学中还列入了《斯大林传略》。此书于1939年出第一版，是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而出的，1947年出修订第二版，以庆祝斯大林70岁寿辰。两版都由斯大林本人修改定稿。被作为《简明教程》补充的是第二版，它提供了关于战前时期，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以及战后头几年的情况和评价。此书的总印数超过1300万册。这是各级学校的学生，各系统和党校、团校的学员以及许许多多的干部培训和进修班的学员们必读的教材。

《斯大林传略》强调卫国战争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最后胜利的，斯大林是历次战役的指挥者，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在卫国战争那一章中谈到斯大林的军事学说的部分，斯大林本人作了如下修改和补充：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原理，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作战技术配合动作，至于现代战争中大量坦克与飞机的作用，至于最强大的兵种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充分顾及局势特点的正确解决办法。

“斯大林的军事艺术既表现在防御上，也表现在进攻上。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军队的积极防御总是同准备反攻相配合的，进攻总是同坚强的防御相配合的，斯大林同志巧妙地规定并运用了新的机动战术，即在几个地段同时突破敌军阵线，使敌人不能集中后备力量实行集中打击；在几个地段上相继突破敌军阵线，使敌人失去调动军队的时间和力量；突破敌军侧翼，绕到敌军后方，包围并消灭敌方大兵团。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洞察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破之。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军队，显示了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sup>②</sup>

---

①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164, 165.

②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231—232.

对于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误，这里自然是只字不提的。

最后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或者像我们党内所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sup>①</sup> 这是斯大林亲手修改的一段话。

当然，斯大林模式的内容不限于此，但最重要的内容已经有了。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有人说，《简明教程》最后一次印刷是在1953年。此后多年没有重印过。只在1997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重印过一次，当时没有任何反响。2004年莫斯科“逻各斯”出版社重印出版了此书，是第302次印刷。从网上搜索，对这次重印也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反响。<sup>②</sup>

某些书籍重印或再版，在俄国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是过去的禁书，有的是学术名著，已成为罕见的珍本书，社会上有需要，出版商就会设法再版。1992年我在莫斯科就看到重印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有意思的是封面上印有“Памятник века”的字样。Памятник一词用得很有意思，可做纪念碑解，也可做墓碑、文物解，这样就成为“世纪的纪念碑”或“世纪的墓碑”，或“世纪的文物”。不管怎么样，经过将近半个世纪，斯大林的著作已经不易见到了，印出来让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本“经典著作”，看看里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东西，总是一件好事。至于读者是反对还是赞同，悉听尊便。对重印《简明教程》其实也应当如是观，研究斯大林时期，研究斯大林本人，研究苏共历史，都需要读一读这本书。

重印的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个“内容简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重印版（1945版），附有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学术评述，对《简明教程》编写的历史、内容、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作了批判性分析。阅读对象为祖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大众媒体和宣传工作者来说本书也颇有意思。”

有人说，这是作为高校历史教学参考书（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发行的。该书

---

①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240.

② 这里的说法也不一定准确，我手头有一本《简明教程》，是1954年重印的，可见斯大林逝世后此书还重印过，2004年出版的未必是第302次印刷，尤其是此前“作家”出版社于1997年还重印过。

的新版发行引起一些注意，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用来暂时填补俄国历史教科书缺乏的现象的：“直到2004年俄罗斯教育部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暂且作为教学参考书面向高校发行。”不过，本书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为“1517册”，不要说作为教学参考书，就是作为一般著作，印数也太少了。而作为教学参考书，就是印行1万册也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从“内容简介”和区区印数也不难看出，重印《简明教程》的对象不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

重印的《简明教程》附有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写的评述，这篇篇幅相当长的评述并没有赞扬这本书，而只是介绍本书的背景材料。这从文章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圣经”；谈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的新经典作家；《简明教程》是怎样撰写的；斯大林——《简明教程》的主要作者；《简明教程》的宣传；斯大林去世之后。麦德维杰夫写道：“在新的党史教科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直接伪造和明显虚假的论断。但在多数场合是借助于所谓‘隐而不言’的手法来歪曲历史的。对不合心意的人物甚至对理解历史非常重要的事件统统被从教科书的文本中删去。”他用一句话总结《简明教程》的历史作用：“实际上，从《简明教程》出版和1937—1938年实施大规模恐怖之时起，可以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党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党，可以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形成了。”

对这样一本书，在俄国可以说早就有了定论，在那里，如果一本书被称为《简明教程》，那肯定不是什么正面的评价。例如不久前俄国就有人说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是新版的《简明教程》，这绝非赞美之词。

其实重印这本书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是一本“名著”，已经多年不再版，在俄国已经成为“珍本书”，很难找到。<sup>①</sup>因此再版此书，就像再版其他历史名著一样，不足为怪。其次，这是作为“参考书”出版的。教学参考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各种各类图书，正面的、反面的图书，都可以列入这个范畴，供有关人士参阅。第三，当今的俄国没有一个学校会把《简明教程》当成课堂的教科书使用，何况此书只写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国当局现在需要弘扬爱国主

---

<sup>①</sup> 我手头的俄文本《简明教程》是1954年版的，这就是说斯大林逝世后此书仍继续重印。估计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停止重印的。

义以振奋民族的信心，实现强国的方针，如宣扬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而不是要斯大林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更不是要回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上去。普京在《世纪之交的俄国》一文中写道：“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sup>①</sup> 普京如此云云并不意味着主张退回去，回到苏联去。我们不妨听听俄国总理最新的说法。2009年8月3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前夕，普京在波兰报纸《选择》（Выборча）发表文章，其中谈到西方有人在整个历史中人为地选取某些片段，片面看待欧洲战前的形势，而不顾其前因后果的联系。接着普京语带讽刺地说：“人们不由地要问，这种神话的制造者离难忘的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有多远，这本书抹去不合‘各族人民领袖’心意的名字或事件，把对以往事件所作的意识形态化的千篇一律的说法强加于人。”看来普京对这本“名著”并不含敬意！

总的说来，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与诉求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不是一回事。国家领导人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强调历史中的某一方面，而隐去某一方面，搞所谓“古为今用”、“历史为政治服务”，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样有时就不免同政治家的要求矛盾。在目前的俄国，人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在当今的俄国，定一书于一尊，用《简明教程》的重印本，或用一本类似《简明教程》这样的书来统一历史学界甚至全国的认识，已经不再可能。

苏联的解体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破产。斯大林模式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过，可以有不同的退出的方式。以苏联的崩溃作为退出的方式，代价太大了，同斯大林模式一起丢失的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清理和摒弃通过《简明教程》传入的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但是，我们在摒弃斯大林模式的时候，坚持并发展了社会主义。

---

<sup>①</sup> 《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 26. 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郑异凡

布哈林，苏联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是列宁时期最年轻的领导人，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喜欢的人物”。<sup>①</sup> 布哈林对捍卫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理论家，列宁之后在苏联无出其右者。

### 经济学家布哈林

布哈林全名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906年下半年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革命形势恶化，正是在这时候布哈林毅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入党后布哈林开始在莫斯科河南岸区担任宣传鼓动员。

1907年秋，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学专业，利用大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190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增补布哈林为委员，次年，被选入新的莫斯科委员会。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区担任组织员、宣传鼓动员。1910年底莫斯科组织遭破坏，布哈林被捕，在狱中被关押了几个月，然后行政流放奥涅加，不久从那里逃脱。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1911年10月来到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布哈林后来总结流亡生活时认为有三大收获：一是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图书馆，从而积累了“学术资本”；二是认识了列宁，受到他的巨大影响；三是掌握了多种外语，获得了丰富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

1912年秋，布哈林在克拉科夫会见了列宁，列宁建议他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此后布哈林一方面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

1912年冬至1913年，布哈林移居维也纳。在这里他一边在维也纳大学听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柏姆·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同时写文章批判他们的观点。他写了《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批判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柏姆·巴维克的观点。他是最早批判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为之起草演说、报告等等。

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收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哈林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林茨被警察当做奸细逮捕，获释后被押送到瑞士边境。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洛桑逗留期间，他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及洛桑图书馆里的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考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1915年7月，布哈林取道法国和英国，辗转来到瑞典，同以后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青年派”建立联系。当局因布哈林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把他当做“炸桥”、“扔炸弹”的“列宁的间谍”逮捕，驱逐到挪威。在挪威，他参加“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不久，他转移到丹麦。1916年10月，秘密赴美国，在那里参加了《新世界》的编辑工作。

这一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5到1916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书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国际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卡特尔，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殖民地争夺与分割世界的斗争等等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布哈林这本书



的科学意义在于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涉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晚于布哈林，显然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对它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前途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长文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多篇短文。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粗暴歪曲，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批判社会爱国主义，他在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同时，也要“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有误解，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实际上，炸毁国家是恩格斯的用语。分歧存在的时间很短，到1917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

一战期间布哈林同列宁的真正分歧是在最高纲领和民族问题上。当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已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直接提上日程，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布哈林在自传中说，“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而这时候列宁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 “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获悉革命的消息后，布哈林立即取道日本回国，当选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布哈林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问题上的动摇，是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布哈林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到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曾专门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布哈林本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会上有不同意见。列宁希望布哈林从事经济工作，他说：经济会议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斯塔索娃认为，经济会议是极端需要布哈林的，但《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对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同《真理报》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反正也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sup>①</sup>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他主持下的《真理报》比较生动活泼，可以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担任政府工作的，这使他能较为集中地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在各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权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以后，苏俄开始同德国和谈。鉴于苏俄经济破坏、士兵厌战、军队瓦解，列宁主张尽快同德国达成协议，缔结哪怕是屈辱的和约。当时持极端激进观点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同德国媾和。他认为拯救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特别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俄国必须用革命战争的烈火点燃西欧的革命。其实，在指望国际革命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知道，为了保存俄国这个国际革命的基地，必须用空间去换取时间，赢得喘息时机，以便积聚实力，东山再起。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的言行，使苏维埃政权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等也持“左”的观点，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更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勾结，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布哈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

---

<sup>①</sup>（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页。

明，承认错误，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 ABC》，一本是《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列宁认为，《共产主义 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本书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知识的入门书。《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此书表明，布哈林是最早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为此书写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此书的“出色质量”，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缺点。这两本书都写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过渡时期经济学》可以说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

1920 年苏俄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却越搞越厉害，达到其顶点。也正是在此时期，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到处爆发农民暴动。1921 年春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其顶点。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俄共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也了解当时局势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的政策，承担起阐述、发挥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任务。

他和全党一起作了“冷静的自我批评”，“幼年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破灭，建立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幻想的破灭。他开始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情的新认识，表明布哈林真正抛弃了“左”的激进立场。

1922 年列宁卧病期间曾同布哈林有过多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来布哈林写进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布哈林转达说，列宁认为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

尽管历史上有过争论和分歧，列宁始终给予布哈林以极高的评价。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之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对党内的6名领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给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极高的估计，说布哈林（还有皮达可夫）是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不过，列宁对所指出的缺点做了很大的保留，他随即补充说，这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此“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sup>①</sup> 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是列宁根据自己同布哈林的接触交往得出的看法，并非对布哈林的盖棺论定。1926年布哈林在一次未公布的讲话中说，他完全记取了列宁的批评，并彻底摆脱了托洛茨基式的“高谈阔论”。<sup>②</sup> 历史证明，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表现，完全证明他记取了列宁的意见，学好了辩证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最好的一个。这使他在临刑前写给妻子的信中敢说，他在狱中所著的《哲学短篇集》，“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sup>③</sup>

## 捍卫和发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20世纪20年代是布哈林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年代。

布哈林在1924—1927年同托洛茨基派、1928—1929年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写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等文章。

布哈林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政策，是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340页。

<sup>②</sup> （苏）《政治教育》1989年第8期，第72页。

<sup>③</sup> （俄）《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扩大商品流转，通过市场关系加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同时也通过市场关系和竞争逐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存在小生产，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搞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关系。而既然存在市场关系，就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服务，制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

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布哈林依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而在过渡时期它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向计划调节过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消耗规律将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根据劳动消耗规律，布哈林要求经济领导注意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动的平衡，工农业之间要实现平衡发展，工业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要实现平衡发展。因此，他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片面地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做法。

布哈林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既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当做殖民地来剥削，也反对斯大林的“贡税”论。他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可以也应该取自农村，但不是用剥夺的办法，而是用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农村富裕了，就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号召农民发家致富。

布哈林认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列宁所说的合作社，它是农民易于接受，乐于参加的组织，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引导农民从生产上组织起来。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他反对斯大林无视个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搞强迫集体化的做法。

布哈林为过渡时期设想了一条和平、渐进的有机发展的道路。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后，国内战争即为国内和平（公民和平）所代替，新社会开始有机地进化发展，即长入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无须再搞第二次革命，对城乡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逐步排挤以至消灭。布哈林设想的这条道路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提法是截然对立的。

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派争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开始同斯大林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反对把征粮的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不顾后备资源的条件，超高速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反对要农民交纳“贡税”的理论，反对中断新经济政策的企图。

由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逐渐形成了多数，布哈林以及观点与他相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被打成“右倾集团”，或称“布哈林集团”，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29年4月中央全会撤消了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联共四月全会的决定。11月联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就参加了领导工作，是历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包括《共产国际纲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之后，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直接参与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被撤职是联共党内的分歧造成的。联共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扩大到共产国际，株连了一大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 冤案与平反

布哈林被排斥出领导圈之后，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对苏联的最高决策已没有多大的影响。在1930年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起初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后，该局划归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制订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布哈林出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成员和负责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一个委员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际一些，这也许有布哈林的作用。

1934年1月联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

言，他的发言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2月21日，他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

1934年8月，布哈林出席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就苏联的诗歌问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早在1925年，布哈林主持起草了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主张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自由竞争，无产阶级作家不能靠垄断，而要用作品去争取领导权。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布哈林坚持他在2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政策，反对强制性的指令，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和在创造性的探索方面开展广泛的竞争。报告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

1935年2月苏联成立宪法委员会，起草新的宪法。布哈林是委员之一，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律部分。

1936年2月底至4月下旬，布哈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奉命赴巴黎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事宜。但由于对方要价太高，而斯大林又坚持压价，不舍得花钱，谈判没有成功。

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遭暗杀，这是基洛夫在党内和国内威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在国内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镇压。1936年8月举行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的审判。8月15日各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束基洛夫谋杀案的审判和惩办有关人员的通报。8月22日《真理报》发表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对布哈林等人进行审查。没有查到什么东西，9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称：“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证据，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

这一年8月初布哈林已到南方帕米尔度假，所以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返回莫斯科后，他就再没有去《消息报》上班。他的境况越来越糟。12月2日公布的宪法委员会名单中已没有他的名字。

布哈林的第一任妻子是娜捷施达·卢金娜，是在革命前结的婚，后来长期卧病，于20年代初离婚，但一直同布哈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在布哈林受审查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党证退给了斯大林，并在给他的信中声明，鉴于对布哈林指控的性质，她认为还是留在党外为好。她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被捕时服毒自杀未遂，没能逃脱被枪毙的厄运。第二任妻子是经济学家艾斯菲尔·古尔维奇，生有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由于她的要求离婚。布哈林被捕

后，她和女儿也未能幸免，先后被捕流放。1934年初，布哈林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结婚，并于1936年5月生了个儿子尤里。结婚时布哈林46岁，拉林娜只有20岁。这个年龄差距使布哈林身后有一个为他平反奔波的人。

对布哈林的迫害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中。

1936年12月初，布哈林参加中央全会。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托派和右派反苏组织》的报告，力图证明“右派”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地下组织”，领导这一组织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sup>①</sup>他还指责布哈林参与组织暗杀基洛夫的阴谋。面对这种诽谤，布哈林要他“住嘴”，并对斯大林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的言辞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在历史上的功绩。会后布哈林曾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否定对自己的诽谤，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2月15日《真理报》发表不署名文章《右派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回顾1925年以来的反布哈林的斗争。1937年1月17日《消息报》主编正式易人。

联共中央于1937年2月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会议，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2月16日，布哈林开始绝食。他的绝食成了新的反党罪行，被列入全会议程。于是布哈林决定边绝食，边出席全会。在赴全会前夕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著名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让她熟记在心头。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向无产阶级的斧钺低头，无产阶级的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在恶魔的机器前我感到无能为力。契卡的优良传统已逐渐成为过去。而现在叫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契卡原来的威望，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为追求奖章和荣誉，干尽最卑鄙的勾当，而他们不懂得，它们同时也在消灭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鄙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

<sup>①</sup>（苏）《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



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这个机关也会立即找到证据。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这无辜的脑袋还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组织。

我从18岁入党，我毕生的目标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载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解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定把我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我请求新的、年轻的、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sup>①</sup>

在全会上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

为了最终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措施。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布哈林等人被直接从全会投进监狱。

在短短一年的铁窗生活里，布哈林写了三本著作。

一本是《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早在20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专著，已经开了一个头，但事情太多，一直没有时间继续下去。30年代初，他开始收集资料，包括法西斯文化的资料，为写作作准备，终于在狱中的

---

<sup>①</sup>（苏）《旗帜》杂志1988年第12期。

“空闲”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第二本是《哲学短篇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断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保管好此书的手稿，说“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其他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在这本著作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像样的哲学著作问世，如果把本书同不久后大吹大擂地推出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下，不难看到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

布哈林在狱中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时代》，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可惜没有能够写完，只写到20世纪初。这部小说继承了俄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展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

三部著作以及一些诗篇的手稿没有交给布哈林的妻子，而是被锁进斯大林的保险箱。它们的唯一读者大概只有斯大林一人，半个多世纪后经多方搜寻才得见天日，这时候苏联已经不复存在！

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判。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的闹剧，一切都事先安排好，公开审判仅仅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举。在法庭上布哈林尽管做了某些抗争和申辩，否定了某些强加于他的罪名，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这件案子本身，他抽象地承认了所有加之于他的罪名，因此，他也无法逃避他早就做好思想准备的死亡的结局。正如布哈林在其遗言中所说的，面对“恶魔的机器”，他无能为力。“这台机器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因而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胆大妄为”。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布哈林等“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案犯死刑。15日，布哈林在托木斯克被处决。

无产阶级培养和造就一个自己的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当之无愧的领袖颇需时日，然而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物，只在顷刻之间！布哈林之死是无产阶级的悲剧，是社会主义的悲剧。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把熟记心头的布哈林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写下来，并于1961年交给苏共中央。为给布哈林平反，拉林娜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和苏共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主

席团提出申诉，一些老党员也曾提出给布哈林平反的要求，但都没有结果。

在 1986 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求为布哈林平反。1988 年，布哈林获正式平反！顺便说一句，中国学者早在 80 年代初就从政治上、理论上为布哈林翻了案。

历史的法庭是公正的，“历史的过滤器”清除了加在布哈林头上的污秽！

## 27. 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郑异凡

托洛茨基其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十月革命后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曾被当做俄国革命的领袖介绍给中国，那时候，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并提的。托洛茨基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对我国进步的文艺界有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案头就有他的《文学和革命》。后来由于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失败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浪潮中举行了三次大公审，每次都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直接等同于反革命了。中国有一批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这些人成了中国的托派分子。那时康生给他们加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罪名，中国的托派成了“日本特务”。这样一来，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托派就统统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旦发生分歧和争论，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方为“托派”。苏联是托洛茨基的故乡，那里对托洛茨基批得最厉害，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甚至必须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 20 年代起，苏联批托洛茨基的专著多如牛毛，然而有多少经得起岁月考验，站得住脚，就难说了。

托洛茨基到底何许人也？他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他的真正错误又何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批判的文章越多，人们越糊涂。

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仅仅用“反革命托派头子”、“托洛茨基主义创始人”、“列宁主义的死敌”、“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这样的帽子来概括的。托洛茨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根据实际材料，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出较为客观的较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要认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更不能不去研究这个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死敌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以及他当年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 早年的革命活动：“列宁的棍子”

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的一个富农家庭。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按照苏共的习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组织的年份即算作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入党的年份是1896年，即他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时候。只是后来为了表明托洛茨基不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才把他的入党时间改写为1917年，即从他与“区联派”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时算起。

在工人同盟活动了两年，1898年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4年。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结果弄假成真，以后反而以此名著称。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撰稿。列宁对这个年轻人评价甚高，不久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1903年3月2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编辑部“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说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和作报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时事述评专栏来说，托洛茨基不但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sup>①</sup>这个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没有通过，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没有表决权。同年7—8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初他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列宁的棍子”。不久会上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托洛茨基属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33—334页。

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 1905 年革命前后的托洛茨基

1905 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于 2 月回到俄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他的小册子《1 月 9 日以前》，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彼得堡的苏维埃在 1905 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2 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很快也被捕了。他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6 年 9 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 年 2 月在流放途中逃脱。4 月他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 年起他定居维也纳，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从 1912 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是受到欢迎的。

1905 年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对比，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则是错误的。

1912 年 1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由于在这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实际上，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还有托洛茨基，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

“(布)”的字样，那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领兵作战，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14年，20世纪人类第一个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待战争，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他是1915年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是会议总宣言的起草者。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流亡的革命者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维也纳移居苏黎世、巴黎，最后被法国驱逐出境，1916年11月经西班牙赴纽约。在纽约他在俄国侨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新世界报》的工作，使该报转向国际主义立场。托洛茨基认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同列宁回国前所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是吻合的。后到的布哈林曾与他同事于该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有共同语言——都主张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十月武装起义的实际组织者

1917年获悉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托洛茨基立即动身回国。但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4月初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被英国当局逮捕，直到4月底才获释返俄，到彼得格勒已经是5月了。由于1905年的声望，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加入了在大战期间就存在的国际派组织“区联派”。在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区联派”的统一。这是统一合并，而不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严格讲，托洛茨基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是通过两派合并成为其成员的。由于在7月事变后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所以他没能参加党的六大，是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的。9月初获释出狱，立即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是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标志。

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首先，列宁主张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受到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立即提上日程。其次，列宁主张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不支持的立场，而加米

涅夫和斯大林等却在《真理报》上宣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到了9月份，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危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准备武装起义。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也得不到支持，逼得列宁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然而，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列宁却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来就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对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给予了大力支持。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承认，“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sup>①</sup> 1917年10月25日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文告宣布：“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sup>②</sup> 由此不难看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中的分量。

至于说当时存在一个“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这是一个既不合逻辑又不符合史实的机构。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怎么能从政治上领导起义呢？据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在20世纪30年代初揭露，此政治局是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加进去的，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24年倒填日期“组建”起来的！在十月革命期间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局”。<sup>③</sup>

## “不战不和”真相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摆在他

---

① 《真理报》1918年11月6—9日。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页。

③ 见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权如何实现“和平”的承诺。在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列宁决定同德国单独谈判，谋求和平。12月托洛茨基接替越飞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拖住德国以待其国内革命的发展。对这个方针起初列宁是支持的。

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一个革命政权，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要让全世界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的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他估计，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然而，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一直流行一种说法，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托洛茨基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列宁说，“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sup>①</sup> 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其次，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其实，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1918年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提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这是列宁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得到通过。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当时有19人与会，有表决权的是15人。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对8票被否决。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他在1918年1月19日的中央会议上说：“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在2月23日的会议上又说：“可以不签订（和约），但开始和谈。”<sup>②</sup>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页。

<sup>②</sup>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78、212页。

处于少数。

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这就是世界革命，都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问题是各派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不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就不同，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无论是主和的列宁，主战的布哈林，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是志同道合者。

### 国内战争中的功勋

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托继任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这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游击作风，保证了红军的胜利。可以说，在3年战争中，哪个战场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高尔基在《列宁》一书的初版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sup>①</sup> 建立一支正规红军，反对“游击作风”，使用旧俄军事专家，是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他的主张遭到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的抵制，而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顺便说一下，有些人称托洛茨基为“红军总司令”，事实并非如此，总司令另有其人，托

---

<sup>①</sup> 高尔基著：《列宁》。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洛茨基担任的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受他的领导。

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解决迫切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是政治局的前身。1919年12月，中央决定设立政治局，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 工会问题争论

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当时机车损坏，燃料缺乏，劳动纪律涣散，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采取军事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他于11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工会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工会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个新课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因此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sup>①</sup>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再后来，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干什么了。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党的十大的决议中也没有予以否定，那里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决议指出：“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2页。

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sup>①</sup>

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工会的提法。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出现了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成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列宁的提法是：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在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布哈林出来打圆场，搞“缓冲”和“折中”，说“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俄共的文献看，确实两种职能、两种提法都是存在的。工会的国家化被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当时的工会还有一种功能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被忽视了，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梁赞诺夫曾提出，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不是用罢工的方法。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提法，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sup>②</sup>但是，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纲领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一派的注意。我们看到，随着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发展，随着个人独裁的加剧，列宁所指出的工会的这一保护任务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点是当时还感觉不到的，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样，保护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就成了具有同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在夺得政权时所没有想到的。可惜的是，列宁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论点在苏联的实践中，在工会理论著作中都没有引起重视。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7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372—373页。

工会问题的争论在党内引发了大量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纲领。最后，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种派别林立，就某一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的现象，严重妨碍了日常工作，妨碍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而派别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党的统一。有鉴于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决议中的第7条规定，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条当时没有公布，这是考虑到这是一项临时措施，希望备而不用。然而这一条规定后来却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一根大棒，大量中央委员以至政治局委员，稍有不同意见，就在“派别活动”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其实，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废除任命制，实行各级干部的选举制，定期报告工作制，等等。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对党的决定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 新经济政策和工业化方针

1919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其成果是1920年2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托洛茨基指出，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1）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计所得税）。（2）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缴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不难看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是，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托洛茨基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否决。

国内战争末期，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粮食征收制。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行动表达了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广大群众对“一党专政”的不满，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暴动虽然被红军镇压下去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又旧事重提了。党的十大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

很多人认为，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曾经被看成是代表党的观点的文件。1922年11月14日列宁在《致北美俄国侨民》中写道：“凡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sup>①</sup> 11月2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去信说：“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某些提法恰到好处，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sup>②</sup> 列宁的这两段评语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 列宁委托的辩护人

从1921年底起，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年3—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这以后由于列宁健康欠佳，不能经常视事，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错误。首先是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斯大林对持异议的某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建议，但心中并不服气，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是官僚主义泛滥，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担负反对官僚主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34页。

义的工农检察院工作不力，有负使命。

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病中的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sup>①</sup>同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sup>②</sup>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sup>③</sup>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相反地，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并最后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sup>④</sup>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

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反对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党的十二大上，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年3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这就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3—33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4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势力，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掌握党政领导权。

1923年4月，托洛茨基在为俄共十二大准备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专门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由于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他同时警告，由于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要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sup>①</sup>得到十二大批准的这个报告提纲为今后苏联的计划经济提供了论证。

### “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的争论

1923年秋，俄共围绕“新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新方针”的争论是以托洛茨基的系列文章《新方针》得名的。这场争论存在权力争夺成分，但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论，那么可以说它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苏俄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放得比较开，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要在全党实行“工人民主制”，取消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实行的“战斗命令制”。十大还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禁止派别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够防止派别活动，但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扼杀党内民主。问题就在于在实践上很难区别不同意见与派别活动的界限。尽管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取消任命制，然而在实践上任命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忧虑。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政治局的多数派改变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

---

<sup>①</sup>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501页。



是最后一次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展开的争论。

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指责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抗议国家安全机关插手党内事务，同时指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恶化，经济缺乏领导，混乱来自上头。接着，46名党的著名活动家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认为党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党内关系方面领导不当，要求“改变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

由此引发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的反击，展开全党争论。

争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sup>①</sup>。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由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警告“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被看成是实行“新方针”的开始。

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他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指出“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才能消除派别活动的危险。1924年1月，托洛茨基把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

不过，正是在实行“新方针”之后，党内争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一方打棍子、戴帽子，《真理报》不断刊载各地会议通过的声讨决议。给托洛茨基戴的最大一顶帽子就是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

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变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给反对派戴上“背离列宁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之类的帽子。1924年1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客观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

在列宁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显然是违背列宁

---

<sup>①</sup> 其基本内容见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5—362页。

的意愿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担心的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间的冲突会带来的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不希望他们两人之间闹摩擦和冲突，而希望两人能合作共事，因此主张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然而，列宁的这些嘱咐未能防止这类悲剧的出现，竟然在列宁最后时日掀起了冲突的第一个高潮。

争论是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是要争取党内民主，大家都说需要民主，然而却以不民主的办法结束，这就是列宁以后的党内生活的可悲局面。

列宁对这场争论持什么态度？那时列宁在哥尔克养病，已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但从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1月7日至12月，列宁不断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中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报纸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sup>①</sup>列宁对会议的关注，特别是它的“激动不安”，是值得注意的。也许可以说，列宁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最后死亡，是同党内斗争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的。

列宁去世后不久，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sup>②</sup>这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的简短总结！

1924年9月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三驾马车”的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犯有错误。这是直接向“三驾马车”发出的挑战。

如果从俄国革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在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提出了十月革命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十月的教训》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托洛

<sup>①</sup>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738页。

<sup>②</sup> 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茨基对俄国革命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以一贯严谨的作风，有根有据地摆事实，谈理论。对他所作的评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伪造歪曲。此文以及他后来写就的《俄国革命史》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十月的教训》加上回忆列宁的《论列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当时叫“书面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是现实问题，是权力问题。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出手了，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扮演了温和的折中角色，反对“割除”的流血政策。结果以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了结。这正是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结果。他先是以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的军职，不久除去伏龙芝，安排亲信伏罗希洛夫掌握军权。被削去军权的托洛茨基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 托季联盟与托洛茨基的失败

在1925年这一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参加这一派的甚至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个内部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派别，只有两点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一个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另一个就是反对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托洛茨基暂时按兵不动。直到1926年初托洛茨基才下决心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这就是有名的“托季联盟”。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联盟，促成他们从相互攻击到握手言和，主要有两点——理论上季诺维也夫等不同意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同斯大林的合作，深知不能与此人共事。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这样，托洛茨基同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结成了为时已晚的联盟——“托季联盟”。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羽翼丰满，在组织上严密地控制了党的各级组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由于长期互相攻击，互揭老底而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就具体政策而言，则“托季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都显得过左和极端。它们要求高速度工业化，要求打击以至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和城市的耐普

曼。他们把布哈林看成是“右派”，而把斯大林看成是“中派”。因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把斯大林看做是可以争取的盟友。这样他们的斗争方向就完全错了。

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争论归争论，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内在一致的东西。1929年在联共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曾列举了对他布哈林的六项指责：（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只靠富农；（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手下的卡冈诺维奇则回答说，“对你来说这张清单是正确的”。布哈林当即指出，这几项指责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十五大的政纲。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对布哈林的指责是相同的。从后来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以及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尽管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从根本上说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以致后来有人说，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同季诺维也夫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联合得太晚了。如果在列宁逝世后他们立即联合起来，执行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上提出的建议，借助列宁的权威，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也许会大大改观。而自纪念列宁吸收了25万新党员之后，党的成分大大改变，各级机关已安插上大量斯大林的人，整个组织系统完全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这个党已开始听命于斯大林一人。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机关”取代党本身已经成为事实。

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1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托洛茨基从这里继续领导反对派的活动。1929年1月被驱逐出国。那时候还没有对反对派开杀戒，主要的惩罚是驱逐出境，这使托洛茨基得以保全性命，甚至随身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出境。

### 流亡期间的活动

从1929年初起，托洛茨基开始了最后一次长期流亡生活。他先后流亡土耳

其（1929—1933年），法国（1933—1935年），挪威（1935—1936年）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1940年）。

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从事著述工作。从1929年到1940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记叙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解剖苏联社会和联共的《被背叛的革命》，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因遇害而未最后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其次，进行组织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留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然后逐渐扩大到国外的托派，最后成立第四国际。

在这两项工作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历史著作和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托洛茨基本人是俄国许多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又拥有大量在苏联严格保密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他的历史著作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而他关于苏联现实问题的著作，由于他是过来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对苏联的现实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分析苏联问题的著作具有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度。他在1936年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对苏联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至今对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仍然有参考价值。他的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尽管笔下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仍然不失为一本材料相当丰富，内容基本可信的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加上他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和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不能简单地以“反苏”、“反共”来概括，并且应当说，托洛茨基从来不反共，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也没有放弃，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理解。

他对共产国际的否定有他的道理。列宁逝世之后共产国际推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把共产国际变成联共（布）的一个支部，变成单纯的保卫苏联的工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瞎指挥，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凡此等等，越演越烈。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批评是对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共产国际早期的“世界革命”方针，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方针还在列宁生前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第四国际把各国的极左分子组织在一起，脱离时

代，脱离群众，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鼓吹世界革命，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施，他们的组织始终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织。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不成功的。

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是对斯大林的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逃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 “不断革命论”和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使托洛茨基在理论思想领域出名的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其基本主张是：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孤立无援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为实现托洛茨基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环境，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体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托洛茨基的设想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时候列宁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在8个月之后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无产阶级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确实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革命上。

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并没有被看成异端邪说。

1924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1924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并不存在分歧，分歧是从斯大林修改自己先前的观点引起的。在此之前，斯大林本人也是认为苏联单独一国，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次，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的谈到“共同胜利”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因此不可能像斯大林所说的，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下，在第二国际存在一个共同胜利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斯大林对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论断的引证也是牵强附会的。列宁那里所说的仅仅是一国可以首先开始革命，夺取政权，而没有涉及“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为论证自己的新说法，斯大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删除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语句。<sup>①</sup>

1929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把“不断革命”论发挥成3点：（1）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的。（2）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同和平改革相互交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不断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结束。民族革命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第一条是托洛茨基既有的观点，第二条并非他原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涵。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倒不如像布哈林所说的，应当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长入”的过程。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客观形势就显示出，指望世界革

---

<sup>①</sup> 参见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若干问题》、《恩格斯“同时胜利论”质疑》，载郑异凡著：《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318页。

命拯救俄国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需要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它就不会灭亡。在20世纪，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一切有关预言落空。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他也是世界革命论者，但当他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的时候，立即把希望转向东方，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仍有可取之处。他看到了各国和各地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存在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闭关自守的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仅需要欧洲几个最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在此之前还必须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利用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中写道：

“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行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sup>①</sup>

## 托洛茨基的经济主张和斯大林的实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托洛茨基始终坚持计划经济、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在20世纪20年代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鼓吹者，经

<sup>①</sup> 《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22—23页。



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然而他没有看到，计划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也难以制定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的经济计划。把计划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是一个理论和认识的误区。在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要使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市场，不能脱离市场。

工业化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物质条件来说，工业化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以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的任务是在东方落后国家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的补课任务。托洛茨基是苏联工业化的倡导者，主张高速度发展工业，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20年代，托洛茨基主张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8%—20%，被斯大林斥之为“超工业化”，但时过不久，斯大林又指责这个速度为“投降主义哲学”。<sup>①</sup>因为这时候，斯大林规定的工业增长率大大超过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超超工业化”了！

苏联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工业化采取了不顾苏联的国情，盲目的高速度的工业化，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并且其成果仅仅是国家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全面工业化，农业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严重的抑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尽管托洛茨基可以说，这是一面扭曲变形的镜子，也许由他来实施情况会好一些，但未必会有大的改观。

至于农业集体化，这同列宁当年所说的合作社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全盘集体化。这实际上也是大体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但是，看看斯大林集体化的后果就可以大致估计出等待着托洛茨基的集体化的是什么东西了。问题在于，在落后的苏联，在20年代几乎不存在富农阶级，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5页。

因为通过国内战争时期贫农民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已经不再存在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所谓富农，多半是些善于经营的、基本上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中农，甚至贫农。这些人的生产经营对当时城乡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20年代末，没有任何理由去消灭他们。列宁提倡的合作社同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里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人，他们的地位是独立的。而从苏联的实践看，集体农庄仅仅是一种为保证政府得到它所需要的粮食的连环保组织，农民在这里除了双手以外基本上一无所有。农民，现在叫农庄庄员，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没有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甚至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不能随意到城市去打工。政府也不保障他们的温饱，对许多集体农庄政府只管收粮，庄员只能靠一小块宅旁园地养活一家。至于集体化过程中大批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被划成富农流放，农民们大量杀猪宰羊，造成农村牲口的大量减少，那就不必说了。其直接结果是连续两年的大饥荒，其远期后果是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直至50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可以说，集体化消灭的不是“富农”，而是几乎全体农民。从斯大林的集体化实践，也不难看到托洛茨基主张的集体化的后果。自然，也许会有所不同，例如少一些强制和暴力，但总的情况或者方向，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集体农庄这个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不是一种能够解决农业问题的组织。

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为数不多的几项措施。可以说，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东西，大体上没有违背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可惜的是托洛茨基这种教条式的坚持，脱离了俄国的现实。他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一种倒退。因为到20年代，布哈林已经摆脱了左的极端主义，开始正视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他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集体化方针，反对对农民使用强制和暴力，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政策，主张让农民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号召他们“发财”。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保持农轻重的合理比例，反对不顾国情的高速度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托洛茨基完全看错了人，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斯大林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其始作俑者乃托洛茨基！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给斯大林提供了反对布哈林的现成思想武器！

30年代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写的论文和专著，对苏联现实的剖析，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露，是对“苏联学”的重大贡献，也许可以说他是西方后来盛行的

“苏联学”的先驱。他毕竟是从这个国家出去的，他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知道列宁的想法，清楚这个政权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从他的笔头出来的东西，不像西方作家所写的那样往往给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1936年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作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后世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通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斯大林枪下之鬼，都由官方正式恢复了名誉（只有像叶若夫那样的刽子手除外），但托洛茨基并没有获得苏联当局的正式平反，原因是他没有被正式判刑。不过，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托洛茨基是悲剧性的人物。他参加无产阶级打天下的斗争，舍生忘死，但胜利后不久就有家归不得，继续他在革命前的流亡生活。先前他是被沙皇反动政府赶出去的，后来又被无产阶级政府驱逐出境。他在国外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反对和揭露斯大林的工作，但他还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工人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尚未完全丧失。当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进攻的危险时，他号召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他坚持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主张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他的这些主张，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驱逐出国之后，斯大林马上放手搞起全盘集体化，彻底剥夺农民，实行高速工业化，其所采取的措施，所定的速度，是连托洛茨基本人当年也不敢设想的。

纵观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观点，有几条是他始终坚持的，这就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此，尽管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指责甚多，但除了世界革命，斯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有的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而对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则忧心忡忡。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显然落后于同时代的布哈林，在理论方面他把布哈林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同布哈林的争论才真正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 28.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左凤荣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斯大林独创的理论，所依据的是“血亲复仇”式的推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类似斯大林的论述，他们认为阶级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阶级的消灭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那时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便成为多余的了。暴力只能摧毁阶级的反抗，但不能消灭阶级。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工作的重心转变了，转到了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来了，苏俄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改造国家机关，另一个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苏联并不存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形势，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已经失去政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靠无产阶级的法律和专政机关，完全可以镇压破坏新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强化国家机器，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

### 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提出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争论时提出来的。其提出的论据是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不合理，农民不愿种粮和卖粮。沙赫特事件，则是人为制造的所谓“反苏”事件，1928年5—7月苏联把自1923年以来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

生产事故集中处理，造成这些事故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是正常的，但却都被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sup>①</sup> 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时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最后，‘出乎意料’，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sup>②</sup>

在斯大林看来，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sup>③</sup> 他夸大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把其推行全盘集体化和超速工业化造成的困难，以及党内的意见分歧均归结为阶级斗争。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严厉批判布哈林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顺便说一下，把布哈林的理论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对布哈林理论的歪曲，布哈林并不否认存在阶级斗争，也承认在过渡时期不排除在某一阶段阶级斗争还会尖锐化，但他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趋向缓和。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阶级斗争不是永无停息之日了吗？斯大林再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页；第12卷，第15页；第11卷，第5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页。

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sup>①</sup>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因与果是矛盾的。他说的“新的阶级变动”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在下降”。<sup>②</sup>按照这个逻辑，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怎么能把这种变动看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和基础呢？斯大林就是这样不合逻辑地一方面强调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被消灭，城市中的“新”资产阶级正在灭亡、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灭亡，另一方面又按他自己的臆断，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

### 斯大林对“阶级斗争尖锐化”成因的论证

在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之初，斯大林认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sup>③</sup>

1930年，正当苏联全盘集体化速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农村的“富农阶级”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6、第25—2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页。

(事实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 被用暴力消灭之时, 联共(布) 十六大召开, 斯大林在报告中再次强调: “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 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 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 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 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sup>①</sup> “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 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 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 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资本家来”。<sup>②</sup> 斯大林把农村“富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推到了“阶级敌人”的行列, 把大部分人都推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 所以他得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的政策激化了阶级斗争, 1930年1—3月, 全国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 大约有80万人参加。

1932年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工农业中成了唯一的经济体系和统治力量, 但是, 斯大林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而且还有所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 是剥削阶级消灭了, 但是斯大林又强调: “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 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各种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苏维埃分子都被打倒了。这些从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苏联各地, 就钻进我们的工厂, 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 钻进铁路运输企业, 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 钻到那里隐藏起来, 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 当然是带着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心情, 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这些先生们已经没有力量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正面进攻了……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sup>③</sup> 斯大林把瘟疫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306—30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3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 第187页。

等传染病的流行也归之于是这些“残余”在搞破坏，什么事都可以抓到阶级斗争这根弦。应该承认，有敌对情绪的、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人确实存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并没有斯大林描绘得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新制度让他们感到比军事封建主义的沙皇制度好，他们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不是让许多在十月革命年代跑到国外去的白俄也欣喜若狂，把斯大林称为民族英雄吗？对于其中的极端破坏活动，完全可以在无产阶级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镇压。而斯大林所描绘的图景却是到处都是敌人、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的残余，他们在党内、机关企业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到处都存在，那么只能得出结论：“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

斯大林根本就不提对这些人及其家属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按照他“复仇”的逻辑，这些“阶级残余”永远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如果让苏维埃政权太平无事的话，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这些“残余”。所以斯大林反对宽大的政策，他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sup>①</sup>也就是说，苏联加强专政、镇压几乎是无限期的。

更为荒谬的是，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社会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斯大林还在重申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也就是进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式，并在苏联社会掀起一场大清洗的浪潮。1937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其阶级斗争的完备的公式。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sup>②</sup>

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得找到其根源，国内既已不存在剥削阶级，阶级斗争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sup>②</sup> 《斯大林文集》，第153页。



便只能源于外部。于是，斯大林便用外国派遣特务来解释。斯大林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良好和和谐的，资本主义这些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且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吗？”<sup>①</sup> 斯大林片面地认为：“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sup>②</sup> 这些被击溃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早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他们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佣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sup>③</sup> 按照斯大林这样的逻辑，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平息。

###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危害

按照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苏共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还大抓阶级斗争，甚至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国际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他长期坚持通过扩大和加剧阶级斗争的办法治党治国，持续不断地搞大清洗。在30年代大清洗的高潮时期，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党和国家大多数优秀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红军中的许多卓越将领和指挥员，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无辜牺牲品，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

---

① 《斯大林文集》，第141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153页。

③ 《斯大林文集》，第151页。

许多人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苏联的演变与解体埋下了祸根。

关于大清洗的情况，本书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只从军队中的清洗情况，就可见斯大林大清洗的残酷与危害程度。1937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8人被判犯有“间谍和叛国罪”，被处决。他们的罪行是为德国和日本搞间谍活动，阴谋出卖苏联的乌克兰和远东的领土，以换取军事支持来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这是希特勒利用斯大林的大清洗成功地实施了“借刀杀人”的诡计。对于希特勒来说，熟悉现代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是他将来发动侵苏战争的重要障碍，为了除掉他，他们便投斯大林所好，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高级将领间的往来信件，并通过军部大楼失火，使这些文件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偷出，通过捷总统之手把文件转到了斯大林手中。

自此，军队内的大清洗便开始了。在1937—1938年大清洗期间，占总数一半以上军官被清洗，总数达35000人，其中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一、二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有221人均被害；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部被害，6名一级海军将领全部被害，15名二级海军将领有9人被害；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害，29名军政委有25人被害，97名师政委有79人被捕，36名旅政委有34人被捕，三分之一的团政委被捕。<sup>①</sup>大规模的清洗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不仅高级指挥员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已经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团长了，到1940年时，大多数师长担任这一职务不到一年。即使是一场战争，也不会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失去如此之多的指挥官。

1939年以后，苏联开始大规模扩军，更感到指挥员不足。一些在军事院校尚未毕业的学员也被补充进了军官的队伍，但是，到战争前夕，军队的指挥干部也没有配齐，陆军中缺16%的指挥干部，空军中飞行技术人员缺32.3%，海军中指挥员缺编22.4%，全军中有75%的指挥员任职才几个月，许多人连升数级，并不胜任他们所担当的工作。1939年以后释放了一些军人，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捕人，在战争爆发前夕的6月15日和16日还逮捕了空军司令员、空军总监和防空兵司令雷恰戈夫、斯穆什克维奇和施特恩。希特勒欣喜若狂地注视着苏联的情

---

<sup>①</sup>（俄）罗伊·梅德维杰夫著，高增训等译：《斯大林周围的人》，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况，1941年，他在谈到准备进攻苏联时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人才已于1937年被消灭了。这样一来那些正在成长的接班人，暂时还缺乏作战必需的智慧”。新军官们都被培养成忠于斯大林的人，但他们没有经受过考验，削弱了苏军的战斗力。什捷缅科在《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中说：“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夕，我们失去了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这对我们的军队和国家都是巨大的不幸。这使我们的年轻干部处于困难境地。他们必须在战斗过程中取得必要的经验，常常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sup>①</sup>朱可夫也说，1937—1938年的大清洗的后果是严重的。1939年苏军干部的训练情况与1936年相比，其训练水平大大地下降了。军队从团一级开始严重缺乏干部，不仅如此，由于这一清洗，军队的组织纪律涣散，军官无法整顿纪律。科涅夫认为，“如果没有1937—1938年，没有胆怯，没有不信任，没有间谍恐怖症，1941年的战争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国显然绝对不会对战争如此缺乏准备。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sup>②</sup>华西列夫斯基则认为：“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因为1941年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事干部的严重程度的评估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怎么说呢，1939年我有机会参加列宁格勒军区由霍律向梅列茨科夫办理移交的一个委员会，当时许多师长都是大尉，因为所有军衔更高的人都被捕了。”<sup>③</sup>战争前夜，苏联需要加强军队建设，需要有经验、有现代战争意识的指挥官，而苏联自己却把这些指挥官杀掉了，自己毁掉了长城。不容置疑的是，希特勒胆敢向苏联发动进攻和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到惨败，都与斯大林在军队中残酷的清洗有关。

总之，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不是列宁的理论，是斯大林自己创造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使许多无辜者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严重损害了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威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恶果。

---

<sup>①</sup>（苏）谢·马·什捷缅科著，洪科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上），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8—39页。

<sup>②</sup>（苏）康·米·西蒙诺夫著，崔松龄等译：《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335页。

<sup>③</sup>（苏）康·米·西蒙诺夫著，崔松龄等译：《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第375页。

## 29.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是什么？

左凤荣

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指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掌权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他们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民主，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建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 斯大林在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引用列宁的话论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的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sup>③</sup> 而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根本就没有斯大林所引的这段话，列宁在此说，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4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9页。列宁在1918年秋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说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取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494—495页。

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sup>①</sup>

###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由来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曼的信中第一次提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sup>②</sup>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展开这一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③</sup>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1891年，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说：“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④</sup>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的组织形式。巴黎公社发现了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新的政权形式，即它“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sup>⑤</sup> 巴黎公社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普选主要是选举立法机关，而行政官员大多是任命的状况，也改变了议会议而不决的低效率，其实质在于，政府从压迫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从被压迫者变成国家的主人，其实质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制。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91—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3—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5页。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俄国这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关键是解决好农民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和平、面包、自由”的同时，主张“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sup>①</sup>当时列宁专注于发挥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的农村只有区区的四个支部。十月革命后，列宁也一度把农民视为异己力量。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②</sup>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仅仅因为战争，更主要的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存在着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空想。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认识到：“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而“俄国的情况则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sup>③</sup>俄共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向农民作出了让步。与此同时，列宁强调实行工人民主制。

在列宁的思想里，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是不同的。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只能是这样，不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打破资产阶级的法律，无产阶级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法律”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因为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事情常常是这样：无产阶级先占领了银行，随后中央委员会才通过决议，宣布银行国有化。同时，列宁也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1920年3月，列宁对铁路工人们说：“以前的革命之所以失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2、15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35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44—445页。

败，就是因为工人不能保持牢固的专政，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sup>①</sup>可见，民主与专政是两个相关的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职能、民主的职能将是主要的职能。

在政治体制上，苏俄采用的是集立法和行政为一体的苏维埃制，苏维埃代表应该是普选产生的，但由于俄国居民文化水平低和战争环境，人民的自治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监督日益被党的管理和监督所取代，列宁的理论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认识到苏维埃政权虽然在法律上消除了劳动者参加管理的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sup>②</sup>这个“先进阶层”就是俄共（布）。尽管如此，列宁特别强调在政策上照顾农民的切身利益，工人阶级要与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充分估计到苏俄存在两大阶级这一重要的社会现实，说：“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由于认识上产生了这一飞跃，所以列宁才说：“在实践中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sup>③</sup>同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正式提出“新经济政策”并给予论证。“1918年初，……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4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44、45页。

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敌人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共产党人）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sup>①</sup>同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展开地论述了“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条件和政策的内涵。<sup>②</sup>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苏俄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初露端倪，纵观整个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是思想最为活跃，民主气氛最浓的时期。1921年夏天报刊上就提出了法制国家的思想，12月底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sup>③</sup>列宁提出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减它的职能与权限的必要性。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它只保留了镇压公开反革命发动、同间谍活动和走私活动作斗争等职能，不再享有定罪权，所有案件都交由法院处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迟应在两周内对被捕者提起诉讼，并且最迟不得超过两个月或将其释放或将案件移交法院。随后还通过了其他旨在加强法制的法律，如劳动土地使用法、刑法典、个人基本财产权利法，该法案赋予所有公民建立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权利。但是，在列宁去世后，苏联社会朝着民主法制发展的进程被中断了。

## 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谈无产阶级专政时，斯大林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谈专政的民主内容。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574、575、576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59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53页。



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在答复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师生的提问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sup>①</sup> 这里，斯大林仍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真正民主国家的思想，斯大林却只字不提。在无产阶级已经稳固了政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斯大林还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的法律限制，显然是错误的。普通人不能如此无法无天地行事，只有最高领导人才有这种可能，所以，其实质只能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这成为他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根源。

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把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常常只归结为专政的职能，而把专政只归结为暴力，并把暴力看做是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上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整个国家政权；狭义是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暴力镇压职能。而斯大林常常把两者等同起来，混淆起来。1927年9月，斯大林同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只归结为它的暴力镇压职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

斯大林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职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他最喜欢用的字眼是“彻底消灭”，不仅消灭现存的敌人与残余，也消灭“潜在”的对手与敌人。1934年7月，斯大林在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威尔斯谈到在西方宣传共产主义的暴力行动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暴动的调子已经陈腐了。斯大林则不同意，他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绝不会投降，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做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您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sup>①</sup>

无产阶级专政本应该只存在于过渡时期，但斯大林把它永久化了。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仍强调保留具有专政与镇压职能的国家。1950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答阿·霍洛波夫时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消亡问题（其真正的含义是指国家的暴力镇压职能的消亡），对于苏联不适用“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所说的并不是不要国家，而是不要具有镇压职能的国家，列宁把这个国家称为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特殊的‘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sup>③</sup>。斯大林要通过加强国家专政机关的做法达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的，只能是南辕北辙。

斯大林讳言民主，除了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外，他基本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他认为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民主就是一种拥护党的决定的自由，而这种民主就是同意、赞成总书记斯大林的立场、观点、方法，否则就是反对列宁，反对党。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色，对于这些无产阶级政权的创建者来说，他们对本阶级、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他们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上与斯大林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托洛茨基强调加强苏联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布哈林强调国民经济的

① 《斯大林文集》，第19、21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582—583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92页。

平衡发展等等，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危害

在实践中，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片面强调专政，忽视了国家的民主体制建设。在斯大林的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了领袖个人的专政，斯大林把党和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把自己当成党和国家的化身，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对领袖个人的崇拜。斯大林在苏联建设问题上听不得不同意见，致使许多缺点和错误难以得到纠正。

二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尊重。社会主义应该实行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民主，斯大林也制定了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1936年的宪法，规定用平等的选举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代替记名的选举。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苏联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得逮捕。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遗憾的是这些权利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根本没有落实。各级干部、苏维埃代表都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的，选举基本流于形式。由于公民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导致国家政权机关与民众相脱离，失去民众的监督与制约，难以真正为民众谋利益。

三是一味强调专政，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破坏法制、滥杀无辜的大清洗。大清洗成为斯大林体制的常态，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到斯大林逝世前夕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到底制造了多少冤魂，至今都统计不清楚。这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

四是严重伤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使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斯大林不是把农民当成同盟者，而是当成“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把农民变成了革命对象，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把农民完全纳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体系之中。剥夺农民的僵硬的集体农庄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1950年苏联的谷物（注意，是谷物，而不是粮食）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则为7250

万吨，同期苏联肉类年产降为 490 万吨，而沙俄时期为 500 万吨；人均谷物由 540 公斤降为 447 公斤，畜产品由 31 公斤降为 27 公斤。<sup>①</sup> 实践证明，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否定和离开与农民的联盟，视农民为“异己”阶级，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农业的低效率和落后，制约了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品的不足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影响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总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有人说苏联的悲剧在于斯大林没有把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是有道理的。

---

<sup>①</sup> 周荣坤、郭传玲主编：《苏联基本统计数字资料手册》，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 30. 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高 放

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1898年，这一年3月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各地方组织也大多被取缔。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逃到西欧后，只好重新筹备建党。1903年7月17日（公历30日），党的二大在布鲁塞尔举行，后来又转到伦敦续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即以1903年7月30日作为党的誕生日。1917年该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1918年改名俄共（布），1925年又改名联共（布），1952年才改名苏共。苏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经验，更有教训。

### 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苏共执政74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这个曾经领导人民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强大的共产党，却于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广大苏联人民抛弃。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起，就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理论课，其内容就是讲苏联共产党党史。当时是把苏共的历史经验作为马列主义基础来学习和传播。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这门课程才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其中苏共党史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从这时起我们已经开始具体分析苏共历史经验的是非功过。改革开放以来，我

还为研究班学员开设过“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专题课，更进一步评论苏共长期僵化、封闭的错误。对苏共党史，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从一往情深、盲目崇拜到具体分析、着重借鉴的长达60年的进程。苏共的败亡不能不令我揪心伤痛，扼腕叹息，痛定思痛，掩卷沉思。当今探究苏共败亡的教训，不是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20世纪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无一不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只有真正吸取苏共兴亡的经验教训，才能使各国共产党兴利除弊，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使我们恪尽兴党之责，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共产党势必迟早衰落，甚至败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早晚都要应验。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苏共从列宁建党时就是一个个人专制政党，它在富有君主专制传统的沙皇俄国可以改朝换代式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结果只能重新建立专制政党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流亡西方的苏联学者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早在1973年就著有《党治制的由来》一书，在联邦德国以俄文出版，经晨曦等译为中文于1982年3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改为《苏共野史》。全书中心内容是：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从1903年形成时起就面临着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专制党”<sup>①</sup>的争论。列宁起初处于少数地位，由于“他巧妙地运用迂回出击和分化瓦解战术，好一来打击和分化敌人的力量，二来让敌人互相倾轧。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sup>②</sup>，终于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领袖，而使孟什维克（少数派）陷于孤立。列宁进而于1917年4月“在中央委员会发动政变”，击败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保守势力，掌握了领导权，又吸收了托洛茨基派，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党治制的国家，即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政治体制。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沿袭党治制，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左”倾反对派以及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反对派之后，便开始了“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时代，变友为敌，大量枪毙、囚禁老布尔什维克，终于使中央委员会灭亡了，建立了斯大林的个人专制独裁。阿夫托

---

<sup>①</sup>（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等译：《苏共野史》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sup>②</sup>（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等译：《苏共野史》上卷，第55页。

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曾经被西方视为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论著之一，在苏共灭亡、苏联解体之后，此书更为吃香，被认为是揭露党治制国家并预见专制政党必亡的力作。西方和苏联理论界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时也有人同阿夫托尔汉诺夫持同一论调，甚至走得更远，更加极端。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苏共从列宁时期起就是专制政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共产党的始祖马克思，专制是马克思建党的“原罪”。其实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只要列举最简要的事实就可以澄清是非，辨明真相。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8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一切都按照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sup>①</sup>后来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sup>②</sup>到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18—1920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0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7页。

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不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从1917—1923年，这6年在列宁领导下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各司其职；在各级党委民主决策中坚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监督。不幸列宁于1924年才54岁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后面将详加说明），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粗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

当今在总结苏共败亡这个重大课题时，在我国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国内又有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不可能充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党内派别林立，并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才把苏共搞垮了。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宁领导的那6年，更是多半处于内战外战交融的腥风血雨中，更是与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依然能够依靠党内民主克敌制胜。斯大林实行的是过度集权于领袖个人的政治体制。过度集权与高度集权，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高度集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过度集权则是根本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物极必反，正是斯大林带头实行的过度集权的体制长期难改，才导致戈尔巴乔夫后期社会局势失控，各种派别、政党丛生，迫使苏共下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决策固然有重大错误，然而其源头首先缘于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造成长期制度性缺失，从而失去了自我改革的主动动力。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吧。



##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如何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执政长达约30年之久。斯大林是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建筑师。他领导国家工业化事业大有成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并且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进而帮助欧亚12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组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还使苏联成为唯一可以与超级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可以说，斯大林是苏联历任最高执政者中取得最大政绩的领袖、国务活动家。但也正是在他任期内苏共由民主政党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这是他的重大过错。盖棺论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然而不可轻视其过，因为这是决定苏共生死存亡的致命大过。这里没有必要细说苏共蜕变的过程，只从以下6个方面扼要分述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第一，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从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在1936年前后的大清洗中进一步破坏法治，用逼供信、诱骗供的手段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杀人犯”予以处决，连1929年已经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亲自指挥苏联情报机关派人于1940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杀掉。昔日亲密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友凡敢于与斯大林持不同政见者无不成为阶下囚和枪下鬼。斯大林对党、政、军、共青团、工会、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对他的思想观点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甚至以“人民公敌”定罪。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起草的有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共同签名的统计报告，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3770380人，其中死刑642984人，25年以下劳改与监禁2369220人，流放和驱逐出境765180人。<sup>①</sup>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sup>②</sup>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反而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

<sup>①</sup> 据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1月23日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发生，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岂不是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了吗？岂不是人治取代了法治了吗？苏联在1918年、1924年制定过两部宪法，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又通过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宪法。可是实际上有宪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缺少宪政。一个民主政党，党中央内部在决策中见仁见智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凡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经过民主讨论表决，拒不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者，顶多开除党籍。可是斯大林却网罗罪名，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加以消灭。其结果只能把党变成一言堂、一人专政。

第二，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下遵守党章，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斯大林于1927年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召开一次，1934年党的十七大又改为每隔3年召开一次，1952年党的十九大再改为每隔4年召开一次（到1971年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即便不断修改党章，把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3年、4年召开一次，依然不断违背党章。至于党代表会议本来也是实行年会制，它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召开，其权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甚至相隔时间更长，如1941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还有中央全会相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党章规定来看，1922年定为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会并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1934年就改为每4个月召开一次全会，而提供书面报告则从1925年就改为模糊的说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党的各级组织”。到1952年，中央全会又改为每6个月召开一次。实际上中央全会经常延期召开。例如1940年7月之后相隔3年半之久才于1944年1月召开；1947年2月之后，相隔5年半之久才于1952年8月召开。更为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自从清除了反对派之后越来越变成“一言堂”，越来越变成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歌功颂德的会议。

第三，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被破坏，这表明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3年、5年之久才召开一次，这表明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党章规定，政治局本来是与组织局、

书记处并行、并列、并重的党中央3个常设机构之一。可是斯大林时常撇开组织局，实际上由政治局包揽、包办一切，把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sup>①</sup>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如果在政治局内部还实行集体领导、每人一票平等表决，那还算是寡头专断。可是斯大林违背党章，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5人小组。早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作报告。”<sup>②</sup>后来在党章中从未规定政治局的人数和会期。从1925年十五大至1939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员一直是9—10人。1952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称主席团，委员增至25人，享有最高权力。沿用了33年之久的政治局为什么要改称主席团呢？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的赫鲁晓夫一语道破真相。他说：这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sup>③</sup>即是说从今以后公开废弃早已名存实亡的组织局，使党中央主席团成为名实相副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不论是政治局或主席团，都极少开会。实际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几个人，向他们宣布重要决策，要他们分头去办理。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了真情。他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sup>④</sup>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两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6页。

③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62页。

④ 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在一言堂中不可能有自由讨论与民主表决。无怪乎赫鲁晓夫“非常讨厌”“这些冗长、令人头痛的晚餐”。<sup>①</sup>显然，在政治局和主席团中，斯大林经常是实行个人集权、总书记独断。

第四，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使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没有机构能对之实行监督。1920年建立的中监委，本来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列、并重、同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一个中央监督机关，其任务和职责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的《监察委员会》决议的规定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sup>②</sup>的谣言和流言飞语现象作斗争。监委要“使对党员的罪行和过失提出的一切控诉和申诉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解决”。<sup>③</sup>1923年1月23日列宁在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中特别强调中监委要加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察，他主张为了使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他明确地说：“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sup>④</sup>可是列宁此文交给《真理报》发表时，竟被作为总书记办事机构的《真理报》编辑部删去了文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即“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sup>⑤</sup>列宁本意是要中监委加强对“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监督，斯大林竟敢当列宁还在世时就对其不利于自己的文稿进行删节。可想而知，一旦列

---

① 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32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

④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82—783页。

⑤ （俄）布拉诺夫著，张志强等译：《被篡改的列宁遗嘱》，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宁逝世，他就更是胆大妄为了。果不其然，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监督监委。本来列宁是要中监委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以监督其工作。然而1924年5月（列宁刚过世4个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竟倒转过来，决定“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sup>①</sup>第二步是1934年2月召开党的十七大，进而决定取消中监委，改变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sup>②</sup>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第三步是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监委改为设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监委成员。第四步是在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干脆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即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党中央决议的执行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样，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变了。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制还拥有了一个监督全党和地方贯彻执行其个人意志的机构。这样，党中央委员只由总书记个人对之实行监督，总书记则无人能对之实行监督了。

第五，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之后，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本来在列宁领导执政时期，列宁只以党的政治局委员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担任（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充任。可见当党、政、军三大权是分归3个人掌管，在政治局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犹如三驾马车，由3位能人各自驾辕，虽有龃龉，尚能协调，力求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到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年5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年苏联废除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同时他从20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37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年代末起就别具匠心，逐步独自掌管国家安全部门（从“格别乌”到“克格勃”），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实则把它用作严密监控党政军民思想、剪除异己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即因在给他兄弟的私人通信中表示对斯大林的某些做法不满，信件遭到安全部门检查而获罪被捕下狱的。斯大林在独占鳌头、独揽大权之后，还要独领风骚，一枝独秀。为此他还顺水推舟，推波助澜，在文化思想界大兴个人崇拜之风。在电影、文学作品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论著中数量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地大力歌颂斯大林。党内、国内盛行吹捧领袖之风，谁颂扬得多、颂扬得高，谁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个人崇拜以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每当他的名字在公共集会上或党的会议上被提及时，人们立刻就会猛一下地站起来，然后再坐下。”<sup>①</sup> 曾有人带着揶揄的口吻说：“这是我们大家都参加过的一种体育活动。”<sup>②</sup> 看来斯大林是用文化部门的“个人崇拜”和安全部门的“个人忠诚”这一文一武两手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根本维护并巩固其个人集权制的。

第六，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期制，这样就给领导人可以不断连选连任留下法定的广阔空间。斯大林自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当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宁要调离他这一要职的第一次权力危机。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留任。他进而清除了党内的各种反对派，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转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同时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造成重大损失。这引起党内不少人对他的领导心怀不满。于是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权力危机。表现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少得270多票，列当选中央委员名单末位，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却以差3票就满票的高得票率居于首位。只因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斯大林才得以当选。与会代表1225人，可见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他当中央委员，更遑论当总书记了。如果如实公布票数，一定会使斯大林的权力危机加深。于是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

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26页。

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26页。

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在大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3票。<sup>①</sup>如此维护了斯大林的威信，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上当选总书记。渡过第二次权力危机之后，他立即狠心通过大清洗彻底消灭威胁他权力的所有的人，到1941年5月又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政府首脑大权攫取到手。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后，他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集中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军、工、团的活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后又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他的威望登峰造极，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更没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所以从未明确对人谈过他的接班人问题。但是1952年10月举行党的十九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1924年党的十三大起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后来他嫌马林科夫过于软弱，尚未确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测风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中风猝死，享年73岁。他担任总书记31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12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的三点根本区别（民主共和制是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制、权力限任制与权力选举制）。

斯大林实行的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破坏了共产党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苏联的苏维埃民主。党权高于民权，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以及以党代政制、一党专政制、高干特权制、监控干群制等，在苏联代代相传，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例如在斯大林后期50年代初干群工资差别约50倍，到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后期进而扩大到100多倍。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体制长期无法进行体制内改革，到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涌现了众多政治派别和政党，纷纷要求民主化，个人专制或者寡头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等还推广到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也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

<sup>①</sup>（苏）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人民民主。其后果是严重的，切不可等闲视之。到1989至1991年间苏联东欧10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垮台，这固然有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上层与下层、群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种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难以解脱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体制性根源。

##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

苏共为何会形成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为何会由民主政党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呢？这也是有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切不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以下扼要阐述笔者的见解。

第一，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如前所述，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列宁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建设上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这样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这里仅举二例为证。1921年党的十大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的新观念，可惜列宁未加以论述，也未写进党章，党章中依然以“民主（的）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这样即使后来斯大林实际上实行的是个人集中制，然而他也都在被延期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得到认可，并且一再连选连任。因此，人们依然可以说他没有违背“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留下的含糊的“民主（的）集中制”的遗产，很容易被扭曲变形。实际上在斯大林领导执政时期苏共已经在“民主（的）集中制”掩盖下完全变成一个个人集中制、个人集权制政党。1922年4月5日俄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设3个书记，总书记只是书记处首脑的职称，意即秘书长，并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职称。俄共中央从未设主席一职，列宁以其崇高威信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可是俄共党章从未规定总书记的职称、职责、职权和任期。这样就为后来斯大林越位越权，搞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提供了方便。苏共直到1966年二十三大才在新党章中写上一句话：“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sup>①</sup>现在看来，1922年俄共中央在设立总书记一职时没有同时设立俄共中央主席，这是很大的失误。如果同时设立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二职，明确规定党中央主席是党中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



央首脑，总书记只是党中央书记处首脑，并且选举列宁为党中央主席、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那么在列宁逝世后就要另选一人为党中央主席。如果在党章中明文规定设立总书记一职是为了实现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得兼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职务，那么斯大林后来就无法以总书记名义独揽党、政、军三大权。笔者这样论析是从总结历史经验而言，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落后国家如何探索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新路，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

第二，沙俄君主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苏共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更深远的原因。俄国自149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不断对内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对外极力实现军事扩张。1547年伊凡三世之孙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自比古罗马大独裁者恺撒（“沙”即恺撒的变音）。沙皇专制制度集俄国专制独裁之大全，前后历经23个沙皇，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长达420年之久。俄国于1861年从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之后，现代资本主义才发展较为迅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长期依附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所以俄国深厚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和大俄罗斯主义对外军事扩张传统对俄国广大民众、包括很多共产党员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使他们缺少民主共和意识与实践经验，也缺少民族平等意识与实际熏陶，容易接受个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名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实为实现大俄罗斯主义对外军事扩张的过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民族政治文化遗传基因、民族负面政治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经济结构，更是苏联形成并且长期延续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沙皇俄国尽管已经发展了一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1913年现代工业约占国民经济42%），然而依然给苏维埃俄国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苏联共产党长期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没有认识到应该首先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虽然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但是斯大林于1929年就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又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从1928年10月起苏联通过执行3个“五年计划”，

自认为已经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确立的并非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构建的、带有半自然经济色彩的统制经济。这种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缺少竞争的统制经济，不但使苏联经济缺少活力，农业长期上不来，而且正好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把商品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害怕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张力势必动摇、冲垮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第四，斯大林执政时期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沙皇专制制度的俄罗斯帝国是以其强大军事、官僚机器作为政治基础的，以地主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以及沙皇专制政府培植的官僚特权阶层作为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摧毁了旧的军事官僚机器，以人民大众掌权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政治基础，消灭了地主贵族阶级、城乡资产阶级和旧的官僚特权阶层，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工农联盟和各民族人民联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采取两个办法、确立两种制度以保证官员是社会公仆而不会变为社会主人（老爷），即实行官员选举与罢免制、官员与熟练工人同等工资制（官员之间、工人之间工资差别只有5倍），这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质的两项重要保证。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列宁非常重视贯彻实行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宝贵历史经验。可是后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这两大原则。选举限于苏维埃代表、党代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但是苏联采取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选举人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候选人的产生还要由上级党委严加控制，这种选举徒具投票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任命，导致最高苏维埃和党代表大会都变成“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苏联没有发扬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优秀民主传统，却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官僚层层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的封建主义衣钵。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任命制、等级授职制，于是逐步形成了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它成为个人专制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而且党政军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的差别由20年代的几倍扩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

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住房、汽车、物品供应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就越多。总之，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不用官僚阶级或官僚阶层，因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生产密切联系的一个独立阶级，也不是从属于工农阶级的一个阶层，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民主与自由不足而特殊造就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政治体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权。后来苏联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和最终灭亡的结局，证明了正是这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苏联进行行政经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掘墓人。连苏联采用秘密警察制来监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是沿袭沙皇专制制度的体制。1826年7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建立第三厅，任命宪兵司令兼任厅长，下设总档案馆、秘密档案室等机构，全国分7个宪兵管辖区，严密调查、监控各级官员和谋反异己分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苏俄建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是为了对付现行反革命分子。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又经过3次改组，1954年从内务部独立出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这个隶属于政府的专门对敌斗争的秘密特工机构，后来愈益庞大，变为凌驾于党、政之上，由斯大林个人掌握的调查、监控广大干群的极权统治机构。斯大林实际上是党、政、军、特四大权一把抓，使极权主义达到极致。

第五，苏联共产党特别营造的由党严密控制的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基于旧俄国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着意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这些人否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一切文明成果，认为在“特殊的人工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主张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充分发挥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对他们要采取耐心谨慎的态度；对艺术创作部门不能作“繁琐的管束”，要允许他们有相对的自主权，使其“保持自治”。列宁强调要把文化工作同军事政治工作加以区别，他特别告诫共产党员：“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sup>①</sup>可是到30年代，随着在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左”的路线，文化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84页。

领域也越来越“左”。主要表现为党的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加以严密控制，直接行政干预过多，对各种不同风格和学派乱贴阶级标签，乱扣政治帽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等到处滥用，对被批判者采取各种行政和法律惩罚、惩治措施，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在繁荣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直接包办文化的权力急剧膨胀。连苏联历史教科书也要由斯大林等领导人来拟定提纲，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是非也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作结论。这样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就进一步发展为以党代文的文化体制。结果是营造出了党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须按照党领导人的观点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颂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其核心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党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显然是为维护个人专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奠定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六，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达15年之久，富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之家，在东正教教会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中学没有毕业，学历不高，在地下斗争中曾经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自学勤奋，思维敏捷，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观察问题尖锐深刻，口头与文字表述都简洁明快，意志坚强（“斯大林”一词俄文含义是钢），办事



1894年时的斯大林。（新华社稿）

果断；然而思想有一些毛病，表现为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思想认识狭隘固执，思想意识功利重于情义，思想感情偏激急躁，思想作风孤傲粗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实践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十多年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

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疾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与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世办事。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他才从流放所拘留了4年之久获释。这时他对时局的认识跟不上列宁的思想，还认为应该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受到列宁开导后很快转变，在同年7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此后终身连任），10月又被选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7—1922年）。1919年3月刚建立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他即当选为五名政治局委员和五名组织局委员之一，显示出他兼有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双重才能（最初身兼政治局与组织局两局委员者仅有斯大林一人，列宁只是政治局委员）。1919—1922年他还在政府中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到1922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书记处设总书记一职时，他进而当选首任总书记。可是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宁感到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以致列宁对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感到“没有把握”。为此列宁要求调离他的总书记职务。<sup>①</sup>可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接受批评意见，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反而权力欲更加膨胀，进而逐步掌握了党、政、军的全部最高权力。他个人的权力得到巩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就后，他就更加孤芳自赏，自以为是，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当代唯一正确的总代表，自认为是可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伟大天才。他表面上自谦，很少采用单独的斯大林主义的新提法，却颇为欣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或马、恩、列、斯主义的并列式提法。<sup>②</sup>实际上斯大林是比不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就连与斯大林共事长达近40年、一向紧跟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到晚年如实地说：“至于谈到列宁和斯大林，我要说：前者是天才，后者是人才。”<sup>③</sup> 仅从斯大林背离马克思、恩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45—746页。

② 见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年第3期，收入《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1页。

③ （苏）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格斯和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把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这一点来看，他的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贻害无穷，给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后来造成了重大灾难。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胁从促成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难以再现列宁式的天才，却不断连续冒出斯大林式的人才，代代相传，难以从根本上把专制政党改革为民主政党。这是苏联历史的悲剧。后来几任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终导致改革方向有错误，这固然对苏共的灭亡要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但是其根源在于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盘根错节，涉及众多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进而发展人民民主，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失望，于是社会上要求体制外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世界民主化浪潮汹涌的态势下，如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势必就要转向资本主义民主。结果到1989—1992年间终于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专制型的共产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下台了，甚至全军覆没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鉴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响亮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sup>①</sup>这是我们党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决心重新振兴的重要崭新论断。可以说，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即是因为缺失党内民主而丧命灭亡的。然而党内民主并非空泛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和举措。只要细心考察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后来怎样被破坏殆尽，就不难领悟到应该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又向前去发展并完善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50页。

## 31. 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 条约与协定？

杨 闯

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必须联系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在 30 年代中后期的国际处境，并考察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苏联在二战前夕外交政策的反复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 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秘密协定评价不一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定，实际上是在斯大林亲临现场的情况下，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署的。对此长期以来就存在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焦点：一是，1939 年苏德条约究竟有没有秘密瓜分欧洲的议定书？二是，这一条约和秘密协定究竟是避免“祸水东引”的外交成功之作，还是斯大林对德政策发生转变的败笔，并因此对德国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对前一争论的焦点，虽然苏联长期断然加以否认，但由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在 1994 年访问波兰与瓦文萨会见时，将秘密档案文件转交给波方，已经作出了回答。对于后一个焦点问题的争论迄今依然存在。2009 年 9 月 1 日，在波兰格但斯克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70 周年纪念活动时，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警告世人不要忘记战争教训，“我们要牢记谁发动了战争，谁是战争罪人，谁是刽子手，谁是受害者。忘记这些将使波兰、欧洲甚至整个世界

重新陷入战争阴影”。<sup>①</sup>他说这话不仅是针对入侵波兰的德国，也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而普京回答说：“今天我们向烈士致敬，并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希望1939年的悲剧不要重演……可悲的是众多错误决定导致了历史悲剧，我们应该了解悲剧为何发生，但是了解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向前看”。随着普京这些话，俄罗斯对波兰加以反击，公布了一批针对波兰的解密档案。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中将列夫·索茨科夫说：“引发二战爆发的责任，波兰也有份……全部责任不可能由波兰来承担，但波兰政府在1939年否决了建立反希特勒同盟”。<sup>②</sup>

国内学术界对苏德条约与秘密协定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看法，认为它“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政策的彻底破产”。<sup>③</sup>有的学者认为，在苏联战火逼近而同英法结盟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这是“出于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带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苏联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消除了一直担心的祸水东引的忧虑，把祸水推回西方，暂时置身于德国与英法等国的战事之外，何尝不是外交上的有限成功”<sup>④</sup>。以上都是传统的看法。另有学者则持两点论的看法，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应该说是苏联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在英法两国缺乏与苏联合作诚意的情况下签订的，有其合理性，为苏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要看到，法国早已同德国签订了类似的互不侵犯条约，就连波兰也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苏联与德国签订的‘秘密议定书’却丧失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遵守的原则，走向正义的反面。斯大林在与希特勒接近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sup>⑤</sup>这一看法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

## 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毫无疑问，由于苏联的社会体制，斯大林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和苏联处于侵略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论断，对于20世纪30年代

---

① 波兰纪念二战爆发70年，网易新闻中心，news.163.com/09/0902/07/516ISVVG000120GU.html。

② wap.sohu.com/news/world/?nid=170&rid...fullRead=true&uID.

③ 吉润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斯大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④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⑤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的苏联对外政策起着重大作用。他的思想从30年代初认为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是苏联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到30年代中期揭露纳粹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政策，再到30年代后期肯定德国纳粹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敌人的分化。与此相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苏联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4次转变，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集体安全政策，再到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附加了秘密协定。

苏联30年代外交政策的第一次调整，是在1928年至1933年。这次调整应以世界经济危机作为标志。1928年7—9月由共产国际六大批准的共产国际战略，是斯大林直接领导制定的，很能反映苏联当时的政策。这次会议与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同步，斯大林开始清算布哈林，而布哈林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斯大林在这次会上一反布哈林的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现已达到具有这样特点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在法西斯化；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在增长；革命运动在高涨。斯大林强调，由于日益深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革命的震荡，国际关系紧张到了新的临界点，因此，应该提出以下的策略：（1）拒绝同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2）反对在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影响，脱离现有的工会组织，建立新的革命工会。（3）清理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切动摇分子。共产国际六大否定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稳定、寻求工人运动统一的政策，通过了斯大林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工人阶级主要敌人，将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作为苏联敌对国的政策。这次大会之后，在共产国际内部俨然形成了这样的政策，谁无条件支持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实际上变成了要求无限忠于苏联、无限忠于联共（布）及其领袖的政策。在1929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局第五次会议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批判进一步升级，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的区别仅是在策略和方法上。斯大林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十六大上的报告中还认为，德国纳粹党是反对英、法的，是最具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性质的政党；但到了1933年底，斯大林就提出，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德国的新生力量，“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因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矛

盾的发展”。<sup>①</sup>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加剧了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在斯大林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矛盾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依据以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为国家安全利益和巩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借着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愿意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通过双边谈判，同一系列欧洲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1月21日，苏联同芬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2月到7月，苏联又先后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签署了这样的条约。11月，又同法国埃里欧政府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法国考虑到苏德未来可能的接近，在该条约中除了互不侵犯的条款外，还规定，两国承担义务，在遭到任何第三国侵略时，任何一方都保持中立。而德国在保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边界现状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同苏联的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

苏联30年代对外政策的第二次调整，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背景下，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两个战争策源地，苏联和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调整对外政策。由于国际关系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在面对战胜国与战败国矛盾加剧、苏联东、西两面出现了战争策源地的复杂情况下，苏联对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即“由反对和防止英法美策划反苏新武装干涉，维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转变为争取联合英法美等非侵略国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制止新战争，维护世界和平”。<sup>②</sup>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是苏联不变的外交策略。因此，苏联一方面要揭露德、日、意的侵略政策和战争行为，一方面又要保持与德、日的和解关系。这显然不利于苏联试图建立有利于苏联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总政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我们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933年12月29日联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苏联近期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就可以看出来。他说，在任何冲突中苏联不主动进攻并遵守中立；只要不被看成是软弱好欺，苏联对德国和日本应保持和解的政策。这相当程度上是由当时苏联

---

<sup>①</sup>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 фр. 2 - е изд. М., 1994. С. 277—278.

<sup>②</sup>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第361页。

国内正遭遇可怕饥荒、农民不断反抗，国内形势不稳定决定的。

面对纳粹上台、德国侵略性面目的显露，联共（布）内部对德国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布哈林将德国看成是对苏联的主要威胁。他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阐述的法西斯思想应提高警惕。但斯大林与布哈林看法不同。他更加看重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策略，认为，苏联没有理由因为希特勒上台而改变同德国的关系。苏联应坚持扩大苏德两国的经济关系，利用苏联的人力资源、原料和德国先进的工业水平，加快本国的工业发展。基于这种考虑，苏联对纳粹政权对德国共产党的迫害没有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而纳粹德国也投桃报李，满足了苏联的大部分要求，批准恢复1926年柏林条约。只是到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特别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之后，苏联才被迫放弃了迁就德国的政策。即便如此，两国关系的恶化也是缓慢的，这完全是由斯大林在纳粹上台后的对德政策决定的。

1933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建立集体安全的决议，强调为了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参加国际联盟，在欧洲建立共同防御侵略协定，并同愿意维护和平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苏联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苏联采取了与美国建交和加入国联的行动。国际上，对纳粹上台后的德国，英美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英国企图“祸水东引”，美国出现了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强烈呼声。苏联抓住这一信号，作出积极反应，推动苏美建交谈判“从厨房移到客厅”。1933年的11月8日，苏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苏美建交，匈牙利（1934年2月）、罗马尼亚（6月）、捷克斯洛伐克（6月）、保加利亚（7月）、阿尔巴尼亚（9月）、哥伦比亚（1935年6月）、比利时（7月）、卢森堡（8月）也同苏联相继建交。苏美建交，表明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

在德、日于1933年3月和10月相继退出国联后，苏联由长期谴责和反对国联的立场，改变为不反对国联、利用国联的立场。1934年9月18日，苏联正式加入国联，并获得国联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当然，苏联在加入国联的同时也有所保留，反对国联对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并拒绝对国联的以往决议承担责任。

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和法国，因此苏联一直在做法国的工作。法国对德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一直保持警惕，也有与苏联

接近的要求。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法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埃里欧认为，4000万人口的法国很难单独与拥有6000万人口的工业发达的德国相抗衡，苏联是法国所需要的平衡德国的力量，法国必须与苏联结盟。1933年7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对法国作出了积极回应，声明苏联与法国没有利害冲突，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接近不存在任何障碍。接着，埃里欧应邀访问苏联，双方原则同意缔结法苏互助条约。1933年12月，法苏两国外长会谈，双方同意把反侵略的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去。

为缔结针对德国侵略扩张的欧洲安全体系，苏联进一步谋求与法国签署法苏互助条约，这是基于苏联对法德关系的基本判断。1934年5月底，法国外长巴尔杜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建议，首先，讨论“东方的洛迦诺”问题，即所有的东欧国家签署互不侵犯的多边公约，包括德国与苏联在内。第二，签署法苏互助条约。第一项建议由于首创者在1934年10月9日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被克罗地亚恐怖分子暗杀，实际没有落实。而法苏互助条约则得到了巴尔杜之后的法国外长拉瓦尔的支持。1935年5月2日《法苏互助条约》在巴黎得以签署，但拖延了9个月才在法国国会得到批准。这一条约并且没有军事议定书，因此有效性是很有局限的。拉瓦尔在1935年5月13—15日对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就这一条约军事义务提出问题，而他拒绝直接回答。因此《法苏互助条约》只具有针对德国的政治意义。同年5月16日，苏联与捷克也签订互助条约。虽然苏法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都规定了当缔约国之一受到侵略或侵略威胁时，立即进行协商、相互支援和协助的条款，但苏捷互助条约第二款稍作修改，增加了条约生效条件，即“只有当法国对被侵略的一方给予援助时，双方之间才能履行援助的义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把本国的安全更多地寄托在法国身上。

德国扩张没有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反而得到姑息纵容，进一步鼓舞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继续提出牵涉到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德国东部边界问题，其侵略性日益严重。1936年3月7日，德国以《法苏互助条约》为借口，宣布不再受《洛加诺公约》的约束，要全面恢复行使在莱茵非军事区的全部主权，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苏联谴责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政策和扩张政策。与此同时，对1935—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实行全面侵华战争，苏联都呼吁英法等国与苏联

一道制止侵略战争，对德、意、日本进行制裁，并派出志愿人员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从道义和物资上援助被侵略的国家。

苏联 30 年代对外政策的第三次调整，是在 30 年代后期《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由于英法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美国实行中立政策，苏联领导人由此对英、法、美的认识和对德国的政策都发生转折性的变化。1938 年 9 月 30 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和德国总理希特勒，在德国的慕尼黑城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它完全是大国交易的产物，是张伯伦一手操办的结果，它以肢解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为代价，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利益，迁就了德国的侵略扩张胃口，而换取的只是欧洲大国英法的暂时相安无事。绥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引来了英德、法德的接近。1938 年 10 月 30 日，英德两国签署《英德宣言》，声称英德关系对两国和欧洲具有头等意义，《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是两国和平相处的最好见证，两国决心以协商的办法解决和两国有关的一切问题。1938 年 12 月 6 日，法国和德国也签订《法德宣言》，声称法德两国间和善睦邻关系乃是巩固欧洲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大的因素之一，承认两国间现有的疆界乃是最终确定的疆界。

《慕尼黑协定》对二战前的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1）德国由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得到了捷克发达的工业区和军事技术，加强了德国的实力和战略地位，使整个东南欧处于德国的威胁下。（2）《慕尼黑协定》彻底瓦解了法国苦心经营的欧洲结盟体系。由于法国背弃自己的盟国，抛弃了和它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其威信空前下降。（3）中小国家不再相信英法的保证。英法从战略优势转变为战略守势。（4）《慕尼黑协定》加深了苏联与英法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法苏互助条约》、《捷苏互助条约》也由此失去作用，苏法同盟关系趋于瓦解。

在英、法、德接近的背景下，苏联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939 年 3 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阐述了新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方针。他认为，资本主义各国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尖锐化，国际战争形势尖锐化，战后的和约体系崩溃，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开始，只是还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大战。斯大林指出，“侵略国正在靠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公开地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非侵略国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

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sup>①</sup> 如果西方国家企图向苏联灌输希特勒占领乌克兰从而挑起同德国的冲突，那么，苏联不会被西方“火中取栗”的政策所愚弄。他指出，苏联在这种形势下的外交政策是：“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种关系，只要他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同时“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国家卷入冲突中去”。<sup>②</sup> 苏联看到英法对德国的侵略扩张公开采取“绥靖政策”，并在1939年分别同德国签订双边宣言，企图“祸水东引”之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急剧重大变化，从反对同纳粹德国签订双边条约，谋求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转变为更多考虑本国安全，同英、法和德、日都接近的政策。

苏联一方面谴责英法的“绥靖政策”，一方面对英法联苏抗德的政策调整持欢迎的立场，以积极的态度争取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为了密切苏法关系，斯大林甚至建议法国共产党在国会支持法国的军事预算案，支持法国政府的政策。共产国际从联（布）共对法国的政策开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敌视政策。但与此同时，苏联仍对英法保持着不信任和警惕性，在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指导思想下，在与英法就针对德国谈判的同时，也与德、意、日本保持密切接触。这一切固然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但也充分反映出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和两面性。

### 苏联两个谈判战场与波兰的命运

斯大林为改变外交政策，对外交人民委员换马，由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任外交人民委员。它意味着李维诺夫为之努力的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终结，苏联的外交政策由此发生根本改变，苏德开始改善双边关系。但当时苏联仍是两面下注，同时与英法和德国进行着两个方向谈判。苏联一方面同英法继续谈判，保障东欧

---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242页。

②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220页。

国家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同德国谈判苏德关系和德国进攻波兰的问题。只是在做法上，苏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英法的谈判公开进行，大造声势，希望获得成功，而实际上却毫无结果；而与德国的谈判则是秘密交易，暗中进行。

英、法、苏谈判历时4个多月，经历了3个阶段。期间围绕罗马尼亚危机、对中欧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和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问题，双方针锋相对，而没有达成妥协，反映出英法与苏联在政治上深深的不信任。

苏联同英法谈判的第一阶段是1939年3月17日到4月1日。英国向苏联提出，英法与苏联联合共同制止德国的扩张，希望苏联在罗马尼亚遭到德国侵略时给予援助。此前的1939年3月16日和17日，罗马尼亚政府向英国两次请求，要求英国在罗马尼亚可能遭到的侵略中给予援助。苏联提议召开苏、英、法、波、罗、土6国会议，共同商议集体安全。3月31日，英国宣布对波兰提供安全保证后，英国朝野联苏抗德的呼声甚高。苏联对此积极回应，提出了缔结英法苏互助条约等8项建议。但双方在给予安全保证的国家的范围方面存在分歧。苏联建议，当欧洲发生对任何缔约国的侵略时，相互给予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当发生针对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同苏联接壤国家的侵略时，英、法、苏应给上述国家以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但是，英国只关注与英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的安全，要求苏联对这些国家履行军事援助义务，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保证却回避不谈。苏联不同意这种不平等的条件。英国出于传统的外交政策，不愿过早用条约束缚自己，不愿为更多国家承担安全保证，担心英国会被卷入战争，就以这种协议“为时过早”为由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但英国退而建议，由英、法、苏、波四国发表共同宣言，宣告欧洲某一国家遭到侵略时，四国应立即讨论共同抵抗侵略而应采取的步骤。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苏联终于同意加入英法向波兰提供的《无条件保障宣言》。而这时波兰担心苏联会步西方国家后尘，签订“新的慕尼黑协定”，波兰将成为苏德关系的牺牲品，断然拒绝苏联军队过境波兰领土的前提条件。因此，英国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苏联同英法谈判的第二阶段是从1939年4月15日到7月底，这是在德国入侵波兰征兆日趋明显的情况下进行的。1939年4月17日，苏联向英法建议缔结三国军事合作协议，保障从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所有东欧国家的安全。但是双方在所要保障的国家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由于德、意缔结了同盟条约，德国与苏联

秘密接触的消息传来，英国国内的强硬派对张伯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缔结英、法、苏三国的互助条约。1939年5月27日，英法政府向苏联提出了新建议，承认三国互助原则。苏联提出反建议，将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从英国建议的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五国，增加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扩大为八国。但英、法、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的“圆桌会谈”又在“间接侵略”问题上各持己见，达不成一致。英、法、苏之间的政治谈判终于由于各自的考虑和互不信任，以无结果宣告结束。苏联同英法关于欧洲集体安全保障的政治谈判进入了死胡同。

英法苏三国的第三阶段谈判在8月12日—21日举行。这是在政治谈判达不成协议的背景下，直接进入军事合作的谈判。苏联派出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团长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参加的全权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退休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中将衔兵团司令。1939年8月5日，英法的军事代表通过海路前往莫斯科，8月11日才抵达。苏联对英法派出的代表姗姗来迟和级别太低不满，认为不对等，不可能解决苏联军队过境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的问题。在谈判中，英法代表大谈军事合作的目标和原则，不肯承担集体的军事义务。英国提出，至多提供5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在苏军通过波兰、罗马尼亚领土问题上，英法不愿承担敦促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8月21日，苏联在同英法达不成军事合作协议的情况下，宣布无限期休会。

苏联同英法的谈判为什么没有结果？从本质上说，是双方在政治上都不大信任对方。英法力图制造苏德接近的障碍，并要借助苏联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盟国罗马尼亚和波兰。而对苏联来讲，谋求的是在苏联与德国发生战争时，苏军有权过境罗马尼亚和波兰。无论是政治谈判，还是军事谈判，都看不到双方的合作诚意，苏联看到的是祸水东引的企图，从而加深了互不信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英法苏三国谈判的失败主要责任在英法两国。谈判的失败严重恶化了国际局势，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使当时唯一可能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及时建立起来。”<sup>①</sup>

苏联并没有把希望都寄托在与英法的谈判上，早在1939年4月，苏联就已

<sup>①</sup>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第380页。



采取行动，试探与德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4月17日，苏联驻德国大使梅利卡洛夫对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明确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几乎没有影响苏联同意大利的关系，它也不应该成为苏德关系的绊脚石”，“对苏联来说，不存在不和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且由此出发，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sup>①</sup>莫洛托夫在接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时强调，苏德之间应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舒伦堡也明确表示，德苏两国外交关系缓和与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到来。但是在英法苏正在进行谈判的初期，苏联仍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939年5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被授权同苏联谈判德国占领波兰的问题。1939年6月29日，苏联驻德国大使向德国外交部表态：不管两国意识形态如何分歧，苏联愿意与德国保持最好的国家关系。

德国出于发动战争的战略需要，在苏联与英法进行谈判之际，不断主动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德国不仅向苏联表达愿与苏联谈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信息，而且对未来欧洲冲突、波兰问题、波罗的海问题都对苏联大方地作出承诺：在苏联中立并置身于可能的欧洲冲突之外的条件下，德国愿意在波兰保全苏联的一切利益、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1939年8月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建议，就签订一份“划分两国利益的议定书”进行谈判。对此苏联立即表示同意，并建议谈判在莫斯科进行。德国外长表示要亲赴莫斯科。苏联提出先缔结商业和贷款协定，然后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要求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促进改进苏日关系。德国完全接受苏联的建议。

由于德国发动对波兰战争的时间在即，希特勒要求更为迫切。当德国得知苏联同英法的谈判没有结果，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8月14日向苏联提出访问莫斯科的愿望。第二天，苏联虽然表面上拒绝了德国外长马上访问莫斯科的建议，但提出了要德国明确几个细节的条件。1939年8月19日，德国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德国政府同意签署1938年底讨论过的两国贸易协定；德国向苏联提供20亿马克贷款；德国承诺要求日本停止在远东反对苏联的行动；划定德苏在东欧的“利益范围”。苏德于8月19日签订了贸易贷款协定后，苏联当晚表示，一周后接待里宾特洛甫，并提交了苏方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希特勒于第二天亲自致电斯大林，表示接受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要求苏联至迟于8月23日接待里

<sup>①</sup>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第381页。

宾特洛甫访苏。在8月21日，苏联宣布英法苏军事谈判无限期休会的同一天，苏联也复电德国，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来莫斯科。里宾特洛甫如期到访莫斯科，当晚在斯大林出席的情况下，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立即生效。当时双方还签署了贸易协定和划分欧洲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苏德贸易协定规定苏联将向德国出口粮食和煤、铅、锌等工业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在苏德互秘密议定书中，苏联承担的义务是在德国与欧洲国家的未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不再对德国持谴责的立场，两国还划分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承认苏联在巴尔干的利益；德国的势力范围的原有立陶宛，后来苏德签订边界条约将立陶宛划给苏联。波兰的命运虽然在秘密协定中被巧妙地绕过去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波兰分裂，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将按1921年的《里加条约》划给苏联，而华沙大公国和卢布林公国等波兰地区，应该在德国军事进攻波兰之后划入苏联。<sup>①</sup>这完全证明了苏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可耻勾结，苏联对此完全否认。在冷战的条件下，这一历史公案成了没有谜底的疑案。直到1989年前苏联一直否认该条约存在附加秘密议定书。但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以前所发生的苏联对周边国家采取的行动，苏德两国军队在波兰的防线，都可以证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秘密协定是客观存在的。

苏联避战于一时，同时也为德国进攻波兰扫清了两线作战的障碍。1939年9月1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签署7天之后，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 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后，在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指导下，苏联在错误道路上变本加厉地继续走下去，出现四大政治失误。

第一，牺牲了波兰的利益与主权，出兵波兰。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以帮助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名义进入波兰，按照与德国签订的苏德秘密议定

<sup>①</sup> 指1774年、1793年、1795年和1939年总计4次瓜分。——作者注。

书，占领了当时尚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共计近20万（1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200万人口（其中乌克兰人700万、白俄罗斯人300万，波兰人200万）。<sup>①</sup> 苏联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以后，“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就是根据显然是双方在8月份的谈判中已经商定的秘密地图来确定”。<sup>②</sup> 1939年9月28日，苏德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就这样，波兰在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第四次被两个强邻——德国和俄国瓜分了。苏联还秘密处决了2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森林事件”。这是波兰与俄罗斯双边关系上发生的又一幕历史悲剧。

第二，苏联对德国的政策和战争性质判断失误。1939年10月3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五届全会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自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8月23日缔结时起，苏德彼此间存在多年的不正常的关系，即告终结了。从前曾被某些欧洲列强多方烧热的恶感，已由苏德彼此的接近和友善关系的建立所替代了。这些新的良好关系之更进一步的改善，是表现于9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关于相互友好和两国界线的条约。在苏德这两个最大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中所发生的急剧转变，不能不影响到了整个国际形势。”<sup>③</sup> 莫洛托夫坦然承认，苏联对德国的政策是：巩固两国友善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在政治上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志愿。莫洛托夫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责成苏联在德国参战时保持中立，苏联是一贯实行了这个路线的，苏联军队在9月17日开始进驻旧时波兰领土，是丝毫不与此事相矛盾的。苏联在9月17日当天，就分别照会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明确宣布苏联今后对它们实行保持中立的政策。莫洛托夫的这段发言实际表明，苏联从反对英法的绥靖政策，发展为苏联从自身安全考虑，对德国也实行绥靖政策。这是历史的悲剧与讽刺。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对于德国发动对波兰的战争和德国与英法之间战争性质的判断失去了公正的立场。莫洛托夫认为，对当时进行的战争性质，已经不能用苏联过去所倡导的关于侵略的定义去判断了，“‘侵略’和‘非侵略’这样的概

---

① 转引自 *Верг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фр. — 2 — е изд. М., 1994. С. 292.

② (俄)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斯大林》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825页。

③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1957年，第12页。

念，在最近几个月以来已取得新的具体内容，已具有新的含义了……德国是处于趋向立刻结束战争并达到和平的国家地位中，而那在昨天还高喊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却主张继续战争而反对缔结和约。”<sup>①</sup>对希特勒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和“大日耳曼主义”、“种族优越论”，莫洛托夫不仅不予谴责，反而说：“希特勒主义的思想系统，也如其他任何思想系统一样，是可以加以承认或否认的——这是政治观点的问题。可是谁都懂得，思想系统是不可以用武力来消灭的，是不可以用战争来结束的。因此，进行这种以冒充拥护‘民主’为掩饰的，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名义的战争，就不仅是荒谬，而且是罪恶。”<sup>②</sup>5个月之后的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再次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继续重申苏联政府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看法，继续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辩护。他说：“德国去年即表示愿意言和，而英法政府拒不接受，结果所至，双方遂更进一步加紧准备扩大战事。”<sup>③</sup>苏联外交政策是“务必保持中立态度，慎勿参加欧洲列强间之战争”，这一政策是以苏联所缔结各条约为基础，“与苏联之利益完全符合”。<sup>④</sup>1940年8月1日在最高苏维埃第七届会议上，莫洛托夫虽然指出苏联正处于德国与美国援助的英法战争更加强烈化的前夜，但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变化，“一年以前经历了转变”的苏联忠实于和平中立政策，苏德关系“保持着苏德协定所制定的状态”，苏德协定“为苏联政府所严格遵守”，“……苏德之间的可能的摩擦已被消除了”，并“保证德国对其东方高枕无忧”。<sup>⑤</sup>莫洛托夫的逻辑是，当时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德国要打破《凡尔赛条约》的羁绊，英法是凡尔赛条约的创造者，美国是参加者。而苏德关系与凡尔赛体系没有联系，苏德关系是建立在友谊、促进苏德经济关系和“准备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志愿为基础的”。

第三，苏联力图恢复沙俄时期的历史边界，扩大东方阵线。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同周边国家广泛地签订了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约和友好互助条约。但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兰战争后，苏联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苏联不仅对德国发动的对波兰侵略战争、对法国的侵略战争都置身事外，严格履行与

①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13页。

②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15页。

③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52页。

④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64页。

⑤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145页。

德国达成的协定，保持局外中立，而且苏联对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等提出领土要求，并付诸武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联由于领土扩张，人口增加了 2300 万，在波罗的海获得不冻港。苏联虽然扩大了暂时的安全缓冲区，却付出了高昂的军事和政治代价，对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具有消极影响。

第四，苏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协定。苏联一直力图避免两线作战。这种战略意图推动着苏联与日本就双方关系进行试探和谈判。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与日本加快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当时，苏联驻日代办向国内报告：日本“各报现在开始谨慎讨论日苏缔结同样条约的可能性”。日本从柏林发回的记者报道说：“‘看来，德国在签订这项条约以后将尽力设法使日本同苏联签订同样的条约’，‘里宾特洛甫在起程赴莫斯科之前曾在这方面说服日本大使大岛’”，“在许多著名活动家的发言中都承认必然要根本修改日本的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sup>①</sup>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上述预见。1941 年 3 月 24 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阐述了日方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强调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矛盾，日本同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是同英美作战，因为蒋介石是英美的奴仆。而斯大林表示，苏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能妨碍双方的实际接近，苏联从来就不是英美的朋友，现在也不希望同它们交朋友。1941 年 4 月 7 日，松冈外相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再次提出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强烈愿望。双方对双边关系达成一致看法：苏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苏德关系互不敌视。在国际形势和日本及苏联自身都发生巨大变化<sup>②</sup>以后，应从一定的高度观察苏联与日本的关系。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同美国结盟反对日本。莫洛托夫同意，“如果日本认可，那么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的基础与苏联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样”。<sup>③</sup> 很显然，苏联的目的是试图利用谈判收回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利。但由于苏日之间对 1905 年的《普茨茅斯条约》存在根本分歧，日本坚持要苏联将库页岛卖给日本，斯大林认为日方是开玩笑。双方在库页岛的租让权和日本购买北库页岛的谈判中没有任何进展，因此无法就

---

① 苏联外交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 年 9 月—1939 年 8 月）文件和材料，第 658 页。

② 即德国同日本结盟，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者注。

③ 《世界历史》1998 年第 5 期，第 87 页。

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达成妥协。苏联转而建议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以日方承认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来而完全独立，苏联承认满洲国作为交换条件。苏日在此基础上达成妥协。就这样，在斯大林的直接参与下，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以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顾损害中国人民利益为条件<sup>①</sup>，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在不到两个星期的1941年4月25日批准生效。这是斯大林外交政策在与德国划分欧洲势力范围后的继续，即在亚洲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但只是过了两个多月，德国就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使得斯大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 外交的成功之作，还是失误？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苏德秘密协定签订之后，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39至1941年的前期，苏联对外交政策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失误。正是苏联对苏德关系和战争性质判断的失误，导致苏联对战争双方的政策出现重大失误。诚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是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中当然包括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最高统帅部的功劳。但斯大林的功绩掩盖不了他在苏德外交秘密交易中的过错。

从苏德秘密协定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外交决策有严重失误。尽管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有国际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但不能回避苏联外交政策有利己主义的考虑和背离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原则的一面，不能不指出，这是苏联外交决策的重大失误。那么，斯大林在苏联外交决策中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重大失误？笔者认为，这既有客观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有苏联领导人主观认识上错误。

从国际形势的发展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9月前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德意日轴心国的扩张态势咄咄逼人。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英法与苏联之间互不信任。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扩张势头逼人，但英法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德国一味退让，把本国的安全寄托在希特勒遵守诺言上；

---

<sup>①</sup> 当时的中国并未承认外蒙独立，更不承认日本支持下成立的伪满洲国。——作者注。

对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采取消极态度，企图“祸水东引”，对频频发生的战争危机所预示的大战到来，缺乏应有的战争准备。亚洲则是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从局部战争转向全民族的抗战。而欧亚之外的美国奉行“中立”政策。面对这样的复杂国际形势，苏联的对外政策同30年代初期和中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从谋求欧洲集体安全转向更多的是考虑本国的安全，试图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同英法和德日同时进行外交谈判。在同英法不能缔结防御德国的集体安全条约的情况下，苏联一改反对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政策，反过来分别同德、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用牺牲别国的利益求得和德日的妥协，以求得本国暂时的安全。

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主观上对德国的认识看，苏联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直至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之前，对苏德关系的判断一直过于乐观。在签订苏德秘密协定后，苏联对法西斯德国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苏德交易本身也麻痹了斯大林自己，造成过于相信希特勒，因此缺乏大战前的应敌准备，而给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带来了巨大损失。

1939年的《苏德秘密协定》不仅说明苏联违背了社会主义外交原则，而且斯大林自己也由于同德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而对德国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使得苏联在希特勒突然进攻面前缺乏应有的准备。斯大林甚至不相信临战前夜从各方渠道传来的德国进攻苏联情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正是斯大林等人在战略上过于轻信希特勒的承诺，在同德国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对纳粹德国的判断发生错觉，因而对德国的战略准备只限于书面上。在苏联卫国战争突然爆发后，斯大林还一度对德国发动的闪电战惊慌失措，导致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巨大损失。对此，斯大林应该负主要责任：

第一，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确实麻痹了个人政治决断力，对国际形势没有清醒的判断，偏重为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考虑，影响了对侵略战争力量的警觉。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协定也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模糊了世界政治阵线和主要打击对象，有损世界反法西斯的总斗争，也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影响。”<sup>①</sup>而签订这一条约的最大受益者，是希特勒德国。

<sup>①</sup>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第384页。

第二，从军事战略上看，斯大林犯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错误，对德国的进攻方向及其时间发生误判。斯大林原本认为苏德的秘密协定可以推迟战争，使“国家得到三至四年的喘息时间”<sup>①</sup>。大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把苏联参战的时间推迟了不到两年。在德国完成欧洲西部的战略进攻、并控制欧洲西部之后，德国并没有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继续西进进攻英国，而是调过头来，向苏联进攻。希特勒的战略进攻顺序完全和19世纪初的拿破仑一样。

第三，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1939年至1941年的外交政策降到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单纯为了追求本国安全利益，必然要带来外交决策上的失误，不仅牺牲了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也降低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

所幸的是，德国进攻苏联的残酷现实使斯大林猛醒，将国家的生存与军事安全调整到正确的战略上，与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并指挥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功不掩过，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这是我们认识历史应遵守的起码的原则。

---

<sup>①</sup>（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斯大林》中册，第824页。



## 32. 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东方战线”？

左凤荣

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之初，苏联并未卷入，苏联利用西方战事正酣，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扩张，建立所谓“东方战线”。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加强国内防御上，而是力图通过扩大地盘，靠侵犯弱小国家的领土主权增强自身的防御纵深，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建立“东方战线”的做法虽然短期内扩大了苏联的领土，但其消极后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 通过世界革命，扩张领土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目标

斯大林20年代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大目标，而是变得更加现实，他不是空喊世界革命，而是在等待时机。斯大林始终是坚定的输出革命派，1920年他积极推动红军向华沙进军，1923年在列宁病重期间，他又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搞了德国汉堡起义，花掉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两年来积蓄的黄金储备。斯大林不能理解列宁思想的变化，1924年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斯大林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障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后胜利”。因此，苏

联的发展战略不是建立在发挥本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推进世界革命的基础上。推进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所追求的始终不渝的大目标。认识不到这一点，便不能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始终强调发展重工业和抓阶级斗争，战前如此，战后依然如故。

斯大林十分强调苏联的发展战略要立足于对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援助，“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援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sup>①</sup>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sup>②</sup> 1925年3月，在谈到苏联共产党的任务时，斯大林说：“对苏联来说，这意味着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sup>③</sup> 可见，斯大林强调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其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服务的。苏联把自己当成世界革命的基地、中心，把苏联的国际战略建立在推进世界革命上。为了保证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一俟时机成熟，斯大林便要用苏联的实力去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

斯大林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外交的最高目标，但他并不是支持一切革命，只是把世界革命当成借口，只做有利于扩大苏联国家利益的事。斯大林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认为维护苏联的利益，扩大苏联的版图，是与世界革命的利益一致的。其实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是对沙俄扩张传统的继承。

斯大林对恩格斯1889年2月所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由于这一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竟受到了斯大林的批评。1934年有人向斯大林建议把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俄译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以纪念帝国主义大战20周年，斯大林却认为不合适，并且批判了恩格斯。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4、34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9页。

章可以当做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sup>①</sup> 在斯大林看来，恩格斯所批判的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并不是俄国所特有的，侵略政策也是“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中包括拿破仑这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皇帝”，而恩格斯却忘记了这一点。斯大林对恩格斯文章的批判充满了对沙皇政府扩张政策和谋求世界霸权行为的掩饰和辩护，实际上也是斯大林自我思想的暴露。

### 与德国达成协议，瓜分东欧

30年代初，面对法西斯的威胁，苏联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33年12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提出为在欧洲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以维护和平和防止侵略而斗争。苏联明显加强了与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33年10月苏联与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获得国联行政院的常任席位。在苏联的努力下，1935年5月2日，苏联与法国签订了互助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受到某个欧洲国家进攻的威胁时，法国和苏联应该进行协商，以便按照相互保证领土完整的原则采取措施，进行支援和协助。5月16日又按照苏法互助条约的模式签订了苏捷互助条约。这些条约对德国的侵略野心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德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但是，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并不顺利。由于英法政治家和外交家缺乏远见，他们并不想与苏联一道制止德国的侵略，而是步步退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们奉行不干涉主义，任凭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苏联建议英法一起行动，公开谴责德国，英法则表示拒绝。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德国，在慕尼黑会议上背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着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出卖给德国，以换取德国不再扩张。但是，德国的欲望不是这点恩惠就能满足的。

为了麻痹英法，希特勒声称今后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布尔什维克，英法也希望把祸水引向东方。德国很快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再次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研究德国新的侵略态势的问题，苏联力图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斯大林提出联共（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第一，今后还要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的政策；第二，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苏联卷入冲突中去；第三，大力加强苏联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量；第四，加强同那些关心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各国劳动者的国际友谊联系。

由于绥靖政策并未能阻止希特勒的扩张，西方舆论界也对其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从1939年4月开始，英法苏三国进行了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但由于领导人缺乏远见，都想自保，谈判进展并不顺利。英法只想让苏联单方面承担义务，而不想对苏联的安全提供保证。当政治谈判陷入僵局后，苏联又提出立即进行军事谈判，苏联派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作为代表团的团长，而英国的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只是一个退役的海军上将，没有签约权，法国的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将军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授权，但在法国军界地位不高，谈判从8月12日开始，会谈的关键是当德国对波兰、罗马尼亚和法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苏联军队是否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给德国以打击，因为苏德没有共同边界。但是，波、罗两国政府拒绝让苏联军队过境，英法两国也没有做应做的工作，使谈判无法达成协议。英法没有诚意与苏联达成协议，却秘密地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接触和谈判。

希特勒则害怕英法苏达成协议，设法进行分化和阻止。德国从6月起便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建议“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由于苏联对英法本来就不是很信任，英法的行为又加强了苏联的不信任，而德国又对苏联提出了很有诱惑力的建议：苏德之间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整个地区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建议两国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8月12日，在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开始的同时，苏联方面通知德国，同意与德国进行谈判，8月19日，苏德经济协定在柏林签订，德国向苏联提供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和两亿马克的贷款，以此作为优惠条件，换取苏联放弃与英法达成协议。苏联对慕尼黑阴谋记忆犹新，深恐自己被出卖，而战

争的危险又在临近，遂决定放弃与英法的谈判，转而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0日希特勒致电斯大林，说苏德签订贸易协定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要求至迟在8月23日允许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苏。斯大林于8月21日复电完全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声明，鉴于苏军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建议长期休会。英法苏三国谈判中断。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当天便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在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动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另一方不向该第三方提供任何支持；缔约一方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在里宾特洛甫飞越苏联的西部边界时，苏联空军向他的座机开火，里宾特洛甫的飞机甚至被打出了小洞，但德方却没有任何抗议，表明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也是不惜代价的。

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首先保障了本国的安全，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也堵塞了英法与苏联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可能性。“这个条约给了希特勒开战的可能性。此后，三大国间的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西方国家被剥夺了阻止希特勒的可能性。希特勒希望，与莫斯科达成的互不侵犯条约迫使英国和法国不要给波兰以援助。”<sup>①</sup> 苏德条约的签订让西方感到的是惊恐。就条约本身而言，本无可厚非，它使苏联不致首先与德国开战，赢得了将近两年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但是，这一条约也使德国避免了两线作战的担忧，它可以放开手脚按预定计划发动对波兰的进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德条约签订一星期后爆发。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厮杀，这种战争对苏联来说，是推进世界革命的好时机。斯大林关心的主要是战争不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是苏联一国的和平。

问题在于，苏联并没有在自保政策上止步，竟堕落到与德国法西斯划分势力范围的地步。它违背自己一贯反对进行秘密外交的原则，也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遵循的原则相背离，与德国签订一系列《秘密议定书》：1939年8月23日，在

---

<sup>①</sup>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和芬兰历史学会：《冬季战争（1939—1940）》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21页。

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划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规定：

(1) 当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同时，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纽斯州的利益。

(2) 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将大体沿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划界。

(3)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强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声明，它对该地区毫无兴趣。

(4) 本协议由双方保存，严守秘密。

1939年8月28日，莫洛托夫和德国政府代表冯·舒伦贝格又签署秘密协议，对这个秘密附加议定书第2条作了精确的解释：“2. 当波兰国家各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苏势力范围分界大体穿过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

1939年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又签署了三份秘密议定书：一份规定苏联为生活在其国内的德裔居民、德国为生活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裔和白俄罗斯裔居民迁居提供方便。第二份则是对1939年8月23日秘密附加议定书的第一条作了新的补充：立陶宛包括在苏联势力范围内，而卢布林省和华沙省一部划入德国势力范围，规定了德国—立陶宛边界。第三份秘密补充议定书规定：双方不允许在各自的领土上发生影响另一国领土上波兰人的宣传鼓动。<sup>①</sup>

苏联和德国法西斯通过订立秘密协定的办法，在历史上第四次瓜分了波兰，所不同的是，前三次瓜分是由沙皇主持的，而主持这次瓜分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与领袖。这件事当时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知道，政治局未经讨论，最高苏维埃也不知情。秘密条约文本由莫洛托夫本人保存，当西方从德国处得到文本，并公之于世时，莫洛托夫竟然多次脸不红、心不跳地予以否认，硬说这是西方造谣，直到1952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才把文本上交苏共中央档案馆。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在柏林就苏联参加德意日三国协定问题与希特勒会谈时，希特勒强调，缔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重要和有益的，莫洛托夫表

<sup>①</sup>（俄）《历史问题》1993年第1期。

示同意，并说：两个国家都从中受益，德国“得到了稳定的后方，这对于在西方的军事事件的发展，包括法国的失败，有很大意义，立陶宛和波兰东部问题的解决也是正确的。”<sup>①</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如果以此来衡量，苏联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起码的正义立场。1939年9月6日德国驻苏大使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在多年宣传反对德国侵略后，苏联的政策发生了突然的转折，居民还不完全清楚。官方宣传鼓动员的声明引起了人们对德国不再是侵略者的普遍的怀疑。”<sup>②</sup> 二战爆发后，苏联走上了与德国合作瓜分势力范围之路，并称德国为和平爱好者，奉行与德国友好的政策。苏联要求与德国交战国的共产党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直到苏德战争爆发。

### 苏联的安全高于其他国家的主权

在希特勒对波兰发动进攻，然后又挥师西进的同时，斯大林开始建立“东方战线”。为了保证苏联自身的安全，斯大林置中小国家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把本国的边界向西推移了三四百公里，以建立一道阻挡德军东进的屏障。希特勒于9月1日对波兰发动了进攻，9月17日，当波兰濒临败亡之际，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

“谁也不知道波兰领导人现在何处。波兰人民被他们倒霉的领导人交给命运任意摆布……苏联政府认为向自己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兄弟和西白俄罗斯兄弟伸出援助之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苏联政府已吩咐红军总指挥部命令军队越过边界去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斯大林命令苏军越过苏波边界，进驻与苏联毗连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波兰军队没有与苏军交火，没有把苏联当成敌国，苏联却逮捕和拘留了大批波兰人，总数多达25万人，其中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后来苏联当局对这些人进行了分类处理：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被释放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交还德国当局；一些人被留

<sup>①</sup> （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5期，第65页。

<sup>②</sup> （苏）《消息报》1989年7月1日。

下来从事建筑工作；军官、警察、间谍人员等被集中关押到指定的集中营。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建议作出决议，对这些人处以极刑。据此，苏联内务部将其中的21857人残酷杀害，其中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廷处决了4421人，制造了后果极为严重的“卡廷森林事件”。当德军入侵苏联，发现了这一秘密后，大肆宣扬，1944年苏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自己组织了“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专门委员会”，确认这是德国占领者所为。为了不泄密，1959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销毁了全部21857份被处决者的档案材料。但历史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此事与苏德秘密协定一起为世人所知晓，引起大哗，成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导火线。1993年第1期《历史问题》杂志全文发表了1940年3月5日贝利亚向联共中央斯大林呈报的材料和同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向斯大林呈报的材料中，贝利亚说这些被关押的人“全部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对苏维埃制度充满了仇恨。”有鉴于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作出了相应决议。

（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

设立被拘于战俘营的14700名前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间谍、宪兵、渣滓和狱吏案；设立业已被捕，并且羁押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各监狱的11000名各种间谍和破坏组织成员、前地主、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者案。

按特别程序审理，对他们适用于极刑——处决。

（二）审理此案，不传被捕者，不提出指控。按下列程序，作出有关侦查终结和有罪结论的决定：

（1）对监禁于战俘营者，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管理局提供的材料；

（2）对被捕者，依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案卷材料。

（三）案卷的审阅，判决的确定，委托给三人小组，其成员有：梅尔库罗夫、科布罗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司司长伯施塔科夫同志。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于是，21857名波兰人就被三人小组判处了死刑，他们所犯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的国家太小了，抵抗不了苏德两个大国的进攻，这些波兰民族的“精华”就这样消失了，当苏德战争爆发后组建波兰军团时，发



现他们已没有了军官。

1939年9月28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瓜分波兰的分界线，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这两地约占波兰领土面积一半（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它们分别加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

早在1938年4月，苏联就以保护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安全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割让、租借或交换领土等方案，力图使列宁格勒的防线向前延伸，因为列宁格勒离苏芬边界仅32公里。从1939年10月起，两国开始谈判，但无结果。苏联便单方面废除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月30日苏联发动苏芬战争，苏军遭到芬兰人的顽强抵抗，苏联不得不一再增兵。苏联在动用了100多万部队和极大部分飞机坦克以后，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激战，才战胜芬兰。战败的芬兰只好接受苏联的宰割，1940年签订《苏芬和约》，苏联把芬兰的雷巴契半岛、斯莱特尼半岛的一部分、贝柴摩、萨拉地区和卡累利阿地峡划归己有，租借汉科半岛及附近的岛屿为军事基地，期限为30年。这样，苏联总共获得了4.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卡累利阿地区的苏联国界线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50公里。

苏联虽然取得了苏芬战争的胜利，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苏联对芬兰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讲，声援芬兰，宣布在贸易上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向芬兰提供援助；英法两国除向芬兰提供军事援助外，还准备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援助芬兰，后因瑞典和挪威害怕卷入战争而未能成行。1939年12月，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把苏联开除。在军事上，苏军伤亡近20万人，其中有6万人是在战场上牺牲的。50万芬兰人失去家园，他们的反苏情绪很高，为了雪耻，芬兰政府倒向了德国一边，苏联的行为促进了反苏联盟的扩大，这在军事上也是不合算的。苏联红军在苏芬战场暴露的指挥无能、战斗力不强，也使德国敢于发动对苏联的战争。

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正式合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接纳”它们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

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

1940年6月，苏联照会罗马尼亚，要求它归还1918年占去的比萨拉比亚，同时要把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北布科维纳移交给苏联，作为罗“占领”比萨拉比亚22年的“赔偿”。这两地合计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8月2日，苏联宣布在比萨拉比亚地区成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今摩尔多瓦共和国），北布科维纳并入乌克兰。

马克思在评价这类行为时说过：“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可能用兼并邻国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sup>①</sup>十月革命后，列宁主持制定和平法令，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崭新的外交原则：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废除秘密外交。列宁在为苏维埃政权起草的第一个法令——《和平法令》中明确宣布：

“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sup>②</sup>

斯大林的行为正是被马克思和列宁严厉谴责过的资产阶级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它严重伤害了弱小国家的民族尊严与民族感情，因此，芬兰、罗马尼亚被推到了法西斯侵略集团一边。事实证明，苏联靠侵犯别国的利益与主权所建立的这条防线并未起到阻止德军推进的作用，旧的防线被废弃而新的防线尚未构筑完成，德军发动进攻后，得以迅速向前推进。

斯大林为了苏联本身的利益，可以放弃思想上的原则，竟堕落到不自觉地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6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页。

饰法西斯侵略的地步，否定了自己原来站在反法西斯的正义者一边的思想与原则。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许）竟然说：

“德国目前是一个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的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们与德国的关系……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在德国侵占了大半个欧洲、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对许多国家和民族进行无耻侵略的情况下，说德国是爱好和平的力量，而反抗侵略的人却是在犯罪，显然是违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公正原则的。各国共产党也必须跟着苏联改变反法西斯的政策，在国内搞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显然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也是不得民心的。更有甚者，苏联竟然根据德国方面的要求把30年代曾遭到镇压，仍被苏联监禁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希特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惜损害中国的主权与利益，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附件《声明书》中说：“为了保证两国间的和平和友好发展的利益，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主权的行为，为日本扩大侵华提供了方便。斯大林在庆祝条约签订而举行的宴会上，竟对日本武官说：“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放心地向南面推进了吧。”签订条约后，斯大林还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半拥抱着照了一张相，斯大林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当松冈准备乘夜车回国的时候，斯大林还打破惯例，在随从的簇拥下，出乎意料地来为松冈送行，这是斯大林极少的热情举动之一。

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

---

<sup>①</sup> 《真理报》1939年11月1日。

“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sup>①</sup>

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与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争霸战，目的是在中国东北获得更大的权益，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帝国主义强盗行径的体现，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却要战败的沙皇报仇，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从斯大林建立“东方战线”等行为看，其民族利己主义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自己的所谓安全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弱小国家的利益，留下了许多隐患。

## “东方战线”政策的延续

1945年春，苏联红军已越出国界作战，斯大林对铁托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能不是这样。”斯大林坚信社会主义只能靠武力维护和扩大，他说：“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都不敢！”“战争快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sup>②</sup>

二战后，斯大林仍继续其在建立“东方战线”时的做法，极力把苏联式社会主义推广到东欧，对东欧加强控制，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牺牲别国利益的基础上，甚至把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派到波兰去当国防部长。为了保证东欧社会主义的稳固而长期在东欧驻军。这大大损害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第470页。

<sup>②</sup> （南）米·杰拉斯著，赵洵译：《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斯大林的这一政策，破坏了苏联与美、英等国在二战结束前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成为西方发动冷战的一个借口。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演说，指责苏联对东欧加强控制，号召遏制苏联无限制的扩张倾向。斯大林在就此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承认了苏联的这种倾向，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

“不要忘记以下的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由于德国的侵犯而在同德国人作战中，以及由于德国的占领和苏联人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苏联便永远地丧失了约700万人……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sup>①</sup>

按照斯大林的逻辑，只要周边国家的政府与自己国家的政府不友好，便对自己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可以靠自己的实力改变别国的政府。别国的政府与制度不是其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是否对周边大国友好。这种做法，可能暂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从长远看，恶化了苏联与东欧各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明显加强了双方的不信任。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苏联可以对阵营内其他国家发号施令，苏联的利益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的主权高于其他国家的主权，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其他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这种理论是苏联长期对外搞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源，在斯大林之后又有所发展。

从1939年起，苏联利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公开向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的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莫洛托夫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

---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第499页。

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sup>①</sup>

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斯大林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成果的欣喜心情，同时，也反映了他扩张欲望的强烈，即使如此，他还觉得美中不足呢。

---

<sup>①</sup>（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

### 33. 如何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

左凤荣

1941年6月22日，已经征服了西欧大陆的德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一线约1800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了袭击。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开战仅6天德军就占领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开战仅三个星期，苏联就有将近30个师已经不存在了，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损失了大约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仓库被毁，当然，在苏联将士的英勇抗击下，德军也损失了15万名官兵、950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时，苏联红军战士开赴前线。左边树上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被粉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新华社稿）

## 祖国危难时刻的坚定领导者

苏军的严重失利，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战争开始的这一天，他只喝了一杯茶。他一度垂头丧气，丧失了主动性。莫洛托夫，而不是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与德国的战争开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德国法西斯斗争。国家领导体制向战时转轨，斯大林一人担任了苏联所有机构的最高领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所肩负的工作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每天工作长达16—18小时。

1941年7月3日，即战争开始后的第十二天，激战中的苏联人首次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演说，<sup>①</sup> 他的语言是朴实而亲切的，没有华丽的辞藻，他要唤起的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俄罗斯人顽强抵抗入侵者的民族精神，他用了与以往讲话截然不同的开头语，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种口气和称呼一下子拉近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让人感到亲切。他宣布说：

“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了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进行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说，苏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但这只是暂时的，红军的胜利必将日益扩大，他号召全国军民奋起反抗敌人，“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我们应当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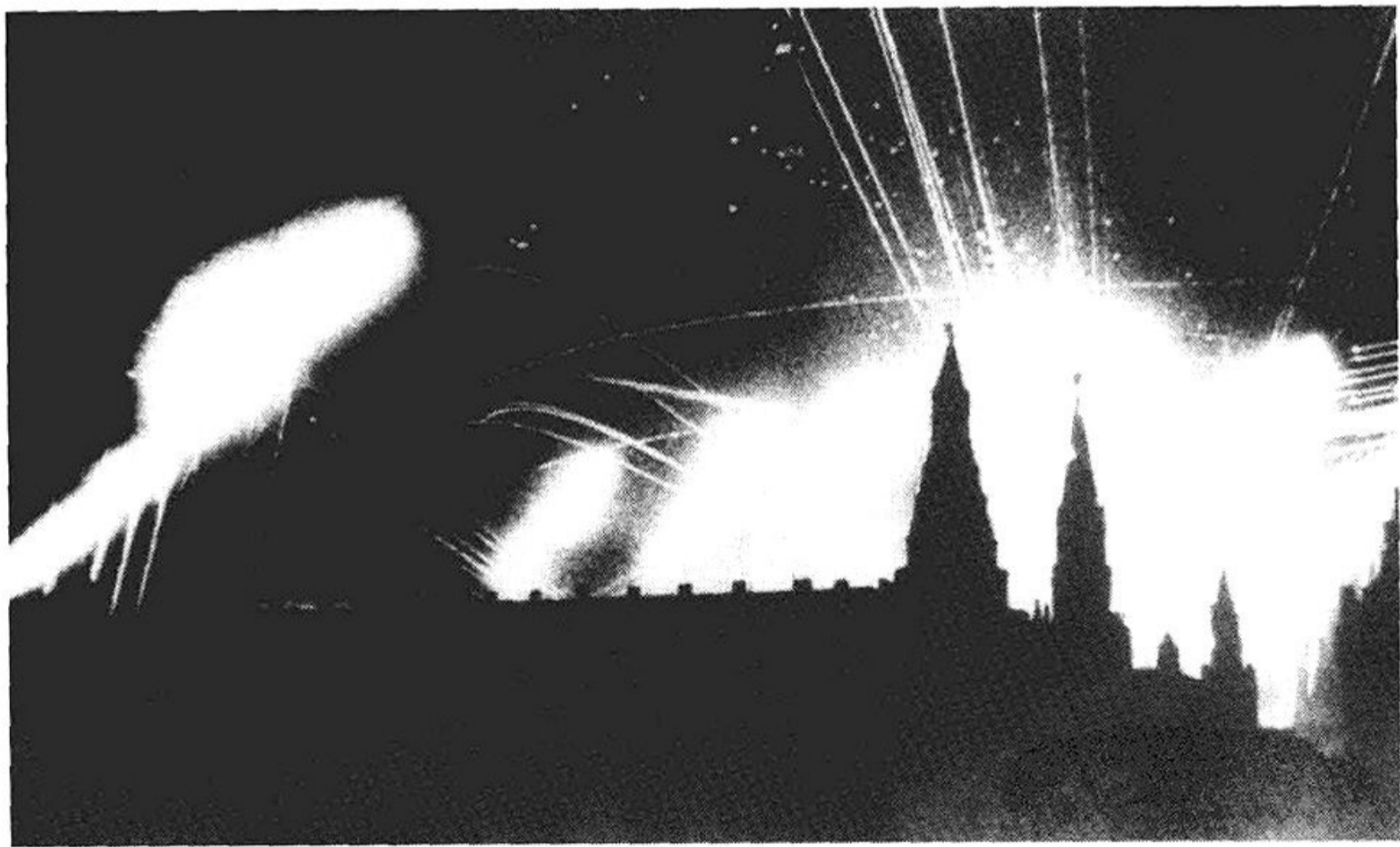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见《斯大林文集》，第288—294页。



务。”他号召红军、红海军和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为保卫祖国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斯大林宣布，苏联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可靠的同盟者，他表示相信：“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苏联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斯大林对争取胜利不可动摇的决心鼓舞着每一个收听这个广播的苏联人，他们感到信心增强了，精神振奋了，有了力量。他们响应斯大林的号召，适龄者纷纷加入军队或民兵组织，妇女则奔赴工厂、铁路、矿山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



这是1941年7月31日晚，德国飞机空袭莫斯科，将战争带入苏联心脏地带。（新华社稿）

占有明显优势的希特勒，于8月5日攻陷斯摩棱斯克，打通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8月底德军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10月份德军集中优势兵力，力图一举攻下苏联首都莫斯科。为了攻占莫斯科，德军集结了77个师，上百万人，

集中了1700辆坦克、950架飞机、14000多门大炮，希特勒吹牛说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消灭敌人。莫斯科的情况十分危急，德军突到了离莫斯科只有25公里的地方，一部分党政机关、国防工厂、科学文化机构和全部外交使团撤到了距离莫斯科800公里的古比雪夫市，到月底，共有200万人撤离了莫斯科。总参谋部也撤出了莫斯科，内务部为斯大林准备了撤退用的专机，经过思考，斯大林决定留在莫斯科，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斯大林认为，苏军在战争初期失利了，遭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对胜利的信心，只要信心不被摧毁，胜利的一天就会到来。只要人民、军队知道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在他们的首都，他们就会增添信心。事实证明，斯大林没有撤出莫斯科，最高统帅的这种临危不乱的精神和顽强的斗志，确实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去战胜法西斯。

莫斯科保卫战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朱可夫大将担任保卫莫斯科的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员。在战斗紧张的日子里，斯大林一连几天不离开办公室，10月底的一天夜里，他还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到莫斯科前线去视察。在他的动员和领导下，迅速建立了庞大的战略预备队，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苏联每年在这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举行阅兵式，而今年法西斯就在莫斯科城下，正准备把莫斯科吞下，德国飞机不断轰炸莫斯科，连总参谋部的大院都挨了炸弹，人们都以为不会举行庆祝活动了。当斯大林向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询问如何安排今年的阅兵式时，他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斯大林不仅要举行阅兵式，他自己还要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他要求把阅兵式摄制成纪录片，向全国播放，以鼓舞士气。

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苏联军民照例举行了阅兵式，表现了他们对法西斯德国侵略者的藐视和大无畏的精神，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苏军将士迈着整齐雄健的步伐，从红场上的列宁墓前走过，最高统帅斯大林威严地站在列宁墓上，检阅部队，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斯大林说：

“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地区，敌人窜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口。敌人估计，我们的军队将一触即溃，我们的国家将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我们的陆海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整个战线上正在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的陆海军一起，

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

斯大林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国的状况比23年前好得多……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可以怀疑吗？”他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sup>①</sup>

斯大林在红场举行阅兵式是大胆的、有远见的，表现了斯大林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善于影响全国的舆论，掌握和支配人民的情绪，特别是在苏联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不少人对胜利没有信心的时刻，红场的阅兵式对于增强人民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激发了全国人民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了苏联人民在前线和后方去建立英雄功勋，加强了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心。被检阅的部队从红场直接开向了前线，去迎击法西斯。克里姆林宫大无畏的精神震动了全世界，鼓舞了苦战中的人们。

苏联红军战士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使德军遇到了战争开始以来最顽强的抵抗。当时的德国报刊说，“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了全面抵抗”。据朱可夫统计，从1941年6—12月，德军在苏德以外的战场上只损失了9000人，而在对苏战争的前两个月，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当夏季和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共伤亡近80万人。<sup>②</sup>

上苍也十分惠顾苏联人，多年未见的、极其寒冷的冬天提前半个月来临了，缺乏准备的德国人深受其苦，寒冷难耐、枪炮失灵，而习惯了严寒的苏联军人开始施展威力了。苏军经过准备，于12月5日开始反攻，斯大林果断地把大量预

---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第311—313页。

<sup>②</sup> （苏）Г·К·朱可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6页。

备队投入战斗，给立足未稳的德军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到次年4月，苏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被赶回了几百公里，损失人员50万、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000多辆，希特勒遭受了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惨重的损失，打破了法西斯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标志着德军的闪电战开始破产。这次胜利在政治上、精神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 斯大林在战争中成了军事家

在严峻的战争考验面前，斯大林的功绩之一是知人善任，他先后用过的四任总参谋长分别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他们都各有千秋，斯大林能看清这一点并能够加以利用。沙波什尼科夫是一个兼统帅与教授于一身的人，他一面研究军事理论，一面孜孜不倦地竭力把最新的军事科学成就推广到广大指挥人员中去。他是一个有高度的军事素养、渊博的知识和丰富指挥经验的专家，他是一个旧专家，能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实在是个例外。沙波什尼科夫是训练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的高手，他帮助斯大林懂得了积聚、调动和使用这些预备队，斯大林很尊敬他，从不对他发火，经常向他请教。斯大林经常在分析某个问题时说：“让我们听听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的意见！”

朱可夫则是一个处理问题果断、思维灵活大胆、敢于面对困难的人物，其坚强的意志和工作作风很像斯大林，在保卫莫斯科的战役中、在解救列宁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等许多重大军事活动中，朱可夫曾起过重要作用。他敢于坚持与斯大林不同的意见，也曾得到斯大林不止一次不公正的待遇，但斯大林还是很倚重朱可夫。

华西列夫斯基在1942年6月至1945年2月任总参谋长，同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任远东苏军总司令。他是一位全面的统帅和将领，既有司令员的才干，也有参谋人员的素养，他经常作为斯大林的代表去进行防御战斗或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在大本营制定战略计划。他不像朱可夫那么固执，很少提反对意见，在同斯大林谈作战问题时，善于委婉、然而坚持不懈地贯彻自己的主张，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要同华西列夫斯基交谈，除了作战需要外，斯大林还经常同他商量问题。

安东诺夫则是一位天才的参谋，他言语不多，但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条理性

强，对大小事务都考虑得很周密。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推荐下出任作战部部长和副总参谋长，当华西列夫斯基上前线时，他就是代理总参谋长。朱可夫说他是“一位能干无比的将军，一个很有文化和魅力的人”。从1943年起，他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与重用。1945年2月接替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总参谋长。

斯大林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在战争的进程中他抽出时间学习军事理论，逐渐学会了打现代化的战争，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军事家，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在决定重大的战役时，斯大林再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他已经掌握了指挥现代战争的艺术，指挥红军开始胜利反攻。华西列夫斯基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表现评论说：“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时而把这个、时而把那个负责人从前线或后方召来研究当前的问题。他要求对所讨论的任何问题都要有详尽的材料。他得到这种材料后有时也征求一下意见，但起初往往总是自己立即作出决定，二话不说就下达号令。斯大林把极重的担子挑在自己肩上，同时也不宽容别人。恐怕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卫国战争期间最充分地显示了斯大林极为坚强的品格：他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当时在斯大林的工作中也有疏忽之处，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那时他不恰当地自负和自信，过高地估计自己在指挥作战中的能力和知识。他很少依靠总参谋部，对于该部工作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利用得远远不够。往往无缘无故地匆忙撤换军事首长……我们大家都逐渐清楚地感觉到，他开始越来越以现代化战争的观念来进行深刻的探索，极为成熟地解决军事艺术问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个里程碑。但是，大概只是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中，他才充分掌握了按照新的方式指挥战争的方法和形式……斯大林不仅变得通晓军事战略——因为他是政治战略大师，所以通晓军事战略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而且通晓战役学。因此，他对制定战役的过程产生了十分有力的影响。他在军事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大大超过了战术学的知识（其实，他也不一定要懂得战术学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斯大林无疑可列入杰出统帅之列。”<sup>①</sup>

朱可夫也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

---

<sup>①</sup>（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59、160—161页。

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sup>①</sup>

有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下定决心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都否认了这种看法。据华西列夫斯基说，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只去过一次前线，“时间是在1943年8月初，这时正在准备斯摩棱斯克战役。当时，最高统帅到了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指挥所，会见了方面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和叶廖缅科大将。这次视察共两天。”这种视察并不是必须的，“最高统帅的工作的性质其实并不要求进行这种视察。最高统帅部每天都获得关于前线态势、战局、苏联军队的情况、苏联军队的士气、各方面军司令和各集团军司令的工作情况以及敌军情况的各种大量情报”。<sup>②</sup>

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后，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并于1942年7月突入了斯大林格勒。这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具有象征性意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寸步不让”的命令，开始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次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贯彻执行的。斯大林采纳了朱可夫的建议，把这次战役分防御和进攻两个阶段进行。1942年11月19日，经历了艰苦防御后的苏军开始了反攻。当时集结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有100多万人，坦克894辆、飞机1414架，火炮13500门；德军有兵力约100万、坦克675辆、飞机1216架、火炮10300门。执行这次任务的是苏联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协调指挥作战。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战斗了两个月，累得筋疲力尽，损兵折将，却始终没有攻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在这场消耗战中，德军士气低落，渐渐丧失了斗志。1943年2月2日，走投

---

<sup>①</sup>（苏）Г·К·朱可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上），第344、345页。

<sup>②</sup>（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第165页。



1943年1月31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向苏联红军投降，到2月2日，共有9万名德国官兵在斯大林格勒宣布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转折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取得最终胜利。这是德军俘虏穿过斯大林格勒街道。（新华社稿）

无路的德国元帅保卢斯终于投降了。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方的胜利而告终，德国损伤兵员高达150万人，占其在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这次战役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折点。

1943年7月4日凌晨，希特勒发布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库尔斯克战役的命令。库尔斯克战役正式打响后，德军攻势凶猛，苏军抗击顽强。德军出动兵力达90万人，1万门炮，2700辆坦克、2000架飞机；苏军共有130万人，2万门炮，3600辆坦克，2800架飞机。苏军掌握了制空权。这场战役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在宽广无垠的大平原上，苏联的T-34坦克和德国的虎式坦克各显神威。经过一个月苦战，苏军转入反攻，8月5日解放奥廖尔，8月

23日解放哈尔科夫。历时50天的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胜利告终。德军损失兵员50万、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这次战役也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不可逆转地转移到苏军手中。从此，苏军在长达两千公里的战线上开始了全线大反攻，于1944年解放了苏联全境。

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和协调了柏林战役。为了先于英美军队进入柏林，苏军从1945年3月末起，只用了两周时间便完成了柏林战役的准备工作：苏联最高统帅部调集了3个方面军，总兵力达250万人，配备有41600门大炮、6250辆坦克、7500架作战飞机，在30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实施6个突击。希特勒下达了“死守柏林直至最后一人”的命令。德军用于防卫柏林的兵力达120万人，并装备有10400门大炮，1500辆坦克及3200架飞机，在柏林周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在柏林以东建立了三道防线。苏军士气高昂，急切地盼望着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时刻。

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下达了攻击柏林的命令，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柏林战役打响。尽管遇到了德军的拼死抵抗，苏军还是于4月19日突破了柏林郊区的防御，逼近市区。4月21日，苏军突入柏林市区。4月25日，苏军与美军在柏林西南的易北河西岸会师，这一消息鼓舞着战场上的官兵们，他们在胜利的鼓舞下，奋勇杀敌。4月30日，勇敢的苏联士兵把鲜艳的红旗插在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希特勒自杀。5月2日，红军攻克柏林，下午3时，德国法西斯终于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柏林战役结束。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柏林战役虽然规模巨大，但是，战略领导和3个方面军行动的协调都是高水平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善于计划战役，在会战中满怀信心地领导各部队。”<sup>①</sup>

5月8日午夜，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的军官食堂大厅内进行，朱可夫主持仪式，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于5月9日零时正式生效。

在战争中，斯大林除了关注纯军事问题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处理经济问

---

<sup>①</sup>（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第648页。



题和组织问题。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助手是沃兹涅先斯基，在组织问题上的主要助手是马林科夫。经济迅速转向了战时轨道，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出来，至1942年1月，西部受德军威胁的企业1523个（其中1360个是国防工厂）被搬迁到几千公里外的东部地区，并很快投入了生产。国防工业在1941年仍然生产了12000架作战飞机、6500辆坦克、近1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朱可夫说，苏联人民在战时拆迁工厂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功勋，就其规模和对祖国的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在战争进程中，“斯大林不是以共产党人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姿态参加战斗的；他抛开了意识形态，以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的身份来保卫神圣的俄国”。<sup>①</sup> 斯大林很懂得把俄罗斯战斗的传统与对人民英雄业绩的颂扬结合起来，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觉性，激发他们为了捍卫荣誉和尊严而去牺牲、去战斗。战争一开始，斯大林便命令在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肖像，他在红场阅兵式上的演说也提出：“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sup>②</sup> 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谈到以往的伟大统帅们，他们大多是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战功的人物。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设立了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纳希莫夫和乌沙科夫等人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对于建立功勋者，斯大林能及时予以奖励，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有36000人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恢复了军官的肩章制度，军官的制服也更加绚丽了，军人增强了自豪感。

1945年5月9日晚，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自豪、兴奋、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

---

<sup>①</sup>（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sup>②</sup>《斯大林文集》，第313页。

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了紧张的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sup>①</sup>

1945年8月8日，苏联远东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越过边界，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进攻，日本关东军溃败。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经过4年苦战，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赢得了胜利。

尽管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民最终取得了胜利，斯大林作为领袖、作为统帅，以其坚定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领导才能，动员和组织全国军民迅速扭转了战争初期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心，人民喊着“为斯大林而战！为祖国而战！”的口号去歼灭法西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 斯大林的严重失误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我们不能说“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为了总结经验，我们还有必要知道在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有过哪些失误，犯过哪些错误。

首先，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严重失利，斯大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sup>②</sup> 尽管有苏德条约，斯大林并不相信希特勒会永远遵守这一条约，因此，苏军参谋部从1939年秋开始拟订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计划。这一工作由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主要制定者是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9月，他们向斯大林和党中央提出了作战方案和计划，正确地把德军的主攻方向定在西线方面，即距莫斯科最短的地段上。斯大林对此却不同意，他认为敌人的主攻方向应该是首先力图占领

---

① 《斯大林文集》，第455—456页。

② （俄）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著、王立平等译《斯大林的失误——苏德战争前十天的悲剧》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有详尽介绍；斯大林甚至想与德再签一个布列斯特和约，见郑异凡：《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

物产丰富的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粮食、煤、石油为目标。在苏联的体制下，军事将领们没有勇气去说服斯大林，结果按斯大林的意见修改了作战计划，把重兵部署在西南方向，在那里部署了58个师，其中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1941年6月22日，德军向苏联进攻的主攻方向是西线，直奔莫斯科。由于苏联在这个方向兵力不足，只好从西南方向临时调兵迎敌，军队在行进中作战，其战斗力自然要降低。声称因为希特勒的突然进攻，造成了苏军的失利，实际上是在为斯大林开脱。朱可夫在1956年5月19日第72号秘密记录中直接写道：“斯大林把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归为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突然突击。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希特勒没有任何突然进攻。对进攻的准备十分清楚，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国防上的失算。”<sup>①</sup>

斯大林不相信关于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使苏军仓促应战。早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8月这一方案制订完毕，取代号为“巴巴罗莎”计划。“巴巴罗莎”是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绰号，以此为计划命名，用意就是为了“消灭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袭，围歼苏联西部的苏军，攻占莫斯科是计划的重点。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巴巴罗莎”计划的第21号训令，批准了对苏联的入侵计划。从1940年夏季开始，德国军队从西欧、中欧各占领国及巴尔干和德国本土向东方大规模调动，苏联的谍报人员向中央发回了大量情报，通报了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沿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德军的构成、部署等情况，还掌握了德军进攻苏联的突击方向以及进攻的日期。

1941年5月底，苏联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从柏林向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通报了德国人的准备情况，并准确地说出了战争开始的日期，但是，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驻东京德国使馆的苏联情报员佐尔格也曾不断向国内发出关于德国对苏战争准备情况的情报，1941年6月1日，他在发回的电文中指出，“苏德战争预计在6月15日爆发……最猛烈的进攻将由德军左翼部队实施”，“在东部边界目前已集结了170—190个师，主要方向将针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就是乌克兰”。6月15日，他又发回了两份极有价值的电报，一份说：“战争

---

<sup>①</sup> Лопатников Л. И. Войн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или война народная – вот о чем идет спор, [www.ng.ru/ideas/2010-03-17/5\\_indulgy.html](http://www.ng.ru/ideas/2010-03-17/5_indulgy.html).

将于6月22日开始”；另一份称：“6月22日拂晓将在宽阔的正面展开进攻。”情报多么准确！类似的情报很多，不仅苏联的情报人员注视着德军的动向，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人、同情苏联的进步人士也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相当准确的情报。这类情报多得不胜枚举，遗憾的是，这些情报都被当成了英国或者德国施放的烟雾。斯大林认为苏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希望战争晚些到来，斯大林的多疑也起了作用，正如莫洛托夫所说：“我们努力把战争往后拖，但最后仍然没有猜准开战的时间，事情发展得太突然了。我认为，不能过分依赖侦察员。对于他们的情报，既要听，也要检查。侦察员有可能把我们推向危险的阵地，使我们过后难以自拔。两边的内奸数不清，因此不进行最周密的、经常的考验，对侦察员是不能完全依赖的。”<sup>①</sup>但愿望没有变成现实。

对于军事将领们要求进入战备状态的请求，斯大林总是强调：“别去搞挑衅！”“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实际上是麻醉了自己。1941年6月14日，即在德军突袭苏联前8天，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报刊，也不仅是英国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准备发动进攻……尽管这些谣言都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不断地被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士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竟然以德国政府的口气、一厢情愿地说道：“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认真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进攻苏联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如果德国方面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也许还可以解释得通，作为被侵略一方的苏联，却替德国辩解说对方不会侵略自己，却是荒谬的。这一声明没有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回答，却麻痹了千百万苏联军民，“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

---

<sup>①</sup>（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了。”<sup>①</sup> 在德国随时可能进攻苏联的时刻，斯大林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下决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头 12 天里，苏军就损失了 60 万人。

在个人崇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自觉地对领袖绝对信任，没有人怀疑斯大林的决策能力。朱可夫回忆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善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sup>②</sup> 朱可夫的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

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惨败，斯大林是有责任的，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误。1945 年 5 月 24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 1941—1942 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斯大林说的是“政府的错误”，一句都没有提到他自己。

第二，斯大林在军事理论与指挥上也有失误。在军事战术上，斯大林一味强调进攻，他不允许苏联的军事学说研究防御问题。战前苏军的部署也主要是为了进攻，把军队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地区，而没有作纵深部署，结果几个迅速推进的德国装甲师就能够轻易迂回和包抄苏军的阵地。在对德国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斯大林仍要求部队进攻，而不是进行有计划的退却，避开敌人的锋芒，这样便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半年，苏军有 300 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被俘者的 75%，与斯大林的这一战术有直接的关系。基辅战役是个突出的例子。

基辅是德军向南方推进的主攻方向。以基尔波诺斯为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负责保卫基辅。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在基辅周围挖了一道很深的反坦克壕，他们的防御也确实牵制了敌人。从 7 月下半月到整个 8 月，战斗均在基辅城外进行，但整个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德军手中。德军从基辅南北两翼向前推进，基辅成了巨大的突出部，夹在了德军中间，敌人有可能随时吞掉这块落在口中的肥

---

① 《列·米·桑达洛夫回忆录》，莫斯科 1961 年版，第 75 页。

② （俄）《军事历史》1987 年第 9 期，第 54 页。

肉。基辅情况十分危急。朱可夫要求撤退，斯大林却不同意，并且把朱可夫撤了职。

主动撤退，放弃基辅，建立另外的防线，抗击敌人，成了当时军事领导人的共识。赫鲁晓夫、基尔波诺斯、布琼尼等人认为，必须放弃基辅，否则，不仅基辅失陷，苏西南方面军也将全军覆没。但斯大林反对放弃基辅，他还发布命令，严厉惩罚放弃阵地者：投降和逃跑者就地枪决，其家庭成员也要被逮捕；陷入重围的部队也要战斗到底，凡投降者，其家属也将被剥夺享受国家补贴和救济的权利。9月7日，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去见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切望使他相信：必须立即将西南方面军的所有部队撤过第聂伯河，继之再向东撤，并放弃基辅。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在这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再不作出决定，西南方面军必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谈话是困难而严肃的。斯大林责备我们，说我们和布琼尼一样执行了进行最少抵抗的路线，只想避开敌人，而不是去打击敌人。”<sup>①</sup>

9月11日，斯大林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谈话中要求他们死守基辅，“未经最高统帅部放许可，不得放弃基辅，不得炸毁桥梁。”西南方面军的局势在继续恶化，9月13日，该军总参谋长图皮科夫向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报告了危险的局势，斯大林得知后，问沙波什尼科夫应该怎样答复，没等沙波什尼科夫说话，斯大林便口授了给西南方面军司令的电文：

“图皮科夫少将向总参谋部提交的15614号报告是一份惊慌失措的报告。相反的，情况却要求各级指挥官保持格外的冷静和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已经占据的阵地，尤其要固守两侧。应当要求库兹涅佐夫和波塔波夫停止后撤。应当向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明必须顽强地战斗，不要向后看。要毫不动摇地执行斯大林同志9月11日给你们的指示。沙波什尼科夫。1941年9月14日5点零分。”

这样，西南方面军只好死守。基尔波诺斯这位忠诚但又缺乏才干的指挥员，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基辅的命令；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9月17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放弃基辅的决议，由于为时已晚，加上基尔波诺斯的犹

---

<sup>①</sup>（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第187页。

豫不决，只有一部分部队冲出了重围。9月19日基辅陷落，26日基辅战斗平息。苏军损失惨重，有四个集团军被围，近45万余人，其中包括6万名军官被俘或牺牲，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有参谋人员全部牺牲，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参谋长图皮科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阵亡。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斯大林应对此负重要责任。不过，基辅的顽强抵抗，有利于减轻莫斯科的压力，也使敌人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1942年斯大林对战争的旷日持久性估计不足，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鼓舞了他，他在给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中说：

“德寇是想赢得时间和获得喘息机会。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给德寇以喘息时间，不停顿地把他们往西赶去，迫使他们在春季之前就把预备队消耗光（届时我们将会有大批新的预备队，而德寇已无任何预备队了），从而保证在1942年彻底粉碎希特勒军队……”

这一命令过高估计了苏军的力量，实际上苏军仍缺乏组织如此大规模攻势的经验、知识和能力。结果，苏军在1941年底到1942年冬的总攻中消耗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9个预备队集团军，没有完成任务。敌人的预备队并没有消耗光，在人员对比上，敌人仍占优势。总参谋部提出苏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防御。斯大林在赞成实行积极防御的同时，又认为可以在克里米亚、哈尔科夫等地域进行局部反攻。结果，均告失败。

1942年4、5月间，克里米亚方面军要从刻赤半岛出发去解放整个克里米亚，尽管苏方在人员上占优势，但由于指挥的失误，苏军遭到惨败，苏军损失176566人，坦克347辆，3476门大炮和迫击炮，400架飞机。这次失败后，又有包括方面军的司令员科兹洛夫、参谋长韦内奇等一批军官被降职。

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在南线发动进攻，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也同意，他们负责向哈尔科夫突击。5月12日进攻开始，苏军连续几天进展十分顺利，直到5月17日苏军按作战序列铺开后才发现钻进了德军的口袋，结果整个57军被消灭，苏联官方宣布5000人阵亡，7万人失踪，300辆坦克被毁，德方宣称俘虏了20万人。对于这次失败，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斯大林和大本营没有建立必要的预备队来可靠地掩护进攻部队的两翼，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没有形成绝对的优

势，没有进行两三处牵制战等等，<sup>①</sup> 则是重要原因。这说明当时斯大林并未显示出一个统帅真正伟大的天才。不过，斯大林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斯大林对待打败仗的军事将领、战俘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态度。对于苏军在战争中的失利，斯大林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却把失败的将领们当成了替罪羊，转移了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力。德军把主攻方向定在西面，首当其冲的是苏联西方方面军。战斗一开始，西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便全部瘫痪了，两支德军于6月2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东会合，西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西方方面军实际上全军覆没：44个师中有24个师被彻底击溃，20个师损失了30%—90%的装备与人员。斯大林6月30日就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由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铁木辛哥担任。把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炮兵主任克利奇以及司令部的另外几位将军送交军事法庭。

实际上，早在6月中旬，巴甫洛夫就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发了两三封密码电报，请求让军队进入野战阵地，他还请求进行局部动员，提出用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但斯大林怕激怒希特勒，没有答应，现在却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方面军的领导。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于7月22日宣布了审判结果：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被判极刑、不得上诉，在判决书草案中说：“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他们出于阴谋的目的，不使所属指挥人员准备迎接战争，削弱了军区部队的战备动员，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在苏芬战争中曾是一个师长，他率部英勇作战，表现出了是一个有才能的指挥员。他之所以与巴甫洛夫等人一道被处决，是因为他是与方面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唯一的集团军司令，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对于苏军不能不是一个损失。

---

<sup>①</sup>（苏）德·安·沃尔科戈洛夫著，张祖武等译：《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页。



当法庭对他们进行审讯时，他们请求把他们派往前线，让他们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并不否认自己对战斗失败所负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方面军遭到失败，确实与他们指挥能力差有关，这是因为在大清洗中大批军官被杀害，才使一些人被提拔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位置上，巴甫洛夫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师，却把他放到了方面军司令的位置上，但这能怪他们自己吗？西方方面军的失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敌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苏军没有准备。

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口授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70号命令：

(1) 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其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

(2) 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服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之家属，应剥夺其享受之国家补贴和救济。

(3) 凡英勇果敢之人员，应予积极提升。

这个命令是残酷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被俘，并不都是贪生怕死。他们大部分是在身陷重围、弹尽粮绝、身负重伤、战斗无望的情况下被俘的。如基辅战役，由于斯大林禁止后撤，致使大量人员被围。在战争开始后的前半年，苏军有300万人被俘，据德国人的报告，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516万苏军被俘，其中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而死亡，只有105.3万人最后获得了解放，而这些逃脱了法西斯魔掌的人，回到国内面对的也是被审查、审判，甚至被逮捕、关押的悲惨命运。

斯大林拒绝参加国际保护战俘公约，红军战俘得不到国际红十字会的任何帮助。斯大林还命令内务部建立了特别集中营，审查突围人员和从战俘营逃出来的人，制造了许多冤案。如：国家安全机关报告斯大林说，原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和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投敌，斯大林批示对他们进行审判，他们被缺席判处枪决，被没收财产、剥夺一切奖励，但是，卡恰洛夫是在1941年8月4日的战斗中牺牲的，直到1956年才被恢复名誉；波涅杰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于1941年8月被俘，在德国的集中营中经受了4年磨难，他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与德国人合作。1945年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苏联，却又被关进了集中营，1950年8月25日被判处枪决。许许多多战斗中的英雄，

在德国的集中营中受尽折磨，但他们像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一样，并没有丧失苏联人的尊严，却被当成了叛徒，他们的命运很悲惨，他们的家属也受到连累。许多阵亡的人也被当成了“失踪者”。被俘者中也确实有变节者（如A·A·弗拉索夫中将），有软骨头，每一个民族都少不了这样的人，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作为军事统帅，朱可夫对苏联对待战俘的这种态度一直很气愤，他说，按照英国的法律，被俘的英军士兵和军官在整个被俘期间继续加算薪金，而且因为他们处境艰难，甚至还增加一些薪金，而我们却提出“凡是被俘的人都是祖国的叛徒”，好不容易从德国的地狱中回来的人，却要追悔当时，即在1941年和1942年为什么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战争中的失利，斯大林惯于以存在“人民的敌人”作解释。在他的批准下，在战争期间还有一些指挥员因遭怀疑被捕。1942年8月25日5时15分，斯大林曾给在斯大林格勒的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发了一封电报：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布良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冲向奥廖尔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这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的准确情报……”<sup>①</sup>

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所幸的是，他没有被处决。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想把叶廖缅科撤职，是他劝阻了斯大林。

在1944年，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之时，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及相应的法令，把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克里木鞑靼人、卡尔梅克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少数民族的居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迁到苏联中东部地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1.9万名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近10万名官兵参加了这一工作。整个民族都被当成敌人看待。这无论用什么理论都是解释不通的。

斯大林把清理被解放地区和保卫红军后方的任务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贝

---

<sup>①</sup> 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324页。转引自《胜利与悲剧》第2卷，第207页。

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说：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卫作战红军后方部队，在清理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和执行保卫战线后方任务中，共拘留审查了931549人，其中军人582515人，平民349034人。从全体被拘留人员中查出并逮捕了80296人（特务、叛徒、讨伐队员、逃兵、抢劫者和其他犯罪分子）。

据沃尔科戈诺夫测算，苏联和德国人员损失的比例是3.2:1，苏联损失大，其中有纳粹分子的野蛮暴行，如对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其他民族的灭绝政策，但也与苏军自身战术上存在的问题、与斯大林强调的“不惜牺牲”的政策和不断的清洗有关。

人们常常把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看成是斯大林最大的功绩，诚然，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坚定的意志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于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同样是值得反思的。除了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战前斯大林在军队中搞的大清洗为苏军的失利埋下了祸根，正如参加过卫国战争的洛巴特尼科夫所说：“大概，失算主要还在于1937—1938年的事件，斯大林使军队失去了领导。正如我曾写过的，军队没有了指挥，那不是军队，而是乌合之众。”“一个有智慧的记者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唯一的赎罪券’。斯大林分子在谈起战争时，努力让人们不要想起由于准备不足而造成的灾难，想起红军和整个国家在1941—1942年的悲剧。”<sup>①</sup>

---

<sup>①</sup> Лопатников Л. И. Войн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или война народная – вот о чем идет спор, [www.ng.ru/ideas/2010-03-17/5\\_indulgy.html](http://www.ng.ru/ideas/2010-03-17/5_indulgy.html).

## 34. 为什么说了解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是认识赫鲁晓夫“解冻”的钥匙？

马龙闪

长期以来，不少人都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贬斥有加，认为它开启的闸门，是苏联意识形态“变修”的开端，苏联由此失去控制而走向解体，等等。简直把“解冻”当成了赫鲁晓夫的“原罪”，似乎苏联日后一切“不堪”的后果都源于此。实际上，这对大部分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是一种误解；对少部分人或个别人来说，则是借此大做文章，故意混淆视听，把苏联解体的一切罪责都往赫鲁晓夫身上推，以此来论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论题的正确性。我们之所以说对大部分人是“误解”，盖源于他们对苏联二战后初期这段历史缺乏应有的了解，特别是对这个时期发生的思想政治运动或政治“清洗”缺乏了解，这种不了解，恰像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了解日后的改革开放那样。实际上，赫鲁晓夫时期发生的“解冻”，是扎根于战后苏联社会的思想政治土壤的，是对战后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的反动，是战后苏联政治发展的历史产物和必然结果。“解冻”并不是什么人为制造的，作为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向；作为社会思潮，它是当时人们思想政治要求的客观反映。“解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不满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要求思想解放，客观上反映了改革的要求，是一股打破僵化的政治现状，要求推动改革的思潮。这一思潮发源于苏联社会历史的深处，是由数十年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积淀而成，并由斯大林个人崇拜筑起的高堤大坝蓄积起来的，特别是由苏联战后的思想镇压和政治“清洗”的后果直接引发的。

我们在此特别要提到战争的影响，战争对战后政治局面的影响，而战后政治

局面又深深影响并引发了日后的“解冻”，这是一个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政治历史的链条。任何割断这一政治历史链条的企图，都是违背历史的，必然造成历史认识的谬误。战后政治“清洗”同赫鲁晓夫的“解冻”，就是同一政治历史链条上紧密连接的两个环节，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因果关系，割断前者，单单拿出后者来，那是不可理解的。一些人正是如此，割断历史，单单拿出后者，并任意加以解释，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里，我们正是要展示出“解冻”以前的这段历史，让人们看看“解冻”以前的那个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多少思想批判和政治镇压发生，从思想理论到体制模式，究竟僵化到什么地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解冻”，才能给“解冻”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 战时见闻和打出国门，是对苏联军民思想的巨大冲击

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对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心的动向，都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它对主要当事国——苏联的影响，无疑是极其巨大的。战争的胜利，鼓舞了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高涨，自然都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密切相关。这种正面的影响，人们看得很清楚，过去也讲得很多。但是，战争对苏联社会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潜藏较深，人们往往不易觉察；况且在只许高唱颂歌，不准触碰伤疤的苏联战后几十年间，战争的负面影响除经济损失可讲之外，其他问题是讳莫如深的。所以，这个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为人们全面、深刻地加以研究和认识。为胜利冲昏头脑，拒绝对体制进行反思；用最后胜利掩饰战争初期的惨败；用战后镇压和清洗掩盖战争中的诸多问题；由战争影响而产生的人心激荡和社会思潮，在社会深层吱吱发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长期不许人们思考和谈论。实际上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不了解这些，就无法深刻理解 1953 年以后苏联社会的变化，无法理解苏联社会的“解冻”，也无法理解苏共二十大和它所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不了解这些，甚至也理解不了日后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根源。

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就几乎是一个同外界隔绝的社会，而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下半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不仅同国外缺少

人员交往，甚至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学文献也被严加封锁。加上苏联公民同来访外国人的接触又严遭限制，实际上在苏联，除国内极少数政界和科学文化界最上层人士对国外多少有些了解外，广大知识层和工农群众视外国犹如天外世界。闭关锁国将近20年后，在战争后期，国门一经打开，数百万军民涌流出国，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在同英美盟国部队的交往中，通过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实地观察，了解到苏联国内与欧洲生活水平的反差，又经过切身体验、耳濡目染，发生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猛烈碰撞，——这一切，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这在战地记者的随笔中，在战时文艺作品和前方战士致亲友和未婚妻的书信中，记载甚多。作家康·西蒙诺夫1945年根据实地观感写成的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曾有一个场面写到一个捷克女人同一个苏军上校的一段对话。捷克女人对上校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但是，您能否认这些吗？”对此，苏军上校作了这样的回答：“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sup>①</sup> 这里明显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欧洲的富裕生活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一些到过国外的士兵，回国后不少人都这样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sup>②</sup> 对人们印象最深的，还不单是欧洲的物质生活，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人们心目中引起强烈反响。苏军政治部门曾拆阅大量士兵信件，了解了一些战士对比国内外政治生活后所产生的思想情绪。苏军总政治部宣传鼓动局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在1945年2月6日举行的会议上，曾把军人中出现的这种情绪同“十二月党人思潮”作了类比，并形成文件，郑重向上级作了报告。<sup>③</sup>

战争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冲击，不仅是源于打开国门后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这种冲击还来自战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和沟通信息的特殊环境。战前，这

① *Симонов К.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наш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 Знамя. №3. 1988. С. 48.*

②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люди идеи решения.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ст. В. А. Козлов. М., 1991. С. 436.*

③ *Сенявская Е. С. Фронтовики. 1941—1945.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М., 1995. С. 35.*

批十六七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虽多少都经历过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岁月，体验或目睹过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和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但当时或因年幼，或处穷乡僻壤，或置身平凡岗位，除耳闻目睹个别情况外，对广大地区不同部门的真实情况是无从得知的。战争给他提供了了解国家、认识社会的独特机遇。这些来城市和乡村，来自工厂、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集体农庄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一起，并肩踏上战场；后来连十几万刑满或刑期未了的“政治犯”也从“古拉格”（集中营）走来，混编在部队中间同他们并肩作战。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管战前是工人、庄员、学生、干部还是“政治犯”，都成了日夜滚爬在一起的战友。战斗结成的友谊使大家无所不谈。这样，战前各地区、各部门发生一切，先前不知道的各种消息都汇集到了一起。这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唉呀，原来国家曾经发生过这样多的不幸！”战争同时又培养了这些军人对祖国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战时拼死为祖国为人民而战，就是为了赢得胜利，让人民在未来过美好幸福的日子。胜利之后，祖国人民应如何生活，他们自然萦怀于心；加上他们打出国门后对国外生活的观察，耳濡目染那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使他们感到国内外生活的巨大反差，由此便在前线军人中滋生了一种思革求变的情绪。

战后几百万前线军人的复员，又把上述思想情绪带回到了后方，回乡后遇到与战前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困苦生活，这越发加剧了上述希望变革的情绪，于是又把这种思想传播给了与他们仅有几岁之差、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小弟弟们”，即“战后一代”。战后在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等城市破获的大量青年社团“案件”，实际上就反映了“战后一代”幼稚的改革愿望和情绪。

文艺是社会情绪最敏锐的传感器。战争后期和胜利初期苏联文化艺术生活的一度宽松活跃，是要求摆脱严酷战时体制、转向和平轨道、期盼新生活秩序的变革情绪的一种反映。1945—1946年夏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思想文化界，气氛较为宽松，知识界许多人“都以为要发生推动我们向宽松自由方向的某种变化”<sup>①</sup>。莫斯科文艺界曾为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举行专题诗歌晚会；文艺刊物开始刊载题材轻松的作品。列宁格勒文艺界在其刊物上也开始连载左琴柯的幽默

<sup>①</sup> Симонов К.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наш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 Знамя. №3. 1988. С. 49.

小品和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歌。同时，电影界、戏剧界和音乐界也都不约而同地活跃了起来。这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社会从紧张凝重的战争气氛中走出来，要求变革的心态。

## 斯大林战后再次发动的意识形态整肃

斯大林一向不喜欢社会文化生活的宽松活跃，往往把这种活跃看成是社会的危险征兆；当然，大量的信息情报也给他提供了社会上和军队内部的思想动向。这样，战争胜利不久，他便立即拉响了意识形态的警报。

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思想权威。早在30年代，这个权威是经过斯大林诠释的“列宁的方针”。到了战后时期，有了斯大林这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斯大林本身便成了权威。这时，只要斯大林发表一次“谈话”，对某个问题加以表态，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运动便可立即发动起来。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8月中旬到9月初，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文学、戏剧、电影一连作出三个决议，指出了文艺创作和演出当中的“倾向问题”，特别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常在它们上面发表作品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柯，进行了严厉批判，抨击所谓他们的“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倾向。左琴柯被日丹诺夫申斥为“文学无赖和流氓”，<sup>①</sup>阿赫玛托娃被骂为“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不完全是尼姑，不完全是荡妇”，“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sup>②</sup>两杂志发表的作品，则被《决议》评价为充满着“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和“俯首崇拜”。1948年初，又对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上演并受好评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出决议，把矛头指向音乐界，讨伐所谓“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sup>③</sup>这使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一大批音乐家遭到了无情打击。

对文艺界的批判，由中央领导人直接出马，亲自点了数十个作家、诗人和艺

<sup>①</sup>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sup>②</sup>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45页。

<sup>③</sup>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0页。



术家的名字，在批判中又牵涉到难以计数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改组《星》编辑部，并假手苏联作协开除了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会籍，随后又将左琴柯开除公职，迫使他不得不谋生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在哲学领域的批判是按另一模式进行的。因为在这里选定的批判对象，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及其于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的著作《西欧哲学史》，因此，采取了“创作争论”的形式。这部著作是怎样落入斯大林之手的，说法不一，但人们清楚的是，1947年1月，斯大林接见米丁、尤金、波斯彼洛夫和亚历山大洛夫本人，就哲学问题和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对《西欧哲学史》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背离党性原则。由于这次被接见的哲学家没能领悟斯大林的意图，因此对这部著作的批判没能立即开展起来。为此，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在同年6月召开了《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这次会议由日丹诺夫作了主调报告，其批判锋芒是指向亚历山大洛夫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评价：仿佛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以一定地位是不允许的，又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这里的思想意图是，要把在哲学中所谓对西方资产阶级“顶礼膜拜”的倾向，推广并联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具体现象中去。但中下层干部低下的政治文化和知识水平，梗阻了贯彻这一意图的通道，使本来就已教条化、简单化的批判，走上了更加扭曲变形的轨道。

1950年对马尔语言学的批判和1951—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没有展开稍微像样的争论，就以斯大林“钦定”真理的形式，匆匆作了最后的结论。在语言学领域宣布的，实际上是30年代以来遭到打击的反马尔学派早已发表的理论观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则以斯大林的结论窒息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并堵塞了不少学者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有创见的主张革新的思想。斯大林宣布：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sup>①</sup>价值规律则只能调节“个人消费商品的交换”，而“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sup>②</sup>这场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原本出现生动活泼局面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以斯大

---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611、613页。

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体制模式作结论，不仅妨碍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且也阻塞了苏联经济的发展道路。

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像30年代一样，也扩大到了自然科学领域。首当其冲受到摧残的是生物遗传学及其学派。早在30年代就受到镇压的苏联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战后又奋起同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展开了斗争。1946年1月，李森科在其《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中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写信上告斯大林。结果，由最高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会上，李森科凭借斯大林对其报告所作的圈阅和审定，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进攻。会后，给该学派扣上了“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禁止他们在学校讲授生物遗传学，并封闭该学派的实验室，撤销该学派学者们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便禁绝了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称霸的一统天下。战后，苏联文化领域加强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理论上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为伪科学学派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除生物遗传学外，量子物理学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学科——电子计算机赖以发展的系统控制论、有机合成化学等，都被伪科学学者扣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被禁止研究，禁止传播。这种情况，使苏联战后在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世界时代的步伐：控制论遭禁，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对生物遗传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打击，造成苏联生物工程和化学合成工业的落后。这在五六十年代新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造成了苏联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 战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

事实上，按照苏联思想政治运动的“模式”，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往往是，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酝酿着政治运动，并为政治运动做“加温”和舆论准备，而政治运动反过来又推动着思想批判运动，把思想批判运动推向更加酷烈的全面镇压的道路上。可以说，苏联战后的思想政治运动就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

对战后初期的苏联来说，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从各个视角看，1948年

都是一个“转折”的临界点：从胜利的隆隆礼炮到这时，已经过去3年，人们普遍期盼的生活好转没有付诸实现，这是由希望到失望的转折点；从胜利至今，最高领导层一直处于“温和”和“强硬”两种方针的选择和动摇之中，“1948年是领导层结束动摇”的一年；<sup>①</sup>胜利后这3年，东欧一直处在安顿的过程中，1948年2月苏南会谈破裂，这是铁托带头反抗苏联模式的转折点。同时，这一年也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一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为另一方，对抗加剧，国际“冷战”局势形成的一年。上述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这种转折，同1948年苏联由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向政治清洗运动的转变正好相契合。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恰是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国内外各种合力推动的一种必然结果。就苏联战后初期的国内局势来看，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同时，政治审查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起初是对从德国回来的被俘人员和被遣返人员的审查。近年来为俄罗斯学术界统计证实，战后从德国共遣返苏联军人和平民共522.9万人，经严格审查后，交付内务部进行刑事管制的共计为33.8万人。<sup>②</sup>这种审查，对一部分人无疑是必要的（如弗拉索夫附敌分子），但总体来说，是严重扩大化了，在审查中过多地怀疑并伤害了一部分人。除对被俘、被遣返人员进行普遍审查，并对其中一部分加以逮捕外，战后苏联对30年代“大清洗”中被关押期满的“犯人”，处理办法也普遍很严厉。由于禁止期满释放人员进入大城市（有些人连居住苏联欧洲部分也不允许），实际上是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流放，一般是遣往边远地区或特殊居民点。更为严酷的是，从1948年起，对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在对他们提不出新的违法指控情况下，仅仅按照行政法规，就再次对他们进行逮捕，或关进劳改营，或流放边远地区。在何等规模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至今未见统计数字。但从五六十年代被恢复名誉者的经历看，相当一部分人有战后被“再次逮捕”的记录。况且，这也是苏联对待“犯人”的通常做法，凡政治形势一紧张，一纸行政决议，就把刑满释放人员再次逮捕。这在30年代“大清洗”时就曾屡次发生过。由此判断，行政当局再次对刑满人员进行逮捕，是苏联战后特别是1948年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

---

①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а. 1945—1964. М., 1993. С. 77.

②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Людские потери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1995. С. 180 - 181.

在俄罗斯，“人们经常拿1948年同1937年相比较”，认为，这是“席卷社会的两个大规模的恐怖浪潮”，而“1948年则是1937年的继续”。<sup>①</sup>当然就镇压规模而言，1948年赶不上1937年。但是镇压机器越转越快，敌人越抓越多，怀疑、告密和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采取“广泛拉网式”的镇压，等等，在这些方面则是极为相似的。1937—1938年清洗的对象主要是各种“反对派”及其同情者，而1948年打击的，则主要是所谓“世界主义者”和那些有违传统教条、抵制个人崇拜、怀有变革或不满情绪的人们。就最后一类人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过前线的军人，并且不乏将军级别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在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战争年代最讲究实际，遵循的人事工作准则是，能者上，庸者下。所以，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这一部分人，思想并不太恪守传统，加上他们最了解战争的真实进程，对战争初期的失败怀有血染的记忆，而且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希望破灭后的困惑也令他们体验最深。对于这些真正了解战争进程和战争生活真相的人们来说，“个人崇拜”在他们心里占有的位置很小。他们经历过战争，是胜利归来的英雄，同其他人比较起来，更敢于直面现实，更敢于坦言真相，也有更多独立思考的习惯。而在战后需要像战前一样循规蹈矩、掩盖真相、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这恰恰成了他们“摔跤子”、尝苦果的缘由所在。

战后对这一部分人的整肃，实际上就是对那些戴着军功勋章从前线归来的英雄们的一种“威慑”。如果联系到战后包括朱可夫元帅在内的一批立过显赫战功的将领们所遭到的冷遇和“放逐”（即调边远军区工作），这个问题就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列宁格勒事件”之发生，虽然有着马林科夫、贝利亚同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争夺接班人，以及双方不同发展方针之争，但就其更为微妙的意义上说，也还另有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

以阿·亚·库兹涅佐夫为首的列宁格勒领导人，是在列宁格勒前线，在被围困的900多天当中，从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走过来的。以他们为首的列宁格勒人，在战争中经受了生死的考验，赢得了无上的战斗荣誉。他们无愧于“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的光荣称号。战争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围困期间冻饿和战斗而死的60多万人，几乎占全城人口的1/3。胜利后在怎样治愈战争创伤、恢复城市经济的问题上，在他们看来在国家预算上，应该占有相对大一些的

<sup>①</sup>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а 1945—1964. М., 1993. С. 69.

份额。<sup>①</sup> 在应将列宁格勒定位于什么城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在更深的思想层面上，他们还有违背“个人崇拜”大忌的行为，即在城市被围期间，他们曾经常引用基洛夫的言论，以“基洛夫的形象”鼓舞人心。<sup>②</sup> 这些言论和行动，引来了最高领导的猜忌，于是，便假当时接班心情甚切的马林科夫、贝利亚之手，制造了著名的“列宁格勒案件”。

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借口，是指责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领导不经中央许可，擅自于1948年在列宁格勒举办全苏商品批发交易会，并被告发在1948年12月党代会上，虚报市委领导人“一致当选”的选举结果，欺骗中央。事实远非如此严重，主要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战后地位上升，斯大林意欲立这两个人为接班人耿耿于怀，便从中挑拨，借枝节问题扩大事态，把列宁格勒人的行为上纲为“反中央”和“反党活动”。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于1949年2月21日召开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联席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列宁格勒领导人“反党活动”的决议，对市委和州委主要领导及其有关干部作出撤职处分。事件自然株连到列宁格勒前领导人，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的H·A·沃兹涅先斯基和战后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A·A·库兹涅佐夫，以及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M·H·罗吉奥诺夫。

对列宁格勒干部的清洗，随后一步步扩大。1949年夏，开始大规模逮捕。1950年9月29—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在列宁格勒举行“公开”审讯。“审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审讯后新闻界也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判决书宣布：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吉奥诺夫同中央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П·С·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П·Г·拉祖京等结成“犯罪集团”，“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像当年季诺维也夫分子那样，企图把列宁格勒组织作为他们与党和党中央斗争的支柱。并“在苏联的一些地方安插反党分子”，“从内部破坏党，并篡夺党的权力”。法庭最后判处上述领导人极刑并付诸执行。其他干部则被判处10—15年监禁。

① Кутузов В. А. Называемое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дело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3. 1988.

② 陈启能等编著：《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

为造成列宁格勒的确存在反党集团的印象，按照马林科夫的指示，在列宁格勒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中，包括对原先曾在列宁格勒任职现已调往他处的那些领导人，也进行了大规模逮捕。还在列宁格勒进行了大规模撤换干部的运动。许多人在被撤职的同时也被开除党籍。从1949—1952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共有200多人遭到镇压，2000多名领导干部被撤职，其中1500人是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干部<sup>①</sup>。他们中许多人在被围期间建立了卓越功勋，在严酷条件下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他们无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干部。

如果说“列宁格勒案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战时有过贡献，战后地位上升，敢于逆传统教条行事的那个特定群体进行的一种威慑和整肃，那么，反对“反爱国主义戏剧批评家集团”，罗织“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和“医生案件”，则是把矛头对准所谓“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是对国际上亲美犹太复国主义危险所作的一种病态的过敏反应，其实质，是一场难以掩饰的反犹主义运动。

战时曾驻莫斯科的一位英国记者，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俄罗斯，世界主义现在成了一种哲学理论。它在俄国的政治文献词汇中，同形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维埃情绪……黑格尔主义和对西方的卑躬屈膝一起，占有显著的地位。”<sup>②</sup>这一段话很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的思想政治运动所打击的目标，但这位记者使用的是当时苏联官方所采取的政治用语，如果用时代的三棱镜将其透析，再用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语言加以解读，那么，就可以从特定角度显示出当时苏联社会内部正在酝酿、激荡着的社会思潮和情绪。

实际上，1946—1948年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位英国记者所指出的思想脉络，而1948—1952年的政治清洗运动，则是这一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逻辑发展和继续。批判对西方的所谓“卑躬屈膝”，打击“无祖国的世界主义”，很容易找到这一目标的载体和代表人物。

战争时期，由于犹太民族受到纳粹分子特别残酷的迫害，在世界各地包括苏联在内，客观上都促进了犹太群体的凝聚和团结。为了收集德军暴行的材料，动员世界舆论揭露德寇罪行，同时也宣传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鼓舞苏联和世

<sup>①</sup>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50 - х годов/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Н. Яковлева. М., 1991. С. 318.

<sup>②</sup> (英)《曼彻斯特卫报》1949年4月25日。

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在战时成立了一个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其领导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前国际工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犹太戏剧著名演员米赫尔斯和莫洛托夫的夫人捷姆丘任娜。战时，该组织在联系苏联国内外犹太团体和西方新闻界，在对内对外反法西斯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当时，该组织是合法的，它的活动也受到多方的鼓励，因此，战后保留下来，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联合会。

由于犹太人在苏联数量较多并有重要地位，早在20年代苏联就提出过一种方案，设想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或远东某地，为犹太人划出一块集中居住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案未能付诸实施。战时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之后，由于克里米亚人口稀少，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又重新回到20年代有过的方案上，主张把克里米亚划为犹太区。这便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手中夺取克里米亚”。<sup>①</sup>由此便引发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镇压。

1948年1月，米赫尔斯被克格勃制造车祸杀害。半年多以后，设在莫斯科的犹太语言文献出版社遭到搜查并被封闭。年底，开始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和一批著名犹太知识分子的逮捕。连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和莫洛托夫夫人也未能幸免。在莫斯科和全苏的几乎所有犹太文化机构，包括剧院、学校、报纸，都被查封。逮捕也波及了莫斯科一些工厂的技术专家。对犹太人的怀疑和歧视以至达到这种地步，连在高校招生中也对他们设置重重障碍，其他晋升之阶——入党、参军、进入科研和外交机关，也都遭到各种限制。<sup>②</sup>

由于犹太人大多分布在苏联文化知识部门，并在这里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打击就尤为惨烈，其中，以戏剧艺术界和医疗卫生界一些部门所受摧残最为严重。

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斯大林授意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以该文为号召，立即掀起了一场对犹

<sup>①</sup>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1页。

<sup>②</sup>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5—846页。

太戏剧批评家的政治批判。这场批判声势之大，炮火之猛，实为战后思想政治批判所未闻。为怕人们不明白这批艺术家的民族身份，报刊在点他们的名字时，还特意在括号内标出了犹太姓氏。这样，就使这场批判运动的反犹性质跃然纸上。

正是1949年初向所谓“无祖国世界主义者”——“戏剧批评家集团”进行的这场大举进攻，构成了此后罗织“医生阴谋案”的序曲。实际上，李森科在1948年8月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向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大举讨伐之际，已经牵涉到许多坚持这一科学学说的犹太医学家。1949年2月16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解除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A·Г·古尔维奇的职务。以此为肇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医学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开始了对大批犹太著名教授、大夫和医务人员的追究和迫害。

在当时浓重的反犹主义气氛下，向中央递呈告密信，告发犹太大夫和医务人员的事件连连发生。随着告密信，继之是中央书记处下达委托调查的有关指示。调查结果上报后，经常是随书记处一纸决定，便把被告发者撤职或开除党籍，最后，再由国家安全局将他们逮捕、关押。就这样，对一批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从告发、调查、上报、作出决定，到处分、逮捕，周而复始，循环上演，这几乎成了当时迫害犹太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固定机制和模式。<sup>①</sup>在这中间，一大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追究和迫害。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案件”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下属机构——营养研究所营养医疗医院发生了。1950年7月4日，苏联内务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马林科夫上报了一封告密信，信中告发犹太人在这座医院拉裙带，安插私人，进行所谓“不法宗派活动”，并提供了一长串被告密的犹太人名单。由此开动镇压机器，案情一步步扩大，在按“多米诺骨牌”式发展的一系列逮捕和审讯中，株连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大夫，由此又牵涉到了几年前的日丹诺夫“医疗案”。这样，便引发了著名的“医生案件”。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广播了一条“医生团伙犯罪”的消息：这个医生暗杀集团以有害的医疗方法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安·亚·日丹诺夫和亚·谢·谢尔巴科夫同志就死于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匪帮”，并说，“业已查明，这个医生团伙的所有参加者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

---

<sup>①</sup>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М., 1994. С. 298.



是他们雇佣的忠实走狗”。<sup>①</sup> 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十多位著名大夫，包括给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看病的鲍·科甘教授，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等，都被列入了这个“团伙”，先后遭到逮捕，连他们的家属也未能幸免。在上述一系列案件和“医生案件”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航空工业案件”、“斯大林汽车工厂案件”、一系列“青年社团案件”，以及“明格列尔案件”等等。每一案件又都牵连数以千百计的人。加上在刑讯时有逼供、诱供现象发生，株连、打击面越来越广，这就引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清洗和镇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从文化艺术界到技术界，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无不如此。据赫鲁晓夫证实，在最高领导层，斯大林已在怀疑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并半公开讲述他们的“美英间谍”问题，同时，他对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也在明显疏远。<sup>②</sup> 从十九大确定的党中央主席团名单看，以“新人”替代“老人”，一场“干部革命”的端倪已经显现。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大清洗”的风暴即将来临。正当此时，斯大林逝世了。这样，党和国家才刹住政治“清洗”的脚步而走上了新的轨道。

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就其具体动因和内容而言，虽然同30年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大清洗”运动有所不同，但形成运动的机制和模式是大体相同的：都是由领袖亲自发动，都是在夸大敌情，在浓重怀疑气氛下相互告密，在相互揭发中展开的，并且都有党内派别和权力斗争的背景，都把党内和党外、上层和下层、政治和学术、干部和群众、思想问题和刑事问题等等，搅混在一起。总之，都是斯大林政治模式的产物。如果说30年代的运动与斯大林模式相伴而生，运动促成了模式的形成，模式的形成又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那么，战后的运动则是这一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模式僵化的产物。这一政治模式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结合，把苏联在这一模式下的畸形发展，推向了死胡同的边缘。这预示着，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不可能完全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行进，接踵而来的“解冻”和改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发展。

---

① 陈启能等编著：《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96、401、443—445页。

## 35. 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陆南泉

二战期间，德国侵略者使苏联遭受到巨大损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和烧毁了1710座城市和70000多大小村庄，使大约2500万人无家可归，毁坏了31850家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破坏了65000公里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13000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最为严重的是损失了2000万人。<sup>①</sup>

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这种愿望的实现，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而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并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现出来。另外，还要看到，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

---

<sup>①</sup> 参见（苏）B·T·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的人民来往，从而看到了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为“小酒店民主”。<sup>①</sup>这也反映了人们渴望改革的心理，人民期待着改革机会的出现。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它的地位空前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方面的情况。

战争胜利后，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废除战时实行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有：取消国防委员会，扩大苏联部长会议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改组经济、技术进步与加强生产集约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权力；把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基本职能划分为三种，并有三个经济机构执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并监督其执行，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委）负责；物资技术供应，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国民经济供应委员会（苏联国家供应局）负责；将新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应用新技术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新技术委员会）负责；扩大各部权力。各部有权在规定的的工作人员数的范围内批准企业与建筑单位行政管理机构的结构的编制，可以在工资基金构成中变动某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编制计划方面的权力。那些保证地方需要的许多部门的工业企业，联盟都交给共和国管理；进行价格改革，主要是取消补贴制度与提高许多重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从1949年1月起，规定了新的批发价格，使整个工业部门的批发价格平均提高50%以上；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比例，主要是改变战争时期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制度。改革后，基本建设费用中企业自有资金所占的比重和计划规定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均有大的增加。1949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48年增长59.4%的情况下，经济机构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自有资金的比重提高了185.5%。

---

<sup>①</sup> 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十分明显，以上一些措施，只是恢复战前的体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战时的某些管理体制并未及时取消，如对1940年颁布的处罚旷工和迟到的命令，1941年颁布的《关于军工企业工人和职员擅离企业的责任法》（该法规定擅离企业者处于剥夺5—8年自由刑罚），到1948年5月才正式宣布废止，但实际一直存在到1956年。仅1948年，因擅离企业而根据1941年法令被判刑的就达24000人。根据1940年法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1947年为215000人，1948年为250000人。在铁路和水上运输部门，特别法庭一直存在到1948年5月。<sup>①</sup> 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sup>②</sup> 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列举了战前1940年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sup>③</sup> 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3年取得这些物质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二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却说：“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sup>④</sup> 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就是从二战时期来看，主要也是体现在保证大量农产品征集到国家手里，满足战争的需要。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在这一演说中，用回忆的方式，继续批判党内反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人，说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

---

① 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第89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③ 指的是1940年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1830万吨钢，1.66亿吨煤，3100万吨石油，3830万吨商品谷物，270万吨籽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7页。

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sup>①</sup> 为什么在工业化与集体化早已完成，到了1946年斯大林要讲这么一通话，十分明显，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他搞的工业化与集体化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怀疑的；二是通过工业化与集体化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于是，苏联在战后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

第二，战后，斯大林个人崇拜大大发展，达到了神化的程度。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4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二是广大苏联人民与苏联红军（从广大指挥员到一般士兵）强烈的爱国热情，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三是战前已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适合战争需要的战备体制；四是不应忽视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的作用，这既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像中国等那样的落后国家。没有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将会困难百倍。至于斯大林的功劳，虽然有不同评价，但大量史料表明，对苏联军队取得反法西斯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主要归功于斯大林善于领导的看法是站不住的。由于斯大林在1941年春对军事战略形势所作的不正确估计，对战争一开始造成的严重损失，已被历史证明。造成这一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海军人民委员H·T·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指出的，还是斯大林的领导制度问题，他写道：“斯大林有一种追求无限的权力的欲望，他把军事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战争的情况下，即使个别人可能在极其关键的时刻伤亡，制度应当保证作战行动不能中断。但当时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这方面是没有准备的。”<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掌握着确凿情报材料的机构与权威人士，没有可能向斯大林证明当时局势的危急程度，更没有权力去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局势的出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战争突然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斯大林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据赫鲁晓夫证实，斯大林得悉苏军遭受重创的溃败之后，认为已经彻底完蛋了，苏联已无可挽回地失去列宁所创造的一切了。后来斯大林实际上在1941年6月底长达约一周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7页。

<sup>②</sup> 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5页。

的时间里没有领导作战，而且躺在别墅与外隔绝，不接电话，只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并请求他立即采取措施扭转前线局势之后，他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不仅所有的苏联元帅，而且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都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但他们没有认为必须去更正赫鲁晓夫的讲话。<sup>①</sup> 赫鲁晓夫揭示的上述情况，也许像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在当时不便反驳赫鲁晓夫，那么，在后来苏联出版的《莫洛托夫访谈录》中证实上述情况是事实。<sup>②</sup> 下面我们看看访谈录是怎样讲的：

战争爆发的头几天，“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所注）两三天没有露面，待在别墅里。不用说，他难过得很，郁郁不乐，人们全都不自在，他尤其如此。”

1941年6月22日，“大家来到斯大林别墅，请他发表告人民书，但遭到断然拒绝。众人遂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回答：“是的，是这样，大致是对的。”

丘耶夫问：“（大家）提议让斯大林领导红军最高统帅部，可是他拒不接受。”莫洛托夫回答：“他拒绝了，这当然是对的。”<sup>③</sup>

过去有关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一开始的表现，曾有过上面那种情况的传说，但谁会相信，在中国一直把这说成反革命造谣。正如有的同志说的，要不是百分之二百的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出来证实，谁会相信这些有万分之一可能是事实呢？<sup>④</sup>

我们在指出斯大林在战争中所犯严重错误时，需要指出是：（1）绝不是要贬低苏联人民与红军建立的伟大功勋，而在斯大林时期这一伟大功勋被贬低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苏联人民与红军的功勋显得更伟大了。（2）并不是完全抹杀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少苏联军事领导人与学者认为，到了1943年春苏联红军打了一次大败仗之后，这才使斯大林能够较正确地了解苏德战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1943—1945年斯大林对军队所下达的指示是比较深思熟虑和比较正

<sup>①</sup> 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第780页。

<sup>②</sup> 访问者是丘耶夫，是一位历史学教授，从1969—1986年17年间，前后访问了139次。根据录音访谈后的整理实录而成书，于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

<sup>③</sup> （苏）丘耶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sup>④</sup> 参见严秀著：《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31页。

确的。(3) 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情况，对于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与士兵来说，已造成了斯大林的名字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团结人民、赢得胜利的希望。不仅如此，按照对任何个人崇拜的逻辑，军事上的一切失误与失败，必然归咎于其他将领，而一切成功与胜利都与斯大林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许多当年高呼着斯大林名字去作战的苏军士兵与军官来说，要重新认识斯大林、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自然就不那么容易了。而相反，战争的胜利，不仅掩盖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不论是战前的还是战争时期的，并且使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比战前大大发展了，把斯大林神化了，把斯大林模式也神化了。个人崇拜的基础是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促进了个人崇拜的不断发展。完全可以说，个人崇拜已是苏联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斯大林战后不可能考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强化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也是强化他所需要的制度，从而使国家政治权与经济权作为他的个人工具，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他的个人专政。

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他战后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二战结束后，对苏联来说，已并不存在自外部的现实的战争危险。因此，完全有可能来调整它战时的经济结构，压缩军费开支。由于战后苏联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斯大林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些调整。如 1946 年武装部队人数从 1100 万减到 280 万人，直接的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从 1945 年 54.3% 降到 1946 年的 24%，1947 年的 18%。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战时联盟的瓦解，苏联的军事预算与军队编制也随之增加。据苏联官方的材料计算，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6—1950 年）国民经济军事化吞没了近 1/4 的国民收入。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值要比 1940 年增加 115%，在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 72% 的情况下，机器制造业要增长 135%，这些指标提前超额完成了。1952 年，党召开十九大前夕，在为大会准备的文件中谈到苏联的成就时说：“国防工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950 年与 1940 年相比，航空工业增长了 33%，武器工业增长了 75%，造船工业增长了 140%，在战后五年间按计划总产值，航空工业完成 102.8%，武器工业完成了 103.1%，造船工业完成 106.2%。生产能力、

工人数都在增长。”<sup>①</sup> 这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整个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中，用于“甲”类占87.9%，“乙”类仅占12.1%。而轻工业只完成计划规定的80%多，未达到战前的水平。农业情况最糟。1950年农业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99%。粮食产量为8500万吨（原计划是1.27亿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头3年（1951—1953年），农业计划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

战后，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处于极低的水平，远未摆脱贫困乃至饥饿，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斯大林战后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尽管与苏联加强国防任务的必要性有关，特别面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强军事工业。但问题是，面对国内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把握发展军工生产的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不仅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超出了防御的界限。纵观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实际上一直把经济纳入战备的轨道，这不能不说，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sup>②</sup>

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

---

<sup>①</sup>（俄）尼·西蒙诺夫：《20—50年代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生产和管理组织》，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sup>②</sup>（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饥荒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孩子。根据苏联内务部长的报告，仅1946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13559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因“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被追究刑事责任”。1949年8月，国营农场一名女教师因生活走投无路，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sup>①</sup> 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出现过人吃人的惨事。饿得发疯的妇女杀死亲生的孩子，吃孩子的尸体……<sup>②</sup>

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却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品的占13.2%，在俄罗斯一些州，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sup>③</sup> 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了工也不出力。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消息。1945年7月苏共中央的一位监察委员在库尔斯克州视察后报告说：“关于集体农庄解散的消息……现在在集体农庄庄员中广为流传。”<sup>④</sup> 农庄庄员对上面来视察的干部，总是询问农庄解散的问题。一次，一个庄员对区里来的干部说：“是不是说很快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生活会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益处。”<sup>⑤</sup> 另外，甚至还有许多人相信，解散集体农庄的倡议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斯大林本人。有人还说，在莫斯科成立了研究解散农庄的委员会，并还有人说已经签署了解散集体农庄的命令。也有人分析，斯大林不会解散农庄，如果他要解散农庄，也是美国和英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又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那样。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

---

①（苏）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卷，第578、469—470页；资料来源：《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8卷宗第7项第380页、第319卷宗第192—198页。

② 参见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③（俄）《祖国历史》1998年第3期。

④（俄）《祖国历史》1998年第3期。

⑤（俄）《祖国历史》1998年第3期。

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反而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是：

(1) 对新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947年5月，按20世纪30年代的模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了1950年4月，完成了集体化。

(2) 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流入”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在货币的实际币值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很多的价格交售出去。更有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农庄都无力完成上交计划。这样一来，农庄都欠了大量税款，从而使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性质。另外，1946年10月，苏联成立了直属部长会议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各共和国各州派驻“不属地方领导的中央检查员”，其目的是强化对集体农庄的直接指挥。

(3) 批判“包产小组”，合并集体农庄。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在1947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作了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对农业体制加以改革，主要内容是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应当计算工作的收成（在工作队中则计算小组的收成），使收成较高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相应获得较多的报酬，收成较低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这一改革思想的推动下，苏联从1947年至1950年，在不少地区曾试行“包产到组”，并在乌克兰得到广泛推广。但由于这种改革，与斯大林的大农业、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先进和对农业的全面统制的思想相抵触，很快遭到批判，说它在经济上、组织上与巩固集体农庄的利益相违背，“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sup>①</sup> 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批判说：“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上，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

---

<sup>①</sup> （苏）《真理报》1950年2月19日。

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业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sup>①</sup>“包产到组”试验的天折，安德列耶夫随后也被撤职。与此同时，在全苏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到1951年1月1日，农庄总数就从战前30万个，合并为12.3万个。到了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合并运动才暂告一个段落。

战后苏联农业发展情况表明，斯大林的上述种种措施，并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皇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则低19%。

第五，由于斯大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错误并实行了错误政策，战后使苏联走向“闭关锁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并建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样，不仅使苏联难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使苏联自我封闭起来，使它的经济体制模式不断凝固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即阵营化。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设起来的体制模式呢？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8页。

## 36. 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栾景河

中外学者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已有相当研究，但绝大多数成果的重点，均放在了论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如何煽动与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分裂中国等方面，而忽略了最终导致外蒙古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本文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部分中俄档案史料，对外蒙古独立的基本过程，以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相关讨论。

### 外蒙古要求独立之成因与沙俄的立场

在讨论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同时，我们首先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搞清：一是清政府对外蒙古的特殊统治形式；二是清政府此间对蒙古地区实施“新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

<sup>①</sup>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1976 年再版；李毓澍：《蒙事论丛》，台湾里仁书局，1990 年版；张启雄：《外蒙古主权归属交涉 1911—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七十七），1995 年版；（俄）别洛夫：《俄罗斯与蒙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 1999 年版；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载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樊明方：《1912 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俄罗斯学者卢佳宁的专著《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 1911—1946》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全面的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外蒙古独立的全过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清政府对被称之为“藩部”的外蒙古，统治形式非常特殊，即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理藩院管辖；在地方设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管理，并以盟、旗为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基层政权机构，而在职的蒙古王公，事实上就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的各级官员。<sup>①</sup>应当说，这种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为后来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寄希望于从中国分离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自1901—1911年间实施的“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的“新政”政策，无疑对蒙古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虽推动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各项制度的变革，但在客观上撼动了自康熙年间起，蒙古上层社会所拥有的各项行政权力，这无疑令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并决定从中国分离出去。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早在1911年初，外蒙古高层就开始与沙皇俄国政府联系，为其独立寻求沙皇俄国的政治与军事庇护。但此时的俄国政府碍于时机并未成熟，断然拒绝，并称：“在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未签订中蒙协定前，切勿指望我们提供帮助”。<sup>②</sup>

1911年7月中旬，以库伦活佛为首的蒙古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实施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并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的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同时，库伦活佛面告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sup>③</sup>

虽然俄国驻库伦外交代表与当地王公贵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暗地鼓动外蒙古独立，但得知库伦活佛正式决定派遣“社会各界代表团”前往彼得堡，寻求俄国的支持时，还是不无担忧。特别是当对方提出的在中国当局得知事情真相后，

---

①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中国的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② 《外交大臣致北京公使馆电》，1911年1月2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第1页。

③ 《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夫多夫斯基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7月28日；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以下简称俄国外交文书。

“将向蒙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情况下，请求以某种借口立即把俄军派往库伦，俄军的到来将会阻止中国人之暴力行动”等请求后，俄驻库伦代表深感事态之严重，速电告俄代理外交大臣：“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sup>①</sup>

在接到库伦代理领事的电报后，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致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称：“鉴于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施行新政，并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侵害蒙人应享有的自治权，故在库伦召开会议，现刚结束。”俄代理外交大臣同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彼得堡。我国领事再三劝告他们，在他收到驻北京公使之指示以前，暂勿派出代表团，但从刚收到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车林齐密特偕五名随员已于7月16日秘密前往彼得堡。”<sup>②</sup>

尼拉托夫除向科科弗采夫通报了上述情况后，作为代理外交大臣认为：不论帝国政府对蒙人运动决定持何态度，“此刻我们尚不具备利用这一运动为我国利益服务之条件，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尼拉托夫同时建议，“我认为最妥当之做法当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因为他们提出之请求很重要，需要预先进行磋商，他们暂且可不必来圣彼得堡。”<sup>③</sup>从上述情况分析来看，沙皇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驻库伦领事馆与当地活佛的确有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但蒙人真正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庇护时，还是让对方感到时机不成熟。但鉴于库伦呼图克图与喀尔喀四盟王公特别代表团衔命前往彼得堡，请求接纳蒙古在沙皇俄国的保护的情况下，沙皇俄国政府迫于突发的形势，决定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讨论有关蒙古问题，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在讨论如何对待蒙人的上述请求时，特别会议认为：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

---

① 《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第2页。

② 《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第2页。

③ 《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第2—3页。

极参与解决近东与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的影响是极不适宜的。会议指出，蒙古问题危机的出现，并非出乎俄国之所料，因很久以来俄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俄国驻蒙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但在目前形势下，俄国不易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俄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蒙古实行新政，其农民在俄国边界进行垦殖，用铁路将这条边界附近的居民点与中国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以及中国军队的部署，特别是在靠近俄国边界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让俄国不能不感到忧虑。因此，俄国政府认为，蒙人反对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新政措施，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支持蒙人的意图，完全符合我国的利益”。<sup>①</sup>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施的新政，确实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改变了其文化生活，屯垦戍边，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对蒙古地区统治政治模式的变革，内容上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蒙古上层社会的世袭特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沙皇俄国政府明知参与蒙人的分离运动会导致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但蒙人的举动，符合俄国的利益。

这里的利益诉求并非像一般人以为的是俄国在蒙古地区的经济利益，中国内地向蒙古地区的大量移民，是俄国政府的最大担心。尽管沙皇俄国政府对蒙古王公贵族要求独立的做法持支持态度，但碍于实力有限，顾及当时的中俄关系，俄还是作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即“最符合我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sup>②</sup>

俄国政府虽作出了上述决定，但仍未忘记安抚前来彼得堡的四盟代表团，对其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许我国在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sup>③</sup> 为防止前来彼得堡的代表们担心将来遭到中方的报复，俄国政府答应向中国方面说情，使中国政府与俄国报刊感

① 《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第5页。

② 《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第5页。

③ 《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第5页。

觉此代表团出访俄国首都彼得堡，不具有政治性质。为强化自己在库伦的军事力量，俄政府决定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携带机枪，加强库伦总领馆卫队的力量。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给蒙古地区封建王公及沙皇俄国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认为，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sup>①</sup> 俄驻库伦总领馆在致北京公使馆的密报中称：“喀尔喀王公们因中国内部出现动乱而受到鼓舞，遂决定积极达到脱离中国之根本目的。根据此项计划，他们就向蒙古人提供武器问题，通过总领馆私下与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进行了接触，加强了同我们政府的协商。建议切勿错过中国革命这一对喀尔喀独立有利的大好时机。”<sup>②</sup>

当蒙古王公们看到形势发展对自己极其有利，便于同年11月15日，要求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从各旗召蒙古军队回库伦。尽管三多反对，但此时的事态亦非三多所能控制。18日，王公们正式向三多宣布了喀尔喀自治，并要求三多及属下离开库伦。<sup>③</sup>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清政府在库伦的驻兵，只有办事大臣三多的40名卫兵与近300人的步兵与骑兵，而中央政府驻库伦的军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离开库伦，<sup>④</sup> 因此也直接导致了库伦兵变。

作为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屡次希望与喀尔喀王公举行谈判，但均遭到拒绝。面对已无法收拾之残局，三多在明知库伦乱局有俄国总领馆参与，还是硬着头皮寻求俄国总领馆对滞留在库伦的中国人提供领事保护。此时，三多的卫队同样亦不复存在，其亲信惊慌失措，故三多决定放弃抗议，离开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1911年11月21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一行，在外蒙古王公们提供的12名蒙古骑兵，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派出的10名哥萨克兵的保护

---

① 《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电》，1911年10月13日，俄国外交文书，13页。

② 《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第19页。

③ 《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第20页。

④ 此间，清政府在库伦设有兵备处，总办为唐在礼上校。



下，携2名翻译，黯然离开库伦，于27日抵达恰克图的边界。<sup>①</sup>

12月28日，喀尔喀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曾赴俄乞援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的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sup>②</sup>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呼吁：汉、藏、蒙、满、回同为一体，只因前统治者之压迫，藏蒙才对中国之态度发生变化。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真诚改变这一态度。他期望藏蒙宗教领袖应发挥影响，使人民在精神上恢复同中国之关系等，<sup>③</sup> 但无法改变蒙古的现实。

1912年11月3日，沙皇俄国政府与外蒙古地方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恰好应验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此前提出的“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句话。<sup>④</sup>

尽管沙俄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但面对中国政府的各种交涉，仍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

1913年10月23日，经沙皇俄国政府提出，并由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琪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齐斯签署的关于外蒙古问题声明中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sup>⑤</sup> 同时在中俄双方的照会明确指出：“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

① 《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第20页。

② 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1911—1915》，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③ 《俄驻库伦总领事电》，1912年3月4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第196页。

④ 因文章篇幅所限，有关上述两个专题研究，详见樊明方：《1912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85页。

⑤ 《俄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1月5日，俄国外交文书，第187页。

政府允许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sup>①</sup>

自1914年9月至1915年3月，中俄蒙三方历经40次谈判，终于在1915年6月7日于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并再次明确了中国与外蒙古的法律关系，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sup>②</sup>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这也就是史称的“从自治到撤治”的基本过程。但此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在沙皇俄国的控制与庇护之下。

### 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的基本政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继承了沙俄的立场。虽然苏维埃工农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并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其为独立国家，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sup>③</sup>

1919年8月，车盟、图盟、汉臣三盟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并称“迭经官府及喇嘛王公等会议多次，众意僉同，已呈奉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核准，据呈大总统收回政权，及时治理，俾外蒙全境日臻兴盛”。<sup>④</sup>面对俄国政权出现更迭，俄国红白两军陷入国内战争，已无暇顾及外蒙古问题的历史机遇，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政府总理段祺瑞决定出兵外蒙，派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挟持外蒙古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并软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

---

① 《俄驻北京公使馆致中国外交总长照会》，1913年11月5日，俄国外交文书，第188页。

② 吕一然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③ 《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④ 《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致大总统电》，1919年11月2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第429页。

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同时，中华民国政府撤销了此前签订的《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并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率部在外蒙古驻防。由此，外蒙古再次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919年11月22日，徐树铮公布中华民国大总统令，接受博克多革根及各王公的请求，将外蒙古并入中国版图。<sup>①</sup>

外蒙古独立的过程，绝非像今天人们想象的，即宣布自治，宣布撤治，被中国政府收回，又从中国分离出去。其情况错综复杂，乃是几种势力，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导致的结果。

其一，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秋，在库伦成立了两个地下革命小组，一个由苏赫巴托领导，另一个由乔巴山领导；两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0年合并，随后成立蒙古人民党。该党的成立，无疑使外蒙古独立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此前是外蒙古封建王公利用中国国内政权更迭，政局混乱，而企图乘机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而现在却是在共产国际、苏联支持下的一场革命。二者虽形式不同，但性质相同，那就是需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其二，中国内政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段祺瑞北京政府被军阀吴佩孚、曹錕等人推翻。而兵驻库伦的段祺瑞亲信徐树铮遭到了上述军阀的通缉，逃离库伦，躲到了日本驻华使馆。而此时的库伦，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局面。

其三，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白匪谢苗诺夫的部下恩琴部串入外蒙地区，对苏维埃俄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军事威胁。

1920年8月29日，苏赫巴托致信苏俄政府，请求：（1）给予蒙古人民党以必要的援助，以促使蒙古自治的恢复；（2）委派苏维埃代表常驻恰克图，作为苏维埃政府与人民党之间的联络人。<sup>②</sup>在蒙古人民党发布的《告蒙古人民书》中明确提出，该党“已与苏联军队建立了密切联系；我们力求解放蒙古，建立人民政权”。<sup>③</sup>蒙古人民党的成立，事实上为苏俄步沙俄之后尘干涉外蒙古事务，找到

---

① 《大总统令》，1919年11月2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 1917—1924》，第429—430页。

② 《苏赫巴托致苏俄政府信》，1920年8月29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 1917—1924》，第459页。

③ 《蒙古人民党告蒙古人民书》，1920年底。《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 1917—1924》，第430页。

了更为合适的理由。

1920年底，苏俄政府向蒙古人民党递交照会称：“假如蒙古自治政府真正愿意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那就应该把从白匪谢米诺夫<sup>①</sup>军队出身的恩琴男爵所领导的白匪伪徒驱逐出去”。苏俄政府在照会中强调：“如果蒙古人民自己不能消灭白匪部队，苏维埃政府将出兵协助把他们肃清。”<sup>②</sup>

或许是自身的政权还未得到稳固，也或许是苏俄政府真有别于沙皇俄国政府，在中苏双边关系问题上还是尊重了中国的主权。

1920年11月2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sup>③</sup>致电中国外交部称：“中国虽在库伦驻有充足军队，业经数日，而谢米诺夫残部军兵，仍自由向蒙古境地前进。为驱除此项残兵，中国蒙边官吏愿意俄国赞同派兵赴蒙一节，已于十一月十日达知在案。不知何故，迄今尚未得中国政府关于上项之答复。”契切林在电报中同时强调：“兹应向中国政府声明，俄罗斯共和国以不侵略他人土地为政治原则，现俄国政府拟不将武装士兵开赴蒙境。倘谢氏党徒仍在蒙边一带出没，需俄国协助时，则俄国政府为中俄两国友谊及利益起见，定以武力协助廓清反对革命之谢氏党徒。”<sup>④</sup>

中国对苏俄政府的要求并未予正面答复，但外交部、驻英国公使馆等单位收到的指示是：“俄政府借词越俎，从中有何作用，殊可疑虑；关于派兵赴蒙一节，言词阻止，并将毋庸请援情形，切实告知；外军越界，关系主权，然仍有可以武力协助之言，在我终难承认。”<sup>⑤</sup>同时，中国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转告苏俄政府，彼此尊重主权，取消以前的想法，以免发生误会。

中国政府的确预感到苏俄政府计划出兵外蒙古，围剿恩琴残部的复杂性，担心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苏俄政府在此问题上，却不依不饶。次年3月4

---

① 又称谢苗诺夫。

② 《苏俄政府致外蒙古自治政府照会》，1920年底。《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 1917—1924》，第435页。

③ 又称齐切林。

④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中国外交部电》，1920年11月28日（12月21日收）。《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 1917—1924》，第433页。

⑤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中国外交部电》，1920年11月28日（12月21日收）。

日，苏俄政府再次通过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电中国外交部，要求出兵外蒙古，并称：“库伦为恩琴所据，对俄华均不利，本政府拟派兵入蒙扑灭此种祸根”；“此次出兵，确系拯救俄华人民，期间不受报酬，无需交换利益，且不生条约关系，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sup>①</sup> 1921年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中国外交部电报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

面对中国政府对苏俄军队出兵外蒙古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苏俄政府终于向中方发出了最后通牒。1921年7月18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指责中国政府漠视远东共和国公民的利益，违反多次保证的对远东共和国表示友好及同情的立场。优林在照会中详细列举了恩琴在外蒙古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后，正式声明：“远东共和国政府为军事及政略上之理由起见，不得不出击，以歼灭此地等盗党。”<sup>②</sup> 当然，优林在最后还是表示，在完成此项军事行动后，其远东共和国军队将撤出外蒙古。但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苏俄政府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并未兑现以往的承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10月28日，苏联红军出兵外蒙古，并在年底基本完成了剿匪工作。虽中国政府对苏军进入外蒙古地区屡次向苏方提出抗议，并通过各种渠道与苏俄政府进行交涉，但无任何结果。

不仅如此，蒙古革命政府代表团于1921年秋赴莫斯科，就双方的未来关系确定基本原则，并在11月5日，签订了完全损害中国主权的《苏蒙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俄国劳农政府承认蒙古民主政府为唯一合法之蒙古政府；蒙古民主政府承认俄国劳农政府为俄国唯一合法之主权者”，同时还具体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sup>③</sup>

蒙古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但其政治体制还为君主立宪，即博克多格根为其所谓的元首，1924年5月20日博克多格根去世，导致外蒙古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1924年6月13日，蒙古革命政府宣布外蒙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

---

<sup>①</sup> 《外交部收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函》，1921年3月4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第435—43页。

<sup>②</sup> 《远东共和国外长优林致中国政府函》，1921年7月18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第439—440页。

<sup>③</sup> 《苏俄与外蒙签订〈俄蒙修好条约〉》，1921年11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第462—463页。

国最高权力机构为大呼拉尔。同时，大呼拉尔借鉴苏联的宪法，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sup>①</sup>

此后，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支持更加积极。一方面，苏俄政府明知外蒙古主权乃属中国，但借助“革命”之势，客观上承认其合法的存在，并与其保持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前，即1924年5月30日，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中却又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sup>②</sup> 苏俄政府的上述做法，实质上是打着“革命”的幌子，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长期受内政与外交的困扰，特别是自1931年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后，民国政府根本无力处理外蒙古的任何事情。外蒙古事实上已逐渐从中国脱离了出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卫星国。

### 斯大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外蒙古在蒙古人民的“革命”下，在苏联的具体支持下，事实上已经脱离中国，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没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外蒙古的法律地位问题。这也是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担心与关注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虽然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并未得到中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随时还有可能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去。于是，斯大林借二战即将结束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打算彻底与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

1945年2月11日，由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的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并要求美、英两国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sup>③</sup>

斯大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同意参加盟国在远东地区的对日作战，

---

① （苏）И·Я·兹拉特金著，张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05—211页。

②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40页。

③ 即《雅尔塔协定》，详细内容见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4页。

提出外蒙古、旅大、千岛群岛等问题，要求美、英两国满足其条件；另一方面计划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商谈相关问题。实际上对于苏联而言，不管有没有《雅尔塔协定》，苏联都会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更深的意图在于为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雪耻，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苏联，实现斯大林的远东战略。

1945年6月30日，当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拜见斯大林时，对方就已经暗示宋氏，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为此，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sup>①</sup>

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sup>②</sup>

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仍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可以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对日本战略地位。<sup>③</sup>

在7月7日的会谈中，宋子文首先代表蒋介石表示，需要时间研究斯大林提

---

① 《行政院长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72页。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4页。《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③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5页。《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对外蒙古法律地位的理解是承认外蒙独立，蒙古人自己要求成为独立的国家。宋子文表示，“蒙古人希望组建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中国没有计划让其独立”。<sup>①</sup> 迫于无奈，宋子文表示：苏联在外蒙古有自己的驻军，中国可以同意苏联军队入驻外蒙古，但不能承认其独立。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并表示：“苏联方面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如果中国将坚持既定之观点，那么谈判将不会有任何结果。”<sup>②</sup>

为避免中苏谈判陷入僵局，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之态度，以及中国政府急于要解决东北问题，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主要如下：（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2）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新疆叛乱，使两国贸易与交通得以恢复。（3）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sup>③</sup>

斯大林听完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后，对宋子文以蒋介石电报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颇为满意。尽管中苏双方在外蒙古独立、其主权和宗主权问题上的理解和看法有很大分歧，但这丝毫没影响谈判的继续。宋子文提出将东北问题与外蒙古问题分开处理，但斯大林坚持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东北由中国人组成，而外

---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20页。《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22页。《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③ 《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莫斯科1945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609—620页。



蒙古没有中国人。斯大林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意味着对其的自1921年以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中国）的主权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二十四年。”<sup>①</sup>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作出承诺：关于满洲问题，他愿意作出任何中方希望得到的声明，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也没有支持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国内还有另一个政府，自称为政府，应当由中国自己去解决。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只援助中央政府的要求，斯大林表示自己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强调，自己愿意同中国真诚相处，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应有关系。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sup>②</sup>

研读中苏谈判两轮，共计由斯大林参加的9次会谈记录，就不难发现，每次会谈的内容均涉及外蒙古问题。由此可见，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心中的重要分量。

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4天后，即1945年7月4日，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即前往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晤。斯大林与乔巴山讨论了中苏谈判以及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等问题，还向乔巴山宣读了中苏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草案。对此，乔巴山不无兴奋地表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与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与友好合作的。”<sup>③</sup> 7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设午宴宴请蒙古领导人，在举杯祝酒时说：“一段时期以来，蒙古人内部就与日本，还是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很多蒙古人，包括德王在内支持与日本友好。但我这杯酒要敬那些理解并正确决定蒙古应当与苏联保持友好的领导人们。这些人现在领导着蒙古的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32页。《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sup>②</sup> 《蒋介石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重庆，1945年8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649页。

<sup>③</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档，目录7，пор. 560. пап. 38. 卷宗110，第7页。转引自卢佳宁：《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莫斯科2003年版，第252页。

独立，而那些主张与满洲人、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人却在他们的脚下。为蒙古领导人，为独立干杯！”<sup>①</sup>

斯大林的一席祝酒词道破了天机，谁主张与苏联友好，谁就能获得独立，谁就是正确与英明的。但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真是为了外蒙古的民族独立吗？答案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两个多月，两轮，即9次重要会谈，终于签订了明显有损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在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后，将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中方确认将根据外蒙古全民公决之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同年10月20日，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此乃形式大于内容，但毕竟为双方在解决外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找到了一个可下的台阶。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外蒙古由此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正式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 几点基本看法

### （一）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成因非常复杂

自1911年起的早期的自治与撤治，乃其活佛、封建王公，因不满清末新政，担心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及地位而导致的。他们趁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国内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际，在沙皇俄国的庇护下寻求自身的利益。沙皇俄国在外蒙古自治问题的态度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由原来的反对，到后来的坚决支持，这与沙皇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沙皇俄国后来力主外蒙自治，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中国的汉人充斥外蒙地区，对俄蒙边界，包括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军事，以及人口安全的威胁。但碍于当时沙皇俄国政府的实力，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档，目录7，пор. 560. пап. 38. 卷宗110，第8页。转引自卢佳宁：《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莫斯科2003年版，第253页。

他也只能在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的条件下，支持外蒙古的自治，以及分裂活动。

### （二）1920年间，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外蒙古走向分离中国的重要一步

正是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外蒙古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因素，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1924年间蒙古共和国宣告成立，外蒙古独立已经成为事实。

### （三）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谈判期间再次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

外蒙古虽然客观上独立多年，但一直未得到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不仅对外蒙古，特别是对苏联非常不利，也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势下，外蒙古再重新回到中国。因此，斯大林决定利用苏联计划出兵中国东北，结束中日战争的难得机遇，与有求于苏联的中国政府讨价还价，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以去除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心病”。

在捍卫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其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彻底地支持外蒙古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苏联所奉行的“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利益”，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仍反对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无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但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获得独立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苏联“功不可没”。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段难以忘却、辛酸的记忆。

## 37. 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罗肇鸿

苏联的建立和解体都是 20 世纪的世界大事。苏联的兴亡在人类历史上记录着曾经出现过不同以往的社会制度，俄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中推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中杀出了一条新路。一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让人看到了希望。

但是经过 74 年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又消亡了。它不仅涉及苏联本身，而且连带东欧一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改制易帜。

对于苏联衰亡原因，迄今为止，国内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写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论文，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在这里，笔者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就是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这个误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妨碍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获得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了解和认识。第二，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仇视和扭曲世界市场的功能，使一大批国家脱离了世界市场，阻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导致这些国家封闭落后，无法分享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停滞。与此同时，原先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招致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抱怨和不满。

## “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歪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

### （一）敌视市场是错误理论形成的根源

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无论实行哪种社会制度都绕不过这道坎。斯大林没有看破这一点。虽然他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从资本主义市场捡了不少便宜，可是却没能把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做法继续下去，反而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使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列宁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没有货币、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一个中心（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指挥。但列宁很快发现，这种向共产主义直接冲击的办法行不通，立即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由消灭商品货币到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政策显然是成功的。迄今为止，即使苏联解体以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十月革命后最好的年代。

斯大林没有沿着列宁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对市场始终采取敌视态度，认为它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渊藪。集中体现在对价值规律的态度上，他一直想禁止价值规律的作用。有时，经济形势不好，不得不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但也绝口不谈市场，只说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价值规律在苏联命运多舛。它始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异己之物，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价值规律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消灭—承认—又消灭—重新承认或半承认的曲折过程，即使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临时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将来总是要消灭的。列宁逝世后仅过了几年，斯大林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紧张，物资短缺重又显现。因此，20世纪40年代初又不得不再次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要严加限制。到了1952年斯大林发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纵观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苏联的政治家们虽然视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的异己，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一心想消灭至少是严格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凡经济情况好转，便会提出废除或限制价值规

律的作用。由此又导致经济情况恶化，不得不重新请出价值规律这尊神来调节经济生活。一俟经济再次好转便又故伎重演。社会主义同价值规律这场官司打了近70年，直到苏联解体价值规律以另一种形式取得胜利而告终。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无情，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仇视市场反对价值规律开始，最后却以盲目崇拜市场而告结束，得到的是国家的解体。

不可否认，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建立“经济合作互助委员会”都同敌视市场经济有关。

## （二）“世界革命”战略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提出

世界革命从广义上说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也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所以，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sup>①</sup> 不过应该指出，完整的世界革命战略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它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时间里，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有时明显有时隐蔽地予以贯彻和实施。

列宁的“世界革命”论是根据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如《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最著名的当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综观列宁的这些论著，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可以行动起来推翻这个最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221页。

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sup>①</sup> 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sup>②</sup> 现在看来，虽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乏深刻的分析，但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则不符合实际，至少带有某种主观和空想的浪漫色彩。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他在1918年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sup>③</sup> 他在1919年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sup>④</sup> 但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并未实现。原先预计在欧洲会很快出现的革命形势也没有发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反倒趋于稳定。后来，列宁根据形势的发展修改了他的观点。他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sup>⑤</sup> 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sup>⑥</sup> 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修正没有引起联共（布）的重视。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用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派，在党内获得了领袖地位，而且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不仅继承了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的消极面推向极端。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就是他的代表作。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特别是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已经包含有主观的成分，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我适应和调节的能力。但列宁毕竟还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修正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则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总危机理论起直到1953年逝世为止终未见有丝毫改变。

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过于简单，只是建立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而且把危机同战争进而又把战争同革命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他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30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00、117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77、284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1—64页。

⑥ 《列宁回忆录》第4卷，莫斯科，1969年，第26页。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成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他还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sup>①</sup>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战争和革命联系起来的。他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sup>②</sup>

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分和主观因素，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趋势和可能，特别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离开了客观实际和可能性。因此，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斯大林也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重新趋于稳定，除了苏联以外暂时还不可能有其他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援苏联，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不成熟，现实情况反而说明，苏联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是进行世界革命和保卫苏联的安全。两者相辅相成。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加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的安全，则有利于世界革命。由于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目标了，所以，斯大林便

---

<sup>①</sup>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1日—9月28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4—45页。

<sup>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2—223页。



更加重视保卫苏联的安全。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使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满心以为新的世界革命风暴又要到来了。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发布指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曼努伊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上（1931年3—4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1918—1919年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sup>①</sup>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把这次经济危机当做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集中表现，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垮台。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尽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不是总危机。斯大林夸大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扭曲了列宁关于“垂死资本主义”的理论。

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又不是太好，需要转移视线。由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打击面过宽，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继而又进行大清洗，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斯大林担心有人会清算他的这些错误。正当此时，天赐良机，资本主义大危机及时送上门来。斯大林抓住机会，一方面，作为动员民心的法宝；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做压制反对派的撒手锏。更重要的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得越玄乎，世界革命的形势越是迅速到来，就越是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逃避责任，使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

### （三）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

从苏联成立那天起就立志要搞世界革命，决心实现“天下一片红”。为了搞世界革命，为了说明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斯大林提出了总危机理论，指示各国共产党起来推翻本国政府。但是，理想并未成真，斯大林的后继者反倒把苏联自己赔了进去。

世界革命战略和总危机理论害人害己，危害不浅。害人是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多作评论。但是，由一个中

---

<sup>①</sup> 《共产国际与资本主义危机》，见《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1册，莫斯科，1932年，第42—43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的思想》，载（俄）《近代史》1995年第5期。

心统一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实际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真正“主人”是斯大林，由他发号施令，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斯大林为了同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他在1943年5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也承认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这种办法不好，决意解散共产国际。他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sup>①</sup>第二天，共产国际便被宣布解散了。

虽然共产国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也在1953年逝世了，但是，世界革命和总危机理论的贻害并未完结。这种贻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联要当头的思想根深蒂固，后来又发展成为霸权主义。第二，世界革命战略演变成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两霸争夺搞得世界在几十年中不得安宁。当然，这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干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斯大林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联要当头，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延伸。1946年3月，斯大林在《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里说：“苏联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指中东欧国家——引者）内能有对于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怪有人说东欧国家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1947年9月，成立欧洲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之后，也把苏联“大清洗”带到这些国家。由苏联操纵的镇压浪潮无情地席卷了东欧各国共产党，使得这些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对苏联失去好感和支持。后来，当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的时候无人感到惋惜，甚至暗自窃喜，足见苏联当局同这些国家结怨之深。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固然

---

<sup>①</sup> 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a. e. 11. 转引自菲尔索夫：《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近代史》1992年第2期。

难辞其咎，公正地说，斯大林也应该负一部分历史责任。

同样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苏联霸权主义思想实在说乃萌发于斯大林。根据主要有三条。

第一，斯大林首创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战后，亚洲和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sup>①</sup>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建立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

第二，斯大林一直主张输出革命。他在上书中说，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可以使他们了解苏联的发展道路，也即是苏联模式。他说，“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sup>②</sup>

第三，顺昌逆亡，唯我独尊。斯大林在国内专横霸道，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一言九鼎，别人不容置喙。更为严重的是，谁对斯大林持异议，轻则入狱坐牢，重则秘密枪决，永不见天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治理下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冤假错案最多的。上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的“大清洗”由于卫国战争被掩盖起来了。1947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闹独立性”便被开除出情报局，诬陷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嗣后的镇压浪潮席卷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党。波兰受此案诬陷并被镇压的除一批中央领导人如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宾科夫斯基等人之外，普通党员受牵连遭开除的有20万之众。<sup>③</sup> 在匈牙利，审讯并处决了以书记处书记伊克·拉斯洛为首的19名领导人，全国有100万人受到监视，100人被处决，5000人遭逮捕判刑，1951年5月政治局委员卡达尔被捕。拉科西从1945年任匈共总书记，他的镇压活动

① 《斯大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4页。

② 《斯大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7、581页。

③ 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4页。

主要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前。<sup>①</sup>在保加利亚，以政治局委员、保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斯托夫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处决，受此案直接牵连的干部达1080人之多，被清洗的党员有9.3万人，保加利亚的冤案还伴随着日夫科夫等人的夺权活动，镇压特别残酷。<sup>②</sup>此外，被无情镇压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佐治，罗马尼亚的鲍科尔、鲁卡，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等一大批领导人及干部和党员，他们的共同罪名都是“反苏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帝国主义间谍”、“刽子手”。<sup>③</sup>由于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在中国搞革命，斯大林一直耿耿于怀。1949年底，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斯大林近两个月不见面。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命令他“你到他（毛泽东）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去见了毛泽东、谈了话，回来向斯大林汇报说：“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sup>④</sup>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对毛泽东宽容地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sup>⑤</sup>据说，这本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宽恕一个违抗军令、但作战取胜的将领苏沃洛夫时说的一句话。活脱脱一个君臣对话，哪有兄弟党领导人之间的平等态度！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有勇气对毛泽东说出这句话，权代道歉。他的后继者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四） 曲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欧洲国家包括战败国的经济得到恢复；第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扩大了。世界人民经过这场战争的洗劫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经过战争劫难的人民获得一

---

① 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0、65—66页。

② 铭真：《日夫科夫与保加利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4页。

③ （苏）乌克兰科学院国外社会与经济问题研究所：《国际和平与进步力量的团结》，基辅，1990年俄文版，第45页。转引自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④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⑤ 周文祺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但是，这种形势没有出现。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急剧壮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决意要把社会主义这股“祸水”堵在“铁幕内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封锁。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纵有千般热情搞建设，也无法一门心思只顾它。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又一次陷入了误区，依然坚持总危机理论。他认为，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着“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完全脱离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主要表现在：

第一，违反辩证法，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内部调整的可能性。事实上，经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经济在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时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曾经在发达国家作为主流经济学流行开来，时间长达几十年。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余地还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经济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就不会完全消失，就会周期性地表现出来。但是，它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在某一次或几次危机之后死亡。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总危机理论的时候是因为受当时大危机的影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1952年还坚持总危机的说法就离谱了。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还有调整和改革的可能，它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不仅大大向前发展了，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走上欧洲联合的道路。当然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事了。

第二，忽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这使斯大林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和修正理论和政策。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革命性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恰恰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科技革命的成果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开端，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科技革命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了世界新产业链的形成。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又使得一批后进国家的生产力得到发展。斯大林在阐述总危机理论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把思想禁锢在原先的框框里头。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建设和革命，犯错误、出乱子当

然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逝世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并未得到纠正，反而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苏联要当头，要输出革命，让更多的国家接受苏联模式，就必然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搞军备竞赛首先就要同美国争霸世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而又危险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却要支撑起同美国一样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机器，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它让路。斯大林时期原本就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苏联的轻工业极端落后，严重影响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为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工业的发展就更加畸形了。轻工业落后，农业凋敝，民用品短缺成了苏联经济模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人民中的不满和抱怨在积累和加剧，他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群众系统反抗的原因。

有关苏联军备竞赛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笔者在这里只想说明，一方面，苏联实行军备竞赛战略同斯大林的理论 and 思想有关。把责任全部推给他的后继者是有欠公允的。另一方面，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这种积累起来的矛盾只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相配合，就可能给苏联体制本身造成灭顶之灾。苏联解体的过程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外部环境影响的作用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苏联国内经济衰败，政治混乱，民族纷争，才是最终把苏联推上解体不归路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后，遗留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专家学者都应该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发明“总危机”的故乡恰恰发生了总危机？原来他乡是故乡！

## **“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苏联同 世界经济的大潮流隔绝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在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有了20多年的长期繁荣。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使苏联特别是斯大林错误地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一方面，把

社会主义阵营当做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基地，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隔绝开来，从而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 （一）“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内部没有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快就根据雅尔塔协定建立起两极体制。欧洲和亚洲有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志的，但胜利之后他还是表示欢迎。一批国家同苏联一样搞社会主义，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当然是高兴不已，因为至少是部分实现了世界革命的理想。所以，他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看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成果。而且，他还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视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表现。

1947年，苏联退出马歇尔计划之后胁迫东欧国家与西方相对抗。1947年7—8月，苏联分别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叫做“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1月，成立常设的“经济互助委员会”，<sup>①</sup>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其实，它根本不是在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根据行政命令行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至少是很少起作用。

如果苏联参加了马歇尔计划，或者苏联退出其他东欧国家参加，历史将会怎样演变呢？也许苏联可以像战时利用“租借法案”那样利用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恢复自己的经济。也许东欧国家会更快地融入欧洲。也许美国和欧洲国家压根就不愿意帮助苏联发展经济。但从结果来看，显然，西欧国家迅速恢复了经济，而且逐步走上联合之路，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却经历了停滞和落后局面，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彻底垮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关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以及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实践，阻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延缓了欧洲联合的进程。

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正式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

---

<sup>①</sup>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页。

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他还说，是“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息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sup>①</sup>

斯大林说，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企图窒息它们，这并没有说错，是确实的。但是，他对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却是错误的。

先从政治方面说。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内部性质来说，它是受苏联控制的，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斯大林却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他还夸大了苏联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而忽视了“互助”，即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援助作用。他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sup>②</sup>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经济力量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提供了巨大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但是，苏联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和经济合作的不平等性质，导致“经互会”内部合作的不协调和平等互利性质的破坏也是造成它瓦解的主要原因。

再从经济方面说。既然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市场，那就应该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经互会的运作却是政治多于经济。

既然是一个世界市场，那起码要遵循比较利益原则在成员国内部进行国际分工，建立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补偿机制，在进行贸易时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等等。但是，这些原则如果说不是完全忽略至少也是置于不重要的位置。“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分工大体上是根据政治意愿进行的。严格说来，它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

反过来看，斯大林对合作的前景倒是信心满怀。他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3、594页。

<sup>②</sup>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4页。



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sup>①</sup>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超过反而大大落后于邻国，而这些邻国中有的原先同“经互会”国家的水平相近或者稍差一些。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经互会”存在40多年时间里，其成员国并没有向西方国家大量输出商品，由于国内商品短缺，反而要从西方进口商品。人民也以拥有“洋货”而自傲。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对“经互会”体制本身造成冲击。

从“经互会”的外部环境来说，斯大林的认识也是完全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个市场理论是总危机理论的延伸或继续。在上面引述的话中，斯大林明确说过，两个市场的形成“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总危机理论的缺陷也就是两个市场理论的缺陷。关键是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可能性。在两个世界市场理论中，斯大林还把总危机加深狭隘地理解为“市场的缩小”。他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斯大林还因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然有效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sup>②</sup>很明显，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失去东欧和中国市场就使得总危机加深了。在这里，说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掠夺原料的狭隘范围内。其实，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战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它们另立炉灶对资本主义世界销售市场的影响并不大。更重要的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恰恰说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得对原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大下降，生产效率却几十倍成百倍地提高。科学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4—595页。

<sup>②</sup> 《斯大林文集》，第595页。

技术革命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加速是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斯大林由于理论上的短视，给“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斯大林断言“经互会”这个世界市场将很快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输出商品的情景并未出现，反而产生了另一种景象，即商品短缺。“经互会”成员国内部普遍出现崇拜洋货，追求洋货的现象。难怪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短缺经济”。

## （二）创建“经互会”，掐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地区集团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的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使生产率迅速提高。

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视野，而且还使它成为计划人员的思维定式，害得一些国家跟着倒霉遭殃，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割断了世界产业转移的链条。“经互会”这种封闭式经济集团，隔绝了世界市场，使得它不能在世界市场上获取比较利益。更主要的危害还在于，它使“经互会”市场脱离了世界产业转移的链条，妨碍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的世界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继而又在80年代出现了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浪潮。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迅速地使它们的经济上升到新的阶段，出现了诸如“亚洲四小龙”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果说，在存在一个“经互会”之时，在封闭条件下尚可偏安一隅，那么，待到“经互会”瓦解以后就会发出“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却为时已晚。

第二，阻隔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辐射波”。二次大战后正逢新的科技革命迅速开展，并且得到普及，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观苏联的情况却是十分有趣。什么科技革命、集约化经营一类的论著汗牛充栋，企业就是没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去接受和实施。因此，虽然苏联的科技人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同苏联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关系极大。

第三，远离了世界市场的竞争。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得苏联的企业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既无近忧也无远虑，经济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俸禄和奖金。

在这种内外条件的夹击下，苏联经济终于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就连苏联过去引以为豪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风光不再，悄然逝去。只要看一看 80 年代苏联和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就可清楚。选择 80 年代是因为正好是苏联解体前的 10 年，很有代表性。

苏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比较（对上年增减%）

	1981—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苏联	3.7	3.3	2.9	5.5	3.0	-2.0
美国	2.8	3.2	3.5	4.5	2.8	0.9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9 年；（苏）《经济与生活》1991 年第 5 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91 年 11 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是逐步下滑的，除了 1985 年以外，那一年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加速战略，片面发展机器制造业，次年，速度又降了下来。直到解体的前一年即 1990 年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倒是实现了稳定增长。1990 年是美国经济发生了经济危机，所以经济增长率下降。

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单纯是由于上述一个原因造成的，但脱离世界市场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内部，不在外部。如果苏联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西方国家纵有千般阴谋，万种诡计，也是不能在短期内搞跨一个得到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政府的。

### （三）封闭发展，反差巨大

从“经互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或者证实一个原理：在当代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开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凡是实行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封闭的国家。亚洲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拿西欧来说也是如此。西欧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经历了煤钢联营、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欧洲共同体直

到实现欧洲单一货币，开放和联合的程度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改善。

观察一下“经互会”的情况正好相反。几十年如一日，固然不能说合作的程度没有提高，但始终囿于“经互会”的小圈子里。撇开苏联使“经互会”服从自己需要这一层不说，单就坐井观天、孤芳自赏这一条就足以使得“经互会”成员国落后于世界大潮。“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同外部世界形成巨大反差。另一方面，“经互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同西欧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除了一些初级产品，其他制成品很难出口到发达国家去。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互会”瓦解之后，“回归欧洲”的口号如此受到人民的欢迎。东欧国家在脱离苏联阵营之后都置俄罗斯的反对于不顾，急于加入北约和欧盟，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由于忽视甚至敌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特别是错误地认识外部世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调整 and 改革的可能性，夸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制造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自我孤立于或者隔绝在世界市场之外，在封闭状态下越来越使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脱离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前进步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命运。当我们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有人强调苏联最后一个领导人的责任，笔者觉得不免有失公允。实际上，从源头上说，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做法是应该负历史责任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是只是在后期才犯下错误，在他执政之初就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实行过错误的政策。就拿上述所指出的两个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来说，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压制、束缚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掌握大权的领导人对历史的发展负有巨大的历史责任，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毋庸置疑，斯大林歪曲和敌视市场、建立“经互会”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后来出现的经济停滞，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等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斯大林自己都没有想到，经济规律竟如此无情，他从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开始，从仇视市场开始，苏联最后却是被崇拜市场的势力所淹没。他想建立一个理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却是苏联本身的解体。斯大林原以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同资本主义平行的世界市场可以蓬勃发展，甚至超过后者，但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却如此顽强，世界经济区

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竟如此强大，最后导致“经互会”的瓦解。

## 人民继续谱写历史

苏联解体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遗产，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可以总结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在苏联解体之后预言“历史终结”的学者坦承他错了，因为历史并未终结。欢呼柏林墙倒塌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痛苦折磨。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锐。原苏联东欧国家人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实现。

但是看一看 21 世纪的世界，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活力地向前迈进。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 （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完整性

本世纪的经济史已经证明，市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从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几乎占人类 1/3 的国度里，曾经企图取消市场，但没有成功。事实恰恰说明，迄今为止，市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绕过市场而采用其他资源配置手段，不仅代价非常高昂，而且无功而返，不得已又“再续前缘”。在现代条件下，恢复世界市场的完整性对于保证各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地区集团化和全球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又相继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范围更加扩大。所以也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比如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 and 自由化等，依然是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对金融事业的管理，都是保证经济健康和平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2008 年美国首先发生次贷危机，由此演变成金融海啸，继而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是何等重要。要克服经济危机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全球化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 （二）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

认清时代的性质，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由此制定出正确的国际战略，对一个

国家的发展关系重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然要影响到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或者有利于资源配置，或者导致资源配置上出现大的偏差。为了国内的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国际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开放的战略。

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是无法开放的。试想，在西方国家联合干涉苏维埃的时候怎么有可能开放，即使开放了西方又怎么会接受苏维埃呢？但是，由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同西方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问题在于，斯大林很快就扭转了新经济政策的方向，或者说停止实行这个政策。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倒是利用危机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斯大林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制造了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来也有机会把战时苏联同西方的合作关系继续下去，利用战时实行“租借法案”的经验参加“马歇尔计划”，争取比较快地恢复经济，同西方建立过得去的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斯大林根据总危机加深的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市场——“经互会”。从此，同世界市场割裂开来，给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当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举完成。不过，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制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国际战略却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

### （三）和平共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一个中心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1943年，斯大林由于要同美、英等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解散共产国际，不坚持各国共产党首先去推翻本国的政府，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惜的是，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共产国际的做法，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又当了阵营的头，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一大片国家，对它们发号施令，而且在这个小天地里实行封闭式运转。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又把斯大林处理国际关系的坏榜样发展到极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实行家长式统治，自封为“老子党”，把其他国家的主权视为“有限主权”。在阵营外，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阵营内，唯我独尊。这种体制肯定长不了。在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实行霸权主义更加行不通。协商与对话，实行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才是符合潮流的正确选择。

苏联已是明日黄花，昔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是否就会更安全？两极体制已经崩溃，世界正在迎来多极化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是一个需要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专家学者认真研究探讨的大问题。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富足、更和平的环境下，未来应该是更美好的。

## 38. 冷战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左凤荣

“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对立与对峙的国际关系的结构和现象。它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特征，表现为除军事热战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对抗，严重阻碍了各国之间正常的交流与合作，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关于冷战起因与发展，过去我们长期沿用苏联的看法，认为冷战是美国挑起的，凯南的 8000 字长电报、1946 年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1947 年美国杜鲁门提出援助希腊、土耳其，防止它们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推行，使冷战格局最终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而成为雄踞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大国。在经济上，它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的国家，当战争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已达 200 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 330 亿美元的 2/3；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 1/3；它的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在军事上，在欧战结束时，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高达 1100 多万，垄断了核武器，有 1200 艘大型军舰（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海军已远超英国皇家海军，无有与之匹敌者，可以向世界各地快速输送兵员。<sup>①</sup> 在政治上，美国已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保护与控制之下，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成了它的手下败将，于是美国渴望领导世界的欲望难以按捺。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

---

<sup>①</sup>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38—439 页。



统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sup>①</sup>在准备于1945年4月13日杰斐逊日的讲演稿中，罗斯福写道：“强大的力量要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作为美国人并不打算拒绝接受我们的责任。”<sup>②</sup>美国追求领导世界与独霸全球，不允许出现挑战者，冷战的爆发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说苏联只是被动迎战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欧洲的实力首屈一指。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十分强大，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土，改善了西部的战略环境；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是，苏联也存在致命的弱点，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损失的军民总数为2700万—2800万人，有1710座城镇、7万多个村庄、31850个工厂、6500多公里铁路和4100个车站被毁，40%以上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被洗劫一空。1946—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5，农业产值仅是美国的1/2，基建投资仅是美国的24%，而按人均计算则更低：国民收入为17%，工业产值也是17%，农业产值为42%，基建投资1/5。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选择应该专注于国内建设，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让老百姓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斯大林却没有这样做，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扩大和维护势力范围上，加重了盟国间的不信任，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苏联的扩张倾向加剧了盟国间的不信任

斯大林领导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斯大林也

---

<sup>①</sup>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sup>②</sup>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2页。由于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该讲稿未及发表。

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1941年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曾说：“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国人民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或是对亚洲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sup>①</sup>而在实际上，斯大林的做法与其说法相距甚远。

从1944年开始，随着苏军越出国境作战，斯大林对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加，引起了丘吉尔的不安。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拿出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

罗马尼亚

俄国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国（与美国一致） 90%

俄国 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75%

其他国家 25%<sup>②</sup>

丘吉尔意在限制苏联的行动，尽量保住大英帝国的利益，但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份建议，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两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比例为：苏联 80%，英国 20%，在南斯拉夫仍为 50% 对 50%。<sup>③</sup>这说明斯大林并没有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没有自私的目的，实际上苏联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与其他大国进行争夺了。

英、美、苏三大国首脑曾在1943年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讨论了对德协同作战与战后的安排等重

---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②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斯祝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6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7—338页。

③ 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大问题。斯大林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想尽量获得更多的领土和其他利益。当丘吉尔提出斯大林的这些做法与苏联所宣称的原则不相符合时，斯大林公开说自己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问题上“已成了一个保守党人士”。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左）、罗斯福（中）、斯大林（右）及其外长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会晤，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新华社稿）

委员会制定出具体计划；（3）在投降条款中增加一项，写明德国将分割，但不详谈。”<sup>①</sup> 由于德国被苏联红军和英美的军队分区占领，各国在其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制度，最后，德国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

在这些会议上，斯大林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美英两国领导人，尽量索取更多的赔款、强取别国的土地、侵犯小国的主权。斯大林是分割德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在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提出要不要分割德国的问题，丘吉尔提出应建立一个除普鲁士以外的多瑙河联邦时，斯大林说：“我不喜欢成立几个新的联邦国家的计划。既然决定分解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罗斯福建议将德国分成五个或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这个削弱德国的方案可以研究。”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认为总统的建议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即（1）原则上同意德国应予以分割；（2）委托外长委

<sup>①</sup>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2页。

斯大林竭力获取别国的领土，扩大自己的版图。他提出苏联帮助波兰把边界西移至奥得河，波兰则放弃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苏联还要求把沿涅曼河左岸一带的东普鲁士北部，包括蒂尔西特和哥尼斯堡城划归苏联，苏联直接从德国得到了大约 13.8 万平方公里土地，获得了不冻港。斯大林的理由是：“俄国人遭受过苦难和流过这么多血，他们渴望得到一些领土，来略微满足千百万在此战争中受过苦难的居民的心意。”苏联在坚持继续占领芬兰的领土时，还向芬兰这个小国提出索取 3 亿美元的赔款。当丘吉尔提出向芬兰这个穷国要赔款不大合适时，斯大林坚持他们可以用物资支付。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条件：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端归还苏联，租借旅顺和大连港及其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对罗斯福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无法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对日作战。最后，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背着中国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外蒙古现状须予以维持；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须予以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还苏联。斯大林这种行为与帝国主义者没什么区别，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参加者与主力，也成了苏联宰割的对象。苏联还于 1944 年 10 月 10 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对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不仅收回了沙皇失去的权益，还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他还不满足，写信给杜鲁门，要求占领日本北海道的北半部，被拒绝。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 687707 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自恃苏联已经强大，不断向盟国施加压力，争取得到更大的利益，于 1945 年 6 月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土耳其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交给苏联；土耳其必须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军事基地；修改 1936 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但是，美国只同意满足苏联自由进出海峡的要求，不能接受苏联控制海峡。苏联却不肯放弃这一侵犯土耳其主权的无理要求，于 1946 年 8 月 8 日再次向土耳其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与土耳其共同负责对海峡的防御，遭到了英美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甚至准备以武力来对付这种侵略。莫洛托夫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我提出过由我们控制两个海峡。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是，我应当完成对我的委托。1945年，我在战争结束后提出了这一问题。海峡应当由苏联和土耳其守卫。这是不合时宜的，无法实现的。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也有错误。

“我们对土耳其曾有领土要求……斯大林晚年变得有些自高自大，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不得不重提当年米柳科夫提出过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斯大林说：‘让我们来施加压力，达到共同管理！’我对他说：‘他们不会给的。’斯大林说：‘你向他们提出要求！’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奢望从伊朗那里得到土地，把他们共和国的领土扩大近一倍。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试探，却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还曾经企图得到与巴统毗邻的一个地区，因为以前格鲁吉亚人曾经在这属于土耳其的地区居住过。”<sup>①</sup>

战争结束后，苏联拒绝按期从伊朗撤出军队，以种种借口拖延撤军。苏联要求得到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了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在苏联的策动下，伊朗民主党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搞自治。面对苏联这个强大的对手，伊朗向美国呼吁请求保护，并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最后，在形势的逼迫下，苏军不得不撤出伊朗。

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促进了美英联合对付苏联，加深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猜疑和敌视，使本来就已变得脆弱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正是以此为借口，美国的冷战政策出台。

苏联还在其他地区谋求利益。当讨论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问题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盟国施加压力，苏联需要利比亚。当莫洛托夫提出苏联要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大喊：

“这是休克，休克！你们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能打赢战争，但不善于运用胜利果实。俄罗斯人仗打得很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往往吃亏。苏联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要吸取沙俄的教训。于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西方提

---

<sup>①</sup>（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出了很多要求，特别是在波兰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上寸步不让。当谈判波兰的边界时，苏联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丘吉尔提出异议，说：“利沃夫从来就不是俄国的城市”时，斯大林则回敬说：“那华沙曾经是俄国的城市。”莫洛托夫回忆说：

“在波茨坦会议讨论波兰边界问题时……斯大林就‘寇松线’说：‘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俄国人竟连寇松和克莱孟梭都不如吗？……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乌克兰人会怎么说呢？他们准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不如寇松和克莱孟梭更能维护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利益。’”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干得确实很出色。1945年4月25日斯大林给杜鲁门发了一封强硬的电报：“显然，你们不同意苏联有权达到在波兰建立对苏友好政府的目的，苏联政府不同意在波兰存在对苏敌对的政府。这一目的一定要达到，因为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的土地上流了血。”<sup>①</sup> 华盛顿承认苏联的合理利益，使东欧不要成为对苏不友好政策的基地，但是，他们要求东欧不受外部的控制。斯大林违背了已经达成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1946年初迫使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离开波兰逃往西方。从战后斯大林对东欧的政策可以看到，“斯大林已经表现出他在使自己从内部得到更大安全方面做得多么过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了他的国家从未有过的安全，但他仍认为不够。他那无法满足的对安全的追求是东西方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尽管他和他的西方伙伴们都有一种愿望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易于相处的但不一定是真诚的关系。尽管即将到来的冷战既不是蓄意制造的也不是意料之中的，它仍然是注定要来的”。<sup>②</sup>

斯大林奉行实力政策，早在战前就表现出来了，正像莫洛托夫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之间，如果它们想要达成协议的话，就必须分清：那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而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sup>③</sup> 苏联与德国划分过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后，斯大林实际上也是按这一思路行事的。1945年雅尔塔会议期间，莫洛托夫拿着宣言的草案来找斯大林，对他说：“好像有点过头”，斯大林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去加工吧。我们以后可

① 《档案披露的秘密》，莫斯科1991年版，第12页。

② （美）沃伊捷赫·马斯特尼著，郭懋安译：《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③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26页。

以照自己的方式去执行。关键在于力量对比。”<sup>①</sup> 西方国家对苏联早有戒心，苏联在战争进程中和战后的行为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斯大林这种凭借苏联实力满足帝国野心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加强盟国间的信任与合作。

### 斯大林不合时宜的演说，催生了丘吉尔的冷战宣言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颂扬苏维埃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取得这次胜利的不仅有苏联，而且还有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等许多国家，而斯大林却片面地认为，二战的结果表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sup>②</sup>

斯大林把帝国主义与战争机械地画上了等号，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sup>③</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和平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的生活，而斯大林却号召苏联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争。为此“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5000万吨，钢达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种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sup>④</sup> 也就是说苏联仍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重心还是备

① (苏)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90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475页。

③ 《斯大林文集》，第472页。

④ 《斯大林文集》，第483页。

战，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大林的演说一发表，便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苏联同英美等国的分歧有加深的趋势，但双方都还局限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关系并未完全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公开大肆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与战争画等号，自然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美国《时代》杂志说斯大林的演说是“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斯大林演说发表后不久，即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8000字电报，其所用的论据有些就来自斯大林的演说。凯南首先分析了苏联官方对战后问题的看法：苏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受其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所困扰。这些矛盾是不能用和平妥协的方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这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在1946年2月演说中所表达的看法。凯南认为，从苏联的政策角度看，苏联不会错过任何削弱资本主义的机会，苏联致力于加深和利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就会变成革命起义。苏联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他们的成功与否实际上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实际上也是对斯大林演说的回应。他也攻击了苏联的制度，说：“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制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他对俄国需要一个安全的边境表示理解，但是，不能容忍的是“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



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呼吁英美建立起特殊的关系，联合阻止苏联的扩张。

1946年9月下旬，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sup>①</sup>与凯南的电报相呼应。诺维科夫的报告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写的，反映了苏联官方的意见和观点。报告指出：

“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它的特征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美国的所有力量——陆军、海军、工业和科学——都是服务于这一对外政策的。为此目的，已经制定了广泛的扩张计划，并且通过外交活动和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建立海空军基地系统，通过军备竞赛，通过制造更新式的武器，正在推行这一计划。”

报告认为，杜鲁门政府已经改变了罗斯福时期的对外政策，“政治上反复无常但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杜鲁门就任总统以及随即任命贝尔纳斯为国务卿，表明民主党内最反动的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加强。美国对外政策不断增强的反动性，日益接近于共和党人倡导的政策，成为民主党内的极右翼分子同共和党在对外政策方面密切合作的基础。这种两党合作表现为在国会两院里形成了以参议员范登堡和参议员塔夫脱为首的非正式的反动的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老一辈守旧派组成的集团，在两党人士发表的基本相同的对外政策讲话中得到了特别清楚的证实”，“美国力求建立世界霸权的明确意图，还反映在和平时期增强军事潜力和在美国国内外建立大量的海空军基地方面。”

关于美苏关系和美国的对苏政策，报告说，“战后美国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目的是在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美国政府现行的对苏政策，还旨在限制或消除苏联对邻国的影响。为了在与苏联毗邻的前敌国和盟国中推行这一政策，美国试图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在这些国家中支持各种反动势力以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设置障碍。美国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确保美国资本打入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这种政策目的在于削弱和推翻对苏联友好的执政的民主政府，并在将来以一个驯服地

---

<sup>①</sup> 凯南的电报和诺维科夫的报告均可见（俄）《国际生活》1990年第11期，第141—154页。

听命于美国政策的新政府取而代之”。

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和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计划使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报告最后认定美国正在考虑针对苏联的“第三次大战”。总之，报告全面否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凯南的电报成为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依据的话，诺维科夫的报告则成为苏联与美国进行对抗的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所追求的是世界性大国的利益，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俄国正在成为各自能决定半个世界命运的国家。1946年2月莫洛托夫宣称：“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国家之林了。现在若没有苏联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际关系间的严重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sup>①</sup> 美国也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它宣称，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称霸世界有其内在的动因，苏联要与之争雄，只能与之迎头相撞，正如基辛格所说：“美方逐渐了解的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sup>②</sup>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美苏两强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不可避免。

## 美苏关系破裂，“冷战”格局形成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请求对困境中的希腊、土耳其进行援助，以免它们落入极权主义者之手。杜鲁门演说的主要意图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对“极权主义”的立场，他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

---

<sup>①</sup>（苏）莫洛托夫著：《对外政策问题》，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4页。

<sup>②</sup>（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页。

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杜鲁门的讲话，实际上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美国势力的一篇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杜鲁门自己后来把他的这一讲话说成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作为实行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又名“欧洲复兴方案”。为了防止战争造成的贫困与混乱使欧洲爆发革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 1947 年 6 月 5 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由美国出钱帮助西欧国家复兴经济的设想。“我们的任务是唤起合理经济的再生，促使政治社会的结构容纳自由制度存在。”其条件是受援国必须同美国签订多边或双边协定，采取措施稳定通货、维持有效的汇率和降低关税壁垒，受援国须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并向美国提供部分战略物资等。该计划原定 5 年，提前一年，到 1951 年底完成，美国共向欧洲提供 120 亿美元的援助，对战后西欧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战争时期，苏联欣然接受美国的“租借法案”，得到了 109 亿美元的各种作战物资和粮食等。战后，苏联也希望得到美国的贷款以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经济。当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时，苏联并没有立即反对。1947 年 6 月 27 日，莫洛托夫率 80 人的代表团去巴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但苏联不接受美国的条件，也没有坚持修改这些条件，便退出了会议，这也正中了西方的下怀。苏联自己不参加，也不允许东欧国家参加。苏联不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苏联把这一计划看成是美国转嫁危机的手段，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意味着把欧洲各国置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内政的直接干涉……这个计划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企图以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国家集团来对付东欧国家”。

战后，斯大林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安全，希望能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以恢复被破坏的经济。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仍希望更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歇尔计划出台后，苏联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对抗苏联的集团，苏联便开始采取积极的进攻政策，组建以苏联为首的政治经济集团。

此后，苏联明显加快了对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人事等进行全面控制的步

伐。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也为了加强对东欧的控制，限制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1947年7—8月，苏联与东欧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被称为“莫洛托夫计划”。1947年9月22日成立了苏联和东欧八国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样，苏联便在政治、经济上全面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完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组建工作。

情报局的建立是苏联一手导演的，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复活。共产国际虽然于1943年6月解散了，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继续工作，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联共（布）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原来经共产国际对其他各党的领导，事实上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季米特洛夫等外国共产党人纷纷回国，该部更名为对外政策部。战后，东欧国家和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或参加了政府，为了加强对这些共产党的监督和控制，莫斯科产生了建立某种中心的想法，但这次不是建所有共产党参加的世界性组织，而是建立地区性组织，由那些在本国有相当大影响的共产党参加。<sup>①</sup>

1946年6月初，在斯大林别墅，苏、保、南三国领导人共进晚餐时，斯大林向他们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斯大林声明：我们不会让共产国际以任何形式复活，需要全新的情报机关，定期开会，交换经验和通过不具强制性质的决议。在讨论由谁来当这一新机关的发起者时，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谁能担当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认为首先是铁托，其次是法国人。<sup>②</sup> 1947年夏末，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建议9月中旬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遭到苏联的断然反对和苏斯洛夫的羞辱。这并不表明苏联反对建立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建立新的共运机构的想法始终占据着苏联领导人的头脑，苏联在秘密进行着准备工作。1947年春，斯大林在与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要求波兰党出面倡议创建一份共同的、情报信息性的定期刊物（不是机关，不是局！），哥穆尔卡同意，他们一起拟定了邀请参加的党的名单。同年7月，波兰党向苏、南、捷、保、匈、

---

① Совец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8. С. VIII.

② (俄) 格·姆·阿及别科夫：《如何筹备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载 Совец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8. С. 3—4.

罗、法、意 8 国共产党发出邀请信，邀请它们派代表出席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某些国家的形势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除了（要创办的）刊物以阐明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外，我们没有建立任何国际工人运动机构的目的”。<sup>①</sup>但苏共对会议却有自己的计划和目的。苏共领导层已经明确，要把两个问题列入会议日程，一个是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协调各党行动的问题，可见建立情报局的目的是明确的。<sup>②</sup>然而，苏联却对各国共产党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1947 年 9 月 22 日，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波兰的什卡拉尔斯卡—波伦巴小城开幕。会议开始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都通报了各自党的情况，马林科夫在报告中除了谈联共（布）的活动外，还提出了有必要采取明确措施，以建立各党之间经常的联系，但他没有详谈。9 月 24 日晚，在各党代表都发言完毕后，马林科夫按苏共的计划向会议提出两项建议：第一，让日丹诺夫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第二，由波兰党代表作关于协调各党活动的报告。<sup>③</sup>马林科夫建议的实质是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苏联代表在会下积极与各国党的代表接触，推动这一计划的实现。作为会议的倡议者，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受了愚弄，坚决反对建立任何有组织的共产党国际中心，他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各国共产党应该独立自主，同时，如果有必要，各国共产党将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苏联进行磋商。<sup>④</sup>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密码电报中汇报说，波兰人对“建立公开的情报局表示怀疑和反对”。<sup>⑤</sup>在联共（布）代表的努力下，联共（布）的建议最终还是被接受了：成立了由九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国际组织——情报局，它担负着组织经验交流和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任务。九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最终变成了情报局

① Сoвeщaния Кoминфoрмa, 1947, 1948, 1949. Дoкyмeнты мaтeриaлы. М., 1998. С. 5.

② 参见：（俄）格·姆·阿及别科夫：《如何筹备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载 Сoвeщaния Кoминфoрмa, 1947, 1948, 1949. Дoкyмeнты мaтeриaлы. М., 1998. С. 8—10.

③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91，第 51 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4 期，第 146 页。

④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0 页。

⑤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96，第 2 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3 年第 4 期，第 150 页。

成立大会，建立了新的类似于共产国际的国际中心，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

情报局的建立，增强了苏联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实力。日丹诺夫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宣言，公开宣布出现了两大阵营，“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结果是统一的帝国主义阵线之被突破，俄国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果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胜利，结果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包括全球的经济体系；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削弱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增强，结果就是中欧和东南欧许多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sup>①</sup>他公开指责美国，“美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反对苏联、反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反对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看做是全世界反民主的反动势力的堡垒。因此，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天起，他们就着手建立一个仇视苏联和世界民主的阵线，鼓动欧洲各国的反人民的反动势力——通敌分子和以前资本家的走狗，而这些欧洲国家在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正在开始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安排它们的事务”。他还说，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势力，制造新战争，反对社会主义与民主，支持一切地方反动的反民主的和亲法西斯的政权和运动”。<sup>②</sup>

随后，苏联积极支持和帮助东欧各国共产党清除对立势力，把东欧各国的多党联合政府变成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府，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保证了苏联有一个与西方国家隔开的“安全带”。斯大林的政策是企图使欧洲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的政策，特别是使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服从于苏联的政策，成为执行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建立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在稳固东欧的基础上，斯大林加强了与美国的争夺，于是，出现了柏林危机。

英美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会被苏联所控制，便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1948年6月，开始在西占区背着苏联搞币制改革。斯大林对此很恼火，便在苏占区也

<sup>①</sup>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16、17页。

进行币制改革，并宣布从6月24日起封锁柏林，封锁西占区与柏林的一切水陆交通。这样，国际形势使立即紧张起来，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冷战高潮。

为了表现自己的决心和实力，西方开始向西柏林250万居民实行空运。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空运行动，总计有277728架次的飞机，空运了211万吨货物。苏联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目的没有达到，不得不于1949年5月12日宣布解除封锁。1948年柏林危机，是苏联奉行实力政策的一次失败，“共产党人在柏林的压力不但没有如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分裂同盟者们，相反，却促使英美，特别是法英间在解决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得到缓和”。<sup>①</sup>正是在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轰炸机开始出现在英国，之后，于1949年4月上旬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苏联及其盟国则在1949年1月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苏联东欧经济集团。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鉴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冷战格局，新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但是，亚洲的形势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稳定下来，南北朝鲜的存在成为新矛盾爆发的一个焦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支持北朝鲜完成祖国统一。但是，美国决心干预，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了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并凭借其实力，扭转了战争开始时的不利局面，于10月19日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斯大林不敢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苏联不准备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只能提供武器装备。为了保卫国内的和平建设环境，中国于10月25日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扭转了战局，把敌军赶过了三八线。最后，美国只得在它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亚洲的冷战格局也稳定下来了。

纵观冷战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苏联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迎战者，美国把苏联当成对手，要对它进行遏制；苏联也要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实力所及的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相抗衡。如果说，美国是冷战的发动者，那么斯大林则为这一政策呐喊助威，因为这一政策也是符合斯大林逻辑的。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

<sup>①</sup> 《档案披露的秘密》，第21页。

## 39.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孔田平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与二战后的政治现实有关，是二战后独特的国际环境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解放了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控制了沿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线的东欧地区。从历史上看，控制过东欧的条顿骑士团、瑞典、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和希特勒德国都曾对俄国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对苏联而言，东欧同时是一个防御阵地的前沿地带；可能实行的向西扩展的跳板；在意识形态上使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合法化；采用苏联模式的实验室”。<sup>①</sup>斯大林控制东欧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是将东欧作为保卫苏联的后盾。而在斯大林看来，确保东欧成为其可靠后盾的有效方式是移植斯大林模式。而美国主导的西方不愿接受苏联在东欧的扩张，担心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决定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说，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后的国家不仅屈从于苏联，而且受到苏联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决定向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主义问世。1947年6月美国提出了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随着冷战的来临，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到1948年在苏联支持下东欧国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东欧国家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

---

<sup>①</sup>（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等主编，林穗芳译：《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主义也被移植到东欧国家。

## 1948—1956 年东欧国家的斯大林化

1948—1956 年是东欧国家实行斯大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将苏联模式强加给大多数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40 年代末，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冷战要求限制东欧国家的主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采纳苏联模式。“进步和和平阵营”的国家不得不实行进一步的苏联化。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完全从属于苏联（外部苏联化），同时采纳苏联国家运行模式（宪法仿效苏联宪法）、苏联的经济体制，在科学、文学等领域向苏联看齐，特别是以苏联价值观取代既有的惯例和价值观（内部的苏联化）。

从 1948 年起，除了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东欧国家开始实行全面的斯大林化，苏联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波兰作为东欧最大的国家具有典型性。

首先，一党制形成。1948 年 1 月波兰工人党攻击社会党控制的中央计划局，指责中央计划局成为“资产阶级科学的人质”。中央计划局领导人变动消除了不同于共产党的经济观念。1948 年 4 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两党领导人通过了统一的决定。5 月两党发布了题为“在走向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道路中”的关于意识形态和纲领的声明。提到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采纳苏联模式需要考虑到波兰的条件。8 月波兰工人党发生人事变动，主张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被解职，贝鲁特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哥穆尔卡的解职，意味着教条的极端斯大林主义者的胜利，意味着波兰工人党通过了新的政治路线，即否认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948 年 12 月 25—28 日，在华沙举行两党合并大会，合并后的政党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到 40 年代末，波兰统一工人党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全面控制，其他政党如波兰农民党成为联盟党。1948 年 7 月，多个青年组织合并为波兰青年联盟，仿效苏联共青团对青年进行教育。1949 年 6 月，代表 350 万工人、占农业之外就业工人的 90% 的 36 个部门工会组织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会全国理事会。这些准政党组织如工会和青年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传送带作用。1951 年中期议会成立宪法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新的基本法。宪法委员会主席贝鲁特强调新的基本法要利用苏联政治体制解决方案。宪法草案被译为俄文，并

交斯大林审议和修改。1952年7月22日，议会一致通过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强调波兰为人民民主国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1952年宪法不仅规定公民享有社会权利，如工作、休息和教育的权利，而且也规定了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但是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结社自由和通信秘密等权利只停留在纸上。波兰国家体制全面模仿苏联，从国务委员会、人民会议到司法和检察系统无不如此。司法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新的制度。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机构手中，而党的结构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各级行政机构从县到省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党的第一书记。1952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贝鲁特担任总理。波兰出现了领袖崇拜，贝鲁特被视为党和国家的象征、一贯正确的思想家和“祖国之父”。波兰仿效苏联成立了安全局，以消除对新政权的抵制，监督公民的政治态度。新政权依赖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全局和民警局，在1948—1949年间这些机构滥用权力，制造国家恐怖，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贝鲁特当权期间，有19位波兰官员被判处死刑，天主教红衣主教维辛斯基身陷囹圄。许多人因政治观点遭到清洗，被投入监牢。

其次，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波兰在经济体制上也仿效苏联，到40年代末波兰已与苏联经济十分相似，其经济是基于中央计划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制。1949年2月波兰建立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向企业分配资源和人力，并制定中央确定的生产计划，形成了指令—分配制度。在国有化的浪潮中，私营工业的比重下降。国家对私营工业和商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市场供应日益困难，出现了排队和黑市等现象。波兰也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到1950年国营农场控制了可耕地的10%。1953年，波兰停止农业集体化。农村合作社虽然保留了合作社地位，但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1951—1952年重新实行农产品强制交售制，农民交售的价格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一半。国家对外贸实行垄断，苏联成为主要贸易伙伴。波兰与苏联的贸易条件并不平等，波兰出口到苏联的煤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国家推动工业化，以大量的投资用来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如钢铁、造船、汽车制造、化工等。六年计划的项目有新胡塔的冶金联合企业，琴斯托霍瓦的钢铁厂、卢布林的汽车制造厂，以及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造船厂等。国有化的结果是国有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工业化促进了波兰经济的改造，为波兰建立了重工业的基础。波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经济运行模式

并不注重效率，经济增长具有外延性质，未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竞赛具有暂时性，其结果是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浪费。经济发展并不和谐，大量资金分配给重工业，不仅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而且忽视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三，意识形态的苏联化。在苏联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苏联的同时，波兰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了全盘苏化。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遭到批判，斯大林的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个人并不行使权力，而是由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在没有任何敌对阶级的条件下，代表工人阶级的党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当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实现了财产的社会化，以国家计划取代了市场交易，社会主义就已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敌对的外部环境，因此国家不会消亡。与社会主义愈接近，阶级斗争就愈为尖锐。在国家消亡之前，国家权力需要最大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法也仿效苏联，一方面注重信息的垄断和信息封锁，限制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新的现实进行神化，粉饰太平，其结果是宣传与现实的脱节。波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仿效苏联，确立了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多数东欧国家在同期也采纳了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在 1948—1956 年在东欧国家被全面采纳，使斯大林主义的弊端也得到了充分暴露，东欧国家为实行斯大林模式付出了惨痛代价，主要表现在：

(1) 在政治上破坏法制，实行恐怖统治。在斯大林主义登峰造极之时，许多忠贞的共产党员成为新制度的牺牲品或阶下囚。1948 年 6 月 28 日，南斯拉夫被驱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掀起了清洗“铁托分子”的政治运动。据统计，1948—1952 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被清除的党员有 250 万人，被监禁的有 12.5 万人至 25 万人，受害者中间有：3 位总书记、1 位总统、几位副总理、几十位部长等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100 名将军。<sup>①</sup> 1948 年 9 月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因哥穆尔卡“右倾民族主义”被解职，在两个月之间有 5 万党员遭到清洗。1948 年 12 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年间有 26 万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被开除出党。安全机构滥用权力，许多波兰公民遭到迫害，到 50 年代中期被释放的政治犯达 10 万人之多。1949—1953 年匈

---

<sup>①</sup>（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0—221 页。

匈牙利被处决的共产党员要比霍尔蒂统治时期多。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遭到陷害，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和在二战期间“充当德国间谍”，最后遭到处决。1948—1956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有35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有250万名，大清洗之后党员人数下降到150万左右。1951年政治大逮捕，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等13人受到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1954年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胡萨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判处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国内派共产党领导人科斯托夫被指责有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1949年遭到清洗，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副总理职务。1949年12月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科齐·佐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1949年经秘密审判被处决。阿尔巴尼亚的大清洗涉及31名中央委员中的14名和109名人民会议代表中的32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4的党员被开除。

(2) 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强制实行国有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影响。1949—1950年，东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1952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98%、100%、98%、97%、99%、97%、100%和81%。<sup>①</sup>东欧国家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但是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之上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姆拉德诺夫在保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按照盲目崇拜发展具有决定结构意义的部门的逻辑，农业在保加利亚经济中只被安排起次要作用。结果很明显，那就是保加利亚农村的人口迁移和日益荒芜，农业生产不断下降，农产品匮乏”。<sup>②</sup>东欧国家在农业集体化中采取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迫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除保加利亚农业集体化进展较快外，其他国家进展缓慢。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效率。由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其结果是消费品的短缺，黑市和消费品短缺成为生活的常态。

---

<sup>①</sup> (英) 本·福凯斯，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3) 意识形态的斯大林化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扭曲，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限制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命令”性质。个人并不行使如何权力，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拒绝工人自治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多元的独立工会。在一个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那就只有一党的余地。<sup>①</sup> 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封闭了社会主义的革新之路，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来自苏联，其中不乏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正如姆拉德诺夫说言，“形成这样一种形势的根源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它建立了一支宣传‘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写的经典条规的代言人大军，以此来代替志同道合的创造者的共同体。它建立了缺乏理性的王国、使人僵化的空虚和精神上的静止，以此代替在斗争和怀疑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思想”。<sup>②</sup>

### 1956年之后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后果

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2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苏联从此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东欧国家也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政治犯被释放，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遭到迫害的改革派领导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然而赫鲁晓夫缺乏对斯大林个人所犯错误的体制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不可能根本触动斯大林模式。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非斯大林化的进程随之中断。此后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主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时期。东欧国家在1956年后的非斯大林化进程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有限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基

---

① John Marangos, *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 Ashgate, 2004, p. 15.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础，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体制长期负病运行。

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集权制并没有进行根本改革，这一体制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无力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虽然在宪法上也规定了基本的人权，但是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些公民因发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而失去工作和福利。这一体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出现了打击异己、清洗政敌、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等现象。这一体制漠视法制精神，在治国方式上实行动员、命令、强制和镇压等方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政策，又制造了更多的政治审判案。在“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粉碎后，1970年的清洗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有50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遭到清洗的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官僚集权制面临着在等级制基础上执政的官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由于有关生产力、生产资料、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是由一小批官僚决定的，而生产财富的工人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东欧国家出现了在官职、住房、收入、采购、医疗、教育和出国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即特权阶层，他们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只关心自己特权的保持和扩大。而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则面临着贫困化和营养不良等问题。波兰在1980年特权阶层及其受益家属的人数达300万左右，约占人口的10%。正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将波兰带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边缘。官僚集权制的直接后果是政权与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波兰从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12月工人抗议到1980年独立自主团结工会成立，工人抗争不断。到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1/4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80%，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的官方工会被大部分工人抛弃。这表明波兰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关系的紧张已到危险的地步。

(2) 党的领导变为权力由党的机构垄断与集中，削弱了国家机关、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干部任命制导致了干部危机，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享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治生活日益程式化，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变成了由指定演员按照预定台词演出的独角戏。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68年6月发表的两千字声明所言，“党与国家的结合导致使

党失去与执行权力保持距离的优越性。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活动没有批评。议会忘掉了真正进行领导。选举没有了意义，法律失去了分量”。<sup>①</sup>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乌尔班内克认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被曲解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制定政策时，同人民对话的机制，实际上已被取消。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会遭到压制。于是，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作出有效反应的可能性，被党葬送了，党于是成为自我孤立的牺牲品”。<sup>②</sup> 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往往享有特殊地位。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忽视民主，强调集中。任命制被滥用，加剧了干部危机，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姆拉德诺夫指出，问题在于“上级指定和任命制度通过其弊病——垄断、秘密、滥用职权、耍计谋使得许多干部蜕化变质，毁了他们。因为这种制度教他们只看上面，朝上司看。它教他们相信，他们不管犯多少错误，甚至根本不合格，既然被列入指定和任命的名单之中，那么在领导层总会有他们的位置并能保住他们的工资与特权”。<sup>③</sup> 乌尔班内克曾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干部的虚伪稳定和职务分配，导致一些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党和国家的特权阶层中，把有利可图的位置攫为己有，而且也占有了极其重要的权力阵地”。<sup>④</sup> 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较为狭窄的、盘根错节的小集团，不受监督地掌握权力。这些干部唯命是从，为破坏法制敞开了方便之门。

(3)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之外的东欧国家得到保持，即使是经过改革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也未产生良好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负病运行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体系以及行政机构对于企业的干预，侵蚀了企业的

---

① 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效率，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不利。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忽视，使得商品货币范畴被动地起作用，仅仅作为核算手段而存在。由于实行价格管制，价格严重僵化，长期固定不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导向功能丧失殆尽。企业以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赢利率作为衡量其成功的主要指标，对于提高质量、改进产品与科技进步缺乏兴趣。企业考虑的是计划者偏好，而不是市场需求。商品短缺造成了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与蔑视。因此，不难理解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sup>①</sup> 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下，一方面中央计划当局缺乏监督经济过程的信息与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单位缺乏创新激励，墨守成规没有风险，而从事创新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如果创新成功，创新者的收益与上级分享，以昭示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果创新失败，上级则会怪罪创新者，失败的代价完全由创新者承担。东欧国家实行的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通过对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增长，而这需要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第二个因素，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资源被用于规定为“增长引擎”的部门与活动。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在经济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先性影响很大，这种优先性即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优先于住房。第三个因素，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不在微观水平上进行通常的成本核算。<sup>②</sup> 上述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是消费品严重短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和排长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9年齐奥塞斯库已执政24年，但罗马尼亚人民仍在忍受食品、电力和热力的短缺，一些罗马尼亚学者认为这已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不平衡增长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生产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足；注重教育投资，忽视住房建设；过度发展的部门产生了大量库存，而发展不足的部门则造成了严重的短缺。尽管东欧国家在经济增长上有过不凡的记录，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浪费、低效率基础上的。从国际比较看，

① (匈) 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W. Brus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 25.



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与西班牙，南斯拉夫与希腊，相差不大，到了1980年，差距则大大扩大了。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地利的70%，匈牙利相当于意大利的74%，波兰相当于西班牙的77%，南斯拉夫相当于希腊的81%，东德相当于西德的64%。<sup>①</sup>在东欧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东欧显然已败下阵来。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真正进行过经济改革的国家，仅包括1950年后的南斯拉夫、1968年后的匈牙利和1982年后的波兰，其他国家也进行过一些修修补补的变革，但只是着眼于完善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改革。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未取得成功。南、匈、波经济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摩擦、冲突，旧的低效运行体制被部分抛弃，新的有效运行体制并未形成，因此经济恶化的态势更为明显。一些人指责经济改革放出了潘多拉的盒子，造成了经济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市场化进展的缓慢才加剧了中央计划经济中潜在的经济问题。东欧那些未进行经济改革、固守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也早已陷入慢性危机，经济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固守传统经济体制，最多只能苟延残喘，而不会带来效率的根本改进，因为中央计划经济由于排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是无效率的。

(4) 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僵化保守，故步自封，僵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桎梏。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曾成为东欧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信念，在东欧社会主义特定的环境下要彻底摆脱这一信念非常困难。保加利亚共产党姆拉德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新的宗教裁判所的桎梏的束缚”。<sup>②</sup>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经典的共和政体思想包括法制国家、议会制、人和公民权利、政教分离、世俗化、教育普及、科学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性、言论和信仰自由、普及

---

① M.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 - Hall, Inc. 1991, p. 111.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文化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认为，“由斯大林倡导和实践的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歪曲了这些概念”。<sup>①</sup> 党的宣传部门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波兰的利宾斯基认为，“党的宣传歪曲现实，消灭新闻自由，有计划地混淆视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部门，相应地编造供各级用的教材，实行经济恐怖，给奉迎者以奖金和特权，不断地消灭独立思想”<sup>②</sup>。在上述环境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教条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东欧共产党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影响颇深，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领域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南斯拉夫尽管与苏联的正统理论分道扬镳，但其理论家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独出心裁地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将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付诸实施，甚至在私人企业雇工多少为宜的问题上也求助于经典。<sup>③</sup> 从表面上看，他们力图为其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却束缚、阻碍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承认商品经济的，但这种承认并不彻底。如承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强调按劳分配，否定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自治理论成为新教条主义枷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障碍。”<sup>④</sup> 波、匈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因循守旧，不愿突破正统理论，担心改革会侵蚀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经济改革上缩手缩脚，犹豫不决，难以进行果敢的改革。波兰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等领域裹足不前与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无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力图将改革限制在正统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为经济改革设置理论羁绊。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最后一任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剧变后曾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这种提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难为执政党所接受。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6 页。

② 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 年第 1 辑。

③ 孔田平：《试论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 年第 10 期。

④ 朱行巧：《南斯拉夫早期经济改革：经验与启示》，1997 年向“对转轨中的渐进主义重新思考”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应当强调的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存在作为一个外在因素限制、制约着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南斯拉夫较早摆脱了苏联控制，是一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不只是沙皇俄国的简单继续，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sup>①</sup> 在冷战时期，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帝国性质”。<sup>②</sup> 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对于卫星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不会放任东欧发生不利于苏联的变化，恫吓与威胁是苏联对付其盟友的惯用手段。苏联领导集团担心东欧的改革不仅会威胁它在那里的霸权利益，而且会对苏联社会本身造成影响和冲击。<sup>③</sup>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就遭到苏联军队的无情镇压，同年匈牙利在令莫斯科放心的情况下进行了谨小慎微的改革，实行“新经济机制”。1982年的波兰经济改革也是在苏联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苏联只默许东欧国家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一旦苏联认为东欧某个国家越轨就进行干预。这就可见东欧的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一方面要顾及莫斯科的反应，避免不触怒苏联，另一方面要顺应国内的改革要求，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不畅的问题。这种状况，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之后有所改变，苏联出于国内改革的需要，要求东欧加快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一方面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加深，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出现了重组，政治动荡开始加剧。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战后有限主权和斯大林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未能确保实现应当释放出来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sup>④</sup> 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丧失了信心。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东欧共产党失去了以改革方式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机遇。

---

① Adam Bromke, *Eas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Solida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93.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③ 李静杰、王小路：《苏联的“共同规律”和东欧的改革潮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 40. 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沈志华

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1944—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sup>①</sup> 本文则着重讲述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总体评述。

---

<sup>①</sup> 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另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208页。本文使用的具体史料及其来源均可查阅上述论著，限于篇幅，除新的补充材料外不再出注。

## 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有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则是比较紧张的。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sup>①</sup> 这些史事都是得到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sup>②</sup> 这些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最初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

① 参见 Панцов А.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2. С. 75—87; A. V. Pantsov,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 New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scow's Role in the Rise of Mao", Issues & Studies, 41, №3 (September 2005) pp. 181—207.

② Панцов А.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2. С. 84—85.

了主张。<sup>①</sup>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sup>②</sup>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sup>③</sup>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sup>④</sup>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他最初为中共选择的国际联合对象也是美国。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时，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③ 潘友新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谈记录，1941年1月15日，ABПРФ，Ф.0100，ОП.25，п.200，л.8，л.28—29。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第256页。

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sup>①</sup>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接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辞职。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开始把希望转向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

---

<sup>①</sup> 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49—62页。

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还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 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最佳的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

就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



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战后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

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

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sup>①</sup> 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长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资料表明，在中共取得全面政权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而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为主，目的在于帮助中共取得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的控制。军事援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苏军撤退时赠送或遗留下来的

---

<sup>①</sup> FRU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IX, Washington, D. C.: GPO, 1972, pp. 148—151.

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sup>①</sup> 第二，通过朝鲜供应或交换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以缴获的日军物资为主）。<sup>②</sup> 此外，由中共掌握的旅大地区各工厂在苏联占领当局默许和鼓励下生产的大批武器弹药，自然也可以算是苏联提供的间接援助。<sup>③</sup>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1949年前中共曾得到过苏制的武器弹药。苏联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公开和积极得多，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贸易往来为中共提供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从1946年底至1947年底，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2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亿卢布。第二，在旅大地区向中共移交了大批工厂，还帮助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对中共政权的物资供应。第三，派遣大批专家协助修复东北铁路网，帮助中共培训技术人员、建立铁道兵部队，并以贷款或易货方式为中共提供铁路物资8760万卢布。1948年底中长铁路全线通车。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乃至军事胜利和政权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sup>④</sup>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

---

① 关于这批武器的具体数量，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批武器对于内战初期中共抵住蒋军大举进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详见 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С. 138、185；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6—80页；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85—306页；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② 到1947年6月，运送给东北局的物资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又有52万余吨。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第197—200、202—204页。

③ 内战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

④ 至于战后苏联向中共提供的现金援助，目前看到的俄国材料只有1946年的5万美金。见周恩来亲笔签字的收条，1946年10月16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第38页。

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sup>①</sup>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 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羽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辟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

---

<sup>①</sup> 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即将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表达这层意思。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 79.

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sup>①</sup> 国务院 1948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sup>②</sup>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 1948—1949 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 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

---

<sup>①</sup> 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 年 9 月 15 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 2 卷，第 239—247 页。

<sup>②</sup>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13, 1948, NSC 34, DDRS, CK3100371087 - CK3100371119.

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sup>①</sup>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懂得“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sup>②</sup> 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看清楚。

无论讲国际主义还是讲民族主义，毛泽东都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为此，他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斯大林此时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 and 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

<sup>①</sup> 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攀比上升的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273—283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6页。

然而，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他在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诬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俄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往来电报说明，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sup>①</sup>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或者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答复。无论如何，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

---

<sup>①</sup>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4 – 5. С. 132—140; Рахманин О. Б.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 1. С. 87—88.

国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后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sup>①</sup>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8年12月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1948年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sup>②</sup>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是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

---

<sup>①</sup> 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年7月1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384—387页。

<sup>②</sup> 1949年2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被捕，她在《明天的中国》一书中把毛描述为亚洲的圣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称为亚洲的圣经。（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研究报告，1949年12月2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560—568页。）斯大林这样做很可能就是在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至少客观效果如此。



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默不作声了。顺便说一句，关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的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作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最多都不超过8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sup>①</sup>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sup>②</sup>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在此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

<sup>①</sup> Адibeков Г. М., Андерсон К. М., Роговая Л. 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1946—1947年莫斯科对中国问题并没有特别关注，从当时苏联驻华外交官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来：“显而易见，我们驻满洲军方和其他代表并没有把所有情况报告莫斯科，莫斯科也没有经常向大使馆及时通报情况，而只限于中央简要指示里所列举的情报”。“苏联大使馆对情况的掌握很有限，而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Крутиков К. А. В гоминьдановском Нанкине, 1946—1948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2. С. 138、147.

<sup>②</sup> 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只要莫斯科支持和帮助中共得到天下，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是不是真心做斯大林的学生，其实并不重要。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作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中共。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很快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sup>①</sup>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尽管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8—1479页。

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題，而在这些问題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唯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題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題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題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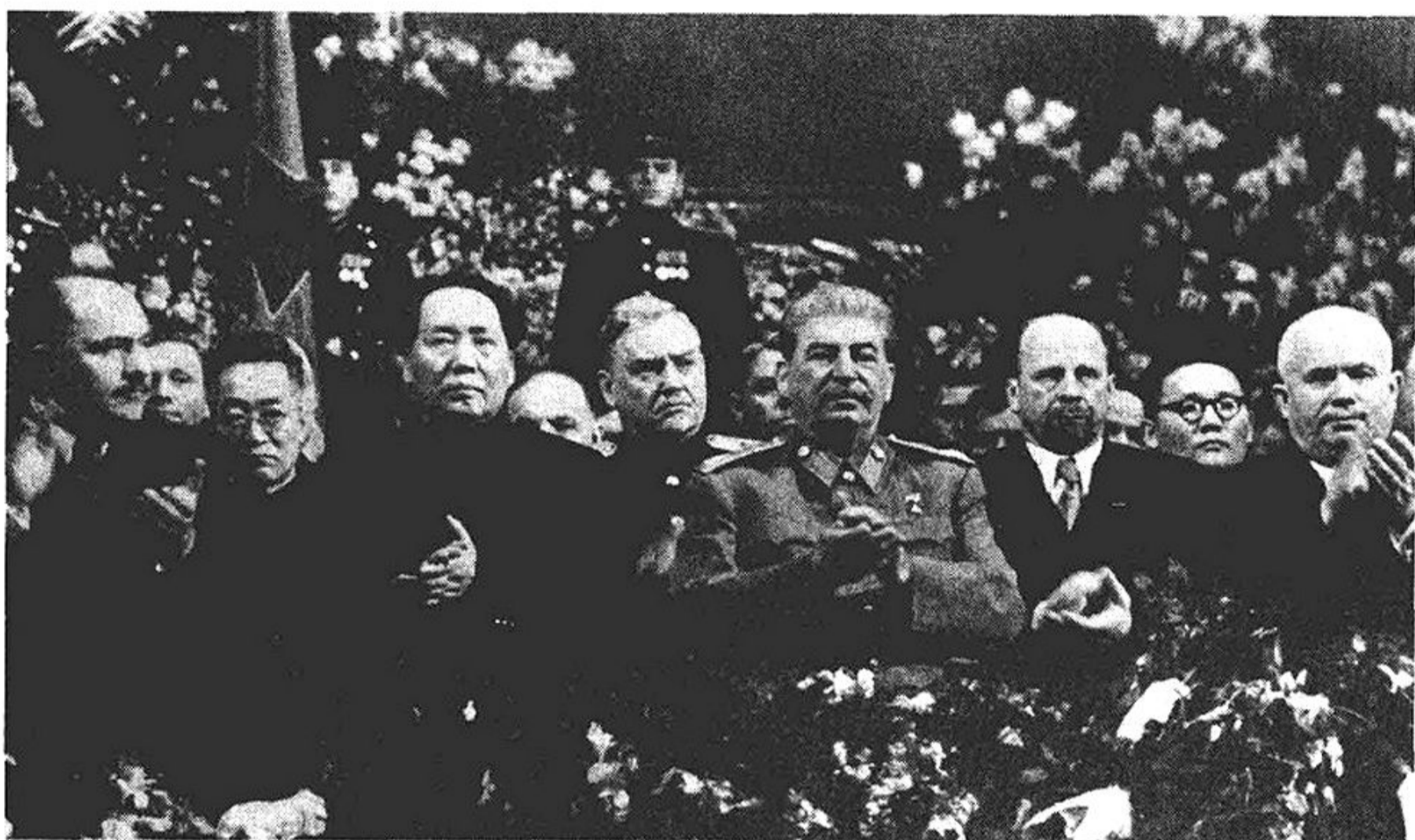
### 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对于中共政权而言，与苏联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情报机构曾断定：尽管决定依附于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越大，克里姆林宫为实现‘国际主义控制’而介入中国的意向就越强烈，调和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分歧的困难就越大。最终，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的多”。<sup>①</sup>从大体发展趋势看，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題，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題。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作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

---

<sup>①</sup> 中情局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1948年11月3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第425—427页。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新华社稿）

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作出了让步。

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取得了中长铁路的经营权、旅顺海军基地的租赁权和大连行政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实现了自沙皇时期俄国人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远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点就是获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涉及苏联的在亚洲的基本安全利益和重大经济利益，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此异常警惕，始终不愿松口。对于中共而言，如果不能废除1945年条约、收回东北的主权，那么就无法向党内说明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操体现在哪里，也无法实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更难以对国人解释中共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也要逼斯大林作出让步。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作出让步，自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图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后排左一为斯大林、左二为毛泽东。（新华社稿）

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sup>①</sup> 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作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

<sup>①</sup> 蒋介石私下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中共，甚至不在于苏俄，而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31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的对华新政策。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作出让步。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sup>①</sup>。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是可靠的同盟，就可以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

---

<sup>①</sup> 见 Goncharov,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04.

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大的举动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在4月10日—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斯大林1月30日突然作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可以认为，中共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

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是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作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对历史的简要回顾表明，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双方来说的确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至少经历了五次转折：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选择对方作为战后合作的伙伴；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才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撞中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才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一、中共和苏联都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盟问题的，意识形态不是出发点，但确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以国际主义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标准，而毛泽东则把崇尚国际主义和追随莫斯科作为取得苏联支持的敲门砖。

二、中共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灵活策略和军事才能，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些援助和支持在巩固中共政权的过程中才是必不可少的。

三、苏联的安全与中共政权的巩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一致性，但在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却有严重冲突，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险些导致中苏同盟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这个必要的同盟，又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

四、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直接影响在于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并成为中苏调整相互关系的潜在因素。

五、至于美国人经常讨论的“失去中国”的问题，如果说1944年确有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或友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逐步靠拢，这种机会到1949年已不复存在。

六、中苏同盟对于双方来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始终存在，且时隐时现，特别是就领袖个性而言，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他所承受的屈辱和压抑，总有一天要爆发——中苏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B406 >。）

## 41.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左凤荣

朝鲜战争一直是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解密了一批档案资料，为弄清一些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是20世纪除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参战国家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涉及当时两个最大国家——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利益，也触及了新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局面，但是，这场战争又不是如此简单，即使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的俄罗斯学者仍把它称为“神秘的战争”。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研究了苏联战争一些新的档案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对金日成及其同事在统一朝鲜问题上的行动影响很大。首先是上面谈到的毛泽东的‘亚洲主义’和他提出的按照‘中国模式’重塑亚洲的方针，刺激了他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左倾激进派活动家走上战争道路”，<sup>①</sup>“一方面，由于金日成及其同事努力让斯大林相信，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答应向‘朝鲜朋友’提供军事帮助，斯大林最终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立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支持）”。<sup>②</sup>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中国起着比苏联更大的作用，金日成发动战争直接与中国相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开始都反对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先改变了立场，毛泽东被迫同意，朝鲜战争从爆发到久拖不决，都是斯大林所需要的。

①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93.

②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94.

## 朝鲜战争是朝鲜半岛分裂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对朝鲜进行改造和治理，其主要任务是在朝鲜建立统一的临时政府。美苏双方分歧大，各不相容，苏联认为成立统一的临时政府要保证其亲苏是困难的，苏联转而实行使北方在政治、经济上成熟起来，建立不受美国影响的对苏友好政府的政策。苏联红军进入朝鲜后，在各地建立起军事管制机构——警备司令部，共有 113 个。苏联的这些警备司令部，控制朝鲜的地方自治机构——人民委员会，司令部职责扩大化。1946 年 2 月建立了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从苏联回国的金日成取代曹晚植（曹把苏军视为与日本一样的占领者，什特科夫说他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成为领导人。美苏在欧洲已经形成冷战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在朝鲜合作下去。1947 年 10 月以后各行其是，1948 年 8 月 15 日，南方成立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1948 年 9 月 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朝鲜战争是冷战格局的产物，是冷战造成朝鲜分裂的结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和李承晚都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论”，不过金日成是秘密准备，而李承晚则是公开叫嚣。韩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李承晚不过是在放空炮，虽然他个人的斗志很强盛，主观意愿很强烈，但是客观上不具备物质条件，美国也不同意。而北方则不同，从建国起，金日成就想武力统一朝鲜，并向斯大林提出过这一设想，斯大林起初虽然不同意，但为了增强北朝鲜防御能力，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援助。

## 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曾是中苏的共识

1949 年 6 月 25 日，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召开成立大会。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认为，为了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参加国家统一、独立和民主发展的斗争，有必要成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此后，朝鲜领导人一方面预防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也在寻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之路，并寻求苏联的帮助。为此，1949 年 9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并作出决议，要求苏联驻朝鲜大使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

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军事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从而把北朝鲜的边界推进到汉城附近的局部战役，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的干涉提供借口。朝鲜的任务是：第一，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力量。<sup>①</sup> 尽管金日成等人对此不满，但斯大林反对朝鲜方面武力统一或者发动局部战役的立场并没有变。

列多夫斯基认为中国直接影响金日成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有两个重要理由：一个是所谓毛泽东的“亚洲主义”，另一个是关于中国允许朝鲜军人回国。

列多夫斯基根据194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号召各国共产党走中国式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解决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革命观，表明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反帝斗争的态度，中国当时尚未完成全国解放的任务，根本谈不上直接帮助这些国家从事武装斗争。正如列多夫斯基引证的材料所说，中国当时曾反对在中国召开这两个会议。

关于朝鲜军人回国的问题，这是朝鲜人自己提出来的，并不表明中国支持金日成武装进攻南朝鲜。在日本侵占朝鲜后，许多朝鲜人迁居到中国、苏联及美国等国家。日本投降后，许多人返回了祖国，有的去了南朝鲜，有的去了北朝鲜，在苏联的朝鲜人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朝鲜。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金一要求中方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归还给朝鲜人民军，毛泽东答应了朝鲜方面的要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由于担心南方发起进攻，1949年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在中国东北的两个师立即调回朝鲜：长春师改编为人民军第五师团，配置在罗南；沈阳

---

<sup>①</sup>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776, ЛЛ. 30—32, 转引自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师改编为人民军第六师团，配置在新义州。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配备了全套轻重武器。关于朝鲜的局势，毛泽东担心的是南朝鲜随时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他劝金日成要做好周密准备，还答应如果出现日本帮助南朝鲜发动进攻的情况，中国也会派军队援助朝鲜。但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进攻时，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sup>①</sup>

此时，斯大林也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1949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您的意见，现在朝鲜军队（暂时）不应该发动进攻。我们也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提出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不应该被接受，因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意见是，现在朝鲜同志应该把自己为统一朝鲜而斗争的力量集中在广泛开展游击运动，在南朝鲜建立解放区，同时加强北方人民军上。”<sup>②</sup>

1949年12月29日，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转发了林彪等人12月25日的电报，电报中说：根据最新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有16000名朝鲜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中的之外，还有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计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担任领导职务的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和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战斗经验，有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在我军向南方进军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返回祖国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听从命令并坚决地向南方进军。现在战争接近尾声，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打算让这些骨干回到朝鲜（愿意留下的我们就让他们留下），请中央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研究他们是否可以回到祖国，朝鲜劳动党是否愿意让他们回去。如果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们则把

<sup>①</sup>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Д.331，ЛЛ.59—61。源自沈志华提供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

<sup>②</sup> 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

他们集中编成一个师或4—5个正规军团，经过短暂的训练后让他们回国。<sup>①</sup> 1950年1月8日，苏联方面让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询问金日成对此事的态度。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见，“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队中上述数量的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sup>②</sup>

1950年1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给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电报，指出：当时在四野的朝鲜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总计有14000名。金日成派了3个代表来接收这些人，他们请求把这些人编成一个师并带走全部装备：12000支步枪，440挺轻机枪、180挺重机枪、120支左轮手枪、132个深水炮弹发射器、72个坦克炮、36个105毫米的迫击炮和弹药。林彪建议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1月25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sup>③</sup>

有不少学者把这看成是中国对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支持，其实，按照中国人的行事原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朝鲜战士帮助了中国人民，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提出回国，中国方面自然不会反对，他们要带走所用装备，中国当然也不能不让带走。中国此时并没有完全结束战事，中国的西南还有残敌，沿海诸岛也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盘踞台湾，中国当时向苏联提出给予海空支援，正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sup>④</sup>

从以上资料看，中国并没有支持金日成发动解放南朝鲜战争的想法，斯大林此时也反对他的冒险。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朝鲜问题不是双方讨论的议题。

## 斯大林改变立场，支持发动朝鲜战争

金日成一直致力于武力统一朝鲜，苏联几乎满足了金日成要求购买武器的一

---

① 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以下简称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4, л. 8—9. 转引自列多夫斯基的文章，以下未注明的，均引自此文。

② 转引自沈志华所编《朝鲜战争档案》。

③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4, л. 22.

④ 最新资料可参阅《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切要求，提供贷款、顾问，但苏联反对金日成马上对南朝鲜开战。但在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改变了对金日成要求武力统一朝鲜的态度，在这一天，斯大林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表示允许金日成到苏联来，准备帮助他。<sup>①</sup> 斯大林改变态度可能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有关。苏联一直希望保留与国民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中所获得的对旅顺、大连港和中东铁路的权益，1950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要求苏联要在1952年归还这些地方。<sup>②</sup> 1月28日苏联方面基本上同意了这一方案。这让斯大林想长期在远东占有不冻港的希望破灭，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不能不与此相关。<sup>③</sup> 在中苏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苏双方的关系是紧张的，毛泽东对此曾多次抱怨过。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sup>④</sup> 斯大林本来不想修改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有关旅顺大连港的协定，毛泽东要求重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让苏联人不高兴，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sup>⑤</sup> 斯大林急剧改变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态度，正是发生在中苏谈判紧张背景下。

一般认为，促使斯大林改变对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半岛态度变化的原因还有：一是美军从朝鲜撤退。美国军队在1949年底撤出了南朝鲜，只留下了500名顾问（苏联从北朝鲜撤出后，留下了3000名顾问），1949年3月，麦克阿瑟在接见英国记者时表示，美国的防线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1950年1月他重申这一看法。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一次演讲中，讲到美国在亚洲的“防御

①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6, Л. 70. 转引自《神秘的战争：1950—1953年朝鲜的武装冲突》，莫斯科2000年版，第55页。

②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a, Д. 248, Л. 38—55. 转引自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③ 有关档案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斯大林也没有明确说过这一目标，但在二战结束后美苏占领朝鲜时，苏联的外交官们就曾竭力建议政府把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手中。参见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第27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6页。

⑤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4页。

线”，不包括朝鲜和台湾。这让金日成和斯大林认为美国不会干预，这在他们之间作出进攻南朝鲜的决策时谈到过。二是金日成不断向苏联方面报告说李承晚正在准备进攻北方，三八线附近局势紧张，如果允许他打过去，肯定能胜利；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局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这些说法值得再考虑。关于美国介入的问题，实际上苏联早就估计到了，早在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给苏驻朝大使的指示。在这份文件里，“首先强调朝鲜人民军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发动对南方的全面进攻不仅不适宜而且也不是时候。这可能被看成是北朝鲜的侵略和想把国家拖入内战。北朝鲜的进攻同样可能给美国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北朝鲜侵略问题和争取联合国同意向南朝鲜派遣美军提供借口。而外国军队长期占领南朝鲜又会使得统一国家的事业不会很快解决”。<sup>①</sup> 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早于艾奇逊的声明。关于朝鲜能很快胜利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并不相信，苏联甚至不同意朝鲜发动收复翁津半岛的战役，担心局部战争扩大。关于中国可以帮助的问题，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和中国向朝鲜承诺的是在中国内战彻底结束之后。如果在中国没有完成国家统一时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自然妨碍中国的统一，事实也证明，朝鲜战争使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

1950年2月2日，斯大林再次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要求他转告金日成：秘密前来莫斯科，暂时不要告诉北朝鲜其他同志，也不要告诉中国同志。<sup>②</sup> 2月9日，苏联原则上同意朝鲜组建3个步兵师和1950年动用1951年的部分贷款，实际上开始积极支持朝鲜备战。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莫斯科，中苏已经结盟，斯大林并未向中方通报其立场的改变而是向中国领导人保密，这里是不是存在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有民族主义倾向，欲通过朝鲜战争制约中国的意图呢？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确实有人这么看，英国领事布赖恩就认为，朝鲜冲突是莫斯科蓄意发动的，目的是破坏中国夺取台湾，不让中国强大起来。在他看来，好像近来美国和苏联配合默契，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不让中国结束内战。<sup>③</sup>

<sup>①</sup> 李静杰提供的《朝鲜战争大事记》。

<sup>②</sup>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7, Л. 12. 转引自《神秘的战争：1950—1953年朝鲜的武装冲突》，第56页。

<sup>③</sup> 7月13日，罗中向莫斯科通报中国人提供了北京外交使团某些人士关于对朝鲜战争的说法的情报。源自李静杰提供的《朝鲜战争大事记》。



1950年3月30日到4月25日，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近一个月，斯大林三次会晤金日成，有关谈话没有在苏联档案中找到，但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个人档案记载，会谈大致谈了以下一些问题：金日成拟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统一；朝鲜的经济建设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归还朝鲜咸兴港的问题。斯大林自己称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应该积极行动。在共产党的计划中，中国必须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中共已经胜利了，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胜利改变亚洲力量对比，中国可以出兵帮助，美军撤出了中国，不会与中共作战。现在中苏结成了同盟，美国更不会干涉朝，苏联也是核国家，绝对相信美国不会干涉，而北京会支持朝鲜的解放战争。金日成认为，有中苏同盟，美国不会冒险，毛泽东不只一次答应帮助朝鲜，包括军事援助，朝方相信自己的力量。斯大林要求朝在军队数量与质量上超过南方。通过三个阶段解决问题。斯大林提醒金日成，不要指望苏联直接参战，要求金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sup>①</sup> 这可能是使朝苏认为美国不会干涉的原因。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朴宪永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他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斯大林说了，“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晚11时30分，周恩来就去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得到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说明。5月14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确认了朝鲜领导人的说法，这封电报说：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同意让朝鲜人采取统一朝鲜的行动，但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要等以后重新讨论后再作决定。<sup>②</sup> 在中苏结成同盟、斯大林又对毛泽东不是很信任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同意。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同意了金日成对北朝鲜和南朝鲜局势的评价，他告诉朝鲜同志，在朝鲜完成统一后，中朝两国可以签订类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那样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sup>③</sup> 实际上，毛泽东认为北朝鲜向南方进攻的问题在莫斯科已经解决了，无须中国直接出面，朝鲜也无此要求，所谓的中国同意只是形式上的。此后，中国并未参与朝鲜战争的准备工作，仍然致力于准备对国民党军队的海战。

① 《神秘的战争：1950—1953年朝鲜的武装冲突》，第58—59页。

②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94.

③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95.

苏联人切实帮助金日成进行着战争的准备工作。在金日成访问苏联前夕，斯大林同意按金日成的要求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装备，朝鲜以黄金、白银、钼精矿、铅支付。根据苏联外交官的报告，北朝鲜军队在6月12日开始集结于三八线，6月23日完成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和地形侦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声称李承晚对之发动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之下制定的。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据俄国档案透露，1950年7月1日和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亿7千万卢布。”<sup>①</sup>当时，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干涉，想尽快让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

北方的进攻出乎李承晚政府的预料，12小时后南方才开始进行有效抵抗。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海空军和美国武装力量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援助。同一天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问题，苏联代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没有出席，使美国的意志顺利实现。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后，苏联指示朝鲜军队继续进攻，尽快解放南方，苏联的顾问要换便装，作为《真理报》记者，保证不落入敌手。7月11日英国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建议让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和平解决问题，但斯大林反对，称这是厚颜无耻，不能接受。这个问题只能在有中国和苏联代表参加的安理会解决。对于苏联代表不参加安理会，从而让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毫无阻碍地行事的做法，许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他向苏联驻捷大使表示：“民主阵营不应该离开联合国安理会”。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他，8月27日斯大林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出了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真实意图，值得注意。在书面答复中，斯大林写道：

“我们对6月27日离开安理会和随后事态的发展，看法与哥特瓦尔德不同。

---

<sup>①</sup>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载《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第74页。

我们离开安理会有四个目的：第一，目的是示威性地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sup>①</sup> 第二，目的是强调美国政策的愚蠢性，它承认国民党的稻草人在安理会作为中国的代表，而不允许（新）中国的真正代表权；第三，目的是使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由于两个大国代表的缺席而不合法；第四，目的是让美国政府放开手脚，使他们能够利用在安理会中的多数采取新的愚蠢的行动，使社会舆论能够充分看清美国政府的嘴脸。

我想，我们达到了这些目的。

在我们离开安理会后，美国被牵连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的军事威信和道义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暴虐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方面它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清楚，美国现在被从欧洲引到了远东。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

正如您所看到的，苏联参加还是不参加安理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这样看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离开还是参加安理会取决于具体情况。我们能够再一次离开安理会，也能够再次返回，这取决于国际局势。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我们的目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干扰他用安理会的旗帜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陷入侵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达到这一目的。我想，已经很清楚了，不用再进一步解释了。”<sup>②</sup>

---

① 此时，苏联与中国已经结盟，用不着通过此事来证实。

② 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 558，ОП. 11，Д. 62，Л. 71—72.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让美国卷进朝鲜战争、陷入其中并受到削弱，这样可以减轻苏联在欧洲的压力。但是，斯大林也不会让美国人获胜，他一直密切关注朝鲜战争的进展，他认为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然会介入，不能让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苏联有共同利益。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如果美国不干预，金日成获胜，那是最理想的结局，苏联可以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支配权，获得其矿藏和良港。如果美国参战，有中国人顶着，不会导致苏美冲突。让中美交恶有利于苏联。

### 斯大林积极推动中国出兵朝鲜

斯大林一直积极推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有关情况在沈志华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sup>①</sup>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简单列出几份文献。1950年7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要求中国“集结9个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敌人越过38线时志愿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尽力为这一地区提供空中掩护。”<sup>②</sup>7月8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华使馆通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该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sup>③</sup>中国当时虽然跟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向朝鲜派驻大使。列多夫斯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口头上宣布帮助朝鲜半岛统一，但事实上想让苏联承担这一任务，中国处于中立的立场，目的是不想跟美国激化矛盾。斯大林清楚这一点，急于推动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军队派到朝鲜去。<sup>④</sup>

此时，英国建议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和英国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胜利，打下去并没有好处，美国不能自己提出和平建议，在策略上让英国人出面，或者印度人出面。但斯大林并不想停战，驳回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和平倡议。7月13

①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79.

③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82.

④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99.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是在朝鲜战争中受伤的朝鲜儿童。（新华社稿）

泽东回电，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好意，并提出了加强东北空军的一些意见，主要是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并表示派专门人员到莫斯科与苏方具体商谈。<sup>②</sup>但毛泽东并没有提帮助北朝鲜一事。而朝鲜的局势一天天恶化，到9月份，朝鲜战场形势发生逆转，美国依靠空中优势，打击朝鲜的军队和平民，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向平壤进军。北朝鲜军队遭受严重失败。朝鲜人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领导人，而是不断向莫斯科求援。斯大林神经紧张，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这次是美国人置之不理。斯大林加大了对毛泽东的压力。1950年10月1日，他从索

日，斯大林再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来电报，声明苏联已经驳回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对印度人的要求不予答复，同时敦促中国出兵，“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师——24架喷气式歼击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计划在两三个月内利用我们的飞行员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培训，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考虑，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请告知您的意见”。<sup>①</sup>斯大林想通过给中国军事帮助促使中国出兵。

1950年7月22日，毛

①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85.

②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89.

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在谈了朝鲜的严峻形势后，斯大林说：“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等候您的答复。”<sup>①</sup> 10月3日，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10月2日发出的电报。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

<sup>①</sup>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97—98.

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sup>①</sup>

10月5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提醒中国领导人说过敌人越过38线，中国就会出兵，而且认为不会引起严重后果。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讨。10月6日，苏联从朝鲜撤回专家。10月6日，毛泽东在与罗申的谈话中表示中国至少出动9个师的兵力入朝，但需要苏联提供装备和运输工具，让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跟斯大林面谈。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同意了您的意见。我已经任命彭德怀任指挥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岗同志担任志愿军的支援和保障工作，他们昨天早晨已经从北京飞往沈阳。中国军队在10月15日前可以出兵到朝鲜，中国决定出兵的事已经告诉了金日成，周恩来和林彪已经动身去苏。<sup>②</sup>

中国出兵必须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援，周恩来和林彪到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是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合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一致得出的结论是：“（1）尽管国际条件有利，但中国军队由于目前没有做好准备，不应该跨过朝鲜边境，以免陷入不利境地；（2）如果军队已经跨过边界，也不应让他们在沿着中国边界的山区继续前进；（3）一部分军队占领朝鲜北部的平壤和咸镜山区组织防御，一部分军队在敌人后方转入游击战；（4）应征的朝鲜战士中的优秀分子和指挥员分成小组悄悄地进入满洲，在那里建立朝鲜师；（5）平壤和其他北朝鲜较靠南的山区的重要据点立即疏散。”斯大林答应完全满足中国的军备需求。<sup>③</sup>毛泽东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在10月12日回电表示同意，中国军队还没有行动，他已经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完成先前入朝的计划。<sup>④</sup>

但是，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罗申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宣布：“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一次讨论和研究了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和我的意见，我们的领导们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朝鲜人。”毛泽东同志要求把周恩来留

①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05—106.

②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32.

③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34—135.

④ 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41.

在莫斯科，继续与斯大林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方案。<sup>①</sup> 苏方赶紧把毛泽东的这个新决定告诉金日成，让他停止执行向北撤退的命令。

毛泽东决心入朝作战，帮助北朝鲜，主要原因是美国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当然也威胁了苏联的边界安全。中国出兵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无论从战争的起因，还是从其扩大来看，主要都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体现的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

### 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一场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战争，苏联是唯一在战争中只获利的国家。正如英国学者所说：“在朝鲜进行一次有限的战争，能使中国人明白其真正的军事利益所在。如果这是斯大林的思路，那这种思路被证明是对的。朝鲜战争使苏联与中国翻脸整整推迟了十年。这并不是说是斯大林策划了这场战争。”<sup>②</sup> 朝鲜战争加强了中国和朝鲜对苏联的依赖，加强了中苏同盟。

这场战争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场损失巨大但国家分裂状态没有任何改变的战争。“朝鲜战争是20世纪一次典型的悲剧。战争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发起。朝鲜战争杀死了3.4万美国人、100万朝鲜人和25万中国人。战争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所有的后果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战争的进程错误百出。金日成和斯大林低估了美国人的反应。杜鲁门认为这是攻击日本的前奏，是对美国通过联合国维持国际法的公然挑战。”<sup>③</sup> 美国人也在朝鲜战争中损失了财产和生命。据1956年福布莱特在其关于朝鲜战争书中的统计，美国为了保持南朝鲜这个“自由世界”，损失了33629名士兵，军费和给予南朝鲜的援助总计有56.1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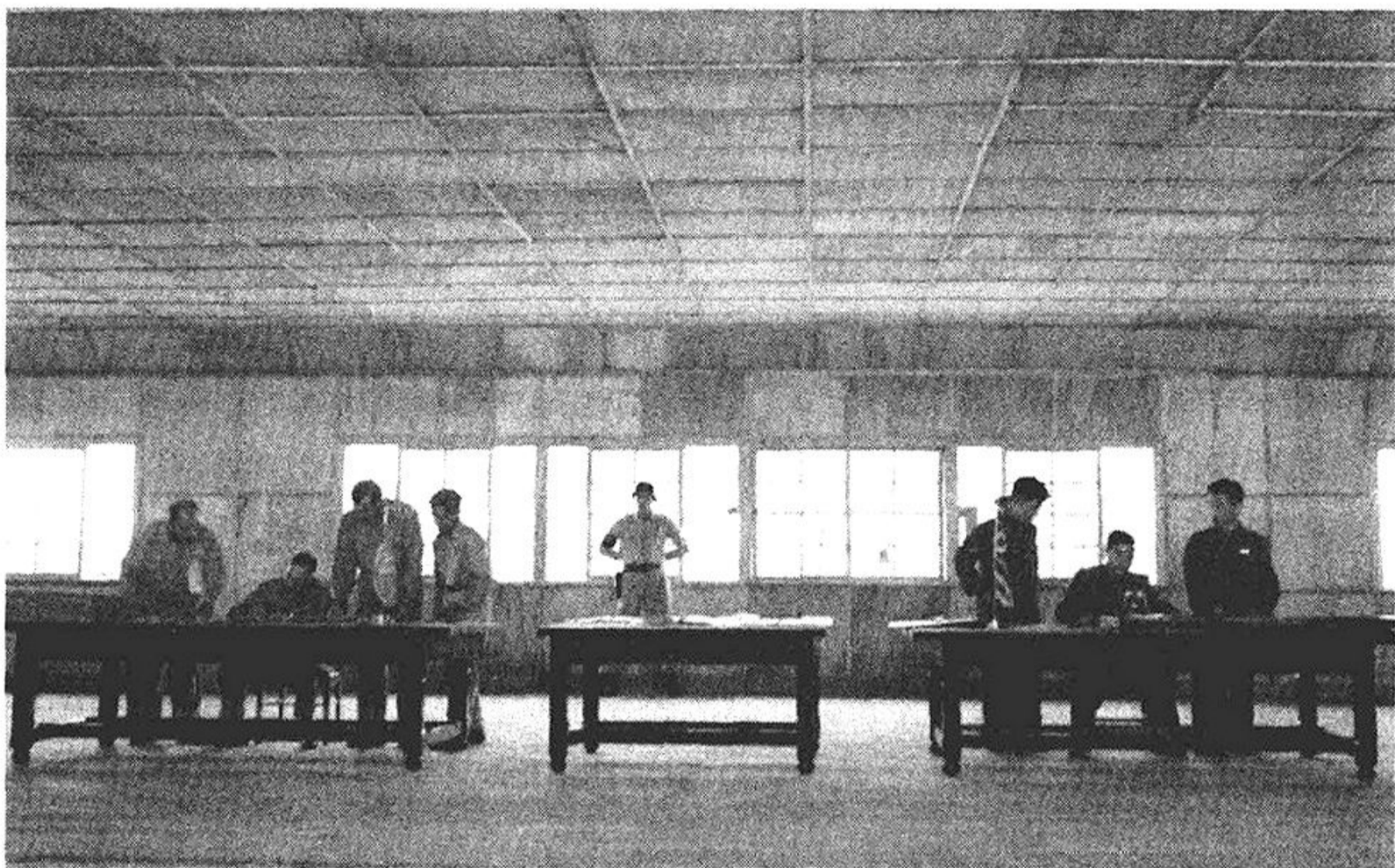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得亦有失，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国人赶过了三八线，迫使美国人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and 志气。朝鲜战

<sup>①</sup> Р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45.

<sup>②</sup> (英) 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2页。

<sup>③</sup> (英) 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第552—553页。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这是当日，在朝鲜板门店，朝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新华社稿）

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东北成为国家建设的工业基地。朝鲜战争也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物质和人员损失，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恶化了中国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的关系。朝鲜战争使美军协防台湾，台湾问题被国际化了，给中国统一带来了大麻烦。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美军开始长期驻扎在朝鲜半岛，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协定和联盟条约：如美泰军事协定（1950年10月），《美菲联防条约》（1951年8月30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日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953年9月）；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1955年1月），美国同柬埔寨签订《军事

援助防御协定》（1955年5月）。美国势力合法地延伸到整个亚太、南亚地区。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国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也大大恶化了。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运往中国物资的许可证，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951年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增设专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了45个。

## 42. 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何 伟

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突破斯大林的“两个凡是”。即使中国达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结束，那时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回归到斯大林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不过赋予它新时代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一个永恒话题。

### 斯大林主义“三步曲”

第一步：逻辑。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其次，党的领袖是解释、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有权威的理论家。第三，党的领袖是未加冕的终身君主，接受帝王的鸟啦、万岁三呼。他具有绝对权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人专政，他一言九鼎，有权决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恩格斯讲过：马克思曾几次说“‘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sup>①</sup>可见，后人把马克思主义推崇到这样高位，只不过是借助钟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第二步：空想。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如果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时，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本国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5页。

的实际，想出一套社会制度，如恩格斯所讲：“从外面强加于社会。”<sup>①</sup>那就是倒退，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回到空想，其危害超过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是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冠以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误导性；二是它有一个社会主义实体，可以强制推行该制度，并要求人们大唱社会主义好；三是这一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权威相结合，就是打人的棍子和杀人的刀子。对持不同意见者、即使共患难的战友也要清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肉体消灭，就是放逐，或者驱逐国外，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

第三步：失败。为什么苏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民80多年，竟没有培养出一位像在内战期间的夏伯阳式的人物，在苏联垮台时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长期战斗。这是可悲的，值得深思，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但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失败。

## 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这个标题不是东施效颦，有新的内容，是指：凡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凡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捍卫，但所坚持和捍卫的均是斯大林确立的理念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个凡是”必须突破，理论才能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如果说第一次突破“两个凡是”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那么这一次突破“两个凡是”是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这比上次评价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是从苏联照搬来的，其根子在斯大林。虽然两者的内容不同，但在反对个人崇拜和解放思想方面是异曲同工，故再次用突破“两个凡是”为标题。

### 一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

首先，人们往往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这里讲的“科学”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说明社会主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08页。

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之上，其奠基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不是空想的。这只是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划。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什么是空想时，是这样讲的：“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sup>①</sup>

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走向科学，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恩格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sup>②</sup>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科学是指社会主义从此摆脱了空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为未来社会规定目标和内容。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sup>③</sup>恩格斯在1893年，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sup>④</sup>恩格斯在1886年，应邀谈社会主义的特征时指出：“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2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sup>①</sup>

从以上几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规划“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恩格斯说，“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未来社会组织方面，“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他们对未来社会、没有“预定看法。”这样做：一是避免在尚无这种经济关系时，来设想“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因为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来设计社会主义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于纯粹的幻想。”二是“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来束缚后人的手脚。三是“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未来社会制度组织情况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确立，因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四是恩格斯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sup>②</sup>五是恩格斯在1875年所指出的，历史表明，在1848年时我们“错了”，“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斗争方法“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历史消除了当时的“迷误”，所有这些都“值得在这里较好地加以研究。”这就表明，不仅对未来社会不作预测，而且对已确立的理论、观念、斗争方式也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他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不可能为未来确定一个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新纪元题词，他说：“用不多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他摘录了《共产党宣言》一句话作为题词：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谈社会组织结构特征，可见，他们没有一个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

再次，既然经典作家没有提出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预想，后人也可以根据他们一些观点概括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如有人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四项基本原则当时提出的内容是以当时的条件为依据。但随着改革开放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7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1页。

的进展，社会实践已发生很大变化，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新的内涵，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这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社会主义的特征随着“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也在发生变化。这种新的内涵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已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新的内涵是法治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由法制专政所代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这个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现在又加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代表”，是两个先锋队的代表。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四项基本原则内容已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发生变化，这就表明，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科学社会主义定式，所谓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也就不能成立。

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也用过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主要是为了表明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后来是为了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区别，而不是阐述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

最后，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明确结论”，而不是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如果一定要问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组织方面详细情况，可用邓小平的两句话：一是“三个有利于”，二是“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三个有利于”，表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为依据；二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符合恩格斯提出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在实践中探索“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错了就改，而不是先验的设想一个固定模式，来束缚人们的手脚，这不符合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

##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论述过，只有斯大林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败，它对社会主义探索来说是一大贡献。其制度的经济基本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但是这三大特征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外表上的区别，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斯大林所倡导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克思认为：一是资本主义被否定之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应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至于如何融合马克思没有讲。但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完全把个人所有完全排斥在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教导。<sup>①</sup>二是斯大林确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者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就使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成为“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三是全民所有制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它的内含和外延没有明确的界定，是没有主体的虚构，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对其界定为“国有经济”。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斯大林所规定的公有制范围，如股份制（初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和各种基金等。实践证明，两种公有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公有制形式，而是多种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其次，关于计划经济。一是斯大林所确定的“有计划按比例”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一论证不能成立。有计划是主观的，按比例是客观的，二者如何成为一个客观规律？二是将有计划按比例作为一个规律，实际上是有计划地破坏按比例，可集中人力财力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或集中力量完成一两个项目，如两弹、航天等，但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日用品严重匮乏，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三是这种计划经济，效率低、投入大、产出少、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下，无人负责，成为一种官僚的“短缺经济”。四是恩格斯晚年指出：“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sup>②</sup>这就表明，不能把有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已尘埃落定。

最后，按劳分配也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一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在资本主义工薪收入群体中就存在，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得还好，没有平均主义。二是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是不断改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264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08页。



变，不断进步的东西”。“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sup>①</sup>表明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长期不变的唯一分配方式。三是按劳分配只是社会主义工资收入者的一种分配原则，并没有包括其他分配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除了讲按劳分配外，还讲了6项分配原则，农民是一个很大的非按劳分配群体。四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为目的，所以不应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来坚持。

由此可见，定为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斯大林针对资本主义弊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你私有制我公有制，你生产无政府状态我是有计划，你剥削工人我是按劳分配。这三大特征只能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外形上的区别，并没有道出社会主义本质。因而将斯大林所设置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捍卫，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 对斯大林的评价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所谓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所谓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者都是斯大林所杜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设计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里就涉及对斯大林如何评价的问题。过去对斯大林的评价曾用“三七开”，用数字虽然能具体表明功与过在量上之比，但不能表明功与过在质上的是非。我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从过程来看功与过，从结果来看成功与失败。如果在当年以反修为主旋律时，认为“这把刀子不能丢”，还情有可原。但在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已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对斯大林应有进一步认识，应重新评价斯大林，这里讲四句话：

### （一）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探索者

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里程碑，他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社会制度。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但他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逝世了。斯大林在世界上是第一位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并使该制度存在80多年。他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1页。

专政学说，变为一党专政。他将《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变为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观点，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他将按劳分配变为实行八级工资制等等，因而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都按照这一模式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在人类历史上无有先例。就斯大林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社会主义零散论述，变成一个系统的具体制度这一点来说，不论正确与否，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伟大的探索者，功不可没。

## （二）斯大林是一位社会主义理论最大的误导者

同时斯大林又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的误导者，他将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上升到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他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律斥之为修正主义，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上是属于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应该是有功之臣。但他把这一模式作为唯一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有些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缺少发展观念。恩格斯晚年，于1875年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好地加以研究。”恩格斯所指1848年即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所持的斗争方法是“错了”，所持的观点“陈旧了”，是“幻想”，历史的发展使其揭开“迷误”。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sup>①</sup>

恩格斯这一分析虽然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但它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即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一些矛盾和阶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07页。

级力量对比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就限制了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这是产生错误的原因。而斯大林不具有恩格斯这种科学发展观，不能与时俱进，没有揭开恩格斯所指出的1848年时期的“迷误”，甄别哪些属于“错了”、“陈旧了”，是“幻想”，他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讲过的话统统认为是正确的，这是第一个误导。

斯大林的第二个误导，是他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个别观点，加以引证阐述，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典，加以确立，不容讨论、质疑。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就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sup>①</sup> 在恩格斯逝世前两年，即1893年，他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sup>②</sup>

既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连未来社会组织方面详细情况的影子都找不到，那么斯大林就应把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探索，而不应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凝固为“真理”，不允许改革和发展，这对后人又是一个误导。

同时斯大林所杜撰的这些理论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的，经不起推敲和实践检验。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的理论。一是排斥个人所有，二是两种公有制是不平等的，为以后的二元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全民所有制是一个非科学概念，主体是虚设的，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楚，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把它重新界定为“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是对农民的剥夺。他提出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也是不能成立的。有计划是主观的，按比例是客观的，怎么能将二者放在一起称为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问题上，他虽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但是很不彻底的，只承认消费品是准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他一方面讲棉花、谷物价格过低，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另一方面他又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他否定了价值规律也就否定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商品经济，也就抹杀了利润的作用，等等。

### （三）斯大林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

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有些误导，但社会主义对人类还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是许多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因而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如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军工、两弹、航空、航天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并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二战后，苏联又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和一定时期，都显示了集权经济的作用。

### （四）实践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应当承认，这些成就大都是在对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而获得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每一个企业、每一项活动都由上级指令，企业无有经营自主权。所有企业如同一木偶一样，都由上面一条线来牵动，自己不会行动。只有将其他木偶置于不顾，只牵动一两个木偶，才能集中全国力量，在短期内完成一些重要项目，其结果使国民经济出现畸形发展，形成“短缺经济”，到处实行配给制，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使人们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失望。所以，它在历史上只能辉煌一时，而不可能长期昌盛下去，因其缺乏生命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斯大林所设置的所有制是一种唯意志论，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官办经济，排斥了公有与个人所有相融合。他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唯权威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 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后果是，资源高消耗，投入多、产出少、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生活品匮乏，人们生活困难。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阶层，严重脱离群众，缺乏民主，形成个人独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垄断为特征，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邓小平称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这些国家人们害苦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倒塌。不管人们怎么说：苏联的变质是出现叛徒，还是帝国主义颠覆，但当这一制度瓦解时，没有出现夏伯阳式的人物为捍卫苏维埃而战斗，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悲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4页。

剧，是人心所向，是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一种无形投票。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瓦解，在尚存的几个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改革对象。时至今日，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实践表明，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斯大林的失败也就盖棺论定了。

斯大林的问题主要是由他所创建的制度模式。他是这一制度的缔造者，这一制度模式又把他推崇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享受着封建帝王的权力和尊严。连孙中山都反对的封建称颂，我们共产党的领袖都接受了三呼乌拉或万岁！（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职后，4月1日乘船到福建马尾时，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大小船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小旗和横幅。孙中山很生气，他说我现在是平民，万岁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为消灭这一封建王朝牺牲了许多革命同志，如果我接受这一封建称呼，对不起这些先烈，不撤走这些标语横幅，不上岸。）<sup>①</sup>党的领袖又受这一制度所驱使，做了一些本人也不愿做的事情（如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斯诺说，我讨厌“四个伟大”）。斯大林又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这一制度不能制约他犯错误，反而纵容他一意孤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指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不谈这一制度的原因，只反斯大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反而继承了这一制度，必然导致灭亡，证明了邓小平所讲：“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所有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才焕发出社会主义的新春。所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作为一次伟大革命，这一革命对象应是“缺乏民主”、“物质贫乏”、“精神空虚”。而以这三者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正是邓小平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它应成为革命的对象，不应成为坚持、捍卫的偶像。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改革前进。有错误要纠正，如同泼去为新生婴儿洗涤的脏水一样，但不要将婴儿丢掉。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改革中探索，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

<sup>①</sup> 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 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是属于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这是在纠正斯大林理论的误导，获得思想解放，才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一）坚冰已打破 航道已开通

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是一重大突破。在所有制上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混合所有制，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表明全民所有制已不存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和两类骨干企业”，大大缩小国有经济占据的行业和领域。2009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从30年改为“长久不变”，这就意味农民与集体的承包契约关系结束，集体所有制已基本不存在。资源由政府的计划配置，改为市场配置，这种计划已不存在。按劳分配分配改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可见，斯大林所设计的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被突破。这一突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生。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接，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目前我国对斯大林“两个凡是”的突破，应当说坚冰被打破，改革的航道已开通，但继续走下去还任重道远。

### （二）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根深蒂固

在我国，斯大林的理论误导还远远没有清除，其影响还根深蒂固。如有的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还是回到斯大林的模式上去，仍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看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因为我国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并不是斯大林这一理论有错误。所以就有人将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看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忽视了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各种基金等所组成的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观点都影响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改革已进行了30年，到目前还没有到位，

还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在这种双轨制下，名义上是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计划控制。名义上是政企分开，实际上是将政府垄断改为国企垄断。名义上将国企改为股份制，实际上国企的本质仍旧未变。这样，有人就能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体制获得特权而不承担责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想使改革止步不前，就将斯大林的公有制理论作为依据，反对发展民营经济，主张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可见，绝不能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改革的对象，斯大林的理论影响就会自行消失。对斯大林的影响力绝不能低估。当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就想突破斯大林的理论，但结果只是在斯大林的体制内进行管理权的改革，对这一体制没有触动。在以后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仍然没有超脱斯大林的理论，人民公社就是沿着斯大林设置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理论，实现“一大二公”。在毛泽东想纠正“三面红旗”所出现的错误时，曾号召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他指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议有评，出版了三本读书笔记，基本上是肯定的，没有跳出斯大林这一“如来佛”的手心。如今，不纠正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导，我国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徘徊不前。

### （三）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德国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还是“死人抓住活人”。例如目前在理论上对民营经济的蔑视。现在我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如同一张太极图，二者在GDP的比重上旗鼓相当，这一太极图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写照。可是有人不承认这一现实，只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而占GDP的65%、占新增就业岗位80%、占税收总额56%，<sup>①</sup>已占半壁河山的民营经济，难道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就不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这是不顾事实的一种偏见，是斯大林的“理论”在作怪。

市场经济与斯大林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斯大林的理论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但突破斯大林的“理论”，如同一次“伟大革命”，绝不是“技术性细枝末节的修补”，因为斯大林模式是一个完整体系，各方盘根错节，相互制约，互相依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应进行

---

<sup>①</sup> 见《民（私）营经济内参》2009年8月28日。

其他领域的改革，才能使改革取得胜利。邓小平 1986 年 6 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sup>①</sup> 所以，改革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协调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实践证明，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行动。过去我们吃够了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之苦，今天我们还受他误导理论之害。我们只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突破他的“两个凡是”，才能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才能使思想进一步解放，才能使理论创新，才能推动改革前进，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继续前进。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4 页。



## 43. 俄罗斯在重新评价和肯定斯大林吗？

马龙闪

近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俄罗斯出现的所谓“斯大林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在“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这种观点把“重新评价”斯大林与“重新肯定”斯大林联系在一起，即认为俄罗斯不仅在“重评”，而且也在“重新肯定”斯大林。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俄罗斯在向着“恢复苏联”、“恢复斯大林体制”的方向前进。近年正是在这种观点及其潜在含义的影响下，笔者曾听到我国学界个别人发出了这种声音：“俄罗斯将来恐怕要走‘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这种说辞进行逻辑推理，那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中俄两国关系就要发展到类乎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盟邦兄弟”时代了。

针对这种观点，最近在桂林召开的一次学会年会上有个学者说，上面这些说法是“一厢情愿”，是一种“移情”的说辞——就是把自己对于苏联，对于斯大林体制的观点和感情移植、寄托到俄罗斯人的观点上去了；俄罗斯人是从其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斯大林进行评价的，他们没有“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意思，也没有恢复“苏联模式”、恢复“斯大林体制”的意思，而我国一些学者却把自己的这种思想强加给了俄国人，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嫁接”、“移植”给了人家，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实际上，近年来俄罗斯出现的围绕斯大林的某些言论——有人称之为“斯大林热”，是在俄罗斯国运衰微情况下，俄罗斯人为重新振兴，重建其强国地位，而“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是在呼唤像普京这样的‘铁腕’、强权式人物时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这里根本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更称不上是“重新肯定”斯大林，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

来观察，近几年俄罗斯主流社会舆论和官方没有“翻”斯大林的“案”，对斯大林评价上的某些“新”的说辞，也称不上是“歌颂”和“重新肯定”，所以，根本不存在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

下面，让我们从对“重新评价”这一概念的界定谈起，从俄罗斯近年出现“斯大林热”的社会政治背景，俄罗斯学术界近年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情况，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教科书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总体倾向，从俄罗斯近年涉及斯大林问题的出版物宏观数量情况方面的总体把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坚持俄罗斯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

### 什么是“重新评价”——对概念的界定

根据以往讨论这个问题的经验，在涉及问题本身之前，应该首先将讨论的命题、概念弄清楚，对其作必要的界定，否则，双方讨论若没有统一的概念，就会发生各吹各号，各弹各调，出现南辕北辙，甚至有偷换概念的事情发生。为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应对我们讨论题目中的关键词——“重评”或“重新评价”，作一个严格的概念上的界定。

我们以前讲过，“重评”这个词的概念应该是“基本评价的变动”，这样界定这个概念应该是不错的。中文《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虽然都没有列入这个词条，但《现代汉语词典》上对“重新”是这样解释的：是“再一次”或“从头另行开始”的意思。俄文“переоценка”（“重评”）的词根是“пере-”，其含义除有中文“再”、“重新”之义外，还有“过多”、“过分”、“全”、“完”、“遍”的意思。把这个意思同“评价”一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把“重评”界定为“基本评价的变动”，应是准确的，即含义为由“基本肯定”变为“基本否定”，或由“基本否定”变为“基本肯定”，这才可称之为“重评”。而一般评价的变动、调整，或在评价上略高和略低一些的色彩上的变化，不能叫做“重评”。所谓“重评”，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含有“翻案”的意味，是评价的大变动，可以说是从头到脚，从上到下，翻个个儿的评价和变动。

此外，对斯大林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评价，都还有一个观察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我们应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俄罗斯目前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不是属于“重新评价”的变动，而不是从别的什

么观点和立场来观察这个变动。比如说，就不能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其他主义出发，去观察这种评价的变动。这样，只有把概念的界定和观察问题的观点立场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准确地断定是“重评”抑或不是“重评”。我们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对待这个问题的，而不能像街道市民在聊大天时，胡吹漫谈的那样，只要是对什么人多说了几句好话，就叫做“重评”。这种态度我们是不能采取的。

只有把“重评”的概念和观察的立场、观点问题确定了，我们才好进入正题，来谈论俄罗斯近年究竟存在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

### 俄罗斯近年出现所谓“斯大林热”的社会政治背景

####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促发了对“斯大林”的话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口减少，社会动荡，凶杀案和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民众生活普遍降低，连生命安全也受到巨大威胁。所有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直接促发了俄罗斯的“斯大林热”。

自从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以后，俄罗斯的版图实际上又退回到了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它失去了气候温暖而又富裕的南方，用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苏联解体又把俄国人赶入了冰天雪地的寒带。

国家解体不只失去了大片国土，还丢失了一亿多人口，失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这使俄罗斯几百年打开出海口的努力化为乌有。加上经济大滑坡，工业衰败，一下沦落到了几乎二流国家的地步。加上苏联解体后十多年来俄罗斯经济危机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下降，贫困者经受着生活困厄的煎熬。

俄罗斯社会领域也危机重重，出现了灾难性恶化的局面，表现为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痛点，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者大增。据统计，近些年俄罗斯不计算酗酒和吸毒者，心理病人总数达400万，流浪儿童达200万—300万，无家可归者也有数百万之多。20世纪90年代末，妓女总数为300万人，其中每年有25万人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到国外从事卖淫。俄罗斯学者痛心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国家在历

史上还没有过。”<sup>①</sup>

国家权力削弱，法制体系松弛，社会犯罪严重。恶性抢劫杀人案逐年攀升。每年有20多万人被杀，人人无安全感，天天为自己、为家人和亲朋的性命担忧。

人口减少也成为严重的社会痛点。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升高。如果按现有人口发展趋势，一些学者预测，到2050年人口就会缩减到1亿。那时候，俄罗斯“对控制自己幅员广大的领土已无能为力”，有学者认为，有的地方可能成为外来势力的托管领地。<sup>②</sup>

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人过去连做噩梦都想不到的。所以，目前俄罗斯人具有严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些年，他们一直在探寻出路。试想，以俄罗斯人大国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其素有的民族性格和强国情结，他们会怎么选择出路？千条万条，答案归到一条：就是要有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俄罗斯人呼唤铁腕、期盼强权，渴望出现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来治理国家，整顿社会，重建世界大国、强国地位。所以，他们呼唤“第二个斯大林”，这成了近十多年来发自许多俄罗斯人心底的一个呼声。

这是目前俄罗斯发生所谓“斯大林热”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 （二）俄罗斯当权者企图寻找“国家思想”的定位

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俄罗斯都有这样一个传统，要有自己的“国家思想”，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在尼古拉一世时，曾有“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国家思想。苏联时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苏联解体抛弃其原有国家意识形态后，从叶利钦时期起，就开始探索“国家思想”。从叶利钦到普京，在寻找“国家思想”定位当中，先后有过下列几次调整：

（1）苏联解体之初，采取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当时，极端民主派得势，面向西方，向欧美靠拢。但休克疗法改革的破产，使极端民主派遭到沉重打击，他们依靠的那种西方自由主义也随之失去了吸引力；况且，俄罗斯有自己本身的传统文化，全盘端来西方的东西，跟着西方的屁股转，也为俄罗斯所习惯了的大国地位所不容。

<sup>①</sup> В·И·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第8页。

<sup>②</sup> В·И·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第14页。

(2) 大约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至 21 世纪初，又探索过欧亚主义思想。俄罗斯古代，特别是鞑靼蒙古入侵，给俄罗斯带来的东方传统更多一些。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沾染的西方基因，又使它瞧不起东方。同时，这种欧亚主义起不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大国地位的那种鼓舞作用，所以有迹象表明，官方又放弃了欧亚思想。

(3) 普京上台后，“国家思想”定位渐渐明朗，被确定为“强国思想”，或叫大国主义。这就是以俄罗斯强国主义、大俄罗斯自豪感为中心，高扬俄罗斯的光荣民族传统，重建它的世界强国地位。在用民族主义鼓舞人心，以期恢复世界强国、大国地位当中，斯大林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成了可资利用的重要精神资源。

普京用“强国思想”定位自己的“国家思想”，同民众渴望用铁腕和强权治理国家，以期恢复秩序和稳定的目的相吻合。由于他的官方思想定位与广大民众的愿望正相契合，所以，普京受到目前俄罗斯人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普京的这种“强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中派主义或者中间主义：既不是右翼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普京目前受到俄罗斯民众的广泛支持，就是因为他所持的这种中间主义立场。他选择这种思想定位，也与争取大多数选票有关。这说明，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是抱这种思想的。

普京上台后，这些年的几乎所有内外政策行动，都可以用这种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强国思想”来解释。

他在 2000 年 5 月 7 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应该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国家。我们应该保持这些记忆和时代的连续性，将我们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传给我们的后辈。”<sup>①</sup> 稍有一点俄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为建立并捍卫俄罗斯、为俄罗斯跃居伟大强国作出贡献的人物中，理应包括从留里克、莫斯科大公、伊万雷帝，到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等在内的所有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仅在二战前后就为俄罗斯扩大版图数十万平方公里，使俄疆域超过任何一位前任者的斯大林。要知道，这实际上是把斯大林放在同俄罗斯历史上封建帝王并列的行列里评价的。普京从这个视角肯定斯大林，就是用俄罗斯民族主

---

<sup>①</sup>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5 ноября. 2000.

义、强国主义的价值观对他进行评价的。须知，斯大林也配得上被列入这一行列、从这一视角被评说，因为他事实上为俄罗斯帝国的开疆拓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思想中也有相当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列宁就曾对他这种思想作过严厉批评。

普京强国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还表现在，2003 年举行的俄军洲际导弹演习，是彰显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的一次引人注目的空前行动。普京 2005 年邀请各国元首参加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60 周年活动，并举行举世瞩目的大规模庆典，更充分显耀了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

普京总统曾多次暗示，最好改写历史教科书，向青年人展现俄罗斯昔日的辉煌。这是用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思想线索贯穿教科书，与他的“国家思想”定位相适应的。

上述这一切，都贯穿着“强国主义”这一当今俄罗斯国家的官方思想。用这一思想，即俄罗斯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几乎可以解释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斯大林的一切评价。普京对斯大林在二战中功绩的肯定，就出于这一思想；俄杜马主席、政权党领袖格雷兹洛夫在斯大林诞辰 125 周年时，称赞他是“一位非凡人物”，也主要是指斯大林在二战中的贡献和这期间取得的强势外交谈判地位。这无疑也是从民族爱国主义立场评价的。俄议会的一个重要派别，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民族主义派，把十月革命骂为“黑暗”、“罪恶”；把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个个骂得狗血喷头，唯独赞颂斯大林。这更不肖说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强国思想”。就连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将斯大林歌颂为“不仅是俄罗斯 20 世纪历史上，也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这样说，不言而喻，是认为斯大林的地位超过了列宁——这也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来评价的；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出发，我们是不能同意这一观点的。

当然，俄罗斯在当今出现的这种以强国主义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引起民族沉沦和国家地位下降造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主义向来是依据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强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对待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持不同立场的。对于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同情、理解和支持态度的；对待强大民族和压迫民族的

带有进攻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反对态度的。俄罗斯目前的民族主义，应该说与它在沙俄帝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不加分析地、笼而统之地把它视之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在处于某种弱势地位时带有某种自我保护意味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应给予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但是，由于传统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由于俄罗斯人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强国情结，对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又不能同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完全等而同之；在他们这种民族主义之中，是不能不说含有某种原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积淀成分在内的。因此，我们应当有所分析，有所区别，对其不同成分采取不同态度，而不能笼统予以同情和支持，或一概予以批判和反对。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向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导师”，这是斯大林的主要身份，也是他整个生涯活动的本质方面；如果仅仅用上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即以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观点评价斯大林，不能说是对他的正确评价和真正歌颂。这样来评论斯大林，恐怕连斯大林本人也不一定会认同。大家都记得，斯大林1931年在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对于这位作家把他同彼得大帝所作的比较，斯大林是不同意的。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是为商人和地主的“民族国家”，而他是为工人阶级，“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因此，认为这位作家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恰当的”。他只愿做“列宁的学生”。他还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这个大海。”<sup>①</sup>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比较谦虚和清醒的，他对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是冷静的。按他这种评价，他也比彼得大帝伟大得多。而现在，我们有些学者，对俄罗斯当今把斯大林放在同封建帝王同一行列里评说，似乎就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不，这仅仅是把斯大林作为继承俄罗斯帝国遗产和传统的大国领袖来评说的，不是高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贬抑；当然，就斯大林的这一身份来说，这也是对他不失恰当的一种评说和谈论。

而对斯大林的真正的、主要的身份、本质的方面，俄罗斯官方又是怎么评价的呢？据俄塔社莫斯科2005年5月6日报道，普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3—94页。

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普京又说，这个时代的教训之一就是独裁，压制自由，这使国家和社会走上了绝路。<sup>①</sup> 普京对斯大林的定性，就是“独裁者”。俄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说，斯大林“在国内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过火行为并不光彩”。<sup>②</sup> 从俄官方代表人物这些言论看，恐怕不能说，俄官方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很显然，普京总统等对斯大林的本质方面，即国内政策方面，搞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面，是基本否定的。

对于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哪一身份、哪个方面是更主要、更本质的呢？无疑，是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的领袖，是斯大林体制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建者这一方面，这才是他的本质属性。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他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这难道能说俄罗斯官方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吗？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情况。

## 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决定着俄罗斯学术界历史研究态度的改变，因而发生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的重新评价。这期间，随着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史学界的改良—修正学派为自由民主派所代替。而在1992年以后几年，随着休克疗法—激进改革遭受严重挫折，西方自由民主派的史学观又陷入危机。大体在90年代后期，新的史学观——文明观开始抬头，欧亚主义为人们所重视。但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史学界的各种思想派别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新欧亚派和传统——乡土派，等等。<sup>③</sup>

<sup>①</sup> 新华社《参考消息》，2005年5月8日。

<sup>②</sup> 《政权党领袖呼吁重新审查对待斯大林的态度》，/Исвестия. 22 декабря. 2004. // [www.izvestia.ru/community/article891662](http://www.izvestia.ru/community/article891662)

<sup>③</sup> Г·И·兹韦列娃：《俄罗斯文明的特点：新史学论争透析》，载《社会科学和当代现实》，2003年第4期，第101页。



在这种史学流派纷呈并存的情况下，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各说各话，很不一致的。但我们应该着眼并把握史学界的主流、基本趋势、基本看法，而不能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把少数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史学界的主流。

那么，怎样把握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主流呢？这应着眼于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以此来把握这一研究的主流。

### （一）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对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多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sup>①</sup> 学术界大多倾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一系列关键的特征，如对社会实行绝对和全面的监督，一党专政，极度中央集权，压制异己思想，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民众的支持，等等。<sup>②</sup>

但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它包含有俄罗斯传统和革命后果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也指出，斯大林体制“是所有社会力量情绪和活动的综合产物”。不过，许多史学家也同时指出，不能忽视斯大林在这一体制形成中的个人作用。<sup>③</sup>

除了对斯大林体制的上述评价外，原改良—修正学派的“行政命令体制说”，还在一部分学者中间流行和存在。

### （二）对工业化的评价褒贬参半

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存在客观上的要求，是为苏联整个

① *Наша Роди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 1—2. М., 1991; Иванова И. В. Механизм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ласти. 20—30 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11; Гимпельсон Е.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эволю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1917—1930, М., 2003; Павлова И. В. Механизм власти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1; 列昂诺娃:《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现代俄国史学发展基本趋势》, 在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2005 年西安年会上的学术报告。*

② *Трухан Г. А. Путь к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у: 1917—1929 гг. М., 1994; Сахаров А. Н. Как мы понимаем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1996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学术报告; Фит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 - е годы: город. М., 2001.*

③ *Секиринский С. С. Сталин. Сталинизм.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2.*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况所需要的。<sup>①</sup> 但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可行的；而斯大林却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极后果较大的加速工业化方针。<sup>②</sup> 这一方针引起轻重工业、工农业严重失衡，社会过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非常措施。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化很快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对二战的胜利起了支撑作用<sup>③</sup>。总体上史学界对苏联工业化有褒有贬，但肯定者还是不少的。

### （三）对农业集体化基本否定

俄罗斯大多数史学家对使用强制、暴力手段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完全否定的。<sup>④</sup> 他们认为，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社会变成两极化，一极是官僚支配着国家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一极是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

### （四）对大清洗完全否定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30年代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普遍给以否定，认为正是这一大镇压，使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sup>⑤</sup>

近十多年来，大清洗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和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版了数百

---

①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овые факты,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Часть 1, М., 1997.*

② *Чемоданов И. В. Были ли в СССР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2; Грегори П. Еще раз о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90. №12; Кабытов П. С., Козлов В. А., Литвак Б. Г. 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этапы духов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М., 1988; Кооперативный план: иллюзи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М., 1995. и т. д.*

③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Шагина. Т. 2, М., 1999.*

④ *Хаустов В. Н.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6; Шекшеев А. П.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постанчество на Енисее. 1918—1932 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2, и т. д.*

⑤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е годы. М., 1996; Власти СССР и общество: Репресс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20—40-е годы. Под ред. В. П. Дмитриенко. М., 1999; Бакулин В. И. Кадровые чистки 1933—1938 годы в Кие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1. 等等。*

种，达上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和包括各种资料的著作。<sup>①</sup> 研究的问题涉及大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人数，等等，也出版了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出版了有关镇压情况的资料和研究性著作，仅普斯科夫一个地区就出版了有关那里镇压情况的 15 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 14 卷集，鄂木斯克有 6 卷集，斯摩棱斯克有 4 卷集，等等。

2004 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sup>②</sup> 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 134 万多名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 10 倍多。”<sup>③</sup> 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 1300 万—1400 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的确，俄罗斯有 3 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 89 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建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中。<sup>④</sup>

### （五）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

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

① 这样的著作，诸如：Репрессии 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е. 1937—1938: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Архангельск, 1999; Не предать забвению: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Т. 1—8., Псков, 1993—1999; Фролов В. А. Трагедия нар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епрессии Черемшанского р-на Татарстана. Казань, 1999;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Калин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Матриолог 1937—1938; Т. 1. Тверь, 2000; Из тьмы забвения: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1918—1954; Т. 1: Рос. Федерация. Астрахан. область, изд. “Волга”, 2000; Растрельные списки. Москва. 1937—1941. М., 2000; Панков С. А. Репресс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ибири (1928 – июнь 1941 гг.). Изд.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2002, 等等。

② 见网址 [www.intersax.ru](http://www.intersax.ru).

③ 见网址 [www.intersax.ru](http://www.intersax.ru).

④ 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 М., 2004.

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sup>①</sup> 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sup>②</sup>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Л·С·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 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结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sup>③</sup>

从俄罗斯学者对上面这几个重要方面的评价看，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

一般来说，教科书较能反映学术界基本的、主流的观点。为了更确切地印证上述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再让我们通过两种较为典型的教科书，看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先看看在教科书中带有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一部，这是由 Э·М·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为首的 20 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对于“大清洗”，它是这么评价的：有关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这本书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sup>④</sup> 可见，这个教本对“大清洗”是

---

① Лешен Л. Е. 1941 год. В 2 т., М., 1998; Случ С. З. Сталин и Гитлер. 1933—1941: расчеты и просчеты кремля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1; Суворов В. Очищение: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обезглавил свою армию? М., 2001; Короленкова А. В., Брукмийер М. Сталин, русские и их война 1941—1945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等等。

② В·И·扎伊季涅尔：《评 В·Ф·季马的〈1941—1945 年战争中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行为气质〉一书》//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6. С. 211—212.

③ Данилов В. П. Сталинизм 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2. С. 169.

④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Щагина. Т. 2. М., 1999. С. 83.

彻底否定的。该教本认为，30年代的体制是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对于整个30年代，这本书评论说，“尽管艰难困苦，发生所有困难，国家面貌却快速改变了”。“虽然国家生活在这个时期有过悲剧和矛盾，也有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但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劳动中追求高度职业技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和稳固家庭的思想动机，则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sup>①</sup>在这里，这本书只能用“强国思想”、国家发展和劳动、个人家庭幸福等最一般的思想来评论30年代，而怎么也否定不了“悲剧”、“乌托邦计划”和“矛盾、困苦”等。可见它尽管用语含糊，也不能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多少有力的论证和辩护。

另一部也是为教育部核准的教科书——A·K·索科洛夫的《苏联历史教程(1917—1941)》。该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说得更透底一些。它在评说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时认为：“现在，对苏联30年代社会体制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以极权模式或极权制度为最流行。”<sup>②</sup>这个教程也持这一观点。该《教程》说，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史学界各种评价都有，既有“乌托邦纲领”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特殊民族支派”说；既有“国家社会主义”、“变形社会主义”说，也有“兵营社会主义”说。<sup>③</sup>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史学界的主流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大体上仍然保持着上述观点。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史学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从这个更大、更宏观的视角，就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研究的状况作一个概观。

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史》杂志，这是俄罗斯史学界三大史学权威杂志之一，它几乎每期后面都转载俄罗斯《图书评论》杂志发布的俄罗斯近期面世的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新书书目。对这些书目，从2000年第1期到2006年第1期，除极个别几期杂志因他人借出无法查阅外，对6年间各期杂志上的绝大部分书目，笔者都作了查阅和统计。查阅书目总计2372种，其中明显直接涉及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书籍，计165种，其中从标题判断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占130种，属中

①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Щагина. Т. 2, М., 1999. С. 91, 92.

②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 1999. С. 213.

③ 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 1999. С. 213.

性标题的占30种，持肯定或赞颂标题的有5种。这个数量统计足以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出版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持否定评价的著作，要大大多于持肯定评价的著作。笔者以为，这种权威的纸质媒体资料比无法取得数量概念的电子网络资料更能说明问题。笔者之所以敢于断定，俄罗斯史学界“当今否定斯大林的资料实际上还更多一些”，<sup>①</sup>就基于这一资料来源。有学者对这一论断提出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

有人可能会问：有的中国学者在文章中举证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言论，说他们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或为他进行翻案，对此，你有什么评论？我现在就此讲三点：（1）我已经谈及了几个这类学者，如Э·М·夏金和库库什金等，他们分别是第一种教科书的主编和评论者。他们的观点在教科书中体现得较全面，看不出他们是要重新评价斯大林；有论者所引夏金的话只是表明了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国家思想”的某种调整，根本说明不了是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2）没涉及的其他俄罗斯学者，他们都大体是影响不了“基本盘”的极少数，其中有一直持30年代“联共（布）简明教程”观点的学者，他们几十年对斯大林观点如一，谈不到是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此外，有的还是学术界的“怪人”，如那个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史学界就如是称。（3）笔者还要重点涉及一部著作——弗·维·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sup>②</sup>这本书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2004年我国就用极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B·П·达尼洛夫对该书及其作者是有评论的，他说：弗·维·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了30年代法庭审判中那些被告的供词”，这样使用供词“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些“审判中的供词是如何得到的，人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领导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sup>③</sup>

B·П·达尼洛夫又说，他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领导请教并询问了有关《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引用1919—1930年间和1930—1940年间被镇

---

① 马龙闪：《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② （俄）弗·维·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原载（俄）《历史问题》2004年第2期；转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研究》2005年第3期，第19页。

压者的数字资料的情况。这位学者说：“2003年5月8日我收到了正式答复，说是经查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呈报的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1919至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资料。’因此从‘上述资料的形式’及其内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sup>①</sup>

这就是说，这是一本含有伪造资料的，甚至拿非法审讯口供做论据、存在严重纰漏的非学术性著作。像这类非学术类著作，恐怕不能用做评价斯大林的可靠凭据。而这类书籍或文章，或此类作者，或者连这类作者都不如，连节目主持人、演员关于斯大林的言论，都进入了相关学者的学术文章，并当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佐证，这恐怕是不可靠的。

### 解剖一个典型的标本——

####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用书》

在此，还要涉及近年被俄罗斯国内外炒作得很凶的一本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用书》，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标本加以解剖，看看从中是否能得出俄罗斯“重新评价”、“从新肯定”斯大林的结论。

这是目前最能代表俄罗斯民族爱国派对斯大林评价的一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被某些人看做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sup>②</sup>也是“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官方色彩”的一本书，并且认为，这本书引起了“西方震动”，是因为普京重新评价了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按照本书作者本人所说，该书“给出了一个评价祖国历史的标准”。

这本书在俄罗斯出版后立即引起我国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马上翻译出版，大加宣传，认为它“重新评价”了斯大林和苏联历史。下面让我们看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究竟是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了

<sup>①</sup> 原载（俄）《历史问题》2004年第2期；译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研究》2005年第3期，第19页。

<sup>②</sup> 在这里应注意，“教科书”与“教师参考书”有很大区别，前者是供学生使用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很强，学术价值也高；而后者是供教师教学中参考用的，带有资料性质。某些评论者把二者混淆了。这里所说的该著作是“教师参考书”，而不是“历史教科书”。

“基本评价的变动”，就是说，作了由“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评价，或者说“重评”、“重新肯定”了斯大林。

首先，看看这本“教师参考书”是怎么给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定性的。其中说：“斯大林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熟知俄罗斯历史并景仰上述历史人物（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引者），认为他们是自己的老师，而他也有意识地遵循先辈们的‘历史规则’。”<sup>①</sup>接着又说：“实质上，斯大林内外政策的目标是重建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上和地域意义上的帝国……斯大林实际上实现了‘白俄运动的理想’。”<sup>②</sup>这理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收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报那次失败的一箭之仇。

该书用很大篇幅论证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与15—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和18—20世纪的沙俄帝国，不仅有着“国家特征的相似性”，而且有着“政治—组织原则的相近性”，实际上是说，不仅斯大林本人是“俄罗斯帝王”，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继承人”，<sup>③</sup>而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历史演变”的结果，是前两者在“政治—组织原则”上的继承者。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具有对斯大林定性性质的评价，是肯定这位政治领袖人物，还是对他的否定？这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斯大林本应该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但却被定性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所领导的苏联本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却被说成是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政治—组织原则”的继承者，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颂还是侮辱？如果斯大林本人在世，也不会把这看做是赞颂之词的；他曾说，无产阶级领袖同彼得大帝相比，一个是“大海”，一个是“沧海之一粟”。他这句话，应该被无产阶级奉为“名言”，比起我们一些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学者来，是高明千百倍的。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把斯大林看做俄罗斯帝国思想的继承者，这并不是该

---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66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65页。



书作者亚·维·菲利波夫的发明，这是以前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历史学家早有的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年转向沙俄帝国传统，不仅恢复了沙俄帝国的机构名称（如把“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等）和建制，赞颂帝俄将领扩张侵略的功业，还把伊凡雷帝称为“伟大英明的统治者”。<sup>①</sup>因此，这本“教师参考书”对斯大林的这个评价并不是“重评”，这是“一仍其旧”的一种说法，差别仅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还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和价值观要求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思想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到了目前这位民族爱国主义者的作者亚·维·菲利波夫的笔下，却是完全没有了一丝一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气息，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标尺，而完全是歌颂、肯定斯大林这位“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奇怪的不是该书作者这种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倒是我国的一些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此也不加分辨，以为该书作者是“肯定”、“重评”了斯大林。目前的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学者，在这本“教学参考书”中是在大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舞曲，而我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知道为什么却也跟着大跳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舞来呢？

其次，再让我们看看这本“教师参考书”中被认为是对斯大林评价最高的一句话：“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sup>②</sup>作者在书中对“最成功”的理由，列举了5条：第一，正是在斯大林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第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第三，“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第四，“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第五，“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sup>③</sup>

在这里，斯大林所以“最成功”，赫然列在首位第一条的，是他扩大了俄罗

---

① Соколов А. К., Тяжельникова В. С.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 М., 1999. С. 174—177.

② (俄)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76页。

③ (俄)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76页。

斯领土，甚至还超过了过去沙俄帝国的疆域版图。据统计，斯大林在二战前后共扩大版图 67 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还包括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即并入苏联版图后的图瓦共和国）17 万多平方公里。这是“功”还是过：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看，当然是“功”；但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看，就未必是“功”，更不能称为“最成功”，还应该受指责。

但不能不承认，这位“教师参考书”的作者还是比我国的某些评论者稍客观一些的，他没有回避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后果”，并把它同样归结为 5 条：第一，上述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第二，“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他领导了“几次大镇压”；第三，“一些社会阶层整个被完全消灭——富农、城市小市民、神职人员、旧知识分子”。第四，“一些完全忠于人民政权的群众时而也受到严酷法律的迫害。斯大林时代也谈不到生命安全”。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低的，特别是在农村。”<sup>①</sup>

在这里，应联系到本书作者所提供的其他史实：“大量历史证据证实了‘大清洗’中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老的列宁近卫军”<sup>②</sup>和共产党的“管理阶层”——战后“政治镇压目标的性质也是类似”<sup>③</sup>。综上所述，斯大林执政的“后果”——完全按照该“教师参考书”的说法，就是：“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几次大镇压”主要打击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和共产党干部；“消灭”的那些整个阶层，大多数也属于人民群众；<sup>④</sup>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干部在这个社会“谈不到生命安全”，而且“生活水平也是低的”。请问，这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和社会？是真正继承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吗？本书作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斯大林时期建设的苏联，“并不是它（系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预定模式的继续”，<sup>⑤</sup>而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让我们对比一下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史学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初的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扭曲了社会主义”或者“背弃”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同作为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史学家的本书作者目前对斯大林的评价，二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 76 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 71 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 72 页。

④ 无数史实证明，30 年代镇压的“富农”大多是十月革命后富裕起来的一般农民。

⑤（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 70 页。

者有本质区别吗？没有，完全没有！非但没有本质区别，民族爱国主义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差别仅在于，民族爱国主义派对斯大林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作为，是不掩饰地采取赞扬态度的，而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扭曲”或“背弃”社会主义，在当时是持批判态度的。虽然一褒一贬，一扬一抑，但评价本质是无大区别的。将二者对待斯大林的观点相比较，这难道能说目前的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是在“重评”和“重新肯定”斯大林吗？

尽管本书作者在书中对斯大林作了不少明显的充满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辩护，但最后在综合斯大林功过的各有5条的评述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用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而不是站在俄罗斯大国主义、强国主义，因而也不是站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斯大林也不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在我们看来，苏联最成功、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列宁，列宁成功地领导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地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开创性地利用商品市场关系，提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①</sup> 像斯大林这样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苏联模式搞“僵化了”的领导人，难道能说是“最成功的领导人”吗？

从上面我们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从21世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的多数政治派别，包括俄共传统派、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一仍其旧，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充其量只是更客观、更理性了一些而已，所以谈不上是“重评”。关键问题是，对民族爱国派在调整、选择和确立国家民族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动怎么估计。通过上面我们对一个典型的标本——《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的解剖，可以清楚地看出，以普京为代表的民族爱国主义派领导人在选择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民族爱国主义和主权民主）当中所达到的限度，在调整对斯大林评价方面所能走到的极限。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目前对待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此，可以使我们在处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当中保持清醒头脑，不至于被所谓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云云的论调搞昏了头脑，以至于在俄罗斯向何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处去的问题上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前甚至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普京可能仿照中国模式，走俄罗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看法与近年我国某些学者对俄罗斯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误导有很大关系，也同一些人低估了极端民主派目前在俄罗斯思想界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几年从俄罗斯传出的信息是很矛盾的：一会儿报载，“调查显示，俄怀念苏联的人越来越少”，“相信苏联解体及国家通过主权宣言‘对国家有好处’的人增加到56%”；<sup>①</sup>一会儿又传出，俄罗斯目前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的人占47%。<sup>②</sup>一个时期又报道说，“俄罗斯出现末代沙皇热”：调查显示，“有将近70%受访者”“赞成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庭成员恢复名誉”；<sup>③</sup>可接着不久，报端又载，“俄学者称官方欲为斯大林恢复名誉”……<sup>④</sup>这诸多矛盾的信息，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目前俄罗斯舆论多元化的情况，但都是各持一端的新闻报道，并没有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抓住本质的综合分析。本文通过近年对斯大林评价变化的三个层面的分析，通过近年俄罗斯主要政治派别对斯大林评价变化幅度的考察，特别通过对可以代表当前俄罗斯主导政治派别（民族爱国派）观点的著作来作具体分析，又通过以上这三个问题加以综合考察，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所谓“重评”云云，只不过是部分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从大国主义、强国主义情结出发，对斯大林感情色彩的变化，对斯大林臧否向度的局部调整，并不是基本评价的变化和评价实质的变动。

## 评价斯大林的价值观问题

从目前普京和俄罗斯重要官方人物评价斯大林的言论看，无疑，他们都是从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出发评价斯大林的。他们评价斯大林几乎都是同对德

---

① 据俄罗斯《新闻时报》2009年6月11日报道；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9年6月13日，第3版。

②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第76页。

③ 法新社莫斯科2008年11月18日电；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8年11月20日，第3版。

④ 英国《卫报》2009年3月4日文章；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9年3月5日，第3版。

战争胜利，取得俄罗斯强国、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在近些年俄罗斯国力下降、经济萎缩，国际地位衰微情况下，他们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用强国主义鼓舞人心，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是应予理解和同情，无可厚非；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跟着这种俄罗斯的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调子跳舞。俄罗斯官方一些代表人物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把斯大林同历代俄罗斯帝王并列而肯定他的；甚至有人把这个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说得比列宁还伟大，对此我们是无法认同的。斯大林对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中沙俄失败感到受辱40年，在二战胜利后，他认为对日胜利是洗雪了“耻辱”；在二战前后，他以强势地位共吞并周边国家大片的疆土，包括属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17多万平方公里。对斯大林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行为，我们是不能同俄罗斯人一样看待的。俄罗斯人赞扬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功绩，其实也包括颂扬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和行为。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标准评价斯大林，而是用俄罗斯“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他的。

可是，我们中国学者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用这种原则和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就是要把他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者来评价，就是要像列宁如何对待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那样来评价；也要像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所持的立场那样来评价。最根本的，就是要遵照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原则来评价。《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是讲未来社会应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 这里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而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sup>②</sup> 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指导原则来看，斯大林模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50页。

神的，是“僵化”的、“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我们应该更新社会主义，重塑社会主义的形象，摆脱斯大林的模式。

可是，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的、本质的方面，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大多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肯定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政策，而又从他们目前对待社会主义的立场观念或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否定他的国内政策，他们从后一立场对斯大林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创立者所持的否定态度，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正因为这样，正像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 65 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访谈时所说，斯大林并没有“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出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认为“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并且他称这是俄罗斯的“国家评价”。可见，俄罗斯并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俄罗斯总统的这一番话，可以看做是俄罗斯权威人士对我国学术思想界数年来关于俄罗斯是否“重评”斯大林这一争论的最终结论。由此可以说，我国这场重要的学术争论已尘埃落定。

# 苏联真相

##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阎明复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

——李凤林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上架建议：世界政治

ISBN 978-7-5011-9404-9



9 787501 194049 >

定价：246.00元（全三册）